



红色中国网文集

2023 年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
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毛泽东

目录

“中帝论”者的新自由主义幻想与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节选）	6
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正确对待中国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企”问题	19
新古典主义对中央计划的敌视和无知（节选）	25
聊聊计划经济的过去和将来	41
“阳粉”大战喜羊羊、恩格斯和“阳和平老师”——介绍“阳粉”的批判技巧	58
怎样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来克服教条主义	69
“后资本积累时代”前夜的中国与世界 —— 2023 年新年笔谈	82
关于俄乌战争形势的两篇文章 —— “随波逐流、无可奈何”还是胜利在望？	101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能胜利？ —— 兼谈我们与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分歧 ...	110
实践工作和理论工作都是光荣的进步工作	137
俄乌战争 —— 二十一世纪的“准世界大战”	143
不在“同温层”的红色中国网	158
中美“缓和” —— 黎明前的黑暗还是危机爆发的先声？	187
未来三十年之内会有社会主义革命吗？	193
怎样在网上与“黑”而“不专”的小资产阶级落后群众展开辩论	198
与自由派的思想斗争，是我们的长期任务	203
2023 年 —— 世界力量对比转折的一年	208
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导致生育率降低的一些思考	220
从资产阶级御用“经济学家”的不学无术看新一轮新自由主义“改革”阴谋	231
什么样的制度最有利于科技进步？	235
评“关于当前国内形势的几点研判” —— 兼论消费不足学说的误导	239
为什么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离不开小农经济？	248
为什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以小农为主的农业是死胡同？	254
中国和资本主义全球经济，2000-2022 年	258
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和阶级斗争，2000-2022 年	270
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2000-2022-2100 年	281
产能利用率和企业利润率 —— 兼评唯“生产过剩”危机论的错误	294
全球气候变化，1880-2022-2100 年	305
中国资产阶级国家几种财政收支账户的区别和联系	316
中国资产阶级的“短策”、“长策”与“无策”	331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国家干预（一）	346
评反动民族主义分子的所谓“时间在我”	353
再聊聊中国资本主义与“时间”	364
人口老龄化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财政危机	369
美国工会 —— 美帝国主义的打手和帮凶	378
兵棋体会战争 —— 诺曼底战役推演笔记（一）	380
用兵棋体会战争 —— 诺曼底战役推演笔记（二）	414
中国人所理解的“死” —— 不是无可奈何的谢幕凋零	444

《红色中国网文集 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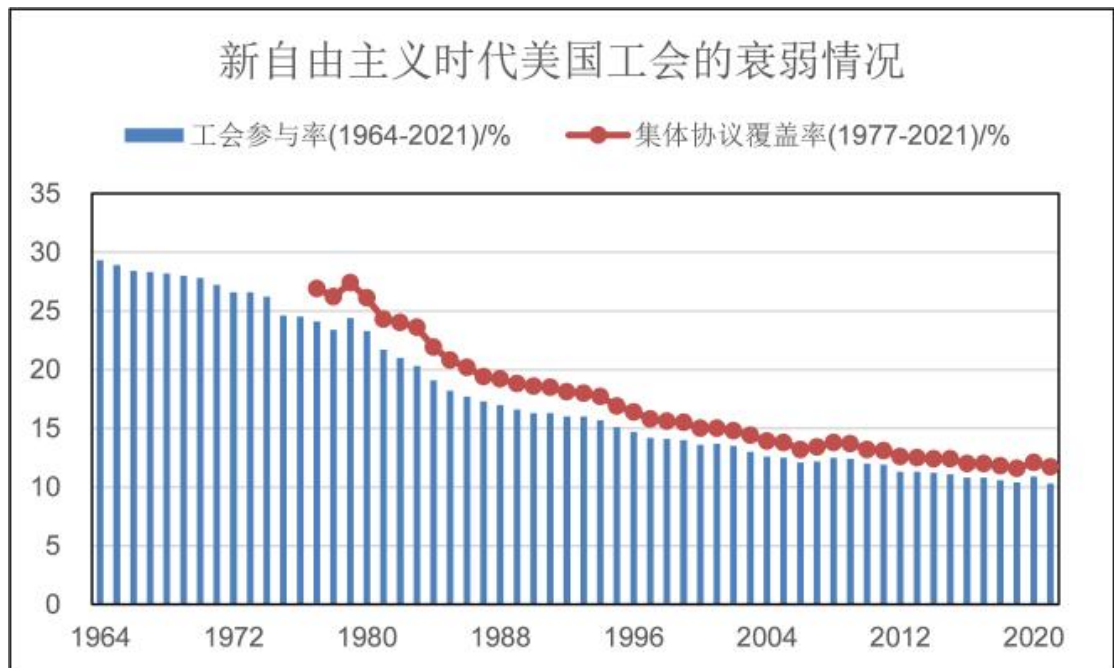
“中帝论”者的新自由主义幻想与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节选）

作者：半外围电子厂老保

做梦的学院派，造反的无产者

在过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运动曾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达成妥协机制中起过它的作用，为工人争取到了相当部分的利益，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今天，这充其量是工联主义的工会运动，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业已衰落。

下图为 1964 年到 2021 年美国工会参与率及覆盖率的情况。



可以明显看出，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美国的工会是日渐衰退的，1964 年美国的工会参与率还有 29.3%，而到了 2021 年就只有 10.3% 了，西方的工会运动都玩不转了，还想在中国这条件更差的地方搞工

会运动，亲，我还是建议你们转战晋江文学城和起点中文网吧，在那里写爽文给资产阶级整乐呵还能拿点稿酬。

在工会运动衰弱的情况下，为什么美国工人阶级仍然能在一些情况下组织起大规模罢工斗争呢？

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是由许许多多的环节构成的，劳动分工日趋复杂，一个部门有着很多生产环节才能生产出产品的某个部分，而产品又是需要多个部分组装起来的，这就意味着只要其中一个或多个重要的关键部门上的工人进行罢工，就会导致整个生产链条的瘫痪。

就以笔者自身的经历来说，我曾经在一家配送中心工作，配送中心就类似于网上超市，运货的仓储员按照员工系统给的信息，把商品从仓库里头拿出来，其他工人则负责清点、打包等，最后再有外卖骑手将商品送出去，恰好有一天，员工系统莫名其妙的崩溃了，不再向往常那样疯狂的爆单，而是直接“死了”，那一天我们配送中心的劳动者们就纷纷停了下来，意识到是系统崩溃后，不少的工人就开始说“罢工啦！罢工啦！”大家都开始或是玩手机，或是跟工友们聊天，整个工作场所弥漫着难得的欢乐气氛，只有老板和管理人员摆着一副司马脸在那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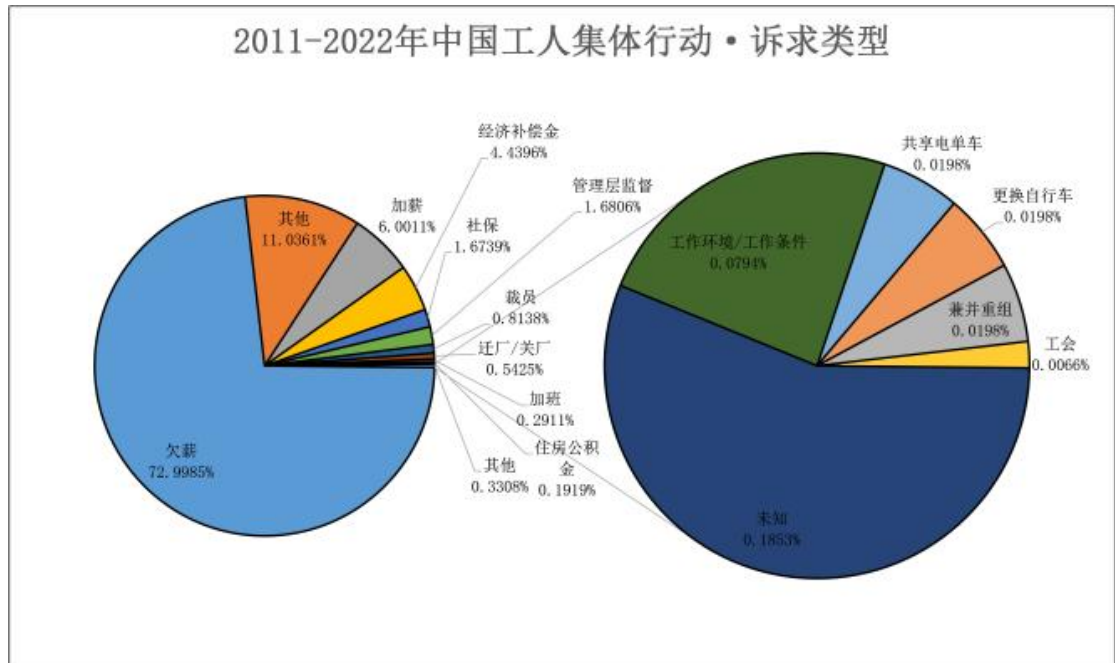
因此，现在的工人斗争重要的不是一个有多牛逼的工会，重要的是工人本身能否利用资产阶级的软肋展开有力斗争，这也是欧美的工会虽然入会率并不高（百分之十几都是很高的入会率了），却能够组织起大罢工的原因。

我们说回到中国来，现在的中国无产阶级没有三权，但照样罢工，照样有枪，为什么呢？因为统治阶级拦不住，在半外围的中国资本主义鼓吹劳工三权合法化，最好的作用就是没有作用——“你向统治阶级借枪来起义，但统治阶级把你当傻子”，最反动的作用就是十年前的珠三角了——“请工人们不要罢工，先去会议室谈一谈！”

资本主义正常时期，这玩意根本不可能实现，但到了资本主义崩溃时期，那又没必要去争取小三权，因为秩序崩溃时期就是革命的前夜了，要考虑的不是合法化而是怎么夺取政权了，资本家害怕工人结社，但工人结社合法化了，那资本家会不会因此被吊路灯呢？这个问题是黑哥儿不会回答的，因为黑哥儿这家伙压根就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革命吧？来了最好，不革命吧？没关系，有了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我们左派也可以在资产阶级议会里公开展示自己的“进步”了。

那么，当代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特点是什么呢？或者说，什么样的斗争是能够胜利的，是能够启发工人阶级意识，是能够让我们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无产阶级最关心的事情。



上图是笔者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数据制作的，自 2011 年到 2022 年间，中国工人集体行动中以欠薪为诉求的斗争共有 11033 次，占总数的 72.9985%，是绝对的大头，加薪为 907 次，占总数的 6.0011%，而工会只占了 0.0066%，还不如工人们针对电动车、自行车展开的斗争来的多。

在这里我就得引用某个学院派组织的巨著了，《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这本书的作者们坚信中国工人阶级必将走上大规模组织工会的道路，然而现实中并没有多少工人会真的去“自发走上组织工会的道路”，不知道是谁在无视现实呢？

资产阶级不会听任工人组织工会，工人也不会听任远航一号的说教而不组织工会。事实上，不论是产业工人，还是其他行业的工人，都已经自发走上组织工会的道路。他们数量虽小，但却代表着工人自发运动的方向，只有无视现实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¹

无视现实！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权利意识、团结意识与斗争意识相比老一辈

¹ 《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工人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工会意识呼之欲出，这正是启蒙工会意识、开展工会斗争的肥沃土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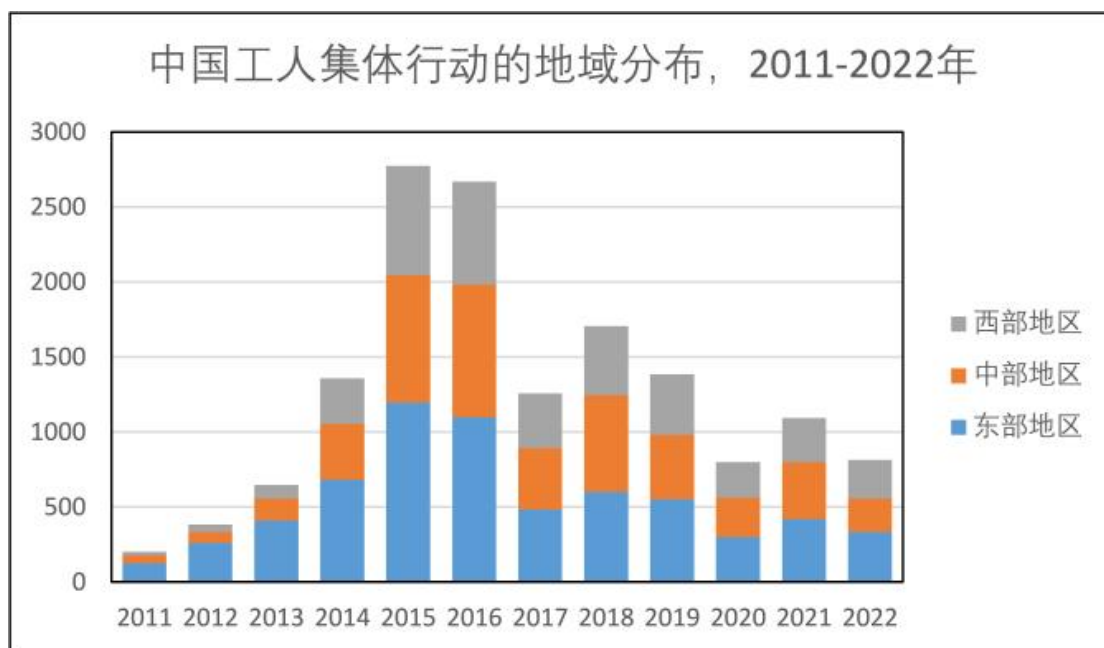
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生活工作经验，自行来验证一下这一“呼之欲出”的“工会意识”是否符合现实，在劳动群众眼中，这些小资产阶级学院派迷信的独立工会不仅是废物东西，而且还是个危险的废物东西，迄今为止，劳动群众的利益没有任何一次通过争取工会所达到的，反倒有许许多多因为触碰了独立工会，不但没有获得应有的物质利益，反而遭到政治打击的惨痛例子，佳士运动正是这一高度脱离实际的斗争路线的最好证明。

公开的非法但统治阶级又无法有效压制的斗争，非法但“合法”，合法但“非法”，公开但“隐蔽”，隐蔽但“公开”，这是自中国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来，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特点。实践证明，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没有必要照搬资产阶级民主条件下的那些组织方式。比如通钢工人的斗争，就是在表面自发的形式下而形成的有高度组织性的斗争，并给资产阶级以沉重打击，违反了一切资产阶级法律，把资本家都给打死了，厂区外头数万的武装警察压根不敢跟工人直接对抗，最后资产阶级还不敢打击报复工人们。这就证明了，只要局部条件有利，工人斗争有力量，哪怕“违法”也不妨碍工人斗争的局部胜利。反之，如果当时当地条件不利，工人没有发动起来，最“合法”的请愿也会被资产阶级无情镇压，佳士运动多体面，学院派左翼青年们多有文化，左派的舆论宣传多厉害，照样还不是连10%的工人都没有发动起来，因为极端的脱离群众而失去了与统治阶级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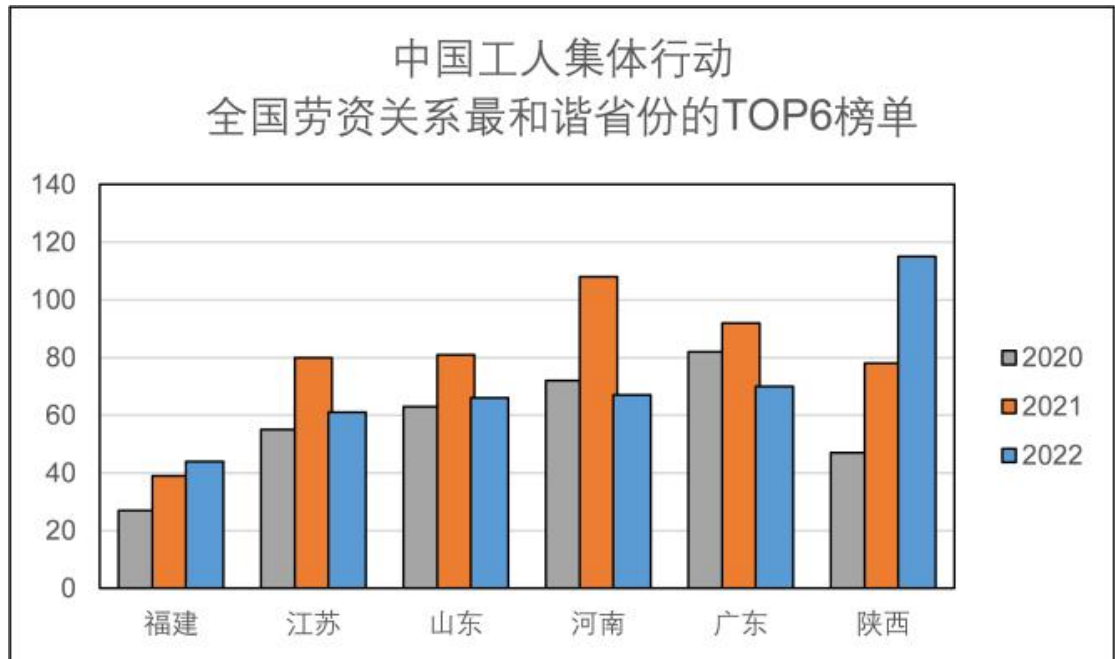
价还价的本事，最终被资产阶级按在地上摩擦，啥都没得到，反倒是整出了几个知名的学院派叛徒。

在日常劳动和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逐渐产生一些在工人中有威信的优秀分子；当出现对工人有利、对资本家不利的特定时机时，这些优秀分子便将工人发动起来，通过采取一些能够给资本家带来实际损失和代价的行动，迫使资本家做出让步。由于这种发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隐蔽、半公开或公开等不同方式，又可以最大限度地限制资本家打击报复给工人斗争带来的危害（在现阶段，要完全避免这种危害，仍然是不可能的）。

中国工人运动的另一特点就是：工人斗争逐渐由沿海向内陆发展。



在 2011 年发生的 203 场工人集体行动中，有 126 场发生在东部地区，52 场发生在中部地区，25 场发生在西部地区，而十年后的 2021 年，在 1094 场工人集体行动中，420 场在东部地区，379 场在中部地区，295 场发生在西部地区。



2020年，广东省荣获全国劳资关系最和谐省份的第一名，2021年则是由河南省夺得，2022年陕西以115场工人集体行动领先全国，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心正在中西部地区转移，那么为什么斗争中心会逐渐由沿海向内陆转移呢？

在中国走上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后，资产阶级依靠对劳动力的残酷剥削建立起来大量的沿海血汗工厂，成为了在世界体系中专门从事中低端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国家，这就使得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工人运动将会集中在沿海地区，伴随着资本积累的高速进行，中国无产阶级队伍的规模也扩大了，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战争中开始学习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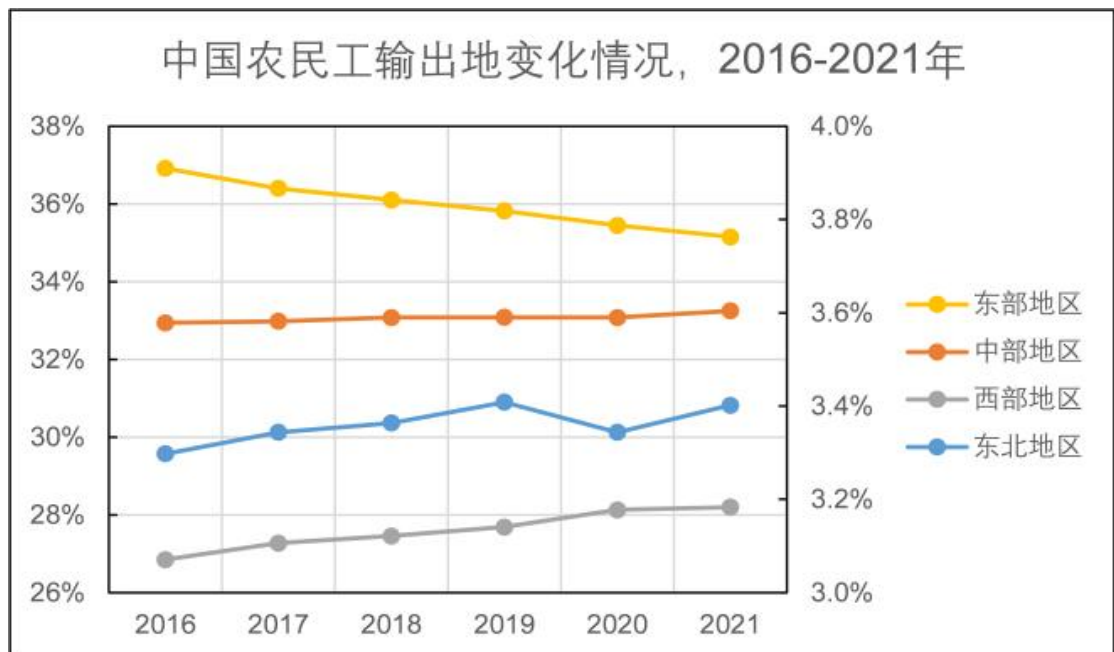
对此，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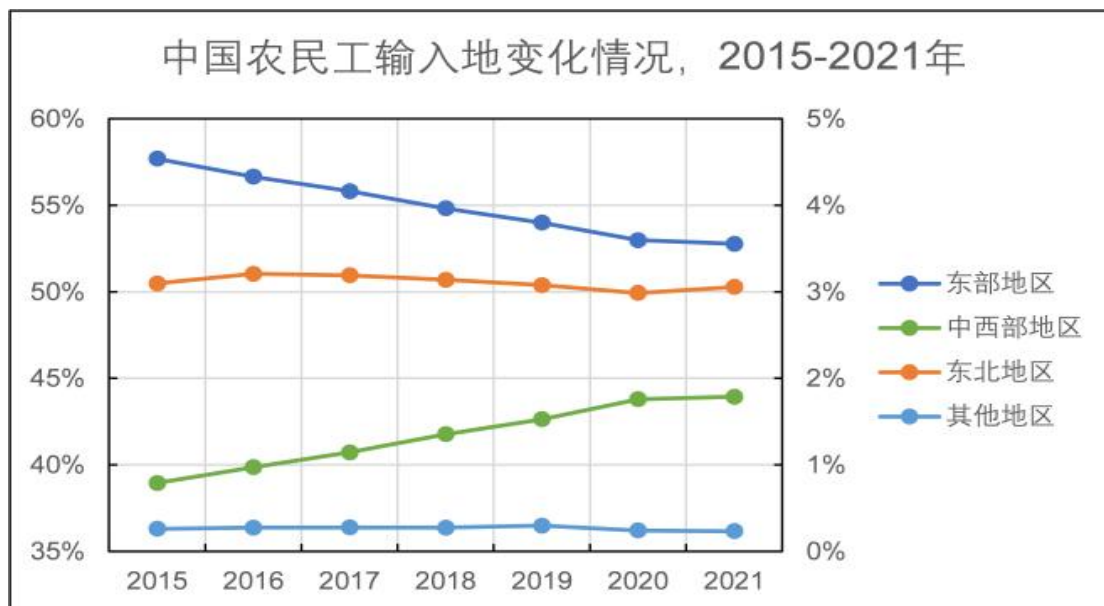
资本主义发展必然会造成工人阶级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总的历史趋势，在这个总的历史趋势下，工人阶级必然要把现实存在的力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转化为经济斗争的成果，这种加强了工人力量，也必然将会导致资产阶级无法如过去那样“顺利的”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剩余价值，用资产阶级的话来说便是劳动力成本大幅提高，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为此，资产阶级开始将血汗工厂搬迁到劳动力更加廉价的内陆地区。

对于生于内陆、长于内陆的大多数劳动群众而言，当他们工作的工厂、工地从沿海转移到了内陆，这就意味着资产阶级将主战场搬到了他们的家门口。

下图为中国农民工输出地情况：



下图为中国农民工输入地情况变化：



2016年，在28171万农民工中有36.92%来自东部地区，32.94%来自中部地区，26.85%来自西部地区，在这些农民工当中又有56.65%是前往东部地区打工的，20.40%前往中部地区，19.47%前往西部地区。

到了2021年，在29251万农民工中有35.15%来自东部地区，33.25%来自中部地区，28.20%来自西部地区，在这些农民工当中又有52.78%前往东部地区打工，43.93%前往中西部地区。

2021年，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增量占全国农民工增量的49.8%，而27%的农民工都是从事制造业的，这大致可以反映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部门逐渐向内陆迁移，过去在沿海打工的农民工逐渐回到内陆，资本积累重心的地理变化也为工人运动带来了新的不同。

在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后，由于巨大的城乡差距，农民工大量的涌入城市，直接冲击了城市的本地劳动力市场，极大的提高了对于资本家的劳动力供给，在资本对劳动的需求小于整体劳动力供给时，将会导致失业率提高，由此随着产业后备军的扩大，无产阶级的实际

平均劳动收入是降低的，因为产业后备军的增加会导致工人斗争条件的恶化。

根据魏下海在《外来移民是否真的损害本地人工资报酬？》中对农民工进城的研究：

本地劳动者工资水平（去除城市效应）与外来移民占比这两个变量的确存在负向关系，且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图2给出了外来移民占比与城市劳动力工资的散点图，也可直观看到两者呈现负向关系。

经过他的一番暴算之后，他得出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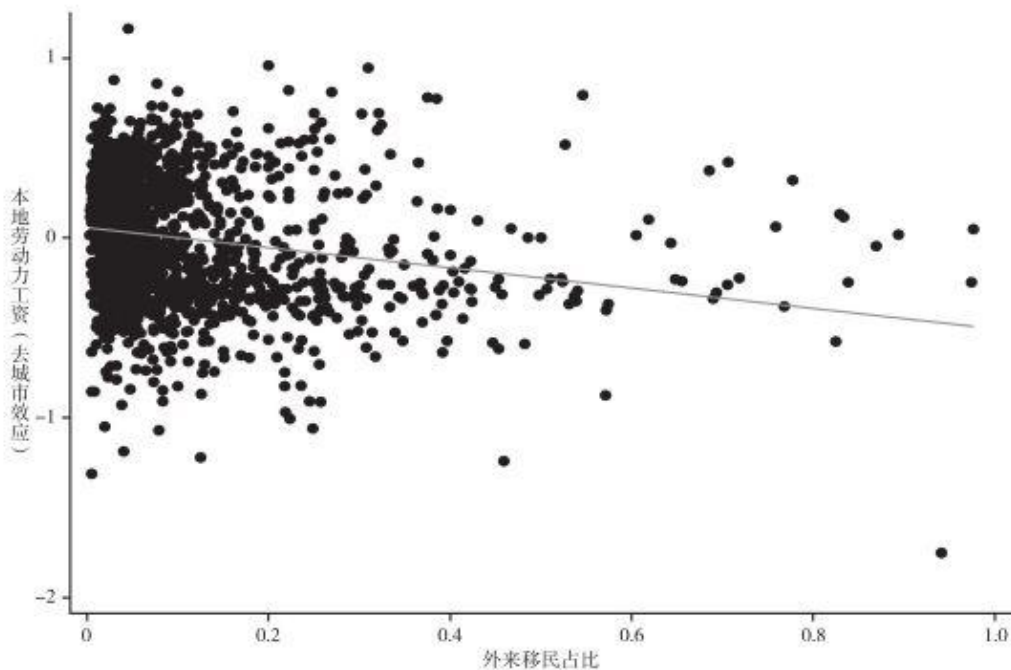


图2 外来移民与本地劳动力工资的关系散点图

资料来源：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当大量的农民工进入沿海劳动力市场，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原有的城市工人阶级的工资下降了：

外来移民对本地劳动者的月工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外来移民占比每增加10%，本地劳动者月工资就减少2.07%。

农民工对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控制本地人教育、年龄和婚姻状况等变量的情形下，农民工每增加 10% ，本地劳动力市场工资就会下降 3.58%。

平均而言，移民每增加 10%，本地劳动力工资就下降 2.8%。

因此，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出口制造业大量雇佣外来“农民工”的特点，在沿海各地方的无产阶级与当地劳动群众之间存在着以地域矛盾为表现形式之一的诸多次要矛盾，除了刚刚说的外来农民工压低原有沿海本土工人的工资外，沿海地区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使沿海地区有着大量的小资产阶级，这些小资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关键执行者之一，它们的存在不仅意味着劳动群众队伍的分化，更意味着资产阶级、官僚集团在沿海地区的力量相较于内陆更加强劲，政权能力相对完善，这些不利于无产阶级的负面因素阻碍着沿海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

伴随着血汗厂逐渐转移到内陆，上述负面因素均得到了相当部分削弱。在广大的内陆地区，大多数劳动人民生长于此，当他们背井离乡去沿海打工时无法把自己在家乡的社会脉络带过去，许多公司都喜欢招聘外地的单身青年，因为他们初来大城市，远亲帮不上忙，他们无依无靠就不敢那么有底气的跟资本家做斗争，因而是新手村后孤身单刷 BOSS。然而在他们回到老家的郑州富士康时，他们原有的社会脉络将会为他们的斗争提供更加有利的支持，你的亲戚朋友都在你的身边，你罢工了，你还可以打个电话过去：“上单哥，借我点钱应急呗。”主场作战，自然是比在客场更有利。

同时，内陆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情况相较于沿海地区并不发达，内陆地区的资产阶级、官僚集团所能掌握的剩余价值是更少的，这就造成内陆地区常常出现财政紧张，甚至是财政困难的局面，统治的基础更加薄弱，那么统治的稳定就更容易被打破。

下图是 2021 年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的财政赤字情况。

2021年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的财政赤字情况



不难看出，中部内陆地区的财政赤字显著高于东部沿海地区，这就意味着在广阔的中西部地区，随着工人阶级斗争的进行，资产阶级所能获得剩余价值的能力将被大大削弱，剩余价值的生产不足将会直接造成地方官僚的财政危机，地方出现诸侯化、割据化倾向，基层镇压力量消极怠工更加严重，派系纷争更加肆无忌惮，镇压手段更加非

正式且不可控，一旦镇压开始，有可能引发当地社会矛盾的连锁反应，再也无法维持“正常”的阶级统治。

因此，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向内陆地区迁移，越来越多的工人斗争将发生在中西部地区，我们越来越强大，敌人越来越衰弱，那么我们中国无产阶级就将在中西部地区这一薄弱环节率先突破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

就比如最近的重庆药厂工人讨薪斗争，大渡口的工人们压根就没有什么工会，什么罢工合法权，什么言论自由，什么结社自由，照样团结起来，在斗争中形成了来自群众、受群众拥护、善于领导群众的工人积极分子，照样在与专政机关的暴力冲突中获得了胜利，战胜了敌人，拿回了自己的劳动报酬，谁管你有没有罢工合法化，只要咱们工人撸起袖子干就完事了，打赢了就笑着拿钱回家过年，打输了就认了回去总结经验教训，深处斗争前线的革命群众，早已在斗争中学习了辩证法，不再追求务虚名而处实祸的“合法性”或“组织形式”，而是务实地利用专政机关的弱点，实现重点突破，夺取阶段性胜利。

这个道理是学院派们永远也不会懂的，因为它们笔挺的西服实在是太干净了。

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正确对待中国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企”问题

作者：俞聂

“还是公平”网友问：

为什么阳和平会一边夸赞工人铁饭碗，一边反对国企？能给工人铁饭碗的只有国企，但阳又反对国企，对于阳和平而言，社会主义时期的国企和今天的国企是不是完全没有共同之处因而绝对对立？还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个两面派？

俞聂网友答：

阳的脑回路跟马列托一样教条主义。毛主席说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在于，看不到矛盾的特殊性，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是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的。在阳和平和马列托那样的教条主义者看来，国企就是资本主义，跟工人阶级是对立的、斗争的，所以要反对。

问题是，放眼当今全球，哪一个资本主义企业不跟工人阶级对立呢？如果只是从空洞的口号出发，我们当然可以对一切资本主义都打倒、改造和革命之。但科学社会主义要求的不仅是抽象，而是要求科学地指导革命的实践。我们必须能够确切地在实践中一步步打倒、改造或者革掉资本主义。否则，革命性就是一句正确的废话。

马恩已经给我们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的矛盾，但毛主席教导的好，我们“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才有可能指导我们的革命实践。对于中资国企，我们不能大而化之地用“资本主义”框框来模糊看待，而是要具体地分析它的特殊性质。只有这样才能回应现实的“悖论”：进步分子想要打倒国企，大多数劳动者却想要挤破头享受国企待遇。到底是劳动者被资本主义落后思想腐蚀，还是进步分子口号不切实际呢？

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既要看一个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又要看多个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阳和平和马列托们一概不做区分，他们只看到一个浑沌、模糊的矛盾，普遍的就是特殊的，特殊的也是普遍的：国企是资本主义企业，工人要反对资本主义企业，等等。

如果我们具体来看，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在中资国企这一矛盾中，工人阶级是次要方面，国资及其代理人才是主要方面，他们规定了国企的性质是资本主义企业（即使是国有制），在剥削着国企工人。

但我们知道，国企只是中国资本主义社会诸多矛盾中的一种。毛主席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就是说，我们看待中资国企这个矛盾的特殊性，

还要看它如何由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来规定。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无疑是其中的主要矛盾。阳和平和马列托们在这里又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吵嚷资本主义就是垄断，垄断就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云云，而不去对矛盾的特殊性作具体的分析。

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特殊性何在呢？红色中国网做了具体分析，指出“中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个主要从事出口制造业、依靠残酷剥削大量廉价劳动力来维持资本积累的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²并且：

由于中国是一个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与核心国家不同，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从世界市场上攫取足够的超额剩余价值，用来收买本国的工人阶级、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并建立某种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就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前途决不可能是资产阶级民主。

由于中国不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外围国家，而是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这就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而发展壮大了的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必然在未来的某个阶段提出日益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要求，这些经济和政治要求又必然与依赖残

²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能胜利？——兼谈我们与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分歧 ... -红色中国网](#)

³酷剥削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发生尖锐不可调和的冲突。

又由于中国是一个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国家，本国自然资源并不丰富，这就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无法转型为一个出口自然资源并靠世界市场上的高价资源来暂时维持国内政治和经济稳定的资源出口型半外围国家。

上面这个主要矛盾规定了国企的特殊性，我们应当依据这种规定来采取对待国企的具体策略。首先，中国社会主要的矛盾性质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整个中国资本家阶级的利润，主要来自于严酷剥削出口制造业的廉价劳动力。无论是纺织、家电、汽车等主要出口制造业的工人，还是物流、外卖、摊贩等绝大多数（半）无产阶级，其所受到的剥削程度都超过军工、能源、金融等主要国企行业的工人。就此，对于广大的中国工人而言，我们应该提出待遇向国企看齐的主张来吸引他们，鼓励肯定他们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长的诉求。

其次，中国社会主要的矛盾性质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必然发展壮大，而中资又无法攫取超额利润来实行阶级妥协。一方面，我们不必担心二十世纪核心帝国主义国家资本家收买本国工人阶级的旧事重演，因为中国资本家阶级完全没有这个能力。另一方面，我们不必担心资本家阶级挑动国企和非国企工人的内部竞争。过去，资

本主义复辟以来的较长时期内，庞大的产业后备军确实是加剧工人阶级内部竞争、破坏城市工人斗争力量的一个主要的客观历史因素。但是，随着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枯竭，中国城市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而资产阶级国家又加紧对国企工人的进攻，搞各种反动“改革”；由此，未来国企和非国企工人必将逐步团结起来斗争整个资本家阶级。我们提出巩固国企地位、提高国企工人待遇，在客观上是加大未来资本家阶级的困难。

最后，中国社会主要的矛盾性质决定了，未来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必定能够取得胜利。那么，现在我们支持国企发展，便于未来在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时期，直接没收并对其加以改造，以服务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终目标。

毛主席说过，“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国企诚然如教条主义者所说是资本主义性质，但毛主席还教导我们：“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我们看待国企还应该抓住“中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个主要从事出口制造业、依靠残酷剥削大量廉价劳动力来维持资本积累的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这个主要矛盾。

国企矛盾的两个方面中，工人阶级如何从次要方面转化为主要方面？阳和平和马列托们只说要“民主改造”，但这在资产阶级专政之下无异于正确的废话。我们只有抓住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如何规定和影响国企矛盾双方的发展过程，并具体地分析其中不同阶段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才有可能真正指导革命实践。

要斗争教条主义，就要不忘毛主席在《矛盾论》中的提醒：“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新古典主义对中央计划的敌视和无知（节选）

原作者：“红色人口研究员”

编注：**980135117** 网友在这个讨论贴中围绕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孰优孰劣的问题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欢迎各位网友就相关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

“红色人口研究员”（**980135117** 网友）：

在 HAD 网友发的文章里面，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对“中央计划”进行了非常离谱的，几乎完全不符合事实或者逻辑的批评。不过，这种批评并不是市场社会主义独有的。从科尔奈到弗里德曼到诺斯，从林毅夫到张五常，所有人都有与此一致的观点。我把这种观点总结为新古典主义对计划经济的敌视。下面我会以 HAD 网友发的分析作为范例，来说明为什么彻头彻尾都是错的。

原网址链接：

<http://redchinacn.org/forum.php? ... page%3D1&page=1>

1，现代工业太过于复杂以至于不能计划？

事实上，尽管反直觉，但是正是因为现代工业越来越复杂，所以才必须要“计划”。

原文作者显然对工业体系和工业革命以来的生产技术的革命没有什么意识。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所谓的经济增长，所谓的技术进步，

如果硬要追求核心，其实是重工业（这里指生产资料工业）的进步。例如说，前工业革命时代纺织业往往是家庭手工业，但是现代的纺织业生产意味着大规模的使用机器、使用极不相同的机器生产极不相同的过程（化纤、染料需要的是化工的设备，而传统的纺纱机则是单纯的物理的机械设备）、使用机器来生产原材料的原材料（例如说棉花种植业背后的化肥工业、化肥和化纤之后的石油工业等等）。再例如说电子产品，一个手机往往需要几千种不同类型的电子元器件，然后到最后才组装到一起。相比之下，轻工业的”复杂化“可以说如果不是根本没有，那也是少得可怜。例如说，汽车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操作更简单但速度更快的马车而已；现代更漂亮和多样性的服装和中世纪的贵族服饰也说不上任何值得一提的区别。可见，工业体系的复杂化，指的是重工业越来越复杂，工业生产流程越来越长，不同类型的中间品越来越多。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推论，那就是这个复杂化和市场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原文说”如果我们不是让消费者“用他们的钱来选择”，那就很难确定人们需要什么、需要的程度，以及所需东西的数量和质量“，”当生产数量相对说来还不多的商品的时候，当数量更重于质量的时候，信息问题还容易解决，当要求生产更多、更好的商品的时候，信息问题就变得不好解决了“。就算这是对的，那也只是轻工业的情况，和真正的越来越复杂的重工业体系有什么关系呢？

或许是为了回答这个疑问，作者对于市场和重工业体系的关系做了非常简短且显然有重大错误的补充：“即使计划者能够克服决定生产什么的困难，那他们还必须决定如何生产它，而且要一项一项地决定。生产包括投入和产出，由于对一个企业的投入来自其他很多企业的产出，这些投入的数量和质量也必须加以计划。然而，由于在技术确定之前投入是无法决定的，因而技术也必须加以确定。要制定一个最具连贯性的计划，计划中心必须把所有这些决定因素统统考虑进去。由于这些因素是相互依赖的，这种计算即使对最高级的计算机技术而言也还是太复杂。与它相比，星球大战不过是儿戏”。这个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对于重工业来说，计划经济是唯一的选择，即使是当下的资本主义体系。

逻辑是很简单的。重工业的大部分的产品具有极强的专用性。例如说一种电子元器件可能只能在某种型号的手机上面使用，例如说某种钢制零件只能用在某种机械上面，等等等等。对于重工业产品来说，只有极少数的产品能有市场，而且这些产品都具有通用性强的特点，例如说钢材、铝材、成品油等等。而炼制成品油的催化剂、炼钢的高炉、还有我上面提到的电子元器件和零部件，往往是不存在市场的。这些产品的生产都是由某个企业的中央计划所支配，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不管这个经济体是市场经济的还是计划经济的。

对此，曼德尔的评价不可谓不传神：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rnest-mandel/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86.htm>

让我们首先把其中含糊不清的东西清除掉。诺夫的数字中包括大量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此外还有专用设备，而普通公民是不会遇到也永远不会消费这部分产品的；它还包含了同一种消费品的不同品种，在西方社会中，这可能意味着 10 种不同的清洁剂或 20 种面包，一般人只消费其中的一两种，而不是全部。了解这一点，对认识诺夫所面临的困境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事实上，先进地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并不“分配”数以百万计的商品——无论消费品还是生产品，私人消费者在其一生中最多也只能购买几千种不同的商品（对于许多人来手这已经够夸张了）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消费“数以百万”的、不同商品，或者根据“市场信号”来“选择”这些商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大量的中间产品根本不是通过市场来分配的，而是通过定货来生产的。很显然，这种情况同样适合于今天大多数的重型机器产品。当你去超级市场时，你所要买的绝不是涡轮发电机，你是通过非常精确的规格来订购这些产品的（批注：也就是说，不是你在一个市场上购买资本品机械，而是以所谓订货的形式，直接下达具体的性能指标），即使它是由社会供给商调节的，但与“市场分配”绝非一回事。……由此我们便得出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在当代大多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消费品还是生产品绝对不是按“市场信号”来生产的，都不是年复一年的波动，更不是每天都在波动，当代生产的主流，符合现行的消费模式，以及预先确定的生产技术，而后者很大程

度上（即使不是全部），是独立于市场的。这是怎样造成的呢？它恰恰是劳动的日益客观社会化（批注：即重工业的发展，工业体系的复杂化）所造成的。

考虑到这点，考虑到现代工业体系必然是计划的，”市场化“客观上其实起到了一个相当反动的作用。

这是因为，名义上的重工业体系的”市场化“，其实实际上是外包化。我在上面提到手机的电子元器件是不可市场化的，但是实际上却往往有市场化的形式。例如说，苹果公司根本不会自己安排电子元器件的流水线，而是从大量的对外采购。客观来说，这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苹果的管理成本，但是它的副作用要大得多。首先，这种安排仍然建立在零部件相当程度上不可通用的基础上，所以说苹果对代工厂仍然有相当的支配权，代工厂对苹果的依附性和一个车间对整个工厂的依附性完全没有区别——换言之，这种所谓的市场其实仍然是中央计划的。但是，一个车间的责任是总公司承担的，代工厂却并不。所以说代工厂可以不管员工的福利；苹果公司不需要准备这些零部件的库存，而只需要在库存不够的时候起诉”供货不及时“的代工厂等等等等。另一方面，考虑到代工厂往往是开在半外围国家，这种重工业体系的”市场化“还在国际不平等交换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这里举得苹果只是一个例子。实际上，自从新自由主义反革命以来，这种反动的重工业体系的外包还不只这一个例子。例如说最近火热的烂尾楼问题，其实背后就有房地产商的重工业体系市场化的例

子。下面的描述引用自《房地产行业的终极宿命？——从狂飙突进、极速周转、超高杠杆到债务爆雷》，原链接是

<https://jiliuwang.net/archives/96774>

我们再看看，地产商是干什么的？我们可以想象地产商是什么人，他干的是是什么活儿。对这些人干什么的，大家可能比较陌生。我们举两个别的例子。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深圳的包租公、包租婆，或者房东们，他们干的是是什么？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建房子，他需要干什么活呢？他自己要找一个人来设计，然后找一个建筑队，把房子建起来，然后再把房子租出去或者卖了。这是深圳的自建房的房东干的事。同样的，一个单位的基建办的三个人在干什么？这三个人无非就是找设计院设计一个方案，然后找一个建筑商把房子盖起来，然后再找人把这个房子分出去，或者卖出。所以我们看到住宅的产品或者商场产品的生产过程有这么几个阶段，一个是拿地的阶段，一个是设计的阶段，然后一个是建设的阶段。当然，如果你要把它卖掉，你还有一个销售的阶段。这是周转的过程。在周转过程当中，钱是不能闲的。一个地产商可以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小麻雀，它具有自己的施工队，也有自己的设计院，还有自己的销售团队。但是如果他手头只有一个项目，那么在他建设的时候，它的设计院就闲着；在他销售的时候，它的建设团队也就他的建筑队和设计院都闲着了。在这个开发过程当中，总有两三个部门是闲着的。这对资本来讲是不可接受的。这时候他怎么办？他一定会把这些建筑设计院、建筑公司和销售公司剥离出去，让他们成为独立的机构，它既能够接 A 公司的活，也可以接 B 公

司的活。A公司和B公司的工期如果不重叠,那么一个设计院就可以先接A公司的活,再接B公司的活,然后再去接C公司的活,等等。这时候一个地产商就成了一个购买服务的机构。它把服务从不同的服务商那里买进来,再以统一的形式向消费者卖出去。这时候地产行业就对外宣称,我们是资源整合型的产品供应商。其实无非是这样:一个地产商其实什么都没有干,他只不过在市场上买地,在市场上买设计,在市场上买建筑,然后再找个销售公司委托它把房子卖掉。仅此而已。所以,一个地产商最大的部门无非是它的财务部。它就是一坨钱,承担一个纯粹的买买买和卖出去的职能。相对于开发商来讲,其他原先的这些建筑队,原先的设计公司,就成了这个地产商的附庸,为地产商服务。

注意这里说的比较好听。实际上,建筑业的风险转移(不管是劳动事故风险,还是以先给货后付款的隐性的金融剥削)是非常明显的。

(说个题外话,反计划经济的人有时候会提到计划经济国家的汽车,说这些汽车由于是中央计划的,所以缺乏”自主性“,没什么创新。我评价是看看中国的合资汽车吧,看看他们相对于计划经济的车厂有什么所谓的自主性和创新。而计划经济下车厂就是合资车,创新本来就是最高的设计局才做的,就好像合资车的创新是德国总部做的一样。拿计划经济的车厂来说没有创新,多少沾点问体育老师为什么不会做数学。实际上,合资汽车就是我上面说到的外包体系里面的”

承包商“，不仅仅相对于计划经济的车厂更加没有创新性，还加大了中国对核心国家的剩余输出）

由此可见，重工业的生产关系就归根结底来说，是必须搞中央计划的。现实中的所谓的市场化的重工业体系，实际上不仅没有市场化，外包商和承包商的关系和本来的工厂——车间关系没有任何区别，而且还导致了巨大的风险和财富的转移。这种市场化的唯一结果就是加剧剥削、进一步放松极少数垄断资产阶级的负担、加大他们的利润、并且增强了他们的寄生性（注意新自由主义革命以来核心国家投资率的不断下降）。在这个过程中，拿轻工业部门的市场化来打掩护的”现代工业太过于复杂以至于不能计划“，在意识形态上做了非常不光彩的”贡献“。

当然了，他们可能会说，就算重工业大部分是没有市场化的，那么，至少轻工业应该市场化啊。

如果上面体现了他们对现代工业技术和现代工业生产流程的无知，那么这就体现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无知。谁告诉他们的这些是没有市场化的？苏联的轻工业产品相当程度上是市场化的，甚至连粮食——除了集体化时代把粮食生产搞砸了和二战以外——都没有票证；70年代的时候苏联就有了超市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b411274N/>）。而中国的票证只局限于必需品，例如棉布、食用油和谷物（这些一旦陷入短缺，任何国家都会搞票证分配，去年美国就是这样；在相对充裕的地区，

例如说上海，在文革的时候是没有肉票的），但是毛时代的收音机和手表难道不是市场化的分配的？轻工业在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就是市场化分配的，讨论这些商品的市场化不就是在解决现实中没有的问题？

2，社会主义的管理学问题？

在 HAD 网友的原文里面，在”信息问题“的后面，又提到了管理问题，原文大概如下：

- 如果产品的定额是由计划机关确定的，那企业就没有任何积极性去消费资源或努力确定并提供那些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东西；
- 如果投入和产出都是由计划机关确定的，企业就会倾向于低报他们的能力而高报他们的需求，以便更容易地完成他们的部分计划。它们还会有很大的动力去游说计划部门以得到较低的生产定额和充足的原材料供应。
- 如果就业是有保证的，而且收入与企业经营的好坏无关，那工人就没有动力去工作。
- 如果计划部门是对整个经济负责的，那它就没有任何动力去关闭无效率的单位，因为这样做或者要增加失业或者必须为失业的工人寻找新的工作。

与中央计划相关的还有政治方面的问题。计划者握有大权。有关生产定额(或价格)的决定对企业有重大的影响，这样，腐败的危险就

很大。一种精心安排的可使定额减少或价格提高的贿赂，可使一个企业得到比认真关心产品质量，或开发新的生产线，或引进新的生产程序更多的直接的好处。

等等等等。这些所有的质疑可以分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

下级部门会不听上级的话

即”如果投入和产出都是由计划机关确定的，企业就会倾向于低报他们的能力而高报他们的需求，以便更容易地完成他们的部分计划。它们还会有很大的动力去游说计划部门以得到较低的生产定额和充足的原材料供应。“，”如果就业是有保证的，而且收入与企业经营的好坏无关，那工人就没有动力去工作”，”腐败的危险就很大。一种精心安排的可使定额减少或价格提高的贿赂，可使一个企业得到比认真关心产品质量，或开发新的生产线，或引进新的生产程序更多的直接的好处“。

这些所有的质疑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说下级为了减少自己的工作压力，会有相当大的动力去尽可能的让上级给自己”放松“。且不说首先让大部分人的工作变得更轻松本来就是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一个目标，这种说法实际上已经不能用错误来形容了，而只能说是反智。现代官僚体系的特点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层层责任层层落实；古代那是因为交通不便不得不放权，而十九世纪就发明了电报（然后很快韦伯就总结了现代官僚制的特点，时间上可不是巧合）。但是到了这些新古典主义者眼里，下级居然能手眼通天，能有效的把

上级计划变成无用的东西。

上级是傻子吗？”企业就会倾向于低报他们的能力而高报他们的需求“，那上级部门不会设置一大堆企业，让他们都秘密地向自己报告吗？”如果就业是有保证的，而且收入与企业经营的好坏无关，那工人就没有动力去工作”，那苏联的物质刺激是不存在的？”腐败的危险就很大。一种精心安排的可使定额减少或价格提高的贿赂.....

更多的直接的好处“，那上级没有上级？上级这么干了他自己的政绩怎么办？中国县委书记能不能贿赂市委书记然后在 GDP 考核上面摆烂（而显然，这是没有的，否则独山县水司楼怎么来的）？

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些对苏式计划经济“低效”、“腐败”的说法，其实都是不存在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联的增长率还是不比美国慢。但是要注意，美国自从 50 年代起就开始搞新殖民主义剥削了，只不过一开始的殖民地也就是日本后面”阶级上升“了。而且美国说是创新很多，但是到了冷战后期，民用品的创新也首先是日本为主的，美国自己也和苏联一样，创新主要集中在军事上面。也就是说，苏联在美国作弊的情况下，居然仍然能取得和美国一样的经济成就，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苏联经济制度的高效吗？

3，分权式计划经济的问题。

在讨论之前，首先必须引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因为我们需要这来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列宁的这个判断非常非常重要：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完全成熟，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

列宁的说法其实有一点抽象，其实这部分是非常值得仔细推敲的。

“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这在农业时代是描述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但是在工业时代，这就是对生产方式的客观描述。成衣业的人生产的衣服必然几十倍几百倍于自己的需要，不管是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建筑业的工人造的房屋也远大于自己需要，同样不管是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由此就必然产生一个问题，如何让人为他人的利益劳动？

资本主义的方式就是所谓的“市场经济”。由于分工，所有人都

不能自给自足，必须设法取得货币收入，资本家通过利润，工人通过工资。消费者的选择决定了资本家是否有利润，然后资本家再通过劳动力市场和企业内部管理（后者是服从于前者的）来决定工人的工资。计划经济的逻辑是类似的，政治家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维持自己权力，组织了一个消费品市场来监察企业管理者，用官职表来决定经理们的收入，经理再通过管理制度来决定工人的收入（细节是由于缺乏劳动力市场，不得不大规模的使用计件工资和绩效工资）。总的来说，这就是一个“集权”的机构。消费者对资本家有权威，资本家对工人有权威；或者政治家对经理有权威，经理又对工人有权威。不管怎么说，他人相对于单个劳动者有权威，全体对个体的权威，是现代工业不再自给自足、必须社会化生产的必然结果，且不以所有制为转移。

而分布式计划经济，其实相当程度上违反了这一点，而且往往由于实际的经济压力最后滑向私有化（不仅仅是市场化了）。

首先，是计划机构对“地方官僚”的放权。这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在历史上，这就意味着计划经济的权威体系的第一环节，也就是“组织了一个消费品市场来监察企业管理者，用官职表来决定经理们的收入”失效了。那显然中层官僚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始躺平，开始不作为。或者，在放权的同时还是有绩效考核，但是绩效考核的数据来源失效。比如说大跃进时期，官僚当然还是要绩效考核，但是很

多的统计任务、核查体系等被放弃了。那这时候就会“乱作为”，结果就是大饥荒。

当然，给中层官僚（企业官僚或者地方官僚）放权的危害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如果一放到底，形成所谓的工人自治，情况会不会好一点呢？答案是，可能会有可行性，但是会有很多问题。

如果完全放权给工人，这实际上意味着计划经济的权威体系变成了“政治家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维持自己权力，组织了一个消费品市场来监察企业并直接决定工人的收入”。这首先会产生激化矛盾的问题。如果一个企业绩效不好所以把管理者免职了是一回事，给所有工人降薪或者提高劳动强度就是另外一件事了。显然这会极大的激化矛盾。列宁时代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乃至托洛茨基残酷的整肃铁路部门，在红军逃兵搞十抽一杀等，都源于此。

当然，也许可以搞点市场社会主义，这样工人降薪或者加班都是因为无形的市场的压力，而不是政府计划机构的直接强迫。这样就是南斯拉夫模式。问题是，下放权力本质上是把使用权下放了。也就是说把财产权的一部分下放了。但是不同的企业部门的财产权是极端的不平等的。例如说钢铁工业的固定资产要比轻工业部门大得多，而轻工业则又比服务业大得多。而要注意的是，现代经济的权威是自然产生的，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在固定资产不一样的情况下，这种权威会在不同的部门之间再生产出来，换句话说，不同企业的工人的严重的不平等。而且，和资本主义不一样。起码在资本主义，工人

阶级是一个相对统一的团体，但是这种不平等下却分化为很多个利益集团。中国的单位制其实也在资本主义复辟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当然，一些形式上的放权是可行的。例如说，如果给地方官员的放权仅仅是执行权，仅仅是给了更多的拨款资金，但是同时却又严密的监视资金的使用，对成果进行多方面的全面的考核，那么这表面看是放权，实际上反而是集权。此外，有的权力不太重要，那确实完全可以也应该下放，比如说某个学校内部的具体管理。但是总的来说，执行的层面还是必须要集权，必须强化整体对个体的权威。

（补充一点，很多人喜欢说的 OGAS，这个计算机系统说白了就是能整合企业和部委的经济活动的信息。因此对计划机构对他们搞监察有极大的帮助，本质上就是一个用来集权的東西）

集权是不是一定是危害的呢？其实不是。这里回到民主集中制，那就是执行必须是集权的，但是决策不一定是。也就是说，作为执行机构，即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工厂，每一个车间，都必须服从上级的指挥执行任务。但是最上级也就是决策的机构，则需要民主产生。比较简便的办法是参考现在的议会制国家，由选民选举组成议会，再由议会任命相关的专家为计划机构。而苏维埃制度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个议会的权力更大的议会制。

这相对于前面提到的分权体系的好处是，在前面的分权体系下，不同企业的工人根据自己的单位分裂为不同的小团体。但是在集权的

体系下，单个企业的工人对自己的企业的话语权是有限的，所以说不会得到任何实际上的财产权。因此工人是一个基本统一的阶级。如果民主制是有效的，这就意味着议会将会表达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的利益诉求，然后让计划机构服从于这个权威。当然，前提是民主制是有效的。我可能会在其他的文章里面分析为什么很多的民主制度是无效的，不过这里就不分析了。

总结一下，考虑到现代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特点，分权是根本不符合逻辑的。经济必须以集权的方式运作，形成“选民决定政治家是否能掌权，政治家为了权力要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而组织了一个消费市场来监察企业管理者并用官职表来决定经理们的收入，经理再通过管理制度来决定工人的收入”的一个经济的权威体系，才是一个合适的制度。权力越大，下级对上级的服从性越大，才能运转的越好。

聊聊计划经济的过去和将来

作者：远航一号

过去一段时间，HAD 网友连续转发了许多篇文章，探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组织问题。在与 HAD 网友探讨的过程中，“红色人口研究员”（980135117 网友）写了一篇长文，抨击市场社会主义者对计划经济的污蔑，并赞颂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历史上的成就。

我对 980135117 网友在上文中所阐述的看法是基本赞成的。但是感觉文章涉及的内容很多，有些地方组织得不是很好、脉络不够清晰，有些地方则没有打中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要害。所以在这里，再补充一些想法，与大家一起探讨。

增长与效率

980135117 网友在文章中努力论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方面都胜过了资本主义。

这里首先说明一下。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概念中，经济效率与经济增长并不是一回事。关于所谓“效率”，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理论上认为是如何用稀缺的资源来最好地满足消费者偏好的问题，理想的状态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在统计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常常用一定的要素投入可以带来多少产出来衡量效率水平，也就是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

先撇开效率问题不谈，仅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经济增长方面的比较来说，这方面还有很大争议。我们知道，历史上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同的，所以两方面的经济增长率是不好直接比较的。要对两方面的经济增长做比较，就必须将其中的一种核算体系调整为另外一种核算体系。做这样的工作需要大量的资源并掌握相关的统计资料。所以毫不奇怪地，到目前为止，差不多完全是由西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社会主义的核算体系调整为西方资产阶级的核算体系然后再做比较。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做这项工作时，不可避免地要带上他们的阶级偏见并贬低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就。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方面，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到目前为止还拿不出完整的、有科学价值的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行比较的资料，所以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的污蔑时，往往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许多同志现在仍然习惯于用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官方统计来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统计直接比较，严格来说，这样做也是不正确的）。

仅就现有的资料来说，比较没有争议的，是以下几点：

（1）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

（2）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放慢；到了八十年代，苏联、东欧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困

难（但是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前，并没有崩溃），经济增长速度慢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3）中国在资本主义复辟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增长速度。

在这几种历史现象中，其中的第二点和第三点是对我们不利的，常常在我们与反动右派的辩论过程中使我们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在这些问题上，怎样与反动右派进行有力斗争，大家可以一起来探讨。

我个人认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七十年代开始的经济困难实际上与同一时期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国家所遇到的困难一样，都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半外围国家的困境：即半外围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既无法与低工资的外围国家竞争，又无法与垄断高技术的核心国家竞争。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继续存在，这个困境就无法摆脱。这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除了一般的半外围困境外，社会主义国家还面临额外的困难。那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处心积虑要颠覆社会主义，迫使社会主义国家承担高昂的国防费用。有的资料认为，七十年代苏联军费水平最高时可能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到了八十年代，苏联的军费仍然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一。这大概相当于将国民经济积累基金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用于国防建设，不可能不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苏联牺牲了自己的经济

增长来保卫世界和平、支援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现在却有一大批中国资产阶级媒体的御用文人反而以此为借口，污蔑苏联穷兵黩武。

另外，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七十年代的一个重大的经济决策失误，就是贪图当时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低利率，借了大量外债，企图靠“先进的”西方技术设备来加速经济增长，结果在八十年代遭遇了债务危机。这是导致苏联、东欧八十年代经济严重困难的直接的、主要的原因。如果苏联、东欧在七十年代没有举借外债，还是暂时忍受较慢的经济增长速度，人民群众的物质消费水平虽然改善不快，但仍然安居乐业；那么，只要再多坚持一二十年，美帝霸权和新自由主义秩序都将全面崩溃，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就可以反败为胜。

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一些理论问题

在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市场社会主义者围绕计划和市场问题展开思想斗争的时候，要对双方的、与此相关的理论有所了解，然后才能有的放矢、击中要害。

980135117 网友花了很多篇幅来讨论经济的复杂程度对计划、市场的影响，主要是为了批判戴维·施威卡特所谓经济越复杂就越难计划的错误观点。但是，实际上，经济的复杂性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也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攻击计划经济的主要方面。因为无论一种经济中是有几百种产品，还是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产品，要解决这些产品的相互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的数学原理都是一样的。在有计算

机的时代，这些数量之间的差别对于计划经济的运行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最早系统批判计划经济的是反动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哈耶克虽然也提出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计算困难，但是他对计划经济的主要批评是更加广泛的“信息问题”。哈耶克的观点是，要进行合理的经济计算，就必须尽可能搜集对于合理经济决策所必需的各种经济信息（比如消费者的需要和偏好、生产各种产品的技术指标、各种原材料的储备和供应能力、现有的技术水平以及未来的技术发展前景，等等）。

哈耶克说，问题不仅仅在于需要搜集并加工的信息量极其庞大，而且在于很多信息是只有在当地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才能具体掌握、无法用统计方法来传递的。哈耶克所说的“当地知识”类似于我们平常所理解的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知识，比如一个人或一些人因为长期生活、工作在一定的环境中所形成的某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对当地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的了解。比如A厂和B厂都生产钢，技术指标也都一样，但是在使用中就是会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质量上的细微的差别，只有那些分别用过这两个厂所生产的钢的那些生产单位对此才有了解，而且对这两个厂的钢的看法还无法拿到台面上来说，也无法在计划工作中得到反映。应当说，哈耶克这里所说的，确实是计划经济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此外，在计划经济的实践中，还产生了一些当初哈耶克并未提及的问题。比如，下级并不一定如实地向上级汇报自己所掌握的一切情况，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有所隐瞒甚至有所歪曲。980135117 网友也提到了上级和下级关系的问题，并认为上级可以设法监督下级的行为。问题是，一切监督都是有代价、有成本的。所以监督不是万能的。当监督的成本高到一定程度时，上级就不得不放弃“不必要的”监督，采取某种程度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当然，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股东和管理者之间、资产阶级国家的上下级之间、负责监管的资产阶级国家工作部门与被监管的资本家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有那么一些既想跟着资本家发财、其脆弱的心灵又忍受不了资本家残酷剥削压迫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比如那些幼稚而反动的“社民分子”——在今天的条件下，“社民”已经丧失了一切改良和进步的作用，纯粹是资产阶级的帮凶），一方面主张私有制，认为资本家可以“自由”发财，另一方面又认为政府可以通过“监管”来防止资本家过度剥削、过度破坏环境、过度危害消费者、过度金融投机，仿佛政府的“监管”无所不能，甚至当资本家侵害劳动者、消费者、社会大众的时候，不是谴责资本家，而是指责政府没有尽到“监管”责任（反动的“南方系”、“财新系”媒体常常上演这样的猫哭老鼠假慈悲），也是出于这样一种无知和空想——因为自己从来没当过领导，所以不知道当领导有多难。

所以，一味地否认计划经济在资源配置、满足消费者需要等方面确实存在一些缺点，不是明智的。事实上计划经济也不可能是尽善尽

美的。未来在充分发扬劳动群众民主的条件下，是不是一定就比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做得更好，也还是个未知数。

在这方面，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的问题是，拿来照别人的镜子却不会或不敢反过来照自己。计划经济确实不能完全解决信息问题。但是，市场经济就能真正解决信息问题吗？哈耶克本人实际上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讲了一个故事。

新古典经济学家倒是认真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新古典学派与哈耶克所属的奥地利学派不仅分属不同的学派，而且水火不容；一般来说，新古典学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治学态度更加严谨一些），在加了无数个假定条件后，“证明”出所谓的“完全竞争市场”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大家注意，这里说的“完全竞争市场”不是现实世界中的任何一种资本主义市场，甚至不是人们一般所说的“自由市场”或者所谓的“小政府、大市场”，而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理想乌托邦。其中一些主要的假定条件有：所有市场上都有非常大量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从而其中任何一方都没有“定价权”；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可以自由地进入或退出某一行业；所有的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都可以自由流动（土地当然不能“流动”，但土地的所有权可以）；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对于买卖的所有产品的一切性能都有完全的知识（没有假货、没有次品劣品）；没有“外部性”（任何双方的交易不影响任何第三方的利益）；有完

全的期货市场（生产者和消费者不仅了解某一种产品现在和过去的所有价格，而且了解该产品在未来直至永远的一切价格）。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其实是一种很好的理论。好就好在，它充分揭示了所谓资本主义市场能够有效率配置资源的空想的、乌托邦的性质。上述“完全竞争市场”所需要的假设（除了上面列举的以外，实际上还有很多条），只要违反了其中任何一条，资本主义市场就无法实现所谓“帕累托最优”。

而实际情况是，“完全竞争市场”所需要的条件在现实中不是违反了一条两条，而是全面地、普遍地被违反，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几乎无法找到与“完全竞争市场”相接近的任何一个方面。凡是不符合“完全竞争市场”条件的，就是“市场失败”（Market Failures，中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教科书，为了掩耳盗铃，将这个词错误地翻译为“市场失灵”）。常见的“市场失败”有，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因此造成金融危机、消费者权益被侵害、结构性失业）、普遍存在的外部性（比如环境污染）、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造成投资的大起大落），还有垄断。在中国的资产阶级媒体上，人们常常喜欢抨击“垄断”。但是实际上，与前面几种“市场失败”相比，垄断只是相对次要的问题。中国的资产阶级媒体抨击“垄断”，一是假借批判垄断为名、攻击国有制，为私有化制造舆论，二是在人们心目中塑造一种对虚假的、并不存在的自由市场的幻想。

所以，虽然计划经济确实存在着信息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但现实存在的市场经济也面临着大量的、普遍的“市场失败”。两者都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到底谁距离“帕累托最优”更近、谁更远，谁有更大的向“帕累托最优”靠近的潜力？不知道！

是真的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探讨过这个问题。一般的资产阶级政客和御用文人（“媒体人”、“公知”、三流经济学家）只是满足于对计划经济的谩骂和对“自由市场”的无知和盲目的吹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严肃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尝试从理论上证明，遭遇了无数“市场失败”的现实的市场经济相对于现实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必然的“帕累托改进”（即更接近“帕累托最优”的理想状态）。

社会主义优越性

如上所述，资产阶级经济学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即使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论，也并没有证明市场经济必然比计划经济优越。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方面，如果一定要说，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必然比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更有“效率”或者增长得更快，也是比较勉强的。事实上，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不是在经济增长方面，而是在于能够满足所有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能够让所有人都过上有尊严、有意义的生活，然后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可以实现“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让大家有房可以住、有学可以上，生病了可以看病住院而没有经济压力的困扰，退

休了以后可以得到社会的抚养、颐养天年。这些都是众所周知、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有人（或至少绝大多数人）都过得像个人样，不用疯狂“内卷”，不用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耗尽自己的每一滴血和汗，不用在资本家和官僚面前奴颜婢膝、点头哈腰。这样的社会不好吗？这难道还不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吗？

资本主义复辟后，“官方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的本质歪曲为就是“发展生产力”，以此来误导广大人民群众，以为社会主义就是要和资本主义比赛经济增长，又利用上世纪末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比较快这一现象来宣扬所谓的“改革开放成就”。

要与这种资产阶级宣传做斗争，我们不能上他们的当。就是要在广大群众中宣传这样一种观念：靠着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剥削强度、毁灭劳动者一切尊严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一文不值！我们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充分就业“大锅饭”，不要资本主义的GDP！

从未来人类的长远发展以及生态可持续性的要求来说，不能允许资本主义经济无限增长下去。从中国资本主义的现实来说，由于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群众的残酷压迫，迫使人民群众开展“躺平”斗争，从而导致未来人口大幅度萎缩，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其自身矛盾的作用下也将在本世纪后半期进入零增长、负增长（即绝对萎缩）。所以，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神话也必然破灭！

向社会主义过渡

在未来一个时期，中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任务仍然是进行长期持久的“躺平”斗争，拖垮中国资本主义。同时，在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于无产阶级有利的变化时，向资产阶级要工资、要福利、要求缩短劳动时间，以各种行动猛烈地挤压资本家的利润率。

资本主义生产和投资的目的都是为了攫取利润。当利润率下降到一定程度，资本家势必大幅度减少国内投资，并企图进行资本外逃。这时，马列主义积极分子就必须开始广泛的宣传和发动，为即将来临的革命形势做舆论准备。

当这样的时机来临的时候，马列主义积极分子必须及时提出“改革开放”已经彻底失败的口号。今天中国资产阶级的核心意识形态当然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什么民族主义；中国资产阶级的核心意识形态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路线，也是当权的资产阶级与反动的自由派小资产阶级的最大公约数，也是妨碍思想上落后的劳动群众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大思想障碍。所以我们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一举打倒这个资产阶级精神殿堂中最为神圣、最不可侵犯的牌位。“改革开放”倒了，社会主义的旗帜就树立起来了。

具体来说，到那时，我们应当发动群众，要求当局宣布结束“改革开放”，实行资本管制、制止资本外流（将中国经济先与国际资本主义金融市场隔绝开来），同时大幅度增加公共投资，以弥补私人投

资崩溃以后所留下来的总需求缺口。如果当局能够满足这些要求，我们就应该力争在比较和平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

如果当局拒绝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那就是自掘坟墓。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就会进一步发展为全面的财政危机、政治危机，进而导致革命形势。

在初步夺取政权以后，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问题就是要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方面，我们面临的主要困难有：一方面，我们从资本主义中国继承下来的国有资本将不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未来的政治条件很可能不允许我们采取对私人资本家大规模没收财产的办法。

因为我们未来很可能将不是通过革命战争的方式来夺取政权的。大部分资本家不会像上一次革命时的剥削阶级那样犯有汉奸、发动内战、亲手屠杀革命志士等人人皆曰可杀的历史罪行。我们如果强行没收他们的财产，许多群众会不理解，在现实中也会给国民经济和工商业管理造成许多不必要的冲击。

未来，工农民主政权很可能是在群众性总罢工以及资产阶级政权瘫痪以后由群众“趁乱夺权”建立起来的。如果出现了特殊的有利的政治环境，也不绝对排除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通过资产阶级议会选举执政的情况。但我们不把希望放在后面这种可能性上。即使出现了后面这种可能性，如果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并掌

握绝大多数地方政权，即使由无产阶级政党在形式上组织了中央政府，也依然是无所作为的。

在用非战争方式夺取政权的情况下，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主要要用经济办法。这时，在革命前向资产阶级当局提出的各种改良要求就可以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步措施。比如，我们可以实行公民基本收入制度，给每个成年公民提供一定数额的基本收入，由此发生的财政支出通过向资本家征税来弥补。我们可以通过国有银行增加给国营企业的贷款，限制并减少给私人企业的贷款。这时，资本家就会被迫减少投资，这就会在总需求上出现缺口。当总需求出现缺口时，国家可以大幅度增加公共投资，如此增加的公共投资可以通过贷款甚至直接由中央银行增发货币来融资，而不会引起通货膨胀（或至少不会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如果出现了通货膨胀加速的苗头，也可以提高利率，进一步挤压私人投资，腾出空间来增加公共投资。如此这般，可以保证公共投资占投资的绝大部分。由于现在的投资决定着未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构成，假以时日，公有制部门就可以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在此过程中，如果有资本家破产、歇业，还可以由国家低价收购破产、歇业的资本家企业，一方面防止工人失业，一方面加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是否要借助一些“旁门左道”来加快过渡，还要看当时具体的政治形势。比如，在一定条件下，如果能够得到绝大多数劳动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可以为了反击帝国主义侵略、

完成祖国统一等目的，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并在此过程中加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在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社会的经济剩余就可以由国家集中起来、统一管理。国营企业的利润以及折旧基金都应该全部上缴，由国家统一分配。未来，社会主义国家所掌握的经济剩余应该主要用于社会公共的教育、医疗、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事业，用于环境保护和治理，以及有利于人民群众自由发展的其它事业，而不再用于扩大物质生产和消费的规模，以符合生态可持续性的要求。此外，在资本主义彻底灭亡以前，社会主义国家所掌握的经济剩余的一部分还必须用于国防事业。

在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掌握并支配了国民经济的剩余以后，就可以逐步地开始向计划经济过渡并缩小商品货币关系在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首先要使得劳动力不再是商品。劳动者的使用应当由有关的计划部门统一安排；国营企事业单位和劳动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需要劳动力的，应当向计划部门提出申请；劳动者需要工作的，也要向计划部门申请并等候分配；劳动者不愿意接受计划部门所分配工作的，可以领取公民基本收入并暂时待业；国营企事业单位和劳动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要努力安排好各单位工作的劳动者，对于劳动者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一般要采取批评教育的方法，只有对于已经犯罪或犯有特别严重错误的人员才可以开除并要求计划部门对其重新分配。

国营企事业单位和劳动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在使用劳动力的过程中，要努力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并适当结合劳动者个人的兴趣来激发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可以适当地组织一些劳动竞赛，并对落后的劳动者给予批评以及在绝对必要时实施一些物质惩戒措施。总的来说，只要保证绝大多数劳动者都可以按照符合一般社会标准的态度认真劳动即可，不要求也不鼓励大多数劳动者都做“斯达汉诺夫”那样的劳动模范。对于少数过分“积极”的劳动者还要加以劝阻，以免他们给其他劳动者在劳动时间和强度方面造成不必要的压力。

在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就可以立即实行适用于所有劳动者的、无例外的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并且除了绝对的公共必需，严禁为了商业目的的加班，也要禁止劳动者“自愿”加班，要反对并批判“劳动致富”的思想。

在此基础上，随着每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可以逐步缩短所有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为未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奠定基础。

随着整个社会物质生产和消费的规模不再扩大，用市场供求变化所形成的盈亏来刺激企业提高效率、增加生产也就失去了意义。在经济停止增长的情况下，计划工作会变得简单得多。绝大多数消费品只需要做到简单再生产就可以了。当然，计划部门还需要开展社会调查，并且通过观察各种消费品库存的变化来了解消费者需要的变化，库存减少的品种，就安排增加生产，库存增加的品种，就安排减少生产，必要时再适当调整消费品的零售价格。此外，计划部门还要设立一些

专门的研究所，根据综合起来的群众意见努力改进现有消费品的性能和质量，并开发少量的新消费品。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将对计划部门所制定的消费品生产和分配计划进行审议并加以修改，使其符合全体人民共同自由发展的需要。

在对消费品计划和生产的过程中，有一些浪费仍然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也不追求绝对的高效率，资本主义市场也做不到。最主要的，是要满足一切劳动者的基本需要，提供自由发展的可能性，保证一切消费品都安全可靠，需要长时间使用的消费品应当经久耐用，没有假货，童叟无欺。要消灭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制止各种不必要的、愚弄消费者的虚假品牌竞争，将劳动者从工作之余漫无目的的、自我强迫的、无休无止的“购物休闲”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够真正自由地支配工作之余的时间并致力于自身体力和智力的发展。

各种消费品的生产数量确定下来以后，为了生产这些消费品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的数量（原材料、机器设备、厂房、办公楼等）也就可以比较容易地确定下来。如果有些生产单位为了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明显超过了该生产单位在历史上或者其它一些生产单位生产同类产品时所需要的数量，那么除非有特殊原因（比如自然灾害），该生产单位在经营管理上显然存在着一定的过失，就可以追究该生产单位负责人的责任。

随着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一定量消费品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的数量会逐步减少。如果发现实际需要的某些生产资料

与计划生产的这类生产资料相比要少，那么节余出来的生产资料就可以纳入社会的储备，然后在来年做计划时安排减少这类生产资料的生产。由此节约出来的劳动力可以在整个社会范围重新分配，并相应地减少全社会劳动者的平均劳动时间（比如通过增加法定节假日的方式）。

在这方面，同样不需要追求绝对的技术进步速度。只要每年全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可以有所提高，每年提高1%至2%，积少成多，经过几十年，就可以达到普遍、大幅度减少全社会劳动时间的目的。

总之，未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既不需要（客观上也不可能）追求经济增长，也不需要与资本主义比赛“经济效率”，只要将各种工作失误、资源浪费、部分落后劳动者的偷懒限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在满足全体人民基本需要的基础上，不断地减少所有劳动者的劳动时间，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扩大所有劳动者追求自由发展的空间，就能够适应未来的历史需要，就能够开辟通往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

“阳粉”大战喜羊羊、恩格斯和“阳和平老师”—— 介绍“阳粉”的批判技巧

作者：远航一号

HAD 网友转发了知乎上的一篇文章^①，标题为“关于‘233 型酷炫喜羊羊’反驳阳和平相关言论的批判”，是一个匿名用户写的。据这位匿名用户说：“[2022 年]12 月 10 日阳和平同志于 b 站发表了上述言论，喜羊羊就上述言论以及阳和平同志曾经在其短视频中提到的‘阶级和脑体分工都是一定生产力水平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的相关观点对阳和平同志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不巧的是本篇文章又是对喜羊羊文章进行的批判。”

在这里，我们姑且称这位匿名用户为“匿名阳粉”。与其他阳粉一样，“匿名阳粉”所写的文章啰里啰唆、又臭又长、逻辑混乱、味同嚼蜡；喜羊羊的原文大约 3500 字，“匿名阳粉”对喜羊羊的批判的批判拖拉了 7000 多字（还不包括引用图片中的文字）。与其他阳粉一样，“匿名阳粉”反驳或者批判别人的办法也是歪曲篡改、断章取义，有时则是无中生有，还有一些时候则确实是不懂装懂、前言不搭后语。

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匿名阳粉”的批判技巧，以便各位红色网友“借鉴”、“学习”，以丰富我们在思想斗争方面的经验和手段。

一. 别人是偷换概念，“阳粉”是明换概念

阳和平先生在去年12月10日的视频中，发表“高论”，说什么即使到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不会组织社会大生产，那么就只好由资产阶级来组织”。喜羊羊批判的就是阳和平的这一谬论。

为此，“匿名阳粉”辩解说：

“在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我们的无产者们往往没有相应的能力组织社会大生产，从而只好由资产阶级来组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要将自己从资产阶级手中夺来的权力重新交给资产阶级，恢复资产阶级专政，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由资产阶级来组织社会化大生产一方面是由于无产阶级自身缺乏相应能力来组织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另一方面又意味着无产阶级必须在不再受资产阶级残酷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发展自身各方面的能力，掌握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各项技能。而最终组织社会化大生产这一活动仍然将由无产阶级自身完成。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在不得不由资产阶级专家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阶段，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资产阶级权力扩大化并培养无产阶级管理组织社会的知识水平和能力。立即将旧资产阶级专家排除在管理和组织社会化大生产和公共事务之外，由无产阶级自身管理

无疑是一种空想，而这样就必须要做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在社会主义初期掌握管理公共事务[权力]的社会公仆转变为社会主人。”

在上面这一段话中，“匿名阳粉”先是说，“我们的无产者们往往没有相应的能力组织社会大生产，从而只好由资产阶级来组织。”这里，作为无产阶级对立面、负责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是“资产阶级”。隔了几行，“匿名阳粉”又说，“在不得不由资产阶级专家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阶段，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里，负责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是变成了“资产阶级专家”。又隔了几行，“匿名阳粉”继续说，“必须要做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在社会主义初期掌握管理公共事务权力的社会公仆转变为社会主人。”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专家”，这时又都变成了“社会公仆”。

难怪凡是头脑正常的人在与“阳粉”讨论问题时都额外吃力。在同一段话里，负责组织与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集团瞬间就从“资产阶级”，变成了“资产阶级专家”，又变成了“社会公仆”。过去说，在辩论中“偷换概念”是不诚实、不光明磊落的。“阳粉”不搞“偷换概念”，而是明换概念，就是与神仙辩论也必能立于不败之地。请问“阳粉”，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后，组织与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到底是哪个社会集团？是已经被打倒的“资产阶级”？还是某种未经明确定义的“资产阶级专家”（“资产阶级专家”到底属

于哪个阶级)？还是既非“资产阶级”又非“资产阶级专家”的“社会公仆”（这样的“社会公仆”又是什么人、属于什么阶级）？

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专家”，还是“社会公仆”，既然无产阶级将负责组织和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大权交出去了，那么怎样防止人家变成“社会主人”呢？怎样避免“无产阶级要将自己从资产阶级手中夺来的权力重新交给资产阶级，恢复资产阶级专政”呢？

“匿名阳粉”有什么高招呢？“在不得不由资产阶级专家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阶段，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资产阶级权力扩大化并培养无产阶级管理组织社会的知识水平和能力。”这些想法是好的。但是，怎样才能做到这几点呢？为什么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几个方面的尝试都不成功呢？为什么，即使有毛主席那样的伟大领袖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失败了呢？

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怎样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呢？我们这一代马列主义者比毛主席他们高明吗？如果是，高明在哪里？如果不是，我们又可以得益于哪些毛主席那个时代所不具备的历史条件呢？

对于这些问题，“阳粉”们不说，没有回答，有可能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二. 无产阶级打野猪，“阳粉”做“批判的批判者”

阳和平胡说什么“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职能分工只会更加细化”。喜羊羊对阳和平的谬论给予了讽刺：“我提议，认同这一观点的人，都应该去厂里面感受一下‘更加细化’的“分工”，看看这到底是福报，还是对我们劳动者的摧残。”

我仔细核对了喜羊羊的原文，在原文中，对阳和平所谓“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职能分工只会更加细化”的评论仅限于上面这一句话。就是从这一句话中，“匿名阳粉”居然“读”出了喜羊羊的“荒唐”：

“喜羊羊犯了一个十分荒唐的错误：... 在喜羊羊看来，仿佛共产主义社会中是没有分工的，人人都是什么都会的‘超人’。马克思曾提到在自由人的联合体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都能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是将这种‘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脱离实际地理解成什么都会从而无需分工是一种很荒谬的做法。与喜羊羊的表述相反地，共产主义社会中分工仍然存在，并且更加细化。... 马克思曾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生产力空前发展，而要使得生产力空前发展，生产过程细化便是一大前提和重要措施。由于科技的发展，生产过程的细化，无产阶级便能很轻易地掌握每一步生产过程，一方面有助于无产者了解整个生产过程，一方面可以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升。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公有制条件下，人们劳动时

间相对很短，而他们将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发展自身各方面的能力，即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如上，喜羊羊说，认同社会分工只会更加细化的人，“都应该去厂里面感受一下‘更加细化’的“分工”，看看这到底是福报，还是对我们劳动者的摧残。”就是从这样一句话中，“匿名阳粉”竟然看到了——“在喜羊羊看来，仿佛共产主义社会中是没有分工的，人人都是什么都会的‘超人’。”

我们有时会用歪曲篡改、断章取义来评价一些人在辩论中不讲道德、无理取闹。但是，即使是断章取义，也要有“章”可断，有“义”可取。与歪曲篡改、断章取义相比，“阳粉“的文章道德已经进步到无中生有的化境了！

喜羊羊在原文中确实表达了，只有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观点。但是，如果不是依靠某种幻觉或者妄想狂，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喜羊羊在原文中主张过共产主义将消灭一切形式的分工。

“匿名阳粉”一方面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中分工仍然存在，并且更加细化”；另一方面又说，到了共产主义，“人们劳动时间相对很短，而他们将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发展自身各方面的能力，即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既然说到分工，那么，到底什么是“分工”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过：“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显然，分工就是指：任何人都只能从事“一定的特殊的活动”，“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只能是猎人、渔夫、牧人或者批判的批判者，并且“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

如果到了共产主义，如马克思（而不是喜羊羊）所描述的“分工”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要“细化”，也就是说，“强加于”每一个人的分工范围更加细小、更加琐碎，而且“不能超出这个范围”，那么，劳动群众又如何才能做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呢？无产阶级又如何有机会“发展自身各方面的能力，掌握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各项技能”呢？

而只要无产阶级“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并且被“强加于他”的范围越来越小、越来越细（除此以外，“细化”还能有什么意思），只能做猎人、渔夫、牧人，或者是更加细分的猎人、渔夫、牧人（比如有的专门狩猎野鸡，有的专门狩猎野猪），而“匿名阳粉”们则可以安然地、专门地担任“批判的批判者”，并且“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我们又如何防止“批判的批判者”不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呢？

三. “阳粉”比恩格斯更懂马克思主义

阳和平否认“只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仍然存在，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喜羊羊指出，阳和平在引用恩格斯的著作时采取了断章取义的、不诚实的做法：“我们来看看恩格斯完整的原话：‘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显然，被阳和平同志省略的这一段话，是与‘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密切联系的；离开了被阳和平同志省略的这一段话，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为什么‘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

“匿名阳粉”认为，“喜羊羊的论述毫无逻辑”，并且为“喜羊羊为什么敢[如此]厚颜无耻”而无限愤慨！

愤慨的“匿名阳粉”接下来用了两大段话，先是啰里啰唆试图论证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然后论证，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阶级划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对一下喜羊羊的原文。喜羊羊朋友在仅有3500字（其中还包括大量引文）的原文中可曾在任何地方否认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才会出现阶级？

将论战对手本来并没有的观点强加给对方（或者通过给读者强烈暗示的方法强加给对方），然后煞有介事地猛烈批判一个并不存在的靶子。这是“阳粉”以及阳和平先生本人在与他人论战时的惯常作风。

喜羊羊说：“无弋爰剑同志说阶级社会的物质基础是脑体分工，这是正确的。”“匿名阳粉”说，喜羊羊“错认为脑体分工是[阶级社会的]物质基础。... 脑体分工根本就不是什么所谓的物质基础。”

“匿名阳粉”还说：“只要稍微懂点马克思主义，稍微有点逻辑思维的人都不会从此篇文章中得出 ... 阶级社会的物质基础是脑体分工的结论。”

这次，“匿名阳粉”既没有无中生有，也没有断章取义，而是犯了睁眼瞎（也许是睁眼说瞎话）的病。

就在“匿名阳粉”自己引用的喜羊羊所引用的恩格斯的话中，白纸黑字，写着：“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看来，不仅仅是喜羊羊，而且连恩格斯也不如“阳粉”懂马克思主义，更没有逻辑思维。

四. “阳粉”说“阳和平老师”荒谬至极

在进一步阐释了恩格斯的论述以后，喜羊羊总结说：“恩格斯明确说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同时也是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条件”。

愤慨的“匿名阳粉”继续愤慨：喜羊羊“引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上述图中言论，得出了‘恩格斯说过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同时也是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条件’这一结论，也是荒谬至极，断章取义之举。... 可恰恰相反，恩格斯的这段话刚好又证明了阳和平老师的观点，而不是支持喜羊羊的观点。”

令人遗憾地是，“匿名阳粉”不仅没有做到忠实地转述论战对手喜羊羊的观点、准确地体会和把握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居然连“阳和平老师”的观点都无视了！

就在“匿名阳粉”所批判的喜羊羊文章中，白纸黑字地引用了“阳和平老师”的原话：“虽然社会职能分工是阶级产生的基础，也就是阶级的出现必须有分工，分工是阶级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反过来认为只要有分工就有阶级(秋石客的理论)是荒谬的，因为分工不是阶级存在的充分条件。”

看看！“阳和平老师”可是白纸黑字地承认，“分工是阶级存在的必要条件”。什么叫“必要条件”？稍有逻辑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A是B的必要条件，那么如果消灭了A，B也就不能存在。比如，呼吸心跳是“匿名阳粉”生存的必要条件，消灭（停止）了呼吸心跳，“匿名阳粉”也就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那么，“阳和平老师”说，“分工是阶级存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阶级与阶级社会就无法再继续存在下去了。这个逻辑，没错吧？既然如此，喜羊羊说，“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是“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条件，何错之有？

如果让我挑个小错，那就是喜羊羊应该把这个条件定义得更加明确一些：“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是“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充分条件。因为“阳和平老师”告诉我们了：“分工是阶级存在的必要条件”。

喜羊羊荒谬至极乎？“阳和平老师”荒谬至极乎？“阳粉”愤慨乎？天真又可笑乎？

怎样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来克服教条主义

作者：俞聂

昨晚在与李东辉网友的讨论中涉及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内因外因分析、各个国家具有自己特定的国情等相关问题

(<http://redchinacn.net/forum.php?... 9356&extra=page%3D2>), 李东辉网友特别强调要我们克服教条主义的错误。说来也巧, 教条主义(往往与宗派主义是双胞胎)也是红中网一直力戒并批判的。就此, 我根据自己学习马列毛的一点粗浅经验, 尝试来谈一谈怎样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克服教条主义的错误。欢迎李东辉网友进一步交流, 也欢迎其他网友批评。

我们说, 内因外因分析其实恰恰同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有很大的关系。

本站的知名反对派“指鸭为鼠”先生向来只强调分析“内因外因”, 绝口不观察矛盾的特殊性——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以至于他十余年来从马列托主义者逐步堕落到了马列托自由派的立场上去。

我们知道, 任何复杂事物都是由差别的部分组成的, 在这里差别就是矛盾, 矛盾就是差别。并且, 事物的发展过程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矛盾的运动, 这就是说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

当然, 我们既要看到矛盾存在于任一时间、任一地点、任一事物及其

变化运动之中，也要看到这种普遍性和绝对性是通过特殊性和相对性（即具体的事物）表现出来的。

打个也许不那么恰当的比方：

现在我们把世界设想成一个 Google Earth 一样的程序。矛盾的普遍性分析好比置顶的公告栏，时刻提醒我们要注意这个世界是有差别的统一体（即所谓“对立统一”），也就是说无论是事物内部，还是事物之间，都是既有差别、又有联系的。

矛盾的特殊性分析则是可以看作一个能够调整具体坐标和尺度的工具栏。在坐标调整、尺度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观察许多不同的单个城市、国家、地区或世界的局部，分析单个局部的特征。这就是矛盾的特殊性分析中所谓关注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在坐标和尺度都能够调整的情况下，我们就不仅可以观察许多单个的局部，而且可以观察某个局部所在的整体，以及某个整体所在的更大的整体，以便更加全面细致地理解整个 Google Earth（即世界）。这就是矛盾的特殊性分析中所谓关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形成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鉴于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全球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因而我们既可以在世界市场的尺度上分析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又可以在民族国家的尺度上分析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还可以结合不同的尺度进行分析。

如果只在世界市场的尺度上分析，那么资本主义就是一个世界体系（或世界性的生产秩序）。无论我们选取哪个具体坐标，目前它的矛盾的主要方面都是全球资产阶级，次要方面都是全球无产阶级及其

同盟军。这时候由于我们没调整分析的尺度，只能看到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打败全球无产阶级，世界革命遥遥无期，而并不了解无产阶级持续分裂、资产阶级始终统治的具体的现实原因和过程，甚至于责备无产阶级的意识涣散，更谈不上找出次要方面向主要方面转化（即全球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路径。

如果只在民族国家的尺度上分析，那么资本主义就是一种生产关系。无论我们选取哪个具体坐标，目前它的矛盾的主要方面都是国内资产阶级，次要方面都是国内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军。这时候由于我们仍然没调整分析的尺度，看到的只能是各个国家层面的无产阶级相继溃败，犹如病毒感染，例如上世纪的苏东剧变。某些左派同志或许是出于坚定信念的需要，此时会在各国无产阶级一败涂地的汪洋大海中，集中精力去寻找几个次要方面相对比较突出、可能具有典型（象征）意义的国家，比如存在毛共游击队的地方，或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比较隐蔽或不那么发达的国家。然而，如果我们只在民族国家的尺度上分析，甚至都无法完全解释历史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为什么会接连发生资本主义复辟。难道真是幸福的国家是相似的、不幸的国家却各有各的不幸，我们只能祈请历史偶然性来说明问题吗？

有些认真的同志这时可能就会想到，调整不同的尺度进行综合分析。比如，在观察民族国家尺度的同时，结合国家以下的尺度进行分析。这时候的画面往往会显得极其复杂，并且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当然，多元论者会跳出来说是对的，因为世界本身就是如此复杂。

相反，唯物论者会主要从物质生产和经济基础去寻找隐蔽的“线头”。一如有些同志解释说，中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主要是因为国内的无产阶级力量还不够强大而且分散，而遍布各地的几亿农民的小生产又异常顽固，即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是导致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物质基础。再如有的同志继续为了坚定信念而断定说，其他历史社会主义国家失败是因为它们各有各的错误，而一国是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因为即使面对国内外的反动力量，只要不断加强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就能解决问题。

我们看到，上面这种综合不同尺度的分析，已经不再只是远远地看某个局部，不再只是分析该局部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而是尝试在尺度的动态调整中找出多种矛盾之间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以此说明包含了局部的整体，或者作为整体的局部的特征。

坦白说，我是赞成这种辩证的矛盾分析法的，既要看坐标（分析矛盾主次方面），又要调整尺度（分析主次矛盾）。但是现实问题的关键是，举凡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何以未能埋葬资本主义、历史社会主义国家为何复辟资本主义、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等问题，一概都不能只从某个单一的坐标局部和尺度来思考和回答，既不能仅仅把它们看成单独的个案来考察（单个局部矛盾主次方面的分析），又不能脱离具有支配性地位的世界市场来对它们进行分析（脱离世界体系的主次矛盾分析）。如果我们从地区、国家上升到世界市场的尺度，再从世界市场、国家回归到地区的尺度，在此过程中亦比较不同的坐标局

部，如此反复观察思考，或许可能得出更加贴近真实的答案。

首先，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无疑已经告成，鉴于地球是人类目前最主要且最大的活动范围，因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应当是我们在分析单个坐标局部(矛盾主次方面)时所应当注意的最高尺度(主次矛盾)。换言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我们在分析一国或地区的资本主义时，必须考虑进去的起规定作用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集团现时构成了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舍此，我们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把应该考虑进去的特殊矛盾遗漏在外，即没有分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当然，假使未来某天真有外星人大规模地跟地球人保持密切联系，或者地球人冲出太阳系跟其他星系的“人类”形成了密切关系，那么届时我们的矛盾分析尺度可能还会超越地球)

我们先简单看看世界性资本主义本身的特殊性。最迟在列宁发表《帝国主义论》的前后，资本主义就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支配性的世界体系(秩序)，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全球资本积累。在这个世界性的矛盾中，主要方面是大规模无偿占有本国及他国无产阶级劳动的跨国资本家阶级，次要方面是全世界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世界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源源不断地被这个资本家集团所攫取。

其次，我们不能仅停留于模糊的世界尺度本身，还要进一步结合民族国家的尺度来仔细观察。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通过民族国家表现出来，就形成了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明确指出的世界性的两大对立，一边是享有垄断高额利润的极少数最富国家，一边是受这个集

团压迫和剥削的世界大多数民族和国家。列宁将这个压迫和剥削全世界劳动者的资本家集团称为“帝国主义”，它们的特征就是寄生性和腐朽性。说帝国主义集团具有寄生性，是因为它们依靠世界市场的垄断地位攫取超额利润，寄生在世界劳动人民的身上。说帝国主义集团具有腐朽性，是因为它们一方面为了维持利润率而日益减少生产性投资，另一方面为了缓和本国阶级矛盾而腐蚀工人运动。

现在我们看到，结合世界市场和民族国家的尺度分析，就能发现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社会当前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跨国资本家阶级与世界劳动人民的对立统一，其中，寄生腐朽的帝国主义集团构成了主要的方面。如果我们承认资本主义是全世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如果我们不否认地球上所有国家或地区都与其存在这样或那样、直接或间接的联系，那么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当今全球人类社会的性质，主要是由“世界市场上具有垄断地位的帝国主义集团”这一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这意味着我们在对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特殊性作进一步具体分析时，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个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的规定性作用。舍此，我们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

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何以未能埋葬资本主义？历史社会主义国家为何复辟资本主义？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对待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一概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具体分析不等于局部分析，

而是提醒我们分析普遍性的矛盾如何寓于特殊性的矛盾之中，特殊性的矛盾又如何表现普遍性的矛盾，即观察和分析二者之间的辩证法。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作为现代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而言，它是现代的特殊矛盾；就现代人类社会本身的历史进程而言，它又是起规定作用的普遍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因此，我们在贯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时，就是考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普遍矛盾是如何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殊矛盾中表现出来的。

这一普遍矛盾首先要通过世界市场和民族国家表现出来。在世界市场上，各民族国家大致分成了核心国家（高科技垄断国家、主要消费国）、半外围国家（主要出口制造国或主要资源国）和外围国家。其中，（1）除个别地区外，外围国家往往缺乏稳定的资本积累秩序，主要从事的是竞争激烈且利润低微的行业，如农业、采矿业、轻纺工业等。（2）核心国家的资产阶级（统治阶级）则通过垄断性的技术在全球赚取超额利润、剥削全世界无产阶级，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将超额利润中的一部分用来提高本国无产阶级的生活消费水平，并维持一定的形式民主，以此实现本国内的“劳资谅解”，避免阶级矛盾爆发。（3）半外围国家的状况介于上述二者之间。半外围国家中的

出口制造国主要从事的也是低利润的竞争性行业，因此本国资产阶级（统治阶级）只能通过政治专制来维持对本国无产阶级的高强度剥削，以保证稳定的资本积累秩序。半外围国家中的资源国由于人均自然资源相对丰富，这些国家无产阶级的处境主要随着世界能源、原材料价格的行情而相应波动。

这些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各国的统治者之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统一体现在追求资本积累的总目标，对立面体现在相互竞争。马恩曾经提示我们，在统治阶级本身未受到颠覆性的威胁之前，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分工）甚至可以发展成为相互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对立和敌视。但是一旦发生任何威胁阶级本身的实际冲突，“这种对立和敌视便会自行消失”。这就是说，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尚不能团结起来实际威胁资产阶级统治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内部之间的竞争、对立或敌视往往会暂时地成为政治的主流。在那样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普遍矛盾将主要通过民族国家间的合纵连横表现出来。到了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实际威胁到资产阶级的统治时，各国资产阶级便开始媾和，试图联合起来打垮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结，彻底绞杀革命力量。

十九、二十世纪的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谓不声势浩大，但最终何以未能埋葬资本主义？我们认为，这是因为西欧无产阶级运动受制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动规律。西欧（核心）国家无产阶级的斗争和革命固然风起云涌，相继争得了八小时工作制、普选权等权利，甚

至几度夺取了政权，但是最终却不幸地主要走向了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其中的关键原因就在于，西欧核心国家的资产阶级通过在世界市场剥削其他国家和地区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将其中一部分用于缓和劳资冲突，让本国的劳资矛盾始终限于资本主义的改良框架之内。以二十世纪初的头号资本主义强国英国为例，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特别是 1920 年至 1980 年），英国经济中的各种劳动收入（如工资、薪金、补贴、小业主收入中的劳动部分等）占英国国民收入的比例提高到了 70% 左右，英国工人通过斗争使得他们的生活水平事实上有了显著改善，远远优于当时绝大多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人民。正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这种不平等交换运动，使得西欧地区原本进步的工人阶级没能成功团结世界其他地区的无产阶级同盟军，西欧工人阶级之间的团结让位于世界劳动阶级之间的竞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终陷入“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

当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普遍矛盾中，世界劳动人民是不会一直甘于处在被彻底支配的地位的。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其后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为全世界劳动者团结的领导力量，鼓舞并支持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上相继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在 1975 年前后的全盛时期，曾经发展到占全世界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二、人口的三分之一）。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是在政治上由共产党或工人党领导、经济上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或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国家，它们组成了一个相互支

持的阵营，共同对抗帝国主义集团，但是在帝国主义集团湮灭之前，它们无一能自外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仍然要参与世界市场的残酷竞争、服从于资本积累（经济增长）的总目标。以社会主义的头号强国苏联为例，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着大量的贸易，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了不少先进技术、设备和特殊原材料，同时也向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出口商品并与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如果从苏联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928年算起，至1970年，苏联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07%。苏联在1928-1970年近半个世纪期间的增长幅度在这个时期有数据的51个国家中排在第二位，超过了除日本以外的所有其它国家。如果以1928-1988年作为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那么苏联在这六十年中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是2.8%。

参与世界市场的残酷竞争、寻求资本积累（经济增长）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个普遍矛盾的规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追求的则是每个人都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发展自我，而不必限于“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天不崩溃，其规律一天不停止发生作用，即使是历史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得不在保证人民生活的同时要将资本积累置于首要地位。然而，“资本积累需要生产大量资本品，保证人民生活需要生产大量的消费品，向无阶级社会过渡并防止复辟则需要极大减少劳动时间的情况下生产前两者。就算这三个任务在长期或终极意义上是统一的，但在通往长期道路上的每一个短期它们都相互矛盾。”就此而言，上世纪历史社会主义复辟的一大原因正是

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动规律使得这些国家无法同时完成上述三个任务。

同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是某种宣称“建成”了的社会主义，那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劳动时间得到普遍、大幅减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当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秩序的规定下，一国虽然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但却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当然这种建设不能只是某一国的任务。反对阶级的统治，就需要现实的对立阶级的力量。反对国家的统治，就需要能够夺取国家政权的组织力量。反对世界体系的统治，就需要能够打破世界市场竞争的世界革命力量。这意味着，在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规定时，世界层面的次要方面（社会主义阵营）如何向主要方面转化，是一个耐力和力量的比赛。与此同时，各个民族国家层面的主要方面（社会主义政权）如何防止主要方面再次向次要方面转化，始终受到世界层面主要矛盾的运动的规律。然而不幸的是，上世纪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力量相对弱势的情况下，耐力也未及帝国主义集团，最终导致了国际共运的低潮。

今天的我们要记取前人胜利的经验教训，尤其需要努力做到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身的特殊性，又分析这个特殊性如何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和主要的矛盾而体现于各个民族国家之中，如何规定各个民族国家的资本主义

的特殊性，如此反复观察——克服教条主义的错误，免得上了资产阶级反动派和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分子的当，做了替帝国主义集团摇旗呐喊的糊涂鬼。

身处二十一世纪的我们需要看到，自从上世纪世界无产阶级被打垮以后，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便又不由自主地开始从联合走向了竞争、对立甚或敌视。无产阶级暂时还没有登上世界政治和历史的舞台，舞台中央仍由各色资产阶级驻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虽摇摇欲坠，但其普遍矛盾仍旧通过世界市场和民族国家而表现出来：在世界市场上，各民族国家以鲜明的核心（高科技垄断国家、主要消费国）、半外围（主要出口制造国或主要资源国）和外围扮演各自的角色。我们看到二十一世纪的情形已经变成部分半外围资源国家的资本家统治阶级获得本国大部分无产阶级的支持，领导外围国家形成了一个虽松散但力量不容小觑的反帝阵营。与此同时，以寄生腐朽为特征的帝国主义集团彻底朝着腐坏、崩溃、毁灭狂奔，它们不仅对挫败（半）外围国家资产阶级的斗争感到有心无力，而且对维持本国无产阶级的舒适生活消费水平、政治权利、文化氛围也彻底无心无力。纵观世界，似乎只有一个内瓢腐烂的庞然大物——半外围出口制造国还在徒劳地尝试裱糊破烂的世界资本主义的“纸房子”。可是，所谓独木难支将倾之大厦，更何况一根早已被腐蚀空心的朽木呢。

站在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我们，虽然还没有完全看到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驱雷掣电、翻天覆地的革命高潮，但是毕竟历史已经为

我们准备好了“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我们的任务就是去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国和世界的阶级斗争形势，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克服教条主义，总结和宣传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现实条件。

可能有些同志会疑心世界体系分析是外因分析，当我们着手观察某个具体国家的时候就不适用了，就需要转向对该国家做内因分析。对此，我们认为内因外因分析不过是矛盾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另一种说法。恩格斯曾说：“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同样的，毛泽东也讲：“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既然如此，对于内因和外因，我想我们还是遵循唯物辩证法的提示来做吧。

“后资本积累时代”前夜的中国与世界 —— 2023 年新年笔谈

作者：井冈山卫士

编注：在这篇新年笔谈中，井冈山卫士同志根据近年来红色中国网独立自主理论探索取得的一些成就，结合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实际，具体分析了过去一年来国内外阶级斗争的若干重大发展。最近一个时期，人们常常会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转折”的时代。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也时不时会故弄玄虚，讲什么“千年未有”或“百年未有”的“大变局”。然而，所谓的“历史转折”、所谓的“大变局”，其实质，到底是什么呢？井冈山卫士同志明确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对资本积累的无限追求为目的）的历史时代即将过去了。取而代之的，也许是一种更加险恶的新的阶级社会，也许是劳动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并向无阶级社会过渡。但无论如何，“后资本积累”时代正在来临，各大国的统治阶级、各主要国家政治上有觉悟的劳动阶级，都开始行动起来，努力争取在旧秩序瓦解后建立起一个最符合自身利益的新秩序。在瓦解与新生交替的大动荡中，唯有中国资产阶级还在忙着在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资本积累游戏中跑在最前面，洋洋自得，而实际上却已经几乎完全丧失了影响世界历史未来走向的主动权。在各劳动阶级中，或许只有中国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在当前历史转折中不仅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且主动地争取建设一个符合自己利益和意志的未来。

在每一个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总会出现仿佛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仿佛阶级社会稳定统治的一切规则和秩序都在突然之间崩裂了，融化了，消失的无影无踪了。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似乎在群众愤怒的指责声中成为自我安慰的笑话，政治的上层建筑似乎只剩下“大白”和辅警仓皇撤退后的一片狼藉。个人的选择好像一夜之间有了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仿佛点击一次一键三连的蓝色按钮，输入一段媚乌仇俄的喧嚣文字，甚或举起一张对折多次的惨白纸张，就能在顷刻之间开辟历史前进的道路。东欧的纳粹狂徒、北美的帝国政客、全球的“白左”宵小都在向新生的中国左派伸出手来，呼唤着后者与他们一起走向许诺中的未来。

但也正是在每一个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历史必然性总是以最强大和最赤裸的姿态无情地碾过无数人的政治幻想为自己开辟道路。纳粹狂徒正在民族解放的炮火中化为齑粉，帝国政客正在群众的反抗中左右支绌，“白左”宵小正在迅速沦为人民群众唾弃的堕落败类。除了少数把自己的全部政治生命都押宝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颜色革命上的“左皮自由派”以外，剩下的绝大多数左派都逐渐从这些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选择”中苏醒过来，逐渐认识到了中国左派的命运取决于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归根结底是中国劳动人民自己推翻中国资本主义、自己建设社会主义、自己解放自己的历程。

个人的选择千种万种，历史的方向只有一个。

“后资本积累”时代

2022 年的中国是一个处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以中低端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制造业为支柱的半外围工业大国。中国资本主义的这些结构性特点决定了它需要维持较高的资本积累水平（近年来中国每年的净投资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0%）才能勉强将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同时满足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国家、劳动人民三方需要的水平。中国资本主义高速积累的外部条件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霸权格局的稳定，即中国需要美国继续履行霸权国家的诸多职能。中国资本主义高速积累的内部条件是中国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达成的“增长的社会契约”——即资产阶级许诺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大约每十年翻一番，大约每一代人有质的飞跃（五到六倍），对于劳动人民中的“优秀分子”许诺以“阶级跃升”的前景；劳动人民为了得到资产阶级的这些“许诺”，不得不提供超长时间和超高强度的劳动，并且放弃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尝试。在 2022 年，上述两个条件都发生了或大或小但是相当显著的动摇。

霸权不是霸权国家单方面的榨取，霸权国家也必须向其辐射范围内的其他国家提供“公共品”，即履行霸权职能。稳定的霸权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惠”关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国家。美国掌握的军事力量成功地压制了民族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解决了民族国家安全和世界资本主义积累秩序之间的协调问题；美国的庞大的工业能力和庞大的市场先后使得美国成为了世界宏观经济的“最后贷款人”和“最后借款人”，先

后稳定了世界宏观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美国从全世界剥削的剩余价值成功构建了以“美国梦”为核心的全球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将全世界的统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大部分以及核心国家的工人阶级都囊括进了帝国主义全球社会契约中。这个社会契约的最新表现方式就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美国的军事力量为中国得资本主义积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保护伞。美国有效地维护了中东地区稳定得地缘政治秩序，为中国保障了一条从波斯湾经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的能源生命线，让石油自给率不到三成的中国资产阶级可以享受较为稳定的能源供应。美国在拉美和非洲维持的帝国秩序也为中国资本积累所必需的原材料保障了稳定的来源。美国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及其欧亚仆从政权的稳定存在为中国资产阶级提供了不需要付出政治代价的宏观总需求。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世界秩序也为中国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动政治进攻、执行国企私有化、金融自由化、“万众创新”、“灵活就业”等政策，以及有效安抚小资产阶级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当这几种条件不复存在时，中国高速资本积累所仰仗的外部条件也就不复存在了。

美国霸权自从越南战争失败以后就进入了“衰而不落”的状态。一方面，美国已经无法像二战刚结束时那样有效履行上述三种霸权职能，其他民族国家在美国霸权之下能够享受的“互惠”利益正在逐渐消失，这是其“衰”的方面。另一方面，美国仍然具有强大的军事和

经济实力，能够通过经济制裁、颜色革命、武装侵略等方式给不服从其霸权的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害。这就形成了当今世界霸权格局最近一个阶段的特征，即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从有限互惠变成了单方面榨取，其他国家“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不得不继续屈从于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这是美国霸权仍然能够“不落”的方面。这种“不落”的状态会逐渐随着“衰”的加深而不再稳定，这体现在美帝国主义的相对实力逐渐缩减，同时其行为却愈发具有侵略性和不确定性。对于那些拥有经济自持力的大国而言，当美帝国主义既无法提供有利的国际秩序，又无法有效颠覆其政权时，脱离美帝主导的世界体系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俄罗斯是第一个明确宣告要脱离美帝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大国。作为美帝仆从武装集团的北约不仅失去了维护欧洲地缘政治均势的意图，也失去了在常规战争中有效遏制俄罗斯地缘政治企图的能力。俄罗斯统治阶级面临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如果服从美帝国主义，就不仅要放弃新收复的克里米亚，放弃其在东欧、中东和中亚的影响力，而且要放弃近二十年来俄罗斯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的成果，放弃能源市场定价权。就算放弃这些，也很有可能无法避免战争，因为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武装集团的最终目的有可能是肢解俄罗斯，消灭俄罗斯统一的民族国家（这也被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明斯克协定》是为了准备战争”的言论所证实）。如果不服从美帝国主义，最坏的情况无非是在核战争中同归于尽，而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俄罗斯在常规战争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地缘政治斗争中最终取得胜利。对于美帝国主义而言，

打垮俄罗斯是形式上维持帝国秩序的斗争，本质上是衰落霸权撤退过程中的反复，输了无非是帝国加速坍塌，但是美国仍然有作为民族国家的本钱。对于俄罗斯而言，这是生死存亡的斗争，是输不起的。

战争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俄罗斯的统治阶级团结一致，拥有本国民众支持，能够承受持久战争和较大伤亡，拥有充足军事物资储备，拥有充足的经济自持力，拥有世界人民的同情——这些决定性的有利条件已经逐渐被各界认识清楚，俄罗斯取得战争胜利的前景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俄罗斯的战争目标也逐渐清晰了起来。俄罗斯最直接的目标是解放“新俄罗斯”地区（原东南乌克兰），推翻深度法西斯化的基辅傀儡政权，实现乌克兰中立化，粉碎基辅政权的民族压迫。俄罗斯的长远目标已经明确写在了其 2021 年底向美国及其仆从国提出的“安全保证”草案中，即将北约的实际作战能力限制在 1997 年的边界，将俄罗斯的直接势力范围推进至原苏联边界，充当美国退出欧洲之后的欧洲安全保护人。俄罗斯的根本目标是通过战争、外交和经济斗争将欧亚大陆相当大的一片区域剥离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对于美国来说，俄罗斯的直接目标是让其退出乌克兰，放弃对俄罗斯搞颜色革命的目标；俄罗斯的的长远目标是让其放弃对欧洲诸多仆从政权（包括欧盟）的支配；俄罗斯的根本目标是让其放弃全球霸权，促其和平转型为两洋之间的民族国家。

俄罗斯上述地缘政治谋划的本质是寻求美帝国主义崩溃后“后资本积累”时代的世界秩序。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诞生以来，资本积累

就是驱使其扩张的根本动力。为了维持资本积累，进而也是维护资产阶级多数成员的自身利益（即确保资产阶级的成员作为资产阶级而存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需要将世界人口中越来越大的部分囊括进来，迫使或诱使其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创造剩余价值。为了协调各个民族国家之间资产阶级的利益，核心国家中最为强大的一个就必须担负起霸权国家的职能。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身地理范围的扩大和直接参与资本积累的人口的增加，这个霸权国家的职能就越来越复杂、愈来愈艰巨，对霸权国家总体实力的要求也就越来越严苛。到了今天，就连美国这样一个大陆级别的强国都无法继续有效履行霸权的基本职能。换句话说，资本积累越是向前推进，就越是需要更加强大的霸权国家来履行越来越复杂的霸权职能，而要供养这个霸权国家国内阶级妥协和履行霸权职能所需要的剩余价值也就越来越多，这就会进一步刺激资本积累向前推进。当进一步维持霸权格局（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基本结构）所需的额外剩余价值显著超过世界体系资本积累所能提供的额外剩余价值时，资本积累就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了否定自身的力量。到那个时候，资本积累本身的崩溃便是可预见的未来了。

在“后资本积累时代”，将不再存在覆盖全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是，代替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格局到底如何，却仍是未知数。第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当今世界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如比尔·盖茨和英王查理三世）和组织（如世界经济论坛）支持的“大重启”格局。即保留资产阶级上层以及直接为他们生产奢侈消费品的奴工人口，将剩下的绝大多数人口消灭或是将其消费压制在极低的水平。要实现这

一目的，第一步就要从政治上彻底打垮、在经济上全面窒息核心国家的工人阶级。核心国家的去工业化和资产阶级民主的衰落都与此有关。

第二种可能的情况，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关键的半外围大国中国爆发，革命民主政权在避免官僚化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前提下削弱并最终击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残余，最终实现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也是我们作为中国的革命左派要争取的结果。

第三种可能的情况，则是当今世界体系崩溃之后形成数个小体系，如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大陆体系和美国主导的美洲体系等。在小体系中可能存在较低水平的资本积累，但是这些小体系将既没有能力各自维持强大的霸权国家，也没有能力进行体系间的争霸。小体系内的领导国家最多能够就本体系内的民族国家利益进行有限的协调。在不存在支撑资本积累所必须的霸权格局的情况下，这些小体系唯一的稳定格局是长期的低积累乃至停滞。但是由于低积累环境下不需要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这些小体系中的劳动人民虽然未必会有较高的生活水平，但也并不存在广泛的革命潜能。这样的多个小体系在停滞和相对稳定条件下的共存，或许就是俄罗斯资产阶级正在追求的“多极化”格局。

无论世界将以何种方式进入何种“后资本积累”时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地位都相当尴尬。服从“大重启”意味着中国资产阶级人口中的绝大部分要么被消灭，要么不再作为资产阶级存在。服从“多极化”意味着中国资产阶级中从事出口加工制造业的主流部分将注定先是

被隔绝在现存核心国家市场之外，然后被欧亚大陆体系中其他国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挤出现存的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市场。相比较而言，向中国革命投降反而有可能是较好的结局。换句话说，当世界其他主要资产阶级集团都在思考和准备如何以对自己更有利的方式进入“后资本积累”时代的时候，中国资产阶级还在继续致力于在资本积累这种“过时游戏”中获得优胜。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中国资产阶级在俄乌战争这种重大问题上既不敢公开支持美国，也不敢实质性地支持俄罗斯的尴尬现象。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自身的稳定极度依赖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稳定，中国资产阶级对斗争双方的依赖要大于斗争双方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依赖，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资产阶级宁愿受着夹板气也要把生意继续做下去，在对外政策上完全处于被动应付的尴尬姿态的根本原因。

那么，中国能否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权，继续支撑全球资本积累呢？答案是否定的。要成为世界霸权，首先要成为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即在世界市场的不平等交换中获取大量净剩余价值的国家。如果中国加入核心国家的行列，核心国家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将会超过世界总人口的四成。加上现存的上层半外围国家，世界上直接或间接“剥削”他国的人口将会超过一半，形成一个多数人“剥削”少数人的世界。古往今来，还从未有任何阶级社会能够在这种格局下取得哪怕是暂时的稳定。中国要成为核心国家，并且维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唯一的出路是把现有核心国家中的绝大部分赶出核心。中国显然永远不会具备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做到这一点。同时，如

果凭借当今美国的能力都无法有效履行霸权国家的三项基本职能，更不用指望一个体量与美国相差不大的中国在一个更加无序的世界体系中充当有效的霸权。换句话说，中国的体量远超过了和平进入核心国家标准的上限，中国太大了，太肥硕了。同时，中国的体量又远小于通过不和平的手段成为霸权国家的下限，中国太小了，太虚弱了。中国没有任何机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

“增长的社会契约”

支撑中国国内资本积累秩序的“增长的社会契约”是中国革命中形成的“社会主义社会契约”退化解体后的产物。社会主义社会契约指的是劳动人民服从官僚集团主导的劳动纪律、收入分配和政治结构；官僚集团许诺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劳动人民的生活提高到“四个现代化”的水平，在某个未来时间点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并在整个历史时期适当控制“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在官僚集团背弃了“社会主义社会契约”之后，由官僚集团演变而来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打败了国企工人阶级，并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了同盟。在农村半无产阶级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的背景下，中国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出口国的身份完全融入了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在这个时候，中国拥有一支数量庞大，受过相当教育、身体健康，又吃苦耐劳的劳动力队伍。快速的资本积累也保证了中国工人收入的迅速增长，而出口加工制造业的简单重复劳动又随时可以被刚进城的农民工迅速取代。在这个时候，摆在中国工人面前的，是一条只要努力工作就有饭

吃、只要长久地努力工作就能在未来为自己的后代提供美好生活的道路。相反，如果不主动接受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这一切都无从谈起。对于资产阶级来讲，当时的历史条件就宽松多了。只要资产阶级将大多数剥削来的剩余价值用于资本积累，并且大体上维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基本功能，他们甚至不需要特别注意收入分配问题，就能够在这个千载难逢的四十年“战略机遇期”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自身财富的积累。

长期宽松的历史环境让中国资产阶级实现了数量和财富的增长，同时也让其政治代表失去了在残酷和复杂环境下才能培养出来的思考和决断能力。这个“战略机遇期”越长，中国资产阶级就越会将其当成是历史的常态。在关乎国内资本积累秩序的问题上，今天的中国资产阶级显然已经认定，中国工人的高强度和长时间劳动都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给定条件”。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经到了几乎耗尽的地步，以往城市工人可以被大量农民工轻易取代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新世纪出生的农民工早已不愿意像其父辈和祖辈那样拼命劳动。中国资本主义能够提供的最大规模的“阶级跃升”机遇，即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从农民变成工人的机遇，对于目前主要以城镇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组成的劳动人民来讲已经完全不具备任何吸引力。同时，由于中国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中处于生产中低端出口产品的半外围地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需要的和能够支撑的“高技能”劳动力是有限的，中国经济能够提供的相当于现代小资产阶级的工作岗位占人口比例的总容量也是有限的。这就意味着，今天

绝大多数抱着成为小资产阶级梦想的高等教育毕业生一出校门就面临着无产阶级化甚至更绝望的半无产阶级化的危险。中国资本主义一度为劳动人民提供过的——只要努力学习和工作就能实现的——向现代小资产阶级甚至统治阶级跃升的道路也基本封闭了。

这些“阶级跃升”途径的封闭只是资本积累秩序崩溃原因的一部分。由于中国劳动人民阶级斗争力量的增强，中国经济在2008年以后出现了明显的利润挤压趋势，即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下降。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出于上面解释过的原因）无心也无力挑战美国霸权，中国无法获得大量的海外剩余价值，只能依靠在较低技术水平上反复追加固定资产投资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造成了产出/资本比的下降。两方面趋势重合，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已经下降到了大约12%，即相当于2009年高峰时期的一半，只是略高于美国在上世纪大萧条时期的水平。产出/资本比的下降意味着资产阶级需要占据国民收入的一个较大份额才能维持同样的利润率。换句话讲，劳动收入份额只要保持不变，利润率就必须下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各安其分”的物质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

阶级斗争烈度的增加也对资产阶级国家的镇压与安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意味着，资产阶级国家要想有效履行其职能，就势必要占有和使用国民收入中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从而同时挤压劳资两方面的收入分配。在中国无法通过成为核心国家、获取海外剩余价值来实现阶级矛盾“破局”的情况下，中国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所

掌握的剩余价值将会越来越无法同时实现（暂时）安抚部分被统治阶级、维持利润率和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三重任务。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也会在逐渐陷入这个死结的过程中继续减速，中国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增长也会随之减缓。如果这个增长速度从7%下降到3%，实际物质生活水平“翻番”的速度就会从十年拉长到一代人。如果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与美国类似的1.5%，那么在一代人的时间甚至无法取得肉眼可见的物质生活水平提升。到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将无力履行“增长的社会契约”中的“契约义务”。失去了“盼头”的劳动人民也不会再继续接受长时间和高强度的劳动，生产和再生产的“躺平”会迅速成为常态，劳动纪律会发生不可遏制的松弛并最终进入总崩溃。正如我们前文所讲的，中国资产阶级稳定统治的条件是高速资本积累，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在资本积累长期停滞的环境下继续存在。“增长的社会契约”的瓦解会敲响中国资产阶级的丧钟。

资产阶级民主的消亡

在某种程度上，2022年美国阶级斗争形势的进展不如红色中国网编辑部在一年前的预期。尽管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民认识到了拜登政权的反人民本质，但是美国人民力量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群众政治动员。在十一月份的中期选举中，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建制派全方位的破坏，共和党内特朗普派的候选人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共和党勉强取得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却没有取得参议院的多数席位。共和党建制派首先

是大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对于他们来讲，宁愿让本党候选人竞选失败，也决不允许特朗普派的候选人取得胜利。

在几个关键的“摇摆州”（亚利桑那、明尼苏达、威斯康辛、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州长职位仍然由民主党人把控。所谓“摇摆州”指的是美国总统选举中在以往选举中既有可能倒向民主党也有可能倒向共和党的州。总统选举的结果基本取决于这些州的投票结果。民主党人担任这些州的州长意味着实际操纵民主党的美国全球化资产阶级的主流得以掌控这些州的选举程序，可以通过邮寄选票、计票造假、假冒选票等方式将选举舞弊系统化、制度化。如果美国大资产阶级需要在2024年总统选举继续搞类似2020年甚至规模更大的选举舞弊，那么掌控摇摆州州长的位置将大大减轻其舞弊的制度阻力，减少舞弊的政治代价。

中期选举后，美国大资产阶级开始积极扶持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州长德桑蒂斯，试图塑造一个所谓的“温和派”候选人来分裂特朗普派的群众基础。由两党共同组建的“一月六日调查委员会”继续捏造伪证，将由大资产阶级谋划、联邦调查局组织、国会山警察全力配合的国会“骚乱”嫁祸给特朗普，试图阻止其再度参选总统。在六年前特朗普的“通俄门”被证明完全是捏造之后，联邦调查局还闯入特朗普的住所，搜罗和捏造特朗普将核武器的秘密文件泄露给俄罗斯的“证据”。美国的行政和司法机构继续对支持特朗普的群众进行从搜查

拘禁等一系列迫害。大媒体公司、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也在强制冻结和删除特朗普支持者的账号，迫使这些人“社会死亡”。

上述这些事实说明，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群众运动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群众基础，以至于美国大资产阶级正在动员整个的美国国家机器对其实行压迫。但除非未来两年美国的阶级斗争局势出现巨大变化，以至于美国大资产阶级自身发生某种深刻的分裂，特朗普想要重新当选将遇到巨大的困难。上述事实还表明，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如古代的雅典奴隶制民主、罗马奴隶制共和国那样，曾经是整个阶级社会政治史上的一个宝贵成就），已经在事实上消亡了。如果没有大资产阶级的支持，类似于特朗普那样的群众运动代表想要通过正规的选举渠道发挥政治影响已经几乎不可能了。特朗普运动或者与其类似的美国人民力量在未来是否还能够再度登上正规的政治舞台，从而加速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的腐烂，加速美国霸权的衰退和民族国家的重建，并在客观上支持中国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这就要看美国人民的智慧和勇气了。

“清而不零”与中国资产阶级

中国资产阶级的新冠“清零”政策在2022年12月仓皇结束了。事实上，中国资产阶级的清零政策直到2021年都算是“成功”的。从资产阶级自身利益讲，清零政策有力地维持了中国资本积累的速度，在新冠病毒杀伤力极强的早期阶段避免了大量人口发病而造成生产

停顿。但只要新冠病毒在中国之外还在流行，只要中国还在继续维持大量的国际人员和物资往来，就势必需要在某个未来时间点上放弃清零。这一方面是因为病毒本身的传染性会增强，势必冲破清零政策体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病毒的杀伤力通常会在演化过程中减弱，对资本积累的冲击也会削弱。在这个时候，过去成功的清零政策就会成为资本积累的障碍。

中国资产阶级放弃清零政策既是其利益的反映，也是被病毒传播性打败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但是放弃清零政策与军事上“敌前”撤退的行动类似，是对决断力和组织性的巨大考验。选择何时、以何种方式放弃清零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权真实的国家能力。

中国资产阶级的当权集团一直把清零当成是其政治资本的一部分，当清零政策较为有效时，当权集团尚可将清零视为本集团“优越性”的一个证据。但是当2022年清零政策失去效果，“清而不零”，徒耗国帑，搞得天怒人怨之时，清零政策就成了当权集团的重大政治包袱。在这个时候，当权集团既想甩脱清零的负面影响，又不希望付出放开的政治代价，其进退维谷、优柔寡断、瞻前顾后、顾此失彼的窘态暴露无遗。在经历了数次小的政策反复、拖延了将近一年之后，当权集团错过了放弃清零的最佳时机，把自身和整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面对新冠时的脆弱无力彻底展现了出来。

就整个资产阶级而言，执行清零政策的将近三年时间是他们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清理私营医疗资本集团、充实公有制医疗力量，

建立起符合资本积累长远利益的医疗卫生体制，并为停止清零后的新冠流行做准备的最佳时机。但是，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国家完全不具备得罪任何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资本集团的能力和胆识，这个整肃医疗卫生行业进而维护资产阶级长久整体利益的政策空间又被白白地错过了。

从清零和放弃清零的政策变化可以看出，中国资产阶级既不具备为某项重大计划进行长期周密准备的能力，也不具备有效协调内部各集团之间局部利益和冲突的能力。中国资产阶级的当权集团尽管取得了以某人连任为代表的形式上的“胜利”，但其仍然在台上的根本原因是它可以在绝大多数短期和直接利益问题上满足其他派系，而不是因为它可以说服或迫使其他派系来服从资产阶级长期整体利益的“大局”。

当权集团的政治空间和政策空间都是极其有限的。在放弃了清零政策以后，当权集团与其他集团之间在短期的最尖锐矛盾已经得到缓解，原本在反对清零旗帜下结成短暂同盟的部分工人、小业主和学生之间的共同利益也已经不复存在了。一些人心心念念的举起白纸就能一呼百应，乃至引发“宫廷政变”甚至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的梦想正在被中国资本主义的现实彻底击碎。

但是，新冠及其相关政策对中国阶级斗争的发展仍然可能有长期影响。第一，清零期间中国资产阶级通过健康码建立起了虽然杂乱低效但是仍可堪一用的社会监控体系，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劳动人民的斗

争能力，这种压制在后清零时代是否还能持续？第二，劳动人民在新冠和清零期间形成的健康意识，比如感到不舒服就要休息并要求资本家提供方便，能否在后清零时代得到保留，进而永久性地成为劳动力价值的追加部分，并成为资本积累的永久性“负担”？第三，在清零期间，资产阶级的冷酷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无能充分地暴露在劳动人民面前。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是否已经认识到了，继续主动接受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就等于为一个完全没有未来可言的资产阶级殉葬？劳动人民在封城期间是否已经探索出了在降低工作的同时降低物质消费的生活方式？摸鱼和躺平能否成为后清零时代劳动者“工作”的常态？第四，放弃清零后的新冠大流行会对劳动人民的长期健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需要在进一步观察和分析后才能得到初步的结论。

总结起来，2022年的中国资本主义处在一个极度需要霸权保护，但是无论是别国还是其自身都无法成为有效霸权的时代。这种格局越是向前发展，中国资产阶级的外部环境就越是无可挽回地恶化。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言，中国资产阶级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在外交政策上做出重大的调整。在面对未来越来越不利的两难抉择时，中国资产阶级会一次又一次地不做选择，直到其内外局势完全糜烂到不可收拾为止。2022年的中国资本主义又处在一个既无法维持“增长的社会契约”，又无法承担不维持“增长的社会契约”的后果的时代。这种僵局越是向前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腾挪空间就会越狭窄。

无论中国资产阶级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它都无法重建在所谓“战略机遇期”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跨阶级的“共同利益”。

在这个意义上，正在中国劳动群众中开展着的“躺平运动”既是在资产阶级背弃“增长的社会契约”之后劳动人民十分自然、完全正当与合理的反应，同时又是对高度依赖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的半外围中国资本主义釜底抽薪式的打击，从而一步一步地缩小中国资产阶级内外妥协的空间，破坏其统治的条件，直至其土崩瓦解、寿终正寝。

关于俄乌战争形势的两篇文章 —— “随波逐流、无可奈何” 还是胜利在望？

作者：远航一号

今天读到关于当前俄乌战争形势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发表在昆仑策网上、乌有之乡转载的由国内著名的国际问题评论家张志坤先生撰写的“俄乌战争中俄罗斯的失误及其相应教训”。另一篇是芬兰独立政治和军事评论家塞珀·聂米在《大国关系》网站上发表的“2022年12月底乌克兰危机中的军事形势”。

两篇文章对当前俄乌战争形势及走向的分析和判断大相径庭。下面把两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分别介绍一下。

在“俄乌战争中俄罗斯的失误及相应教训”一文中，张志坤先生认为，战争进行到现在，俄罗斯未能完成战争初期制定的战略目标，在若干个方面发生了严重的失误，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具体来说，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 俄罗斯对于战争准备不足：俄军兵力不足、动员过迟，“弹药上似乎也已经捉襟见肘了，以至于在战场运用上难以形成对乌克兰后方大规模的集火打击”。

二. 俄罗斯严重低估了乌军的战斗力和乌克兰的战争承受能力：“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乌克兰军队的战斗能力只增不减”；乌克兰的“多数民众并未丧失抵抗的决心与斗志，军队的士气也没有瓦解，依然保持旺盛的战斗精神”；“乌克兰依然没有垮塌的迹象 ... 足以证明乌克兰的战争承受能力非同凡响”。

三. 俄罗斯对战争的谋划设计不周全、“庙算”不到位

四. 俄罗斯驾驭战场的能力不足：俄罗斯没有做到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没有在战场上实现任何一次战役或战术合围 ... 始终都没有打成一场像样的包围歼灭战”。“在无人机等新型军事装备的战场运用方面，乌克兰方面也做得比俄罗斯更灵活机动，这也需要俄罗斯武装力量虚心向敌人与对手学习才行”。

对于这场战争的前景，张志坤先生悲观地认为：“现如今俄罗斯的情形则似乎是已经不知道怎样结束战争了，特别军事行动的终点茫然不清，大有随波逐流、无可奈何走上长期战争轨道的样子”；“以目前战场形势而论，未来俄罗斯能赢得相对的胜利就不错了”。

张志坤先生是国内少有的有深刻洞察力的国际观察家，对于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等重大战略问题常常有精彩的分析。然而，从这篇文章来看，即使像张先生这样敏锐的人，由于受到信息来源的限制，在像俄乌战争这样的问题上，仍然难免受到西方资产阶级主流媒体以及

中国资产阶级媒体的蒙蔽，以至于其判断和分析与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南辕北辙。

下面介绍一下《大国关系》网站上的文章——“2022年12月底乌克兰危机中的军事形势”。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正好可以帮助澄清张志坤先生文章中的一些严重误解。

关于乌克兰的战争潜力

张志坤先生认为：“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乌克兰军队的战斗能力只增不减”。事实上，战争进行到现在，乌军损失惨重，已经到了战争潜力耗尽的边缘。

据《大国关系》网站文章介绍，在战争之初，乌军经过动员的总兵力曾经高达90万，其中包括40万正规军和准军事部队以及50万预备役人员。在过去10个月的战争中，乌军阵亡总数已经超过10万。按照战争常规，受伤、被俘、失踪总数约为阵亡人数的3倍；这意味着，乌军损失总数已经达到约45万。据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尼在接受英国《经济学家》杂志采访时透露：乌军现有总兵力约50万，但只有20万受过正规军事训练。

目前欧盟、英国正在为乌克兰训练士兵，准备用18个月的时间训练3万人，这仅仅相当于乌军损失总数的一个零头。相比之下，俄军在过去三个月中已经动员了40万人（除了征召30万预备役人员外，另有10万志愿人员入伍）。

除了兵力日益枯竭外，乌军装备损失殆尽，武器弹药严重不足。战争之初，乌克兰曾经拥有 2400 辆坦克、几千辆装甲步兵车和约 2000 门各式火炮。战争开始后，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数以百计的重装备。乌军曾经拥有和获得的这些装备中的绝大部分现在已经被摧毁。在接受《经济学家》杂志采访时，扎卢日尼希望西方国家再提供“300 辆坦克、600-700 辆步兵作战车、500 门榴弹炮”。扎卢日尼所要求的这些装备，相当于英、德两国现役陆军装备总数的一半。

而实际情况是，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援助的能力已经濒于枯竭。大约三分之二的北约成员国已经无力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援助。美国的海马斯式火箭炮、榴弹炮弹、便携式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的库存也即将用完，已经影响到现役美军的战备水平以及美国履行其对全球其它地区“盟友”战略义务的能力。

红色中国网在去年 10 月份的评论文章曾经介绍过：“由于连续多年的去工业化、生产外包，美欧帝国主义已经失去了进行大规模工业化战争的能力；美国一年的炮弹产量大约只够维持乌克兰战场上两个星期的消耗。”“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的 16 门海马斯式火箭炮中超过半数已经被击毁；... 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的 126 门 155 毫米榴弹炮中大多数已经被击毁；美国许诺向乌克兰提供 75000 发 155 毫米榴弹炮弹，这些炮弹还不够乌克兰打两个星期；美国许诺向乌克兰提供 20 万发轻武器子弹，这些子弹还不够 1000 人（大约一个

加强营）在战斗中打一天。”（为什么俄罗斯必将取得反美帝、解放乌克兰东南部战争的最后胜利？）

关于俄罗斯战争潜力

张志坤先生认为，俄军兵力不足、动员过迟，且武器弹药“捉襟见肘”，导致战争陷入长期消耗，前途渺茫。而实际情况是，俄军动员快速有效，前线总兵力逐步增加，在武器弹药方面相对于乌克兰有压倒优势，且供应充沛，毫无枯竭之忧。

《大国关系》网站文章介绍说，在经过几个月的局部动员后，俄军新增加了约 40 万兵力，在乌克兰战场前线很可能已经开始形成对乌军的数量优势。俄罗斯计划在未来两年将武装力量总数从现在的约 100 万增加到 150 万，其中长期服役的合同兵总数从现在的约 40 万增加到约 70 万。

在过去 10 个月的战争中，俄军阵亡总数约一万、伤亡总数约四万。俄军损失总数约为乌军的十分之一，至多不超过五分之一。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尼承认，俄罗斯的动员是快速、有效的。俄军动员的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过西方国家为乌军训练和补充的速度和规模。

在武器装备和弹药供应方面，俄军相对于乌军有绝对优势。在红色中国网 10 月份的文章中曾经介绍说：“俄军弹药充足，每天发射约 6 万发炮弹，相当于乌军炮弹消耗量的 10 倍 ... 在俄罗斯战前已有的炮弹库存被消耗完以前，俄军现有的炮弹消耗强度至少还可以

维持半年。俄罗斯战前平均每年生产炮弹 20 多万吨，其军火工业经初步动员后可望每年生产炮弹约 50 万吨，大约相当于炮弹 700 万发，足以维持大约平均每天两万发的发射量，相对于乌军现有的炮弹消耗量仍有三比一的优势 ... 如果俄罗斯对工业潜力做进一步的动员 ... 那么几乎可以无限期地维持大约每天 6 万发的炮弹消耗量。”

关于俄罗斯的战略战术

张志坤先生认为，俄罗斯驾驭战争的能力不足，战略战术水平差强人意，尤其是没有做到“集中优势兵力”、“打成一场像样的包围歼灭战”。

对此，《大国关系》网站文章指出，在当前战争中俄军统帅部门所奉行的战术确实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军常常采用的大纵深、大包围的运动战。俄军目前的战术主要是利用己方压倒性的炮火优势结合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以达到最大限度消耗乌军有生力量的目的。虽然在形式上，这种消耗战看起来不如张志坤先生纸上谈兵的“包围歼灭战”那样漂亮，但其实际效果远远超过传统的运动战。如上所述，这种火力消耗战已经歼灭了战前乌军总数约一半，同时极大地减少了自身的伤亡。目前在双方重点争夺的阿尔捷莫夫斯克（巴赫穆特）前线，乌军每天损失一到两个营。

至于张志坤先生根据战争初期的错误报道，所得出的乌克兰在运用无人机方面更加“灵活机动”、俄罗斯需要“虚心向敌人与对手学习”的结论，则更是严重过时的老黄历了。事实是，俄罗斯方面凭借自己在电子战方面的技术优势，已经击落了乌克兰原来拥有的几千架无人机中的90%。一架乌克兰无人机的平均使用寿命只有三到六次飞行。现在面对无人机的打击惶惶不可终日的，是乌克兰傀儡当局。

关于战争前途

关于乌克兰战争的前景，张志坤先生对于俄罗斯能否取得最终的胜利缺乏信心，认为俄罗斯“已经不知道怎样结束战争了，特别军事行动的终点茫然不清，大有随波逐流、无可奈何走上长期战争轨道的样子”。

如上所述，既然张志坤先生对于俄罗斯战争潜力、乌克兰战争潜力、双方战略战术的有效性都做了错误的估计，那么张先生对于战争前景的判断也不可能是正确的。

在接受英国《经济学家》杂志采访时，泽连斯基和扎卢日尼都认为未来几个月的战争进程将决定战争的结局。扎卢日尼还暗示，如果他不能从西方国家得到他所要求的武器弹药援助（事实上他也没有得到），他将不得不像当年芬兰法西斯军队的将军曼内海姆那样，最终做出接受战败的决定。

《大国关系》网站文章引用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斗是关键军事行动 ... 战斗的目的是消灭或征服敌人 ... 直接消灭敌人的力量始终是最主要的问题。”熟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同志都知道，毛主席军事思想中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与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是异曲同工的。

《大国关系》网站文章认为，俄军目前在乌克兰的作战指导原则很好地贯彻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的根本目的是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思想。文章作者还提醒那些被美欧帝国主义宣传所蒙蔽、仅仅根据几个地方得失就断定俄罗斯即将战败的人，想想当初美帝很快地占领了喀布尔和巴格达时是何等猖狂，而战争的结局又是如何呢？这便是毛主席曾经讲过的道理：“存人失地，人地则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接见边区部队一部分负责同志的讲话”）

《大国关系》网站文章认为，目前俄军完全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接下来，俄军既可以选择继续实施在阵地中依托优势炮火大量消耗乌军的“绞肉机”战法、相机扩大战果；也可以适时转入大规模的运动战，分别从北面、东北面和南面插入乌军的深远后方，包围歼灭在东部战场的乌军主力；还可以从白俄罗斯方向直接插到波乌边界，切断乌军后方补给线，然后等待乌军崩溃。

文章作者预计，俄军将在未来 4-5 个月内彻底击败乌军并取得战争胜利。

乌克兰战争不仅仅关系到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前途，而且关系到整个世界的走向。在这场战争中，美帝、欧盟和北约都押上了自己的全部赌注，动员了可以动员的一切物质和精神力量，妄想通过这场战争来拖垮俄罗斯，扭转美帝霸权衰落的颓势，进而永久统治欧亚大陆。另一方面，一旦俄罗斯取得胜利，不仅乌克兰傀儡政权将被推翻，美帝霸权将彻底瓦解，欧盟和北约都将走上瓦解的道路，西方帝国主义几百年来在世界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也将一去不复返。

世界命运的天平将向哪一边倾斜？是继续眷顾西方帝国主义的魔鬼，还是在魔鬼大厦的倾覆中开辟解放的道路？世界历史的加速起跑，也许就在 2023！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能胜利？——兼谈我们与 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分歧

作者：远航一号

近日，从一个自称“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时事评论”的网站上，看到一篇文章，题为“豺狼当道，遇到狐狸也要打 —— 评投机惯犯红中网”。下面姑且将该文作者称为“时事评论”先生。

这是一篇恶毒污蔑和攻击红色中国网的文章。不过，作者为了恶毒污蔑和攻击的目的，也引用了我们的一些观点，在有些地方，如实地引用了我们历年文章的原文，客观上有助于一些过去不了解、没有听说过红色中国网的青年马列毛同志初步了解我们的观点。对此，我们对“时事评论”先生表示“感谢”。

不过，如实介绍红色中国网的观点，并不是“时事评论”先生的目的。为了达到污蔑和攻击我们的目的，即使在引用我们文章原文的时候，“时事评论”先生也大量采取断章取义、蓄意曲解的手法，有时则是赤裸裸地臆想和造谣。对于这种政治上不磊落、不诚实的卑鄙行径，我们是瞧不起的。

“时事评论”先生的文章，集中反映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近年来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其中一部分错误观点已经发展到了反动的

⁴边缘。借此机会，也讨论一下红色中国网与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若干重要分歧。

在讨论实质性问题之前，先指出“时事评论”先生的一个具体错误。为了抨击我们支持“普京的侵略战争”，“时事评论”先生说：“2022年3月，远航一号在《俄乌战争——如果毛主席在，他会支持谁？》一文中这样论证：按照毛主席三个世界的理论，我们应该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坚决支持第二世界国家反对超级大国干涉和控制的斗争；坚决反对超级大国的扩张主义政策。”⁵

我可以告诉“时事评论”先生，你提到的这篇文章与远航一号无关。你自己可以从网上查到，这篇文章首发于红歌会网，作者是赵磊。我们转载时，已经注明是从昆仑策网转载的。希望“时事评论”先生在继续批判红色中国网时，加强敬业精神，避免犯类似的低级错误。关于俄乌战争，井冈山卫士、远航一号及红色中国网友另有大量“反动”文章，欢迎你尽情批判。

工会与无产阶级革命

“时事评论”先生污蔑我们说：“红中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投机惯犯”，“一贯秉持”机会主义立场。“远航一号在各类活动中为

⁵ [豺狼当道，遇到狐狸也要打——评投机惯犯红中网-红色中国网](#)

什么一贯投机呢？根本上是他缺乏用帝国主义论的科学方法正确观察资本主义体系的视角，而是用机械的形而上学的世界体系论，从而看不清楚主要矛盾，同时又因为缺乏对共运群众路线的正确认识，导致脱离群众，看不到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前途。所以红中网才会跟未明子一样，最终走向了机会主义的路线，构造出一套虚幻的联合薄系健康力量实现红色割据的机会主义策略。”

关于红色中国网对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看法，下面再加以说明。

“时事评论”先生，咱们先来聊聊你的“非机会主义”的策略吧。

“时事评论”先生说，“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最终要靠“社会主义革命”。对于这一认识，我们同意。“时事评论”先生也承认，“对于‘半外围’国家，红中网确实寄予革命希望。”所以，至少在中国未来的前途在于无产阶级革命这一点上，我们与“时事评论”先生在表面上是一致的。

那么，既然我们都同意，中国的前途在于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任何一个严肃的革命者就都不能不面对这样的问题：怎样将我们的主观愿望转化为客观现实？想要革命，是一回事，革命能不能胜利，是另一回事。想要革命，而相信不相信革命可以胜利，真相信，还是假相信？又是另外一回事。

“时事评论”先生，你自己，是真相信，还是假相信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时事评论”先生所能认识到的中国革命策略：
“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深入到工人中去，同工人阶级相结合。左派要善于隐藏自己的倾向，在日常生活中坚决支持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斗争，促进工会等群众组织发展壮大。这是走入群众运动的正确路线。”“中国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就是从无产阶级的斗争入手，逐渐组建覆盖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群众组织，通过先锋队的领导形成全国统一的阶级斗争，最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这两段话中，有一部分内容是基本正确的，比如，“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深入到工人中去，同工人阶级相结合”。有一部分内容，在整个的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都是不切实际的，比如，“组建覆盖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群众组织，通过先锋队的领导形成全国统一的阶级斗争”。还有一部分内容，是已经经过实践证明，属于错误和有害的，比如，“促进工会等群众组织发展壮大”。

关于工会问题，“时事评论”先生批判我们说：“红中网也反对（以）融工路线来组织和发动群众运动”，反对“推进工会组织建设”。

“时事评论”先生否认 2018 年佳士工人斗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斗争的领导者幻想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就可以建立起公开的、“正规的”、“民主的”工会：“远航一号 ... 编造了对方‘幻想’可以建立‘资产阶级法律保护的工会’、‘进而争取建立资产阶级民主’这种所有左翼都当然会反对的政治观点。”刚好，在贵网站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当前马列毛主义者参加工人运动应把握好的六方面关系”，其中说道：“佳士运动一开始提出的也是建立工会，甚至当地的区总工会还批准过。”可见，佳士斗争中所要建立的工会曾经被官方总工会的区一级组织批准过。被官方总工会“批准”的工会，难道不是被“资产阶级法律保护的工会”？这些，本来是马列毛左派内部人尽皆知的事实。“时事评论”先生，你为什么要抵赖呢？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会问题，我们采取的是历史的、辩证的态度。我们从来不否认，工会曾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某些地区（尤其是在核心地区）、某个历史时期发挥过组织工人阶级、促进工人阶级斗争的作用。然而，到今天，世界历史的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中国资本主义又有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和特殊的斗争条件。由于这些变化以及特殊的斗争条件，在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时期，要普遍建立真正代表工人群众利益的正规的、公开的工会，是不可能的；而要普遍建立秘密的、隐蔽的工会，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也将是极其困难的。这里姑且不论，长期处于地下和隐蔽状态的工会（包括靠少数人“打入”官方群众组织建立起来的某种地下团体）

如何接受工人群众监督、如何防止领导人腐败变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当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强大到足以突破中国资本主义狭隘界限的时候，也就不必再受像工会这样的改良主义形式的束缚，而是可以直接发展为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与红色中国网不同，在“时事评论”先生以及与他类似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看来，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发展必须循规蹈矩地、按部就班地遵循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已经走过的道路，必须首先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就争取建立所谓“民主工会”、争取所谓“小三权”，不能越雷池一步；只有这些步骤都按部就班地走完了，才允许考虑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对此，“时事评论”先生是这样讲的：“欧洲的工人运动、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工人运动、上世纪 80 年代的韩国工人运动都表明，随着工人觉悟的不断增长，成立工会等群众组织的诉求会越来越强烈，往往以某一次罢工行动为契机，工会大量组建起来。这是不以远航一号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历史必然性。而马列主义者就是要参与到这一过程中去，不仅在组建工会等群众组织层面帮助工人，而且要像《怎么办》的思路那样，培养和组织工人中的先进分子。”

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人运动，也必须步“欧洲的工人运动”、“美国的工人运动”、“韩国工人运动”的后尘，以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就“大量组建”工会为目的。但是，**然后呢？**请问“时事评论”先生，**然后呢，社会主义革命在哪里？**

先不说在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时期，“大量组建”工会能不能成功，假如中国的工人阶级、许许多多马列毛积极分子抛头颅洒热血，含辛茹苦奋斗几十年，就是为了过上像今天的欧洲、美国、韩国工人那样的“幸福”生活？所有这些国家，都曾经有过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也都“大量组建”了工会，然后社会主义革命就都遥遥无期了。这一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时事评论”先生，这难道不值得你思考吗？

“时事评论”先生，你信誓旦旦地说，“争取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是“所有左翼都当然会反对的”。你确信这是你自己的真心话吗？

“时事评论”先生好像自己也觉得自己的论证不那么严密，于是又继续问道：“**巴西有没有工会运动？南欧有没有工会运动？印度毛派和菲律宾毛派搞不搞工会运动？**尽管这些国家到目前都没有成功，这其中既有缺乏革命政党和正确路线指引的因素，又有革命运动仍在发展过程中、不能一蹴而就的因素，但绝没有不是核心国家就不能搞工会运动的因素。”

中国以外的其他一些外围或半外围国家是否有工会运动、这些工会运动目前对于这些国家工人阶级斗争的发展是否有促进作用，可以探讨。但是，不争的事实是，这些国家到现在都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是马列主义者，不是工联主义者。我们奋斗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而不是为了当工会官僚。确实，所有国家的革命运动都有个发展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但这不是把无产阶级革命推向遥遥无期、虚无缥缈的未来的理由。

说其他国家的人民“缺乏革命政党和正确路线指引”，那么凭什么中国的无产阶级就一定能得到“正确路线”的指引？“时事评论”先生，你们掌握正确路线吗？你们的自信从哪里来呢？是你们有三头六臂，还是有马列灵魂附体，别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几十年、几百年斗争都没有找到的“正确路线”，一下子就被你们找到了？菲共、印共毛这样有经验的马列主义政党都不能提供正确的“指引”，你们比菲共、印共毛又能高明到哪里去呢？

可以肯定地说，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运动”都没有给那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带来革命、带来解放，他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反而越加深重。靠着把其他国家工人阶级已经反

复走过、又反复失败的道路再走一遍，是不可能引导中国工人阶级走上胜利的道路的。

爱因斯坦曾经有句名言：如果一个人一遍又一遍地做同样的事，却期待有不同的结果，这个人一定是疯子。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能胜利？

所有严肃的中国马列毛主义者，都必须认真对待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斗争都没有发展为革命，或者革命了却没有胜利。那么，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有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但会爆发而且能取得胜利？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能到中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共性那里去寻找，而只能到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性、特殊矛盾那里去寻找。比如，有朋友认为，中国现在是“帝国主义国家”。这些朋友就无法回答，为什么自俄国革命以后，在帝国主义国家就再也没有爆发过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列宁的《怎么办》，曾经指导布尔什维克党取得革命的胜利，到了其他国家、其他的历史阶段，却不能够一“办”就灵？以至于“时事评论”先生，只能靠着并不可靠的消息，想象着欧美工人运动正在“高涨”，来维持自己的精神支柱。

那么，在红色中国网看来，中国资本主义有哪些特殊的矛盾呢？让我们先引用一段“时事评论”先生也引用的话：“中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半外围国家。就是说，中国不再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外围国家，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因为中国在历史上已经完成了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也不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因为中国在与核心国家的经济交往中仍然受到不平等交换的大量剥削，因为中国的资本家阶级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分工中得不到超额利润或超额剩余价值而只能得到一般利润。”（“红色中国网工作组致青年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的建议书”）

我们在说完上面这段话后，马上还有一句话：“中国经济参加国际资本主义分工的主要部门仍然是出口制造业，中国的出口制造业仍然要依靠剥削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来维持其所谓竞争力。”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只有这句话才能说明，在所有的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中，中国资本主义又有自己的特殊性。“时事评论”先生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将这句重要的话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概括来说，中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个主要从事出口制造业、依靠残酷剥削大量廉价劳动力来维持资本积累的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资本主义的这几个特点对于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前途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由于中国是一个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与核心国家不同，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从世界市场上攫取足够的超额剩余价值，用来收买本国的工人阶级、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并建立某种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就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前途决不可能是资产阶级民主。

由于中国不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外围国家，而是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这就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而发展壮大了的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必然在未来的某个阶段提出日益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要求，这些经济和政治要求又必然与依赖残酷剥削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发生尖锐不可调和的冲突。

又由于中国是一个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国家，本国自然资源并不丰富，这就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无法转型为一个出口自然资源并靠世界市场上的高价资源来暂时维持国内政治和经济稳定的资源出口型半外围国家。

正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上述特殊性，我们才有信心说，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发展“必然要突破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秩序所能容纳的狭隘界限”；“中国资产阶级将无法解决其未来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决定中国未来历史命运的钥匙，必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落到无产阶级手中。”“时事评论”先生虽然引用了我们的这段话，却故意阉割了我们的论证过程，以服务于其歪曲伪造的肮脏目的。

在“建议书”中，我们论证说：“中国经济参加国际资本主义分工的主要部门是出口制造业，而出口制造业又建立在对大量廉价劳动力残酷剥削的基础上。所以，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造成一个数量庞大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中国的无产阶级又必然要逐步地组织起来并且按照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方式对资产阶级展开越来越有力的斗争。”

“时事评论”先生污蔑我们说：红色中国网“看不到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前途”。这是“时事评论”先生编造的谎言。就在同一份“建议书”中，我们指出：“目前总的形势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在上升，资产阶级剥削的困难在增加，资本主义积累的矛盾在深化。中国工人阶级斗争力量的上升，不仅反映在无产阶级数量的增长，而且反映在工人斗争次数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并且反映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平均剥削率近年来出现了下降的情况（这又进一步反映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利润率正在趋于下降）。这些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工人阶级斗争力量上升的程度，就必然要突破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秩序所能容纳的狭隘界限，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就不可避免。”

我们不仅指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必然不断加强、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不可避免，而且还指出了，未来的危机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得到解决。首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从而无法像核心国家那样依靠从外围、半外围剥削来的超额剩余价值来缓和内部阶级矛盾：“随着无产阶级和现代小资产阶级斗争力量的增强，他们必然要求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以及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权利。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不同，像中国这样的半外围国家不占有大量的超额剩余价值，因而没有条件一方面保证本国的资本家阶级获得相当高的利润率，另一方面又满足无产阶级和现代小资产阶级的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要求。”（2019 年度红色经济观察）⁶

不仅如此，中国的情况也不同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类似积累危机的其他半外围国家。为什么东欧、南欧、拉美、韩国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最后都没有导致无产阶级革命而中国的工人运动将来却必然发展为无产阶级革命？这个问题，“时事评论”先生没有思考过，或者思考了，却不能回答。我们不但思考过，而且有了回答：

“前苏联、东欧、拉美诸国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南欧诸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韩、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都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⁶： [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红色中国网](#)

不过，以往在上述半外围国家，这样的积累危机最后都以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某种方式而得到解决。”

“就半外围国家阶级斗争的发展前途来说，当工人阶级力量的上升发展到与资本主义积累秩序尖锐不可调和时，无非是三种解决办法。或者，该半外围国家设法上升为核心国家，通过剥削世界其他地方来攫取超额剩余价值，从而缓和内部阶级矛盾（如日、韩、台、港）。某些无法上升到核心国家的半外围国家因为拥有丰富的高价值自然资源，如石油天然气，也可以在某些时期通过攫取资源租金来缓和内部矛盾（如俄罗斯、巴西、中东海湾国家）。或者，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全力进攻，并结合将部分资本大规模转移到劳动力和资源更加廉价地区等办法，在打垮工人阶级以后，重建资本主义积累秩序（这是美、欧资产阶级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实行的策略；但是在半外围国家条件下，还没有先例）。或者，资产阶级无力解决其积累危机，也无力解决其政治和社会矛盾，无产阶级领导其他各劳动阶级打倒资产阶级统治，并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造社会（这将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未来的前途）。”

“就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说，无产阶级已经发展壮大到资产阶级无法轻易打垮的地步。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也不可能在中国以外找到足够大的有丰富廉价劳动力且具备资本积累其他必需条件的地区。同样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并基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两级分化的基本规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只能是一个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体系，而绝不可能是一个多数人剥削少数人或者世界上半数人口剥削另外一半人口的体系），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掌握某些半外围国家所拥有的丰富自然资源。恰恰相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着尖锐的资源和环境矛盾。由于这样几点理由，我们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将无法解决其未来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决定中国未来历史命运的钥匙，必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落到无产阶级手中。”（建议书）⁷

关于地方工农民主政权问题

“时事评论”先生先引用了一段我们在“建议书”中关于地方工农民主政权的论述：“在无产阶级成为全国范围的领导力量之前，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在工业化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这样的根据地不是像井冈山、江西苏区、陕甘宁边区那样建立在土地革命基础上的农村根据地，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暂时仍然被外部资本主义包围着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这样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当然是无法存在的。但是在积累危机爆发且资产阶级无力克服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的中央政权遭到决定性削弱以后，则是完全可以存在的。”

⁷ [红色中国网工作组致青年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的建议书-红色中国网](#)

然后，马上就迫不及待地歪曲我们的观点：“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之前，马列毛左派都应该去搞‘根据地’，而这个‘根据地’又要跟薄熙来等失意的官僚资产阶级媾和才能建立。”关于薄熙来问题，下面还会做简短的说明。这里就问“时事评论”先生，红色中国网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主张过“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之前，马列毛左派都应该去搞根据地”？

从上面的引文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们明确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无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壮大，而无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壮大又必然突破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秩序的狭隘界限，从而必然带来资产阶级统治的积累危机和政治危机，从而必然带来革命形势。

另一方面，“在未来积累危机与革命形势发生以后，无产阶级的力量还不足以一下子取得全国胜利，而必然有一个比较长时期的、跨度几十年的过渡时期。”（建议书）

显然，我们关于地方工农民主政权的设想，指的是——当中国资本主义危机已经全面爆发，已经出现革命形势，但无产阶级尚未夺取全国政权——这样一种“过渡时期”中的无产阶级斗争策略。这样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产生的条件，不仅是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之后，而且是在出现革命形势之后。“时事评论”先生，难道是你认为，没有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就可以先爆发革命形势？

按照“时事评论”先生的想象力，这样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即使在革命形势来临之后，也是无法存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所以可以搞农村根据地，原因是军阀割据，存在军阀统治的空隙，而当代早已不具备这一条件。”

“时事评论”先生，我们什么时候、在哪里，说过要搞“农村根据地”？你以为别人的脑子也像你一样朽木不可雕吗？

在我们回答“时事评论”先生关于现代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之前，我们先请“时事评论”先生考虑并回答一个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十分严肃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是不是要夺取政权？

如果“时事评论”先生坦白说，我和我的“网左”朋友们一切关于革命的说辞都是假的，都是自欺欺人的心理安慰，我们一心思考的就是怎样“融工”、组织和建设工会。那么，我们（红色中国网）就不再追问下去了。

如果“时事评论”先生说，谁说我们不革命？谁说我们不想夺取政权？那么好了，从逻辑上说，政权在地域上只有两种可能性，不是全国政权就是地方政权。既然“时事评论”先生认为，我们（红色中

国网)设想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是不可能的,那么“时事评论”先生一定是认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可以一下子夺取全国政权喽?

笔者愚钝,不知道“时事评论”先生以及你的同志们,有什么神机妙算,靠着“大量组建”的工会(姑且假设到那个时候你们有“大量组建”的工会吧)摇身一变,便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化”出美国工人、西欧工人、东欧工人、南欧工人、拉美工人、日韩台工人都没有“化”出来的无产阶级全国政权?

靠城市武装起义?靠“街头革命”把资产阶级吓跑?靠“倾向进步”的资产阶级军官搞政变?你们不会幼稚到还眼巴巴地等着资产阶级民主实现了再靠选举上台吧?也不会堕落到拿帝国主义情报机关的钱当“左派”带路党吧?现翻《怎么办》找答案?列宁也没说啊。

反正,我们是没有什么奇思妙想,不敢奢望一下子夺取全国政权,所以只能从地方政权开始。

这样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能存在吗?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当然是不能存在的。我们也从来没有说这样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可以存在。所以,在这里,不要跟我们提什么薄熙来,更不要妄图把我们关于地方工农民主政权的设想与薄熙来在重

庆的实践联系起来以图达到混淆视听的卑劣目的。除非你们认为，薄熙来及其实践不是一种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中的政治现象。

在“建议书”中，我们明确说了：“这样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当然是无法存在的。但是在**积累危机爆发且资产阶级无力克服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的中央政权遭到决定性削弱以后，则是完全可以存在的**。中国是个大国，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资产阶级力量在全国范围的分布不是均齐划一的，而是有强有弱的。在那些资产阶级力量薄弱而无产阶级力量又相对强大的地方，在资本主义积累危机全面爆发、资产阶级统治全面动摇的条件下，首先出现一批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完全可能的。”

在“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一文中，我们对此有更加详尽的说明：“**如果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深刻的危机，资产阶级的中央政府也将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目前，中国的财政总收入中，中央政府收入、地方政府收入大约各占一半，但是，地方政府支出大约占全部政府支出的90%。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大约有一半的支出要靠来自中央政府的拨款。一旦中央政府陷入财政危机，将无法再补贴各地方政府的日常开支。如果这样，各个地方政府也就无法再满足教育、医疗、治安等起码的公共需要。”

“资产阶级的地方政府不管群众了，群众就坐在那里等死吗？肯定不是。当许多地方政府无法维持的时候，这些地方的群众将不得不自动地组织起来。群众中的优秀分子将会站出来，把积极分子、普通群众团结起来，用革命委员会、苏维埃、群众代表大会、群众民主管理委员会等方式自己把地方管起来，以解决地方的各种迫切需要。在无产阶级占优势的地方，这样的群众自治组织就会发展为事实上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

“在资产阶级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团团包围中，这样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能够得到存在和发展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大危机的条件下，地方工农民主政府将有人和、地利、天时三个有利条件。首先，地方工农民主政府可以解决资产阶级地方政府所解决不了的群众的各种迫切要求，能够让群众有工作，有饭吃，有学上，得病可以看病，能够消灭黑社会，让群众安居乐业。只要做到这几点，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就可以得到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就可以得到‘人和’。其次，资产阶级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矛盾重重。除了人民群众拥护我们以外，一些资产阶级的地方政府也可能不反对工农民主政权的存在（以牵制其他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资产阶级的中央政府会面临很多困难，财政紧张，干部短缺，军队可能不听指挥。在那样的形势下，如果与工农民主政权为敌，可能会给他自己背上一个沉重的大包袱。资产阶级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相互倾轧，勾心斗角，马列毛左派可以利用他们

的矛盾，这就是‘地利’。最后，在整个的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的危机都无法解决，而是愈演愈烈。在那些没有地方工农民主政权的地方，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资产阶级政权都解决不了他们的矛盾，也克服不了危机，满足不了群众的迫切要求，工人、小资产阶级每天的斗争都会使他们削弱。在资产阶级统治区，越来越多地方的群众将会自己组织起来，把那里的地方事务管理起来，并逐步地接受马列毛左派的领导。这就是‘天时’。”

“有了‘天时、地利、人和’这些有利条件，只要马列毛左派能够实行正确的政策和路线，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又注意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就不仅能得到巩固，而且还可以得到发展。按照这样的办法，坚持下去，发展下去，地方的工农民主政权就可以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然后连成一片，占领一大块地方，直至在全国范围取得优势。”

“时事评论”先生，你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关于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来临后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必然可以存在并发展的分析呢？

如果你不同意我们的分析，那么，我们很愿意了解你关于怎样靠着“大量组建”的工会（假设这些工会到那时还没有腐败变质、还没有官僚化）一举夺取全国政权的设想。

如果你拿不出这样的设想，又不赞成我们关于地方工农民主政权的设想。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你实际上根本不相信将来会有无产阶级革命或者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可以胜利？

关于 1989 年的群众运动

关于 1989 年的群众运动，“时事评论”先生所转述的我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那次运动，就其本质和主要方面来说，不是什么天真无邪的“反官倒、反腐败”群众运动，而是小资产阶级自由派领导的与官僚资产阶级争夺资本主义复辟领导权的反动运动。

对于这个问题，暂时还无法理解的一些同志，我请你们思考一个问题：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你们是希望中国的无产阶级又一次白白流血、为自由派做嫁衣裳、然后连资产阶级民主都得不到，还是希望无产阶级能够做得好一些呢？如果你们希望无产阶级能够做得好一些，那么，请不要重演 1989！

关于薄熙来问题

薄熙来先生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一位优秀政治家。他在重庆任市委书记期间，受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影响，做了一些对当地人民有益的事，沉重打击了当地与黑社会相勾结的资本家势力，并且代表资产阶级内主张改良的政治派别，提出了放弃新自由主义、改而实行对劳动人民较为有利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

红色中国网在 2012 年、2013 年期间在宣传上采取了支持薄熙来及其改良实践、团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并通过这种团结扩大马列毛主义影响的方针。这一宣传方针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是正确的，符合当时的阶级斗争实际。

当然，在执行这一宣传方针的时候，我们不能保证，其中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观点都是正确无误的。与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不同，我们不标榜自己是从不犯错的圣人。有些观点或表达方式，在当时可能是正确的或适当的，后来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就不再正确、不再适当了。这样的情况，当然也是有的。

这里，我们还必须要指出，在我们看来，薄熙来失败后，新自由主义势力在中国资产阶级内部就完全占了上风，从此在中国资产阶级内部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改良集团。对此，我们也有论述：“**中国的资产阶级包括国有资本（及其背后的官僚资本家族）、跨国资本及其代理人、一般的私人资本等几个不同的集团。这几个不同的集团，虽然各自之间也有矛盾，但是在拥护中国现在的以剥削廉价劳动力的出口制造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体制方面是基本一致的。这就意味着中国资产阶级的各派别都支持这样几项基本政策：最大限度地剥削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残酷镇压无产阶级可能的反抗，坚持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逐步私有化，坚持贸易自由化和逐步的金融自由化，简言之，**

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党的领导’（后者即坚持政治专制）。自薄熙来事件后，中国资产阶级中已经不存在重要的主张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并做出有限度阶级妥协的派别。另一方面，无论是官僚资本、跨国资本还是一般私人资本都要求维持剥削廉价劳动力的体制，并为了这个目的维持政治专制。”（“中国革命的策略”）

如上所述，“时事评论”先生所谓“只要薄熙来等保守力量需要，远航一号马上就带领着广大群众去投诚”，是毫无根据的恶意诋毁。

关于佳士问题

本来，关于 2018 年的“八青年关注团”及佳士工人要求建立工会两次斗争，我们在 2019 年就做了总结（分别见“红色中国网工作组致青年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的建议书”和“严元章同志与八青年关注团的斗争经验”）。对那段斗争历史不了解的青年同志，建议看看这两篇文章。

“时事评论”先生利用一些青年同志不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将两次斗争混为一谈，污蔑说“在佳士冒险主义策略形成的过程中，红中网起到了非常坏的作用”。

2018 年初的“八青年关注团”的斗争，红色中国网确实参加了，而且发挥了事实上的领导作用。如“斗争经验”一文所介绍的，在制

定基本的斗争策略、发起关注团并做好关注团善后等工作方面，我们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对此，我们不做不必要的谦虚。在斗争的关键阶段，我们制止了“八青年”方面的盲动，保证了斗争的胜利。这次胜利，是多年来左派斗争中少有的。

“八青年关注团”斗争胜利后，贺鹏超等宗派主义分子从中得出错误的结论，利用其宗派团体进行政治冒险。这与红色中国网无关，更不由红色中国网来负责。我们与贺鹏超宗派团体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事实上，我们与大多数马列毛左派同志一样，直到 2018 年底才逐步了解到贺鹏超宗派组织的存在。在佳士斗争发起时，我们完全不知情。对此，“斗争经验”一文中有说明：

“对于大多数左派同志来说，这件事发生得很突然。原‘八青年’主要负责人利用‘关注团’时期建立的关系，给几位发挥主要作用的老同志、乌有之乡还有严元章同志打电话，并广发信件，要求所有左派积极分子表态声援佳士工人。他们既不说明斗争的目的和计划，也不准备与左派各小组协调行动，只是单方面地要求别人无条件支持、无条件服从他们的调遣，谁不听从，谁就是‘不革命’。许多左派同志在仓促之间表态支持，也有许多左派同志没有表态。然后，在几位老同志和严元章同志都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就被宣布为是‘佳士工人声援团’排名最靠前的几位成员。从此以后，原‘八青年’背后的那个组织就打着‘声援团’的名义随意发通知、发文件、发公开信，

从来也没有征求名义上是‘声援团’主要成员的几位同志的意见。所以，所谓‘声援团’并非像‘关注团’那样，有广泛的左派群众基础，也没有正当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而只不过是原‘八青年’背后那个组织用来对外宣传的一个外壳罢了。”

所谓严元章“带动了 ... 一些信任他的、却更不了解青年毛派底细究竟的老工人、老党员一起站在前列为这场极左冒险火上浇油”，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臆测和污蔑。按照“时事评论”先生在这句话旁边给出的注解，提供这一说法的是署名清道夫的文章——“佳士运动教训备忘录（2018-19 佳士运动为什么失败及其 27 个重要问题）”。这位清道夫，就是曾经大名鼎鼎的托派秋火，现已经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宣布退出政治。

“时事评论”先生看到了一个过气托派分子的道听途说加主观臆断，因为是攻击红色中国网的，便如获至宝。如此看来，“时事评论”先生的政治品味，实在是不高。

关于未明子

未明子同志是目前在网络上活跃的一位左翼宣传家，并且正在探索某种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实践方式。对于未明子同志的哲学观点以及实践方式，我们都有一定的不同意见。但是，我们愿意不抱成见的

了解未明子和其他同志在实践中探索的进展，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我们的看法。

未明子同志对于我们的半外围资本主义理论以及关于地方工农民主政权的设想有一定的误解。由于缺乏相互了解，马列毛左派同志相互之间发生一些误解，是正常的。我们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误解可以消除。当然，未明子同志在一些视频评论中出言不逊，也是不应该的。

至于“时事评论”先生对我们的污蔑：“正告所有红中网的网友和对红中网感兴趣的网友：大家尽快远离红中网，远离远航一号，红中网今天把你当座上宾，明天就可能会对你开盒，后天就会踩在你的尸体上吃人血馒头。”我想很多青年左派同志身有体会，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所污蔑我们的，恰恰是他们多年来对待青年同志的一贯做法。正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实践工作和理论工作都是光荣的进步工作

作者：远航一号

据造反法利赛网友说：

“未在今天凌晨的直播更露骨地批评了一次红中网，认为其大部分网友与知乎网左和他的绝大部分粉丝（“就不付代价地点个关注的事，粉丝算是什么东西”）一样也是学院派，即使说的话不同部分观点可能和他一致，但同样带有投机性，不值得信任。

不知是不是对于网站上部分网友希望他到红中网交流的回应，他表示出‘马主义者无论在哪国都是马主义者，如果他能在北美做实事用行动证明自己不是嘴巴选手，那我乐意合作甚至能派人过去帮忙。’... 简直口无遮拦我都觉得有点过于童言无忌。”

...

虽然说的方式不讨喜，但我认为这确实是个问题。如果说激流网那些京圈的高校教授在幕后安全地看学生搞事犯错不负责任，那红中网若仅限于在论坛上观察未和其他左翼实践乃至世界形势变化，又如何与前者拉开距离呢？不是和买彩票等开奖买股票等增值一样吗？不过我最近才接触红中网，还在翻阅网站上资料和讨论历史的过程中，印象很可能有误，是这样的话欢迎指正。”

前几天，在另外一个帖子下，与造反法利赛网友也有交流，交流中，造反法利赛网友似有责怪我们“言行不一”之意。另外也有几个网友，话里话外，不满意我们没有“一线”的实践行动，拿不出具体的实践方案。

所以，这里简单地就有关问题与大家探讨一下。

先说说造反法利赛转来的未的质疑，是不是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生活在某一个国家，就必须在那个国家做“实事”，就必须参加那里的阶级斗争，否则就是“嘴巴选手”，就是说大话、搞投机。

我们知道，马列毛主义是反对主观臆断，是主张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的。

我在美国生活了快三十年了。我们编辑部的同志，有的在国外工作、生后的时间长些，有的短些。一般来说，中国的同志不如美国的同志了解美国的阶级斗争，而在中国的中国同志不如在美国的中国同志了解美国的阶级斗争。我说我决不参与美国的阶级斗争，有我的道理，是我积近三十年的经验得出的一个结论。国内的同志可以不赞成，但没有理由轻视这种经验。

我说我决不参与美国的阶级斗争，不代表我们编辑部没有同志参与美国的阶级斗争。我们确实有同志参与，参与得还很深入，时间还很长，担任了一定的负责工作。但是，值得吗？当然得到了锻炼，积累了经验，教训也不少。

简单说，人这一辈子就这么几十年。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也有“中年危机”，所以剩下的时间怎么用，要珍惜，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那

么美国这里的情况是怎样的呢：（1）阶级斗争形势复杂，外国同志很难了解具体情况，还有语言、文化隔阂；（2）美国“左派”早就脱离工人阶级，基本上是新自由主义大资产阶级的附庸；（3）相当一个时期不会有革命形势；美国的革命形势不会早于中国的革命形势。

那么我是把我除了个人劳动力再生产、在“中年危机”中挣扎以外的有限时间用于美国的阶级斗争好呢还是用于中国的阶级斗争好呢？

下面说说国内实践工作的问题。造反法利赛说，你们红色中国网“仅限于在论坛上观察左翼实践乃至世界形势变化”，与激流网等又有什么区别？首先，我们不仅仅是“观察”，我们还要做分析，还要根据国内外阶级斗争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我们的理论认识。你以为每隔几天写一篇万字长文很容易吗？不要消耗许多脑细胞吗？况且我们还要管理网站，还要和网友交流。作为主编，几乎凡有网友发言，只要稍有实质性内容，我都尽量回复、交流，这难道不需要时间、精力吗？

那么，我们是不是仅限于观察、分析、讨论呢？这里很多网友是过去两三年才加入左派队伍的。但是，中国现代左派的历史已经有二十年了。红色中国网的前身是从中国现代左派一诞生起就存在并一直走到现在的。

我今天也不谦虚了。再往前算，如果要寻找中国现代左派产生的萌芽，远航一号也是有份儿的。我年青时被判刑正式蹲监狱一次、短期被拘禁四次，后来与专政机关多次打交道就不说了，美国联邦调查

局也光顾过我。说句难听的，奋斗了几十年，我现在就算退居二线，不行吗？

红色中国网创始人严元章同志，过去与我一起被拘禁的情况有两次，对于左派与国企工人反私有化斗争相结合做出过巨大贡献。现在斗争条件变化了，青年同志成长起来了，老同志就可以被抹杀被遗忘吗？

那么，某些网友要问，你们红色中国网现在什么“实际”的也没干啊？

对于这个问题，我请提问的网友考虑这样几种可能性：

- 1 红色中国网就是耍嘴皮、说空话，每天唱革命高调，坐等革命桃子从天上掉下来，有朝一日投机革命当“领袖”
- 2 红色中国网自有一套实践工作，但没必要公开
- 3 红色中国网原来是有自己的一套实践工作的，但由于条件变化、资产阶级镇压等原因，已经全部损失，目前尚未恢复

以上几种可能性，请各位网友自选。

至于说，当年，“京圈的高校教授在幕后安全地看学生搞事犯错不负责任”。那么，首先要说，当初的佳士斗争确实犯了冒险主义错误。在这个具体问题上，不追随北大马会冒进，激流网并没有错。但是对于怎样正确总结佳士失败的教训，我们同他们的认识不同。

至于在佳士斗争前后，红色中国网与北大马会系统的交往情况以及我们具体参加的一些斗争，在严元章同志与八青年关注团的斗争经

验一文中已经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尤其是介绍了我们参加的“八青年关注团”斗争。⁸

至于佳士斗争，我们在发起之初是完全不了解的。发起后，我们是不赞成的。尽管如此，在斗争即将失败的时候，我们尽了我们可能的努力，试图挽救他们，最大限度减少青年力量的损失。关于我们努力的情形，可以参考这封 2019 年 2 月我们写给声援团坚持斗争同志的信：

声援团的同志们，无论有多少艰难曲折、误解分歧，我们和你们还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⁹

（这里给不了解当时情况的同志简单介绍一下，这里所谓的“声援团”以及北大马会系统的几个社团实际上都是背后一个宗派组织的外围；2019 年 2 月时，该组织已经彻底失败）

在这封信中，我们引用了 2018 年 8 月在佳士斗争失败之前约两个星期我们写给顾佳悦同志的信，说明了我们关于撤退现场大部分或全部青年同志、避免损失的计划。

我希望，从这些文章和信件中，这里的新网友可以了解红色中国网以往参加实践工作的一些情况。

即使在未来一个时期，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红色中国网暂时无法在国内环境中组织或参与具体的实践工作，也不意味着我们就无所作为了。有什么条件办什么事，有什么食材做什么饭，有什么装备打

⁸ [严元章同志与“八青年关注团”的斗争经验-红色中国网](#)

⁹ [声援团的同志们，我们和你们还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 红色社区论坛 红色中国网](#)

什么仗。马列毛主义者的唯一义务，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任何条件下，都根据自己所处的具体条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以自己认为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最有利的方式，做好革命工作。

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是个伟大的事业，需要千千万万各行各业的人一起奋斗，既需要实践工作，也需要理论工作，既需要“一线”的实践工作，也需要在“一线”后面支援和配合的无数无名英雄。不是只有实践才光荣，理论工作就不光荣，当然反过来，轻视实践工作，也是错误的。今天，我们要将马列毛工作推向前进，既要反对空谈理论，也要反对盲目崇拜不要理论的“实践”。

我们红色中国网愿意接受广大网友的批评，并经常检讨我们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作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马列毛积极分子，我们身上是有局限性的。与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局限性做斗争，是我们的任务。但是，我们斗争的目的，是服务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在眼前，就是要做好红色中国网的理论和宣传工作。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兴趣，为了“证明”自己的无产阶级属性，乔装打扮，把真实的自己掩盖起来，为了“吃苦”而吃苦，为了“实践”而实践。

我们尊重在资产阶级残酷统治下在一线奋斗的同志，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礼！向这些同志致敬的最好方式，就是把我们能做、该做的工作努力做好，而不是盲目崇拜，在左派同志内部再搞那么一套“哲学鄙视链”或“实践鄙视链”。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流氓小资产阶级的陋习！

俄乌战争 —— 二十一世纪的“准世界大战”

作者：远航一号

俄乌战争到今天为止已经进行一年了。在过去一年的战争中，俄罗斯武装力量在卢甘斯克、顿涅茨克人民武装的配合下，解放了顿巴斯地区的大片土地和几百万人民群众，摧毁了乌克兰傀儡当局军事力量的很大一部分，削弱了美、欧帝国主义，将帝国主义的霸权体系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然而，时至今日，由于西方资产阶级主流媒体的欺骗宣传，由于在国际上带有依附性的中国资产阶级媒体起了西方帝国主义传声筒的作用，加上国内自由派、亲帝“左派”和右派民族主义势力的鹦鹉学舌，导致国内的一般群众乃至许多进步积极分子对战争现状与前途的真相缺乏了解。以至于如下一些错误认识仍然相当流行：

- (1) 认为战争实际进程表明俄罗斯军事力量“拉垮”，十分虚弱，配不上“世界第二”军事强国的地位
- (2) 认为战争已经导致俄罗斯国力下降，经济上和军事上都被削弱，今后将更加依赖中国
- (3) 认为美帝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不仅军火商大发战争财，而且削弱了欧洲，促使“资本回流”、“收割”全世界

在红色中国网上经常参加讨论的各位网友知道，红色中国网编辑

部在过去一年中发表了多篇文章，批判了上述错误观点并提出了我们在相关问题上独立自主的分析。下面是远航一号、井冈山卫士以往创作的一部分文章（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阅）：

从撤退到溃退？乌克兰危机和美国霸权的未来¹⁰

为什么俄罗斯必将取得反美帝、解放乌克兰东南部战争的最后胜利？¹¹

弗拉基米尔·普京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终结¹²

“后资本积累时代”前夜的中国与世界

关于俄乌战争形势的两篇文章 —— “随波逐流、无可奈何”还是胜利在望？¹³

不过，近日在红色中国网新注册的网友，对我们关于俄乌战争的分析仍然不大了解。值此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下面将红色中国网编辑部（主要是远航一号、井冈山卫士、草庐棋士）关于俄乌战争进程、前途及其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影响）的看法做一个总结概括。

为了便于讨论，下面所陈述的各条观点都采取概括性、提纲性的表达方式，也不引用参考资料。如有错误，欢迎各位网友指出。

¹⁰ [从撤退到溃退？乌克兰危机和美国霸权的未来-红色中国网](#)

¹¹ [为什么俄罗斯必将取得反美帝、解放乌克兰东南部战争的最后胜利？...-红色中国网](#)

¹² [弗拉基米尔·普京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终结-红色中国网](#)

¹³ [关于俄乌战争形势的两篇文章 —— “随波逐流、无可奈何”还是胜利在望？...-红色中国网](#)

关于俄乌战争初期

在中文互联网上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在战争之初没有能够速战速决，按照其所宣扬的在几天之内拿下基辅，导致战争陷入持久；后来，又被乌军反攻，失去了哈尔科夫以东以及赫尔松等地方。凡此种种，都反映了俄军战力“拉垮”，配不上世界第二军事强国的称号。

这些观点，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中文媒体原创，而是由西方帝国主义首先贩卖再由中国资产阶级充当传声筒的二手货。

关于去年九月份俄军从哈尔科夫以东、赫尔松等地撤退的情况，下面再说。这里先说说俄军在战争头一两个月没有速战速决的问题。

1 无论俄罗斯政府还是军队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宣传，要在几天内拿下基辅。现在有据可查的，关于所谓俄军一旦开战可在两三天内拿下基辅的说法，首先来自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此后又经西方资产阶级媒体不断放大。至于米利当时为什么这样讲、西方资产阶级媒体又为什么大肆张扬，另行讨论。

2 战争持久化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俄罗斯军事力量“拉垮”，而是美欧帝国主义倾其所有，动员了其除了直接出兵武装干涉以外可以动员的一切军事资源武装和援助乌克兰傀儡当局。这场战争，形式上是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实质上是俄罗斯与整个北约帝国主义集团的战争，带有准世界大战的性质，自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见分晓。

3 就军事力量来说，战前乌克兰并非一个弱国，其战前军队规模

超过除俄罗斯以外欧洲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并且经过北约帝国主义长达八年时间的训练和装备，已经基本北约化，与2014年以前的乌克兰军队有天壤之别。战争开始后，除了得到西方帝国主义武器装备的援助外，还可以得到美帝部署的卫星系统和间谍飞机的实时情报支援。

4 俄军在战争初期投入的正规军仅10-15万，加上卢甘斯克、顿涅茨克人民武装约5万，总兵力约15-20万。乌军正规军战前兵力约20万，另有各种准军事部队数万。战争开始后，乌克兰傀儡当局迅速动员预备役约40万。这样，战争初期，俄乌之间兵力对比约为1:3，俄方处于显著劣势。

5 俄军于战争初期在基辅方向投入的兵力约3万，而与其对峙的乌军兵力约10万。俄方在总兵力方面的劣势及其在基辅方向投入兵力的实际情况说明攻占基辅不可能是俄罗斯在战争初期真实的战役目标。

6 尽管俄军在总兵力方面处于劣势，但仍然给乌军在兵力和装备方面造成沉重打击，并且在战争初期即成功地打通了从克里米亚到俄罗斯本土的“陆桥”，解放了重要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奠定了后来胜利的基础。

7 根据俄罗斯在战争初期投入兵力的情况以及俄罗斯统治集团自2014年以来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一贯主张，俄罗斯在战争初期的基本目标，是以打促和，即造成兵临基辅城下之势，迫使基辅当局接受俄罗斯的和平条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承认克里米亚现状、顿巴斯自治、乌克兰中立化）。

8 俄罗斯的上述目标在战争开始约一个月后几乎达成。当时俄罗斯与乌克兰在伊斯坦布尔的谈判已经接近达成协议。但是，美、欧帝国主义将俄罗斯武装力量在战争初期的忍让和克制错误地理解为是俄罗斯虚弱可欺，认为通过战争拖垮俄罗斯、推翻普京政权的千载难逢的时机已经到来了，于是派当时还在台上的英国首相约翰逊访问基辅，向泽连斯基当局下达命令，后者随即退出谈判，导致谈判破裂，战争进入持久阶段。

俄罗斯战争目标的演变

俄罗斯没有能够在战争开始一两个月内达成以打促和的目标。这能不能说普京当局发动战争是“失算”了呢？

我们知道，战争是复杂而残酷的政治现象，包含着大量的偶然性；涉及到世界上几乎所有大国的战争，尤其如此。无论是普京，还是世界上其他的资产阶级领导人，都不可能预见到战争开始以后所有的变化，像演义小说中那样所谓“算无遗策”、“料事如神”，在现实世界中是没有的。毛主席当年也做不到。

但是，作为有经验、有见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普京为俄乌战争在物质上、舆论上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在战争初期，俄罗斯希望达到速战速决、以打促和的目标，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从后来战争的实际发展来看，当俄乌谈判破裂后，俄罗斯方面也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逐步有序地调整并完成自己的军事目标。这说明，俄罗斯方面在战争开始之前，已经考虑到了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并做了相应的准备。

如果说，普京与俄罗斯统治集团对战争的认识有所调整，那么恐

怕就在于如何处理俄罗斯与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应当说，在战争爆发之初乃至以后一段时间，普京并没有下定与西方帝国主义决裂的决心，而是为妥协留了一定的余地。只是随着战争的发展，尤其是在美、欧帝国主义孤注一掷，倾其所有，必欲致俄罗斯与普京政权于死地的图谋昭然若揭之后，普京及俄罗斯统治集团才下定了将战争进行到底并彻底打倒美帝及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决心。

关于俄乌战争的前途

随着俄乌战争的持久化，战争的胜负不仅不取决于一时一地的得失，也不再取决于若干乃至一系列非决定性战役和战斗的成败，而只能取决于战争双方全部可动员的军事潜力，后者又分为人力和武器弹药两个方面。

在乌克兰傀儡当局和北约方面，将战争继续下去的“本钱”就是乌克兰傀儡当局出人出炮灰，北约当局出钱出武器弹药。过去一年的战争实践表明，无论是乌克兰傀儡当局可以动员的人力资源还是北约帝国主义当局可以动员的军事工业潜力都是有限的。

在乌克兰傀儡当局方面，其实际控制区总人口大约不到 2000 万，其中兵役年龄男性不到 500 万。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德、苏两国的经验，兵役年龄男性的最大累计动员限度约为三分之二，乌克兰傀儡当局的实际动员能力很可能不如纳粹德国或社会主义苏联。姑且认为，乌克兰傀儡当局最多可以累计动员约 300 万人。

根据各种独立分析资料，乌克兰傀儡当局的军队在战争第一年很

可能已经阵亡了 20 万人，受伤、被俘 40 万以上，累计毙伤俘 60 万以上。按照，这个速度，到战争第二年，乌克兰傀儡当局军队的累计毙伤俘就将达到 120 万；到战争第三年，累计毙伤俘就将达到 180 万。此外，乌克兰傀儡当局至少需要在前后方共维持 60 万军队才能保持战线的基本稳定。所以，至多到战争第四年，乌克兰傀儡当局的军队就将陷入总崩溃。而从目前乌克兰傀儡当局穷凶极恶拉壮丁的情况来看，其实际动员潜力很可能远远低于 300 万的理论数值。

俄乌战争是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世界上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工业化战争，弹药消耗巨大。乌克兰方面，每天消耗炮弹约 5000 发，每年消耗约 200 万发。然而，去工业化以后的美、欧帝国主义国家，现在已经不具备大规模生产现代武器弹药的能力。美国现有的军火工业每月只能生产炮弹一万多发、每年产量十几万发。据了解，北约当局竭尽所能，准备将一些已经废弃的工厂重新启动，在理想情况下，可望在三年后将北约各国合计的炮弹产量提高到每年 200 万发。到那时，乌克兰傀儡当局是否还能存在，都是问题。

另一方面，俄罗斯方面兵力资源充沛。目前，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投入的一线兵力约 20 万。此外，经过局部动员后，俄罗斯已经集结了约 30 万兵力，部署在俄乌边境及顿巴斯地区的后方，枕戈待旦，随时可以发动大规模攻势。俄罗斯武装力量总规模即将增加到 150 万，此外尚有数百万预备役人员。

根据各种可靠资料，在战争第一年，俄军阵亡总数约两至三万，伤亡总数估计不到 10 万。从兵力资源看，俄军不仅完全有能力承受

现有的伤亡，并且可以随时新的有生力量补充前线部队，保持其战斗力。

俄军伤亡较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俄军在装备和火力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在战场上，俄军平均每天发射炮弹两万至三万发（高峰时每天发射 6 万发），一年消耗炮弹 700 万至 900 万发。据了解，俄罗斯军事工业已经动员，有能力保证每年生产 700 万发以上的炮弹。另有消息说，俄罗斯已经做好准备，储存了足够与北约进行三年大规模战争的炮弹。

无论从兵力资源上还是从武器弹药上，俄罗斯都有将战争长期进行下去的能力。

如上所述，俄罗斯在兵力资源方面与乌克兰相比拥有绝对优势，而其目前在战场上的损失只有乌克兰的几分之一。俄罗斯在军事工业方面的生产能力则超过了北约各国之和。这两项基本条件决定了俄罗斯必然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关于北约直接武装干涉的可能性

如果美欧帝国主义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直接出兵乌克兰，能改变战争结局吗？

美帝国主义目前陆军总规模约 50 万人，但其中有大量的后勤、文职人员，真正的作战部队不过 20 多万。这 20 多万人分布在全球各个军事基地，能够集中到欧洲作战的不过 10 万人左右。即使在加上波兰等国的仆从军，美国和北约各国的联军超不过 20 万人（英、法、

德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现在已经没有像样的陆军可以拿出来作战了)。这20万人与俄军尚未投入战场的30万战略后备队相比，都不占优势。

与以往北约帝国主义侵略南斯拉夫、伊拉克的战争不同，俄罗斯有强大的空军和防空导弹力量。北约与俄罗斯作战，根本掌握不了制空权。

不仅如此，如上所述，乌克兰战场上的伤亡和武器弹药消耗，都十分巨大。如果按照乌军的伤亡速度，北约联军20万人在仅仅四个月时间内，就将全部打光。即使按照俄军的伤亡速度，北约联军在参战一年后也将损失一半。不仅如此，俄军的损失可以随时从后方预备兵力和新的动员中得到补充，而北约联军的损失（在没有国内战争动员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得到补充。

不仅人员无法得到补充，武器弹药也无法得到补充。如上所述，北约现有的军事工业生产能力，甚至无法补充乌军现有的作战消耗，当然更无法补充额外增加的北约联军的作战消耗。

美帝与北约联军如果利令智昏，扩大战争冒险，其纸老虎的原形必然在短时间内暴露无遗。

怎样看待若干具体战役战斗的胜败

粗通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同志都知道，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主张战争的指导原则，不以占领一两个地方为目的，而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的。

然而，在去年九月和十月，在乌克兰傀儡当局发动所谓“反攻”，

暂时占据了哈尔科夫以东、赫尔松等地方后，各种资产阶级主流媒体弹冠相庆，吹嘘乌克兰的所谓“大捷”，甚至得陇望蜀，替乌克兰傀儡当局进一步谋划打到亚速海、夺取克里米亚。即使是一些同情俄罗斯的朋友，当时（乃至现在仍然）也难免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对战争前景忧心忡忡。

如上所述，在长期战争中，战争双方的综合战争潜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无论是哈尔科夫以东战役还是赫尔松战役，对俄罗斯战争潜力的影响都微乎其微。通过有秩序的撤退在局部战场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军队，俄罗斯方面很好地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而在乌克兰方面，将经过西方帝国主义精心训练了几个月、搜刮了西方各国援助的装备，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战略预备队投入到这两个进攻战役中，伤亡数万人，装备损失大半，使得自己本来就处于劣势的战争潜力进一步下降，从而导致在后来的战争发展中处处被动。

有的朋友仅看到俄罗斯近期在战场上逐步获得主动权，却看不到恰恰是由于在去年九月和十月的哈尔科夫以东、赫尔松两战役中俄军在给乌军造成重大损失后主动撤退才为今天的有利局面创造了条件。乌克兰在九月和十月占领了一些地方，但是却使得自己在总的战争潜力对比方面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这根本不是什么俄军“拉垮”。相反，俄罗斯方面能够不顾舆论上的鼓噪、政治上在短期的某些“不利”，根据实际军事需要果断调整军事部署，这说明俄军在军事指挥上是明智的、成熟的。

这并不是说，在战争中，对于任何地方的争夺都不是必要的。比

如，俄乌双方目前正在激烈争夺阿尔乔莫夫斯克（巴赫穆特）地区。这是因为，阿尔乔莫夫斯克是顿巴斯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乌军在顿巴斯地区第二道防线的关键支点。一旦失守，乌军就将被迫退到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夫扬斯克一线；而在那里，乌军缺少系统的、永久性的防御工事。俄军解放整个顿巴斯地区，就是个时间问题。

正因为如此，俄军围攻阿尔乔莫夫斯克，在军事上属于攻敌所必救，迫使乌克兰傀儡当局不断地投入兵力和装备、蒙受重大损失。

相比之下，乌克兰傀儡当局在付出重大伤亡，占领了哈尔科夫以东、赫尔松等地方后，徒然占领了几座空城，受兵力和地理条件限制，既无法向卢甘斯克方向发展攻势，也无法渡过第聂伯河，从而乌军付出的重大损失完全没有任何战略上的意义。

俄乌战争的世界历史意义

前面说，俄乌战争在实质上是俄罗斯与整个北约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战争，从而在实际上带有准世界大战的性质。这场战争的结局，将给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以致命的一击！

这里要着重向不熟悉红色中国网的新网友介绍一下，当我们说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决不仅仅是哪个资本主义国家强、哪个资本主义国家弱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前途。

正如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离不开一个强大的国家一样，类似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稳定，离不开一个强盛的霸权。可以说，只要美帝霸权仍然强盛而稳固，世界范围的革命乃至各个大国的革命

要取得胜利，就是不可能的。反之，只有当美帝霸权不仅衰落并且开始崩溃了，像中国这样大国的革命才有可能爆发并取得胜利。

在俄乌战争开始之前，美帝已经表现出明显的衰落迹象，但仍然勉强维持着对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的控制。但随着俄乌战争爆发，美帝霸权已经开始呈现崩溃之势。

首先，在俄乌战前，美帝尚能勉强保持其所谓超级军事大国的威慑力。然而，在俄乌战争中，美帝军事工业外强中干的本质暴露无遗。经过多年去工业化后，美帝早已经不再是所谓的“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俄乌战争更是大大消耗了其本来就有限的武器弹药库存。可以说，经此一战，美帝不再有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能力，其在全世界各个地方的势力范围都岌岌可危。

在俄罗斯于乌克兰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美帝在东欧的各个仆从国将陷于惊慌失措之中。西欧几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失去了来自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也将陷入长期的经济危机。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发源地的整个欧洲将陷入持久的社会动荡。假以时日，欧洲人民将逐渐认识到，美帝的军事力量将不但不能给自己带来“保护”，而且还是巨大的包袱与风险。随着欧洲人民的觉醒，美帝军事力量将或迟或早被驱逐出去，从而导致北约这一最大最危险的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的解体。

即使在俄乌战争之前，美帝对中东地区就已经失去控制。俄罗斯的胜利将加剧这一趋势。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地区大国都会向俄罗斯靠拢。在摆脱了美帝的军事威胁之后，沙特当局从自身

利益考虑，很可能逐步实现石油交易的去美元化。这一进程可能最终导致美元崩溃。

战后的俄罗斯

俄乌战争对于俄罗斯与中国又会分别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先说俄罗斯。在经济方面，俄罗斯在经历了西方制裁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初步的军事动员以后，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摆脱对西方帝国主义依赖并高度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自从世界范围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出现一个基本独立自主的大国经济。

在军事方面，经过战争，俄罗斯不仅军队和军事工业规模扩大，而且军队和武器装备经受了大规模实际战争的考验，可以确立欧亚大陆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凡是熟悉战争史的人都知道，纸面上人数众多、装备“先进”但未经实战考验的军队，其战斗力，是要大打折扣的。

不仅如此，作为世界上一个主要的能源生产国，再通过与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结盟或合作，俄罗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世界的能源市场。在美帝从中东撤出后，俄罗斯通过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有可能成为维系中东地区和平的实际仲裁者。

长远来说，随着欧洲衰落、北约解体，俄罗斯可以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东欧各国，甚至成为整个欧洲的军事“保护者”。

总体来说，俄罗斯将在欧亚大陆西半部占优势。

至于俄罗斯国内，其阶级斗争形势正在发生一些特殊的变化，是否将发展出某种特殊的、不再追求资本积累的后资本主义阶级社会模式，还有待观察。

俄乌战争与中国

就中国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以及阶级斗争来说，我们对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信心，主要建立在中国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发展的基础上。具体来说，就是以出口制造业为基础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中国无产阶级必然有能力提出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要求，这些要求又必然突破中国资本主义可以容纳的狭隘界限。

另一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以及未来的阶级斗争也会受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矛盾发展的重要影响。具体来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运行，有赖于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还有赖于稳定可靠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而这两者，目前都有赖于美帝维持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尤其是若干个主要市场、关键的能源和原材料产地以及各大洋贸易通道）的安全和稳定。随着美帝的衰落及崩溃，所有这些，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来说，都处于危险之中。

俄乌战争已经破坏了中国资产阶级通过横跨欧亚大陆的交通线建立直通欧洲的陆上贸易的计划。

在俄罗斯战胜以后，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来说，比较理想的情况，是俄罗斯能够代替美帝维系中东地区的安全并帮助恢复与欧洲之间

的陆上贸易。但是，如果是这样，中国资产阶级在能源供应方面就不得不仰俄罗斯之鼻息。长远来说，还可能要付出越来越昂贵的保护费。

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来说，可能更糟糕的情况是，俄罗斯即使在战胜后，也没有力量保障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而中东地区一旦爆发战争（以色列与伊朗之间）或者革命（沙特阿拉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正常运转所需要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就将大幅度减少。

不仅如此，如果未来随着美帝霸权崩溃，非洲与拉美地区陷入革命或动荡，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正常运转所需要的各种原材料都将受到严重威胁。

如果是发生了这些情况，都将有利于未来的中国革命提前爆发。

不在“同温层”的红色中国网

作者：李嘉图”与诸网友

编注：过去两天，李嘉图网友与红色中国网多位网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李嘉图网友以一个“特色党”党员的身份，站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立场，对红色中国网、左派、毛泽东时代、全球化、中国的发展道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许多红色网友对李嘉图网友的观点做了评论。这些评论，反映了过去一个时期红色中国网理论水平的提高以及对各种现实问题认识的深入。

下面，将李嘉图网友与各位红色网友已有的讨论编辑成文，供各位网友参考。在编辑中，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讨论的过程及各个方面，对于有些发言的段落、次序做了调整，个别文字也做了修改。

关于红色中国网与左派：

李嘉图：

我是你们口中说的“特色党”的党员，我在通过社会实践为人民服务。我也学习过马克思的相关理论知识，同时我也学习过毛泽东思想，但是，我是以辩证的角度学习，不是无脑支持，而是看对认识现

在这个世界是否有帮助。我们本来就是要多干实事，你们这些毛左不需要吗？毛主席说的为人民服务，你们是忘了吗？

按照你们的想法已经不需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过后，社会主义事业已经是完美了，不需要再发展理论研究了。

我看了你们很多文章，无脑支持文化大革命，不看文化大革命的反面影响。渴望毛时代，渴望计划经济，渴望大字报，渴望批斗。但是，你们却看不见，中国当时和美国之间的差距，我们是不是要经济发展？到底物质生活条件重要不重要？你们回复一下？你们需要一个“反贼”，你们不能老是在同温层。

饮料喝没了：

“我是你们口中说的‘特色党’的党员”

据我所知，无论是编辑部还是红中网的活跃网友，从来没有使用过“特色党”一词。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过后，社会主义事业已经是完美了”

无论是编辑部还是红中网的活跃网友，从未有过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完美的观点。恰恰相反，红中网认为，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质是“社会主义社会契约”，因而为了与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相区分，将其称之为“历史社会主义”。

你说你看了红中网的很多文章，请把红中网认为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完美的原话贴出来。

“不需要再发展理论研究了”

也是荣幸，红中网的理论一天到晚被歪曲为世界体系理论，被指责错误“发展”了理论，这下好，直接被您高抬为“原教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了。

“我看了你们很多文章，无脑支持文化大革命，不看文化大革命的反面影响。渴望毛时代，渴望计划经济，渴望大字报，渴望批斗”

从这篇红中网对于历史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式文章中可以看出，红中网的实际观点和你所说的完全不相符。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如要严肃地当“反贼”，请给出红中网的原文。如果这样，我相信红中网的网友们愿意与您交流。

俞聂：

李嘉图网友有没有至少浏览一下红中网首页左上的“快速了解红色中国网系列问答”？稍微看看这篇帖子就会知道，“红色中国网坚持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以及其他在过去几十年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中发展出来的进步理论，独立自主地认识和分析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而红中网正是由于积极借鉴最近几十年发展的进步理论，被许多所谓的“正统马列毛左派”攻击为修正主义者乃至反动派。

李嘉图网友坚持理论要有助于认识现实世界，这很好！红色中国网也致力于独立自主地认识和分析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资本主义（在你看可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努力

回答中国革命能不能胜利、怎样胜利（在你看可能是中华民族能不能实现伟大复兴、怎样复兴）的问题。

李嘉图网友如果有兴趣认识现实的中国的话，欢迎读一读红色中国网的“学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能实现全面现代化吗？”系列文章。

HAD:

据红中网文章说：1966 年文革开始，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都严重不足。首先，它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而是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主要理解为旧社会遗留的旧思想、旧文化遗毒所带来的影响。

在世界范围来讲，1968 年开始的世界革命高潮还在进行，但也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毛主席开始面临苏联在二十年代的问题，那就是一国社会主义还是世界革命的问题。一五计划是成功的，但是到了六十年代，由于自然灾害、走资派的破坏，文革的激烈斗争，经济基本停滞不前。六十年代也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好的时候，日本、南朝鲜都在这时实现了经济起飞。那时，如果要长时期地抵抗美苏两霸和世界资本主义，那么人民就要继续捱苦日子。当时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不到 300 公斤，一旦遇到灾害或战争，就很危险。这样，毛主席在国际上也要退却。

所以，你说的什么“完全赞同文革”并不存在，文革运动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问题，何来完全赞同一说？

实际上红中已经和传统多毛左有很大的不同，你这个就是立个沙包打。

李嘉图：

你们左派把我们认为是资产阶级当权。我说点你们不开心的，你就急了嘛？说实话，你们左派当权的时候，为什么不好好发展，而是搞什么两个凡是，把毛的事业耽搁了，结果现在就开始怪实用派了。

我就喜欢看，之后，当局打你们左派的脸，还有自由派的脸，反正现在是如今的中共当权，时间有的是，你们等着就好了。

报与桃花一处开：

没事，我们都带着眼睛呢，继续看吧，不过我也很高兴看到当局有你这样不顾现实站在劳动者对立面的鹰犬，希望当局提纯越来越大比例像你这样的人。

狠活难整 D4C：

时间在我（指资产阶级挺不起腰，小资产阶级往外润，出生人口越来越少，教育住房医疗压力越来越大）？

教员的差等生：

打过脸了，去年佩洛西访台，我以为喊那么狠，怎么也得借此机会收复台湾，至少也得给美国一个教训，结果狠狠地打了我的脸。

猪爱吃瓜：

你自己都说了你是党员，还“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最基本的切实贴合人民群众的需求，跟群众打成一片才能为人民服务。

我是看了半年红中网文章，基本将这个网站的东西粗略摸了一下，这才注册账号加入红中网开展讨论的。

你的言论可以看出你既没有对这个网站了解过，也没有用事实说话办事的严谨态度，道听途说一些有的没的，而且你的理论储备相当程度上来自于中资篡改的所谓特色理论，然后主观代入立场角色就开始胡说。你能在这场辩论中取得胜利？

关于毛泽东时代与计划经济：

李嘉图：

毛主席说，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们只会口嗨。福田说，美国政治制度是历史终结。你们是不是认为，毛泽东思想过后，社会主义事业就完美了？理论就完整了？社会主义事业历史终结论？未来中国只要按照毛时代的发展模式发展，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毛时代的物质水平和当时的美国差距一字不提，计划经济如果真的这么完美，应该怎么体现出它的优越性？政府提出计划，科研可不

是计划，科研是试错，科研方向是不确定的，我就想问，科研怎么通过计划实现？

指鸭为鼠：

计划经济是民主配置资源，不是一二句话能和你讲清楚的。没有毛时代的计划经济（虽然还不完善），所谓的改革开放根本不可能，毛的计划经济为邓创造了基础。而后来经济确实有些发展，一方面是计划经济的工业基础，其次是劳动力不得不拼命劳作，为资本大厦服务，其次确实是技术的自然而然的进步，比如 40 年前你不可能用到手机，但是目前非洲人都能用手机。并不是什么改革开放导致手机出现，手机出现是需要技术积累的，40 年前美帝也没有手机。

偏锋：

这下真是我的青春结束啦！居然看到鼠兄跟红中老哥们站在一起舌战了。谁说左人无限可分，还是能团结的嘛，是需要一个外敌的。

以后鼠兄说彩礼的时候，我退避三个回复。

西红柿收割机：

完全错误，请你认真学习党史教育要求的四本教材。

首先，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的物质水平低于当时的美国并不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帝国主义列强长期侵略中国、剥削中国劳动人民的结果，是地主阶级、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剥削中国劳动人民的结果。请你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翻到第 15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还有约 2/3 地区的农民被束缚在封建土地制度之下，承受着沉重的剥削，这是旧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之一。”

其次，尽管中国社会主义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发展的，但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扫清了旧的剥削阶级，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与阶级基础。同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在第 96 页：

“到 1978 年，中西部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已经占全国的 56%，超过了东部沿海地区。与 1964 年相比，职工人数由 325.65 万增加到 1129.5 万，工业总产值增长 3.92 倍。”

至于两弹一星等成就，我想，你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我就不必多讲了。

最后，如果科研不搞计划，那为什么我们习总书记领导的党中央还要搞“新型举国体制”呢？因为只有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才能够突破尖端技术：

“以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为最高目标，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以现代化重大创新工程聚焦国家战略制高点，着力提升我国综合竞争力、保障实现国家安全的创新发展体制安排。”

我认为，你不是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员。

远航一号：

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现代条件下，科研还真就是“计划”出来的。

现代条件下早就不是十八世纪以前靠个人灵感和小作坊就能进行科学研究的情况了。现代科学研究无不需要大量的经费、人员、设备投入。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大学教授，一天到晚在忙什么？申请经费。申请经费向谁申请，各种基金，有政府的，有企业的，有非政府组织的。但自然科学项目绝大部分是政府资助的。

申请报告要提出你的科研设想，说明为什么这个设想重要、为什么这个设想有希望有条件实现，预计需要多少经费，用来买什么设备，雇佣多少研究人员。

政府或其他基金收到这些报告后怎么评估呢？先有工作人员做一些初步评估，提出建议，然后决策者还会讨论。一般来说，申请经费总额肯定大大超出现有经费总额。怎么样消除“过度需求”呢？不能用价格信号。因为，涨价在这里不适用。而只能用社会标准（经过讨论来决定哪些项目更符合可能的社会需要）和专业标准（从专业角度评价各个申请的可行性）。

经费批准后，等到预计完成的时候，经费获得者要提出报告，说明完成情况、经费使用情况，是否有超支，是否有节余等。

所有这些，不和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申请项目、申请物资指标等流程完全一样？

你以为计划经济时期的计划就是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几个人一商量就拍脑门拍出来了？听说过计划过程要“三上三下”、要群众讨论吗？什么叫三上三下？计委先提出总的设想，然后由下级和企业讨论，提出修改意见；然后计委综合协调，修改后再由下级和企业讨论，再修改，如此这般，三轮或多轮。

所以，自己不知道或者不懂得的事情，不要凭想象瞎讲。

关于我们红色中国网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认识，也请你调查研究，确实（而不是在想象中）读过一些东西后，才能有的放矢，而不要搞张冠李戴。

关于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李嘉图：

如果中国当时没有进行改革开放，中国有没有可能进入全球化的市场？我想问一下，是继续计划经济国内玩，还要不要进入全球化？WTO 还进不进？不进，当时美国的技术，中国没有，我们需要不需要，通过市场换技术，把美国的技术转移到中国来？如果不需要，中国怎么发展？怎么实现共产主义？

偏锋：

所以也就出现了自研不如买嘛，到现在被卡脖子，在你批判别人不反思时，先假定自己的势力全都走对了？

李嘉图：

现在被卡脖子，又不是没有做，被卡了，华为有退缩吗？不还是活着好好的，5G 芯片可能在 9 月份的发布会出来了，虽然是中端芯片，但是，依旧在做。龙芯的芯片自研已经有成果了，高端现在玩不了，中低端抓在手里。中国智造 2025 如果没有用，特朗普又为什么制裁我们呢？

我就很好奇，你们不支持全球化，你们支持什么东西？就在国内玩吗？国内生产国内花？你不要和外国进行贸易，难道你要闭关锁国？拒绝交流？

指鸭为鼠：

（要全球化）但不是通过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方式对工人阶级代价太大。应该通过不断革命，在欧美滞涨危机不能自拔时推动欧美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于是中国无产阶级和西方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生产力只会比现在发展更好更快而且付出的代价要小，不但人类的代价比如生态危机和气候危机不会严重到如此地步，而且工人阶级更加富裕，至少比现在富裕。但是改革开放至多导致少部分权贵资本家特别富裕而已，广大劳动人民付出巨大代价，包括健康和生命（包括广义的生命），把生命放在血汗工厂中不断地如牛马一样劳作，不是真正的人的生命，本质处于非人的状态。

报与桃花一处开：

什么狗屁全球化，破坏自己环境，压榨劳动者血汗，给美帝输血，什么玩意？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披着羊皮的狼，先把大下岗那些死在寒

冬里的工人和被迫成为妓女的人的血债偿回来！我不否认有脱离阶级的个人，但请你看看特色党里面资本家占比多少吧。

支持什么样的全球化？继续血腥压榨劳动者污染自己环境，给核心资本主义国家输血的全球化吗？继续断子绝孙，青年失业率 20% 的全球化吗？

我说的就是你奉为圭臬但实际上站在中国无产阶级对立面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你以为你这种模式的全球化就是全球化的全部了？全球化就只有这一种模式的全球化了？

特浓的坎通人：

我的英语老师就是兵工厂下岗工人后代，他说，硕大的兵工厂就这么给败家子败没了。

HAD：

由于中国的巨大人口规模，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可能在容纳中国成为核心国家以后还保持自身稳定。除了世界其他地区不可能提供 169 供足够的劳动净转移以满足中国上升为核心国家的需要以外，世界有限的资源和环境空间也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上升为一个核心国家。中国已经是世界上许多能源、原材料商品的最大消费者，如果中国再进一步上升为核心国家，所需要的能源和其他资源将足以导致全球范围的环境崩溃。

李嘉图：

这意思不就是，中国继续发展全球范围的环境就会崩溃吗？那还发展个屁，自杀算了，就感觉你们左派当权之后，就不发展了一样，什么鬼啊。

报与桃花一处开：

你少在那里臆想之后虚空打靶，这里论证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中国无法上升为核心国家，你的大脑是怎么理解成其他的意思的？

HAD：

你不要当核心国家，那你只能是美国的血包。美国本身也不可持续发展的走向衰落。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没有霸权维持只有崩溃。

左派等于不发展这种话术太经典了，合着全球第三世界就是发展的必要代价，是吧？

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废墟上，未来社会主义政权首先面临的挑战，是要将社会的物质消费水平稳定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上并满足全体人口的基本需要。当社会主义政权对能源、粮食等关键资源实行统一计划管理以后，大批依靠剥削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来谋取利润的低效资本主义企业将陷于破产。一部分工人会失业。资产阶级可能利用这种经济困难向无产阶级政权展开反扑。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坚决地打垮资产阶级的反扑。首先，必须取缔一切私人的资本输出、杜绝资本外逃。其次，立即将所有的失业工人组织起来，由国家提供最低收

入，提供劳动培训或用于公共工程建设。然后，迅速地发展公有制企业，将所有剩余劳动力都利用起来。与此同时，实行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取缔一切非必需品的进口，节约外汇，减少对残余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依赖。通过上述这些方法，力争用一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国民经济的完全的社会主义化。在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于整个社会的物质消费水平不再增长或只有很少的增长，就可以逐步减少全体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大量非生产部门，如销售、广告、律师、臃肿的官僚部门、浪费性的医疗活动、各种奢侈品等，都可以逐步取缔，从而节约大量的社会劳动时间。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减少以后，就可以逐步增加对各类公共事务的参与，并利用自己的自由时间从事各种创造性活动。或许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在人类自觉运用所认识的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李嘉图：

搞得好像当局没有想到第三世界一样，一带一路是什么东西啊？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什么东西啊？我们为什么要团结中东，团结东盟，团结非洲。搞得好像我们是孤家寡人一样。

你直接反对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依赖，我们是不是要闭关锁国啊？你们真的搞笑，美国现在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是不是就要斗争、战争，来打一架？冷战来一场？你说的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废墟上，

未来多少年是美国的废墟？你有时间表吗？没有就等着吧，在现有的体系发展，逐渐建立新秩序。

HAD:

一旦摆脱依赖不就意味着全球分工体系瓦解了吗？美国还能独善其身？

即使不是红中网网友，也知道中美之间存在了一个互补的关系，既无替代，也无阴阳转换，少了任何一方都将使体系崩塌。

什么美国？五十个美国？全球经济交流最终的主导者将是全球的无产阶级。

西红柿收割机:

你对党中央的政策理解是非常错误的。

我们只有学好弄懂“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才能够在新的斗争中找准着力点，把握发力点。为什么我们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什么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为我们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党。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两大总任务之一，中华民族是什么？中华民族是全国各族人民在反抗内外剥削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共同体。伟大复兴，复的是什么兴？是革命的兴，是社会主义的兴，你可能会疑惑，我们现在不就是社会主义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复这个

兴？你会对此感到疑惑，就说明你过去始终无法理解习总书记，你不能够明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于一个共产党战士的意义。

请你打开《社会主义发展简史》第 188 页，找到这一段话：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得世界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美国和西方的巨大变动…… 北约经过三次东扩，基本上将原东欧国家纳入其势力范围。社会主义在原东欧国家整体退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创。”

注意，这里的用词是重创！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创，这就是我们说的社会主义陷入了低潮，而我们要复的兴，也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更包括了国际共运。对此，习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马克思说的自由人联合体，我们要在全世界搞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共产主义！你若是无法理解，请你认真学习这一期求是杂志。

关于中美关系：

李嘉图：

我想问一下，现在究竟是国内的阶级斗争的矛盾大，还是和国外的帝国主义的矛盾大？

报与桃花一处开：

中国劳动者和中国资产阶级、国外帝国主义的阶级矛盾大，中资和国外的帝国主义狼狈为奸。

看来现实的情况已经触动不少人了，就连拥护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特色党员也不觉得歌舞升平，憋不住来这里讨论了。估计以后这个网站会有越来越多的拥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兔友过来。挺好，继续看看现实矛盾怎样发展吧。

李嘉图：

现在中共为什么不跟美帝跪下来？既然，中国资产阶级是为了利益，直接和美帝投降也不会让自己这么难过，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

HAD：

为什么不跪呢？起源是这样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多数，也是要走资本主义复辟道路。但是几十年的政治经验告诉邓小平，如果像赵紫阳那样乱搞，官僚资产阶级有被工人阶级推翻的危险。而且赵紫阳要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做比较大的让步，这一方面会侵犯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在邓小平看来，要收买自由派知识分子也不需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从1989年开始定了调了。

说白了就是双方都能谈，彼此互有筹码有把柄，双方争的就是筹码，说白了就是讨价还价，对内都要塑造一个邪恶敌人维持团结，跪下了不直接又整了一次国府的烂活？不想干了？

至于你说的这个中美问题，红中网早就有过论述：就中国资本主义来说，中国现在既不是半殖民地或美帝国主义的附庸，也不是列宁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以承担出口制造业为主要职能的半外围工业国。作为这样一个半外围工业国，中国资本主义主要通过向美国、西欧、日本输出大批廉价工业制成品的的方式向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国家转移大量剩余价值。如果没有通过剥削大量中国廉价劳动力而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能不能运转，是很成问题的。然而，中国资本主义要承担这样的“世界工厂”的职能，就必然要到拉丁美洲、非洲、东南亚去采购原材料，就必然要从俄罗斯、中东进口能源，就必然要依赖日本、德国提供的机器。对于中国资本主义为了这些目的而进行的“资本输出”乃至所谓“一带一路”，美帝国主义不仅不会反对，反而会乐观其成。因为只有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不断壮大乃至“强大”，美国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来自中国的超额剩余价值，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才能运转下去。在中国资产阶级方面，除了他们个人之间已经与美国资产阶级发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外，就其阶级本性来说，它的财富和权力的基础，是维持住世界 209 主要制造业出口国的地位。为了这个目的，中国资本主义除了需要美国的市场以外，还必须服从美帝国主义制定的金融规则，甚至在相当长一个时期还不可避免地要依赖美国海空军来保护中国经过印度洋、太平洋的贸易航路乃至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进口来源国的政治稳定。所以，中国资产阶级与美国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现有的资本积累的格局下，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也

决不会真正有取美国而代之的想法，而是会在涉及世界资本主义根本利益的一切重大问题上做“负责任的大国”、与美帝国主义保持一致（制裁朝鲜仅是一例）。当然，像任何两个资产阶级一样，中、美资产阶级之间也有矛盾，中国资产阶级也可能想在周边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但又为美帝所承认的势力范围。但是，相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和根本利益，相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大局”，这些都属于枝节问题。中、美资产阶级或者中、日资产阶级或者陆、台资产阶级是决不会为了这些枝节问题而闹翻天、撕破脸乃至大打出手的。

这是编辑组写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看

理想者之终焉：

只有披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皮，才能 PUA 中国无产阶级向核心国转移剩余价值，顺便从产业链下游分得一杯羹。

关于中国的发展道路与代价：

李嘉图：

又在说污染自己的环境，现在是吗？现在企业环保要求有多高，你了解吗？现在环境是不是变好了呢？青年失业率 20%，是从 16 岁开始的，到 24 岁，16 岁难道不是在上学的年纪吗？这部分也算了，你觉得失业率到底是怎么高？

报与桃花一处开：

你还觉得这个数字不够多是吧。我就不提什么数据注水的东西了，官方说的一周工作 1 小时就算就业，劳动人民看了要笑掉大牙。

980135117:

青年失业率指有意愿找工作的人作为分母，其中没找到而且还在积极找的人是分子，因此不包括在校学生，也不包括家里躺平啃老的人。如果包括啃老的人那失业率就会达到百分之四十八。

李嘉图:

我们的“特色党”也发现了问题所在，十八大之后，环境有没有改善呢？有没有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呢？给美帝输血？怎么了，我们现在想要抢占高端市场了，美国想要和中国脱钩了，这还算走资啊？当时，为什么会出现下岗潮？你不知道吗？国有企业都快死了，没有丝毫生机。全球化咋了，全球化孵化出像华为这种企业没有？华为的待遇可好了，有加班费，这也要批判吗？

爱琳娜:

学生还是外宾啊，在中国但凡有一丁点社会阅历的都不会有这么“根正苗红”的兔友。

君行早:

对于觉得中特不是资产阶级当权的，一律建议去工厂干个一年半载。

报与桃花一处开：

首先告诉你一点，国有未必公有，资本主义也有国有企业。其次，国有企业快死了？什么玩意，我母亲当年所在的厂经营的好好的，结果被私有化后被败家子们干废了。也是，不让他“亏损”，怎么能名正言顺地被那些老板占为己有呢。对啊，我们从劳动者的角度希望每个劳动者都有华为的待遇，但现实有吗？要不看看中国多少劳动者有华为的待遇？还在说没走资，你看特色党敢公布公有制经济成分占比多少吗？走资不是看你和某个国家在上面演脱钩的戏，实质大于形式，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在雇佣劳动制下多少加班得不到加班费，面临失业危机的工人恐怕更有话语权吧？下次别把加班费挂在口上了，这是负面宣传，加班费本来就是应该的，你这么一说感觉加班费是个少见的东西，不给加班费才是常见的现象，这就暴露了嘴脸。

杨坚：

一看就是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环保要求高又如何？纸面数据而已。你有实地了解过化工厂吗？大部分企业的环评都是低标准条件做出来的。比如这个工厂每日可以生产 100 吨聚乙烯，到做检测的时候，工厂就按照每日 10 吨的量来生产，三废排放自然就少了，或者也可以根据标准控制好排放量（把一小时废气排放量控制在标准内，增加排放时间就行），这样子环评能不达标吗？但平常工业生产要是开足马力的话，那他还能达到环保标准吗？还有环评结果需要专家签字，也是厂里老板花钱找来的。最可笑的是，那些所谓的专家也

仅仅只是在厂里转了一圈就走了，据说还要赶下一场呢！要是真的严格执法百分之九十九的工厂都得停业整顿。环境变好？污染不过是从东部转移到了西部，从城市转移到了农村。

李嘉图：

那好啊，化工不要发展了，化工什么也不要弄了，要不要回到小农时代？这不是扯犊子嘛？我想问，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物质极其丰富，怎么物质极其丰富，要不要化工产品？

饮料喝没了：

说中国无良民营企业家为了追求利润不重视环保，咋到你这儿就成了我们说不要发展化工，还要回到小农时代？您这个歪曲的手段也不知道是跟谁学的？

西红柿收割机：

环保要求当然高了，但末端治理的猫腻可不少。上面来查的时候，我们老板就让工程师做手脚，直接往综合池里加大量的活性炭，甚至对外排废水进行稀释处理，等生环局的人走了，老板就接着排放超标污水了。

问题从来不在于中央政策制定的如何，而在于政策是由利益集团来执行的。党中央反腐败就是为了打压这些利益集团，而反腐败斗争不是党内监督就能够完成的，只有走群众路线，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到反腐败斗争中去才能够彻底扭转邓小平时期形成的庞大的利益

集团，以伟大的社会革命推动我们党的自我革命，这就是我们习总书记说的：“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领导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这与其他政党有着显著区别。”

特浓的坎通人：

朋友，虽然我文化水平不行，我是高考落榜生，没上大学，不懂得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但是我想共产主义并不是物质丰富那么简单。

理想者之终焉：

你说的环境变好很多，难道是指中国人民被诈骗到缅甸被割腰子的人越来越多吗？并不止于网络上，现实中我妈也有不少认识的人，有的从缅甸全身而退，有的却只是捡回一条命，下半生怎样活着都成问题。要果真如你所说，中共依旧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为何连帮助人民清除祸患都做不到，只能让缅甸诈骗集团在国内外作威作福？

估计只是因为你和中资脚踏一条船。这年头连个体户做生意都不好做，各大企业公司只能加紧对劳动者的剥削，加长工时挤压薪资，再加上物价上涨，深圳这边早些时期都开始出现招工荒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何群众都不愿意积极投入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呢？

如果你是外商的话，那我承认环境确实不错，苹果特斯拉准入中国市场简直赚麻了，只不过中共对待外商的超国民待遇似乎引得国人有点不满啊

西红柿收割机：

你并不懂得辩证法，因此你无法理解习总书记的教导。

习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光辉论断不仅仅是为了环境保护，而是从中华民族的百年大计出发。由于邓小平时期中国走上了全球化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沆瀣一气，大搞“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洋奴哲学，出口导向型的依附性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中国抛弃毛泽东时代遗留下的历史遗产，就比如环境保护。

我们最早的环境保护是始于你认为的“动乱的文革十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的第122页有一段高度概括的描述：

“1973年8月，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通过了第一部环境保护的法规性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11月7日，国务院颁布《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1974年10月，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正式成立。”

文革期间就已经开始环境保护了，怎么直到习总书记才开始认真地治理环境污染呢？中间那改革开放几十年都干啥去了？

当然，我们都知道是因为利益集团不愿意搞环保，环保在任何一家生产性企业中都是不产生效益的末端部门，私人资本家为了尽可能多地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利润，都会“争先恐后”地无视环境保护。如果能直接把污水排到长江里，那他们就绝不会在末端治理花一分钱。

这些糟蹋中国大地的资本家的理由跟你完全一样，你们都是打着要发展经济的大旗：“企业不要发展了？我不直排乱排，工厂什么的也不要弄了，要不要回到小农时代？”

呵呵，你们这些家伙发展经济几十年，留下的环境问题一大堆，要不是我们人民群众不买账，要不是中国出了习总书记这么个有底线思维、长期思维的领导者，我估计啊，太湖都要被填了拿去搞房地产了。

Aoko:

敢问李嘉图阁下父母工作？

特浓的坎通人:

肯定脱离不了一商、二官、三上层小资。

没有天分:

你提出马列毛思想已经“登峰造极”，不需要新的发展了的观点，不知道是你自己根本没看红中理论，还是已经魔怔到对“左”有了什么刻板印象，觉得我们始终吃老本。

你说你是特色党员，学过马列毛知识。但是你连唯物史观，劳动价值论，不平等交换，阶级斗争，帝国主义论等最基本的马列毛知识都不了解甚至没一点认识，不知道你学的是什么。可见你掩耳盗铃，坐井观天

你说文革有问题，却不能指出文革最大的缺陷在于理论缺失和对实际形式的错误判断，把走资派和反动派的罪行甩给毛和造反派人民背锅，可见你对历史一无所知。

你说改革开放造福了人民却看不见底层人民在超高劳动强度和超长劳动时间的雇佣剥削制度下的艰难生存以及所谓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破坏。连国有，公有和私有的概念都分不清楚，却指责工人大下岗是工人懒惰，效率低下。搞不懂当局提出的一带一路，共同体等口号政策的最根本目的是消耗过剩产能和维护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这又可见你装模作样，愚蠢至极。不深刻了解社会还自称了解，不懂辩证统一却自称懂得。

连我家不识字的老人都懂得不看人怎么说看他怎么做，你还真就听信了当局的那一套八股自信文和花言巧语，如果你不是外宾而真是墙内人，那只能说你是真的低能了。

李嘉图：

骂别人低能，殊不知你们都是低能，你们有能力就当权，改变这一切。我笑你们，你们是自己把能改造中国的权力失去的，不能就别XX。低能儿。造反派是对的吗？搞笑得很，你们红卫兵有多过分，文革时期党组织瘫痪多长时间了？又说资源环境，我们在习上台之后，环境改变很好，懂了吗？你们自认为是懂王，实际根本不懂，你是不是认为当今社会必须进行阶级斗争？我承认在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

中，一定会消除阶级，但是，要实事求是，当今现实背景实现不了，懂不懂？你们是不是还想输出革命到全世界？告诉你，如今我们党中央决定不再输出革命。

激活：

从楼主的言语我看到了曾经的自己，毕竟改革开放“富”了，为什么还有人不满，还会有人不满意。问题就在于，这个“富”是建立在谁身上的。论坛里的所有人都试图告诉你，你所谓的“富”是真富吗？更多的只是时代的进步。你只看到了表面的繁华，没看到背后的血与泪，中国劳动时间世界第一，劳动强度世界第一。这些问题不是我们瞎扯乱造谣，而是实打实存在的。

今年出生人口低于 1945 年，你的美好时代、你的“富”为什么能导致人们不生了，甚至低于 1945 年战乱时期？还有躺平，网络上矛盾不断，这些东西难道全是虚假的，不存在的？不能那么双标吧？只看到“繁华”，看不到背后的血与泪？

李嘉图：

为什么不生了？14 亿了，你们准备要达到多少？每年你们准备增加多少人口？准备在本世纪中，20 亿人口吗？这么多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是说，一直加上去？现在是想生多少生多少，懂了吗？优生优育。

俞聂：

可惜你的党中央在担心“人口危机”了。我倒希望李嘉图网友继续在他的党内外大力宣传“少生优生”。

远航一号：

你对人口变化的规律不太了解吧？

按照现在的生育率及其下降的趋势，未来中国的人口不是 14 亿，也不是 7 亿，而是到本世纪末下降到 5 亿，长远有可能不到一亿。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你还想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吗？

特浓的坎通人：

虽然我文化水平不行，我是高考落榜生，没上大学，不懂的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但是我想共产主义并不是物质丰富那么简单。

还是公平：

你之前的发言也让我受启发，挺厉害的，怎么会不理解共产主义呢？

人的生活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时间的问题，人类展开任何活动都是在时间的维度下的，人是时间动物，人只有从维持生计的时间中逃脱出来，才可能从事新的活动、进行更丰富的生活，人类的解放就是时间的自由，术语上叫做闲暇。共产主义就是要使工人阶级从生产性体力劳动中摆脱出来，尽可能压缩体力劳动时间，推进脑力劳动的全民化，从而使每个人全面发展（归根结底是脑体两大方面的和谐发展）。

猪爱吃瓜：

这次讨论很有总结的价值，一百五十多个回复，整整 18 页，陌生的、熟悉的都出来讨论了，甚至鼠兄都站到我们这里来，实在是颇为有趣。

中美“缓和”——黎明前的黑暗还是危机爆发的先声？

作者：普通人

自从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持续了数年，其走势一度更趋严峻。然而，最近却不断传出中美缓和的消息。外交部长王毅访美、习近平接见了加州州长、人民日报发表了“推动中美关系好起来”的社论、习拜会也在筹备中。种种迹象，让人感觉中美关系的转折点已经到来。在这种形势下，就自然形成了两个问题：中美关系为什么会缓和？如果说对资产阶级上层来说中美关系需要缓和，为什么是现在？

正如红色中国网过去曾经指出的——中国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专门从事以剥削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国家。自从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以来，这个性质就始终没有变。习近平上台以后，虽然采取了许多打击异己的集权措施，又加强对社会的镇压和管控力度，从而得到了“开历史倒车”和“复辟”的骂名，但他从未试图改变中国的经济基础，房地产和外贸仍然一直是中国的经济支柱。这样的发展模式在习近平统治时期两次达到巅峰，第一次是疫情开始前的 16-19 年，房地产在此期间达到了顶峰，在很大程度上拉动了经济；第二次是疫情中期的 2021 年，当时中国用清零政策几乎彻底控制了疫情，而其他国家正陷入泥潭之中，生产能力大受影响。此

消彼长，造就了外贸的飞速增长。

在《学点马克思主义（三十五）——中国革命的策略》中，红色中国网理论编写组指出：

自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以来，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高速经济增长之上。高速经济增长是中国资产阶级许诺的“中国梦”的客观前提。按照这个“中国梦”，只要广大人民群众服从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放弃政治自由而且甘心忍受血汗工厂式的剥削，中国经济就可以实现高速增长，从而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保证大多数中国人都可以过上类似于“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

经济的强势表现一度给了中特统治集团很大信心，使得他们敢于在表面上公然摆出一副与美国分庭抗礼的架势，习近平提出的“东升西降”是当时统治集团内部心态的真实写照。而政府的强势表现又极大刺激了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许多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产生了“在英明领袖领导下打倒美帝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错觉。在这种狂热的情绪支配下，他们认为当前的一切苦难都是值得的，也是暂时的；认为被剥削和压榨都是“必要的牺牲”，一旦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中国人就都能过上“牛排红酒大别墅”的奢靡生活。入关学就是其中的集大成者，也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

然变化就打了中特统治集团一个措手不及，让他们引以为傲的清零政策成了无用的累赘，在负隅顽抗大半年之后不得不突然转向全面放开。疫情之后，被他们寄予厚望的经济复苏也并未如期到来，房地产在过度扩张中走向危机和外贸的火爆不可持续导致了经济引擎的全面熄火。更为致命的是，这台引擎消耗了几十年的燃料——“人口

红利”正在快速枯竭，这使得越来越多人开始认识到当前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和破产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于习集团没有改变高度依赖外贸的经济模式，无论他们怎么反对美国，都无法切断与美国的密切经济联系。这样一来，特色政府的经济高速增长实质上高度依赖于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就是为什么早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就有了“搭便车”的论调。美国资产阶级认为他们出钱出力维持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却让中国资产阶级借此吃到了红利，中国资产阶级应当为此交出更多的剩余价值，并且要安于体系中南外围国家的地位，安心做美国的附庸、不断为美国上供利润。但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大好形势下野心膨胀，不肯甘居人下，而开始幻想与美国争霸、争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导权，此后的中美斗争都只不过是这种矛盾的延续，其实质是大资产阶级内部分赃不均的矛盾。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为了维持自身的反美人设、为了继续沉溺于自己营造的“取代美国、主宰世界”的迷梦，中特统治集团可以容忍中美贸易战和紧张关系带来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失，但即便处在相对有利的条件下，他们仍然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真正挑战美国霸权。2020年疫情蔓延到美国时，美海军一度只剩两艘可出动的航母，当时入关派鼓吹这是收复台湾的绝佳时机，结果中特军队无动于衷。俄乌战争爆发后，中特又一次采取了首鼠两端的策略。去年8月，佩洛西高调访台，给了中特一个极好的出兵契机。特色政府的舆论机器全部开动，声称要“消灭一切来犯之敌”，

民族主义情绪被调动到最高潮。出人意料的是，中特实际行动的无能再一次与宣传形成强烈反差，沉重打击了国内的民族主义，入关学从此成为历史名词，特色政府的公信力和号召力也下降到最低点。中特宁愿承受这么大的损失，宁可让多年来的经营毁于一旦，也不敢出兵统一一个小小的台湾岛，这是小粉红们完全无法想象、根本不敢相信的，但它就是发生了。在利益面前，一切雄心壮志都为之望而却步，中特统治集团不敢对美动手的实质是不敢承受经济彻底崩溃及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而选择继续在当前的经济模式下苟延残喘。为了保住里子，可以不要面子，这是中特统治集团指导行动的现实逻辑。

事实证明，由于高度依赖于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每到关键时刻，中特统治集团的选择总是维护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不是打破它。不破不立，既然不敢打破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又如何建立起新的世界体系来主宰世界呢？既然不敢打破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又如何能够真正站稳反美的立场呢？因此，不管他们嘴上怎么说，身体反应却总是出卖他们，暴露了他们“假反美，真拥美”的虚伪面孔，进而暴露了他们的反动本质。“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这句曹操对袁绍的辛辣评价，今天却恰恰是对中特统治集团最贴切的评论。

由于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和中特集团色厉内荏的彻底暴露，曾经一度被迷惑的广大人民群众已经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迅速开始觉醒，反资思想不胫而走。更为重要的是，许多人已开始认识到中特集团就

是罪魁祸首，中特集团有成为众矢之的的趋势。正如红色中国网理论编写组所写的那样：

一旦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认识到，这个所谓“中国梦”是无法实现的，是水中月镜中花，一旦资本主义积累的危机迫使资产阶级企图逼迫广大劳动群众在忍受政治专制、非人劳动条件之余还要接受物质消费水平的停滞和下降，从而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对于下一代会比自己过得更好的幻想破灭，资本主义积累的要求就会与广大劳动群众对广泛的经济、社会、政治权利的要求发生尖锐不可调和的冲突。那时，中国就会出现革命形势。

虽然中国的革命形势还尚未出现，但这种趋势的形成和临近却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危机的不断发展必将造成中特集团的统治危机，这是中特集团最为恐惧的。

由于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中国资产阶级统治越来越岌岌可危，现实条件已不可能支撑中特集团再去争夺什么世界体系的主导权。进是不可能了，但他们还要全力保住自己的现有利益，首先就是要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这就必须要让恶化的经济重新好转起来，在这方面中特集团是个黔驴技穷的庸医，他们的医药箱没有什么经世治国的良药，有的只是新自由主义的兴奋剂和强心针。借着进博会的契机，习近平重提开放市场，结合之前出台的解除对外资限制的条令，不难看出中特集团给出的药方就是吸引外国资本和发展对外贸易。这种陈腐的毒药不可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却被中国资产阶级视为救命的稻草。

从另一方面来看，此时美国统治集团也一样处于焦头烂额之中。对乌军援不断打水漂又不能停止，已成为他们沉重的负担；中东以色列受到强力的挑战，威胁美国在中东的布局，而与中国对抗的形势还在持续。美国统治集团非常清楚，空有世界第一强国的架子却在持续

衰落中的美国决不可能同时应付三条战线，作出取舍是当前他们要面对的最大问题。这样一来，内外承压的中国统治阶级和美国统治阶级一拍即合、放下旧怨，又走到一起来了。

中国统治阶级和美国统治阶级会不会像自由主义者所期盼的那样就此转向齐心协力，共渡难关呢？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由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不断发展所导致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瓦解，决不是中美资产阶级联手就可以逆转的。倘若他们果真达成了协议，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也只不过是將危机爆发的时间推迟片刻。等到危机真正来临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大难临头各自飞”，一定是先保自己，而不会去尽任何的盟友义务。即便这样他们最终也是保不住的，只是无产阶级可能要面对一段黎明前的黑暗。如果他们的谈判破裂，矛盾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更趋尖锐化，那么资本主义的危机就有可能加速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就有望提前到来。

未来三十年之内会有社会主义革命吗？

作者：远航一号

李嘉图网友问：

未来三十年之内会有社会主义革命吗？是不是真的？契机是什么呢？望解答（真心）。

远航一号答：

为了表现求同存异的诚意，给李嘉图网友准备一个尽可能简短的讨论版本：

1 中国未来人口将趋于下降；劳动力的下降速度将比整个人口更快；到 2050 年以后，劳动力下降速度将超过 2%

2 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在趋于下降。综合外国历史经验、经济模型、中国现有趋势，到本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将不会超过 2%：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51384>

中国现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大约相当于美国 1950 年的水平。在从 1950 年至 2019 年近七十年的时间中，美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 1.7%。日本的人均 GDP 于 1975 年达到美国 1950 年的水平；在从 1975 年至 2019 年四十多年的时间中，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 1.9%。韩国的人均 GDP 于 1991 年达到美国 1950 年的水平，此后，韩国于 1997 年遭遇了金融危机；在 1999-2019 年的二十年时间中，韩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 2.1%。从这些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在达到了中国现有的人均 GDP 水平以后，二十年以上的长期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一般在 2% 左右；并且经过的时间越长，劳

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越低。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中国经济从现在起至本世纪末、在长达近八十年的时间中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不会超过 2%，有可能更低。

3 所以，2050 年前后，中国经济将转入负增长。

4 中国劳动人民不可能长期忍受全世界最长的年平均劳动时间；劳动力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后，年轻一代将普遍要求大幅度减少劳动时间，过上像李嘉图网友那样开着房车在全国旅游的生活；这会使得经济负增长的情形更加严重；随着经济负增长，失去了物质消费不断增加的刺激，绝大多数劳动者将更加缺乏拼命上班的积极性，从资本家的角度看，就是劳动者将更加“好吃懒做”，导致经济负增长更加难以摆脱。

5 从数学上可以证明，如果经济增长率为零或负，资本家的平均利润率也必然不断下降并趋近于零。这时，资本家的投资会大幅度下降，严重的话，还会伴随着大规模资本外逃，从而不仅导致经济负增长，还增加经济崩溃的危险。

6 从数学上可以证明，如果经济增长率为零或负，再加上人口老龄化引起的财政负担，本世纪中期以后，中国资产阶级国家的财政危机将趋于无限恶化，从而陷入普遍的财政破产，进而发展为政治危机：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51566>

7 以上危机，现在的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任何其它形式的资本主义也解决不了（包括“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因为（a）任何资本主义都无法解决未来劳动力迅速下降的问题；（b）任何资本主义在未来都无法使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长期

保持在 2%以上，美国、日本、韩国都做不到；(c) 只要经济零增长或负增长，利润率就必然趋于下降，任何资本主义都解决不了由此带来的投资下降的问题；(d) 只要经济零增长或负增长，加上老龄化，财政危机就必然恶化，任何资本主义都解决不了；(e) 如果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人民要求对资本家增税来弥补社会保险账户亏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上述各项危机将更加恶化，所以说资本主义或者“改革开放”范围内的改良主义就是死路一条，“社民”路线是空想。

8 由于未来经济必然走向零增长或负增长（由于人口和劳动力下降，社会主义也没有办法让经济恢复长期正增长），问题就是：哪种社会经济制度在零增长、负增长条件下还能维持经济稳定、社会稳定、政治稳定？

9 答案是，资本主义肯定做不到，因为资本主义经济不增长，就会出现上述的各项危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以做到。因为历史经验已经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以在哪怕是经济零增长、负增长或低速增长的情况下，仍然保证充分就业并满足人民基本需要（公费医疗、公费教育）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10 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与资本主义竞争方面确实失败了，因为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无法靠残酷剥削廉价劳动力与资本主义竞争。这个账我们认，不与李嘉图网友争。但是，未来，其它资本主义国家都会面临与中国资本主义类似的问题，所以未来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与仍然在增长的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竞争。

11 一旦经济不再增长，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越来越丰富的消费品就不再重要（事实上也满足不了），过上轻松、没有压力、吃穿不愁的生活就是最主要的。这方面，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12 未来在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前，可以先有个过渡时期，从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市场经济（类似八十年代那样），再过渡到计划经济。在过渡时期，我们可以和李嘉图网友继续辩论。

13 如果现在的中国共产党能及时觉悟，适时宣布“改革开放”“胜利结束”，还有机会把握未来过渡的主动权。否则，不是谁想要革命，而是资产阶级自己主动选择革命。

14 再补充一条，中国共产党不可能长期（在未来三十年）拖延祖国统一的实现还能维持政治合法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留给中国共产党的时间也是有限的。但是，只要坚持“改革开放”，国内外资产阶级必然有足够的力量阻止中国共产党下决心实现祖国统一。过去许多年的经验都证明这一真理，未来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真理。李嘉图网友喜欢的、很帅的航母战斗群就会变成趴在港里无所事事的一堆玩具。当然，我们很愿意拭目以待；但是，我们迫切希望，祖国统一早日实现，而不是无限期地推迟下去。祖国统一的大业越是推迟下去，广大人民群众就越是不满意，甚至某一天，李嘉图网友也会严重不满，到那时，中国共产党就真的危险了！只有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人才能有勇气、有决心、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如果

中国共产党始终不觉悟，宁要“改革开放”，不要祖国统一、不要民族复兴，广大人民群众就只有靠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来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了！

怎样在网上与“黑”而“不专”的小资产阶级落后群众 展开辩论

作者：井冈山卫士

非常感谢各位网友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与李嘉图网友进行认真的、友善的讨论。由于李嘉图网友蓄意挑衅，他将休息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我们不妨总结一下与李嘉图这类网友讨论问题的经验教训。

我们知道，对于一些现实和幻想中的阶级利益仍然与中国资产阶级“大局”绑定的落后小资产阶级群众来讲，通过交流、批评和教育是难以达到转变其认识的目的的。这个工作我们做不成，需要资产阶级来做。资产阶级会给他们准备“灵活就业”、高劳动强度、长劳动时间、高房价、天价彩礼等一系列“大礼”来迫使他们认清现实。我们不必太过着急。

因此，对待这一类网友和朋友，我们的基本目的就不再是好言相劝，而是利用与他们辩论的机会来扩大我们自己的影响。即“登他的台，唱咱的戏”。

要做成这一点，需要有一些技巧。这些技巧中，有很多是广大网友已经实践过的，有些则是我们需要一起共同学习的。在这里我就举出几条，希望大家来踊跃补充。

第一，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这类落后群众通常会以造谣来挑衅，刺激进步群众去辟谣。事实上，冤枉我们的人被谁都知道我们冤枉。自证清白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比如李嘉图网友造谣红色中国网与江青同志的谣言

(<http://redchinacn.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254>), 许多网友就就去主动查阅材料来辟谣。这样，李嘉图敲下一句话时间的“交换比”就赶上了网友们千百倍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扭转“交换比”的关键就在于转守为攻**。比如，在李嘉图网友的案例中，揪住中国资产阶级丧权辱国，人民生活看不见希望，在天下大势的激变时期错失历史机遇等等，就比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具体细节管用。如果能把这些和李嘉图网友的生活联系起来，那么效果就会更大。“小粉红”通常是笑贫不笑娼的慕强者，因此，我们不仅应当揭露中国资产阶级的”坏“，更应当阐明中国资产阶级的“蠢”和“弱”，给听众造成“彼可取而代之”的印象，这也能干扰“小粉红”的情绪和判断。

当然，对于一些流传广泛的谣言，如“饿死三千万”，毛主席去世前“经济崩溃”等，需要我们广泛地查阅资料，来达到辩论时一击必杀的效果。

第二，在我们展开进攻的时候，对手通常会采取耍赖的手法。这一方面是因为对手的弱点远比我们多，需要遮掩的东西远远超出他们的个人能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们拥有人员的质量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耍赖。

耍赖本质上是“弱势策略”。而应对耍赖的关键点，就是继续放大对手的“弱势”，压倒其一切“策略”。

耍赖的手段之一是“顾左右而言他”。比如李嘉图网友在使用资产阶级航天部门吹牛材料失败以后

(<http://redchinacn.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209&extra=page%3D3>)，立刻逃离战场，开始吹嘘平平无奇的资产阶级灾后补救措施

(<http://redchinacn.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237>)。在这种情况下，进步网友们可以采取在新帖子下反复追问李嘉图网友辩论失败的事情，而不去管他新提出来的、毫无意义的话题。这样，抓住对手的痛点，反复摔打一处，不让他的耍赖离题手段奏效，造成“孔乙己效应”（只要发话，就是“窃书”），就能以较低的成本达成效果。

当然，如果对手的故意离题确实引发了有意思的话题，并非全无意义，那么大家也可以跟上新的话题讨论。毕竟我们不是针对某些网友个人，而仅仅是剔除他们用来转移话题的垃圾信息。

耍赖的第二种手段是“我无耻我骄傲”。这在李嘉图网友身上非常明显。在他的语境里，他自己是“党员”，是未来有钱有权的天之骄子，而网友们则是没有前途的“土鳖”。同时，由于网友们多是进步左派，因此就被李嘉图网友强加了大量的道德负担。比如“立刻开始革命”、“你来领导”、“你行你上”、“不能对我（李嘉图）这种群众无礼”等等。这种“我无耻我骄傲，你善良你去死”的方法本

质上是道德绑架，或者 PUA。网友们通常是有朴素正义感和阶级情感的人，面对这种道德绑架，就算不吃这一套，也有可能感到心里不舒服。

面对道德绑架最好的手法，不是丢掉道德。丢掉道德就意味着成为道德虚无主义者，成为群众眼里的“马基雅维利”，最终失掉群众。面对道德绑架最好的手法，是反绑回去。再次以李嘉图网友为例，他自称是党员，又号称“无条件服从中央”。那么所有“中央”的恶政、无能和昏聩都是他必须解释和负担的道德责任。因此，什么佩洛西访台，帝国主义军舰进出台湾，经济减速等等，全都是李嘉图网友的负担，因此也全都是进步网友进行道德反绑架的抓手。

道德反绑架的目的在于让对方陷入“道德——忠诚——自我”的三重困境。对于李嘉图网友而言，面对道德反绑架，他要么抛弃道德，承认自己不在乎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要么抛弃“中央”，承认自己反对“中央”的恶政，因而对“中央”不忠；要么抛弃自我，承认自己只是机械服从“中央”恶政的废物。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给李嘉图网友构建了什么陷阱，这只是因为新自由主义时代末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矛盾：一个拥有基本认知和判断能力的人，不可能在对中国资本主义忠诚的情况下，还能无视中国资产阶级的恶政、无能和昏聩从而保持道德的完整性。

最后，有些“小粉红”并不在意我们说的这些，他们很有可能就是享受谩骂、造谣、羞辱的快感。在现实生活中，他们谁都不敢得罪，那就只好在网络空间中发泄恶劣情绪。这种情况不难理解，中国资产

阶级的逆向淘汰机制不仅让号称“理科研究生”的李嘉图网友不再懂得基本的航天物理规律，也让他只能靠谩骂他想象中的“左派废物”来获取基本的满足感。

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已经逐渐失去了培养“又黑又专”的“人才”的能力，这是李嘉图网友等人的个人悲剧，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末路哀鸣，也是未来中国革命开幕序曲。

与自由派的思想斗争，是我们的长期任务

作者：雾雨魔理莎、远航一号

雾雨魔理莎网友说：

我们不仅要善于同特色党斗争，也要善于同自由派斗争，我来谈谈我对自由派的看法以及未来可能的斗争方向。

首先，毫无疑问的是，自由派是中国最反动，最无耻的一个群体，他们极端反华反共，无脑跪舔欧美日资本主义国家，认为中国不行外国行，带有浓厚的逆向民族主义，表现为张口支闭口腊，而且自我意识极度过剩，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可以代表中国的广大人民。

其次，自由派们虽然天天以民主自由标榜自己，而实际上干的是法西斯分子的事情，他们对他们眼里的粉红（包括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马列左派）极端仇视，为了打击他们不喜欢的“粉红”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包括暴力殴打、人肉开盒网暴、刷屏举报等下作手段，我在推特上就见过不少自由派开盒网爆墙内的一些爱国群众。

由于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以及川普的上台，把西方所谓的发达文明砸了个粉碎，加之自由派极端反华反共，群众对他们已经是深恶痛绝，他们已经渐渐的失去了在中国的影响力，但是，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由于疫情也同时把中特虚伪的面具也一同撕了下来，各种社会乱象层出不穷，最近他们也有反扑的趋势，他们也在和粉红斗争中学聪明了，不再是天天复读民主自由无脑反共反华了，转而开始天天炒作中国的社会问题，借此来暗戳戳的否定社会主义，或者是借着女权、动物保护这类白左话题来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我们以后要引起注意的地方。

远航一号：

与自由派的思想斗争，是我们今后的一个长期任务。

首先，要了解自由派的阶级基础。自由派的阶级基础，一方面是那些与跨国资本、出口制造业资产阶级关系密切的小资产阶级（为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外企、港台企、私企工作的，有海外关系的）；他们的主张，实际上反映跨国资本、出口制造业资产阶级的利益。

另一方面是一些在资本主义竞争中不甚得意的中下层小资产阶级乃至一部分即将跌落到无产阶级地位的边缘化小资产阶级。他们幻想，只要资本主义中国可以成为西方的附庸，从而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劳动力市场与全球的小资产阶级劳动力市场打成一片，他们的命运就会发生奇迹般的变化。

这里说的小资产阶级指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资产阶级，通常指形式上是雇佣劳动但因为从事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至关

重要的技术、管理、意识形态等职能而享有一定物质特权的高技能劳动力，如中层经理、工程师、公务员、大学教授、医生、律师、体育明星、著名演员等；大致相当于以前人们说的“知识分子”以及现在一般生活中所说的“小资”，不包括小业主。

他们的精神寄托，是依靠“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实现（实际上排斥劳动群众的）“自由民主”，以改善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

他们的依靠对象，从来不是劳动群众，而是跨国资本和私人资本。因此，他们在社会上实际上充当着跨国资本和私人资本代言人的角色。在历史问题上，他们疯狂地诋毁中国革命。在现实问题上，他们的基本策略是“反官不反资”，将中国的一切经济和社会问题都推到“共产党”头上，将资本主义给人民带来的一切灾难都歪曲为是专制或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带来的。

所以，他们也喜欢讲房地产泡沫、经济危机，但他们的药方永远是全面私有化、对所谓“民营企业”放开不管以及对外国资本全面开放。

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自由派的这些谬论不仅在小资产阶级中流行，而且也必然影响到一批落后群众。

我们与自由派的斗争是长期的。归根结底，我们将战胜他们，劳动群众将普遍觉醒，因为资本主义客观矛盾的发展必然教育广大的人民群众。

当前，我们与自由派的斗争，可以抓住这样几个方面：

1 大力宣传美帝国主义日薄西山、世界人民反帝反殖斗争全面高涨，摧毁小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精神信仰

2 戳穿自由派“反官不反资”的各种谣言，用事实教育劳动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从劳动人民那里剥削去的剩余价值，永远是资本家拿大头、官僚拿小头，官僚是为资本家服务的

3 坚决反对国企私有化：要向劳动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宣传，目前条件下，国企工人乃至公务员的较好待遇，不仅对国企工人和公务员有利，也符合所有劳动群众的一般利益。要坚决批判落后群众的小农平均主义思想（将资本家剥削自己视作天经地义，却看不惯另外一些劳动群众比自己待遇好），以此来挫败资产阶级勾结自由派在工人阶级中制造分裂的阴谋。

4 对于广大的、一般的、既非落后也非先进的劳动群众，要以各种方式鼓励他们以躺平、怠工等方式为自己的实际和具体利益而斗争，不要去理睬自由派“打倒共产党”一类的不切实际的口号。我们的目的，是鼓励群众以一切切实可行的方式削弱资本主义，不要替资本家操心。具体来说：反对为资本家拼命劳动，反对为了个人致富而在劳动群众中拼命竞争和“内卷”，主张主动消费降级，拒绝支付高价彩礼，拒绝为了讨好小资产阶级女性而买房、买车，力争晚婚，力争不生或只生一个，与催婚催生的落后父母做坚决斗争，在劳动场所要大力推广摸鱼、怠工、混日子。有的人说，躺平仅仅是一种消极的反抗方式，触动不了资本主义。这种认识是错误的，群众性的躺平是中国资本主义最害怕的，是

可以致中国资本主义于死命的。一旦躺平成为群众性的、普遍的、不可动摇的社会行为，不仅可以拖垮中国资本主义，而且自由派的一切欺骗也都不再起作用。因为自由派的全部阴谋，就在于，画一张自由民主的大饼，然后欺骗劳动群众永远给资本家当牛做马。只要劳动群众不再给资本家当牛做马，自由派的大饼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就会被资本家与劳动群众一起抛弃。

5 借用台湾、香港等问题，通过启发劳动群众的朴素爱国感情，来进一步揭露自由派充当帝国主义奴仆的真面目。

2023 年 —— 世界力量对比转折的一年

作者：远航一号

2023 年，是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转折的一年。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世界进入了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时代以来，世界力量对比第一次发生了对美帝国主义和全世界反动力量不利、对世界人民和全球反帝反殖力量有利的决定性的变化。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的前二十年，是美帝国主义、国际资产阶级、全世界反动势力占优势的时期。在近半个世纪中，以美帝国主义为首、中国资产阶级为副的国际反动势力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发动了疯狂的进攻，摧毁了曾经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削弱了西方核心国家的工人阶级，在广大的亚非拉地区（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和半外围地区）制造了无数的经济危机和巨大的社会灾难，将数以亿计的人民推进饥寒交迫的深渊，又将侵略战火燃遍了从南斯拉夫到中东、从阿富汗到北非的广大地区，使数百万人死于非命、数千万人流离失所。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崛起，成为推动世界资本积累的一支主要力量。与世界上一些进步人士的主观愿望相反，中国资产阶级无意改变现有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中国资产阶级的财富建立在残酷

剥削亿万中国劳动人民的基础上。为了维护这样的财富，中国资产阶级需要美帝国主义及其在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的仆从所提供的海外市场，还需要美帝国主义的海军保护全球各大洋的航路。在共同剥削世界上广大的外围地区，从那里攫取廉价的能源和原材料方面，中国资产阶级与美帝国主义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美帝霸权的衰落，更由于广大亚非拉地区以及俄罗斯人民的斗争，依赖亚非拉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的中国资产阶级又不敢把宝完全押在日薄西山的美帝国主义身上，从而在国际上一贯地表现出瞻前顾后、首鼠两端、进退维谷的丑态。

真正打击并且正在摧毁美帝霸权的力量是广大亚非拉俄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伊拉克与阿富汗人民反美救国斗争的胜利、叙利亚人民捍卫独立自主国家的斗争的胜利初步挫败了美帝国主义鲸吞整个中东的狂妄计划。

但是，美帝国主义在侵略中东的计划失败以后，不仅没有放弃其统治整个欧亚大陆的野心，反而变本加厉、孤注一掷，妄图颠覆和肢解当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反帝堡垒——俄罗斯，以一举实现其通过控制欧亚大陆的中心进而永久统治世界的迷梦。

在苏联解体前夕，西方帝国主义的头面人物曾经信誓旦旦地向苏联人民的叛徒戈尔巴乔夫许诺，一旦苏联抛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北约的成员国将不会扩大，北约所部署的武装也决不向东移动一步。然而，仅仅在苏联解体八年之后，1999年，西方帝国主义就撕毁了自

己的承诺，将原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捷克、匈牙利、波兰接纳为北约成员国；2004年，除了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等国绑架上北约战车以外，又将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接纳为北约成员国。

2008年4月，在北约成员国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不顾俄罗斯政府的强烈警告，西方帝国主义的头目公开承诺，乌克兰与格鲁吉亚将“最终”成为北约成员国。同年8月，俄罗斯对格鲁吉亚亲帝政权进行了军事打击。

2014年2月，在美欧帝国主义情报机关的策划和指挥下，由乌克兰的寡头资本家以及亲帝国主义小资产阶级积极参与，并以法西斯暴徒为主力，发动了所谓的“广场革命”，推翻了以亚努科维奇为首的乌克兰合法政府，建立了纳粹傀儡政权。

二月政变发生后，俄罗斯政府依照克里米亚人民的意愿，收复了克里米亚。与此同时，哈尔科夫、卢甘斯克、顿涅茨克等地方的人民纷纷发动起义，建立了人民共和国。然而，当时的普京政府对于西方帝国主义仍然抱有一定的幻想，没有坚决地支持哈尔科夫、卢甘斯克、顿涅茨克等地方的人民起义，导致哈尔科夫人民共和国失败，顿巴斯地区的大片领土被基辅纳粹当局蹂躏。

普京政府相信德国资产阶级与法国资产阶级的所谓“保证”，于2014年、2015年先后两次与基辅当局签订了由德、法参与担保的明

斯克协议，要求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实现停火并给与顿巴斯地区人民高度自治的权利。然而，基辅当局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遵守协议，他们对顿巴斯地区进行了长达八年的炮击，成千上万的平民死于非命。

从 2014 年开始，北约向乌克兰派出大批军事顾问，按照所谓“北约标准”训练乌克兰军队，并为乌克兰军队提供情报支持。美国还在乌克兰境内设立了大批生化实验室，从事不可告人的秘密“研究”。到了 2021 年，基辅纳粹当局自以为已经准备就绪，在顿巴斯前线集结庞大兵力，妄图以大规模攻势一举消灭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

在这种形势下，俄罗斯于 2021 年底分别向美国和北约提出安全条约草案，要求乌克兰中立化，北约武器撤离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东欧各国，北约集团的武器部署恢复到 1997 年以前的状态，美国和俄罗斯不在各自的境外部署核武器等。美欧帝国主义傲慢地拒绝了俄罗斯的和平建议。

特别军事行动

2022 年 2 月 24 日，普京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俄罗斯开始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在战争初期，虽然普京已经提出了实现乌克兰“去军事化、去纳粹化”的目标，但并没有下定推翻基辅政权的决心，其主要目的是“以打促谈”，以较小的代价实现相对有限的政治目标。

到了三月底，俄、乌双方在伊斯坦布尔的谈判取得了突破，达成了和平协定草案。按照草案，乌克兰保证永久中立、不加入北约，乌军的人数和装备将受到严格限制，顿巴斯地区在乌克兰主权范围内实行高度自治，双方搁置关于克里米亚的争议。就在这个时候，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逊窜到基辅，传达了美欧帝国主义的旨意，要求基辅当局将战争进行下去，直至打败俄罗斯，并承诺将运用美欧帝国主义可以掌握的全部力量支援基辅当局。

在战争初期，从有限的军事和政治目标出发，俄罗斯方面仅仅投入了正规军约十五万人，加上顿巴斯地区的人民武装，俄军总兵力约二十万人。与之相比，基辅当局在战前的常备军即有约三十万人，再加上战争开始以后迅速动员预备役，乌军总兵力很快增加到六十万以上。

到了五月份，俄军已经解放了包括马里乌波尔在内的亚速海沿岸地区以及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绝大部分地区。这时，俄军兵力不足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

与此同时，西方帝国主义误以为抓住了彻底颠覆俄罗斯的千载难逢的良机。他们一方面以强盗式的行径“冻结”俄罗斯在海外的财产，

同时对俄罗斯实行各种所谓经济“制裁”，不允许俄罗斯使用西方的支付系统，妄图用这些办法来扼杀俄罗斯经济。另一方面，他们搜刮了在东欧各国可以找到的几乎所有的苏式装备，为基辅当局装备并训练了数万生力军，并动用北约的卫星、间谍飞机向基辅当局提供情报支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喘息以后，基辅当局在 2022 年的九月份和十月份将这些生力军分别投入哈尔科夫以东以及赫尔松方向，并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根据当时战场的实际情况，俄罗斯方面实行了全面收缩战线、保存有生力量的正确的战略方针。俄军在给乌军以重大打击以后主动放弃了哈尔科夫以东地区以及第聂伯河右岸赫尔松市周围的地区。一时间，西方帝国主义媒体及其在全世界的应声虫群魔乱舞、弹冠相庆。西方帝国主义与基辅当局从俄军的主动撤退中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俄罗斯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只要再加一把力，俄军的整个防线就会崩溃，乌军就可以打到克里米亚，普京政府就会垮台。

面对新的形势，以普京为首的俄罗斯领导集团逐渐认识到，西方帝国主义已经下定决心要致俄罗斯国家于死地；俄罗斯国家与人民除了与西方帝国主义彻底决裂并斗争到底直至胜利以外，再没有其它的选择！

2022 年 9 月 21 日，普京总统宣布，俄罗斯进行局部动员，征召三十万预备役入伍。同时，俄罗斯的军事工业进入了战时动员，坦克、装甲车、炮弹、导弹的产量成倍地增长。

2023 年的前五个月，俄军以瓦格纳志愿兵团为主力，在顿巴斯东线发动了局部攻势，先后夺取了索勒达尔、巴赫穆特（阿尔乔莫夫斯克）等战略要地，并给乌军造成重大伤亡。在同一时期，俄军加固并完善了在扎波罗热方向的防线。

战争开始以后，西方帝国主义长期去工业化的恶果开始显现，其军事工业已经无法承受长期、大规模常规战争的要求。尽管如此，美欧帝国主义仍然迷信所谓的北约武器、北约训练相对于俄军武器和训练有所谓的“优势”。美欧帝国主义动用了其现有的弹药库存，又从以色列、南朝鲜等仆从国搜刮了几十万发炮弹，拼凑了几百辆“西方”坦克以及上千辆装甲车，为基辅当局装备并训练了十几个旅的“精锐”部队，妄图在 2023 年的夏季用一次大规模攻势一举突破俄军防线、夺取克里米亚。

2023 年 6 月初，基辅当局的夏季攻势开始了；到了十月份，这一攻势已经彻底失败。基辅当局付出了重大伤亡，损失了十万以上的军队，丧失了几乎全部的西方援助的装备，在其发动进攻的整条战线上没有取得任何突破，仅仅占领了几个小村庄。

基辅当局夏季攻势的硝烟还没有散去，俄军的冬季攻势就开始了，俄军在长达一千公里的整条战线上分别在库皮扬斯克、红利曼、巴赫穆特（阿尔乔莫夫斯克）、阿夫杰耶夫卡、马林卡等多个方向上向乌军发动攻势。由于在失败的夏季攻势中丧失了几乎全部的战役预备队，乌军只能将现有防线上的部队拆东补西、疲于奔命，完全陷入被动挨

打的境地。目前，俄军已经解放了马林卡并包围了在阿夫杰耶夫卡的乌军“精锐”部队，完全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胜利属于俄罗斯！

如果说，在 2022 年秋季，人们对于这场战争的胜负还存有疑问的话，到了 2023 年底，甚至西方资产阶级主流媒体都不得不面对俄罗斯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现实了。

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是战争双方可以用于战争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运用这些战争资源的能力。

经过近两年的战争，基辅当局的战争潜力已经濒于枯竭。综合各方面消息，到目前为止，基辅当局在其统治区已经累计动员两百万以上，基辅当局所控制的武装力量（包括后勤、文职人员和地方保安部队）目前约为一百万。这意味着，战争进行到现在，乌军累计伤亡和逃亡总数已经超过一百万。

战争开始以后，基辅当局统治区的人口已经下降到约两千万，其中兵役年龄男性约五百万。也就是说，基辅当局已经累计动员了兵役年龄男性总数的约五分之二。在扣除从事后方生产以及维持基辅当局统治秩序所必需的人力以后，基辅当局的动员潜力已经所剩无几。大批最有战斗力、最狂热地信奉纳粹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分子已经被消灭。战争初期那支由有经验的老兵和中下级军官组成的乌克兰军队已

经不复存在。基辅当局不得不强征大批只经过几个星期“训练”、毫无作战经验的新兵，将他们投入战壕。近来，基辅当局更加丧心病狂，在其统治区狂抓滥捕，将妇女、老人、少年乃至残疾人都抓来填充炮灰。乌军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都在迅速下降，越来越多的乌军士兵在 frontline 向俄军投降。

另一方面，俄军越战越强。战争初期，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总兵力仅有约二十万人；现在，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总兵力已经发展到六十多万人。俄罗斯人民空前团结，青年踊跃参军；自 2023 年初以来，每天有一千多人志愿参加俄罗斯武装力量。

俄罗斯的军事工业迅速动员，坦克、装甲车、导弹、炮弹、无人机的产量大大增加。在主要武器和弹药的生产方面，俄罗斯的产量超过西方各国的产量之和几倍乃至十几倍。俄军装备精良、弹药充沛；乌军的重装备损失惨重，弹药严重短缺，不得不在前线对弹药的使用实行配给。

双方军事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俄军兵力的增加和武器装备方面优势的扩大，都决定了基辅当局的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面对基辅当局败局已定的前景，美欧帝国主义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美国国会迟迟没有通过对基辅当局的新的援助法案，导致美国政府掌握的可用于援助基辅当局的资金濒于枯竭。在即将来临的 2024 年度，基辅当局尚有高达数百亿美元的财政赤字无法弥补，经济总崩

溃的时刻正在一步步逼近。基辅当局内部狗咬狗的矛盾严重激化，伪总统泽连斯基威胁要解除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的职务，后者则通过其亲信威胁要对前者发动政变；有评论认为，基辅当局已经陷入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危险而动荡的局面。

目前，俄罗斯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达了要将战争进行到底直至彻底胜利的决心。俄军将不仅解放第聂伯河以东和黑海沿岸的广大地区，还将彻底摧毁基辅纳粹当局的武装力量，打垮基辅纳粹政权，将西方帝国主义在乌克兰的影响彻底铲除干净！

世界力量对比的根本转折

在俄罗斯国家与人民的胜利面前，西方帝国主义惊慌失措。12月21日，英国大资产阶级的喉舌《金融时报》发表文章，题为：“俄罗斯赢了怎么办？”文章作者认为，一旦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胜利，俄罗斯就可以对乌克兰强加“胜利者的裁决”，普京将控制世界小麦出口量的四分之一，俄罗斯的胜利将鼓励其他国家“侵略”自己的邻国（也就是会给世界上的其他反帝力量以巨大的鼓舞），北约将从此信誉扫地。

俄罗斯国家与人民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在俄罗斯胜利的鼓舞下，亚非拉各地区的人民掀起了反帝反殖斗争的高潮。尼日尔、马里、布基纳法索的进步政权紧密团结，将法帝国主义的势力从矿产丰富的西非内陆地区一举驱逐出去。 Hamas抵抗力量发动了反抗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伟大起义，一举打破了以色列军事

力量不可战胜的神话；也门胡塞武装切断了红海航线，掐住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命线。美帝国主义赖以维持世界统治的所谓的航母战斗群在波斯湾和地中海之间徘徊游弋，无所作为；美帝国主义海军正在失去维持全球各大洋航路基本安全的能力。

俄罗斯已经成为欧亚大陆上无可争议的最强大的军事力量。通过与伊朗、朝鲜等反帝力量团结在一起，以俄罗斯为首的反帝阵营在与以美帝为首的北约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对抗中，在军事力量对比方面占据了优势，并且这种优势还在不断扩大。

在颠覆俄罗斯、扶植基辅纳粹当局的侵略计划上押上了全部赌注的欧洲资产阶级跳得最“高”（与美帝国主义相比，欧洲帝国主义者更喜欢标榜自己是“文明”的代表、“理性”的象征）、摔得最惨。在失去了来自俄罗斯的廉价能源的供应以后，欧洲资本主义仅存的“高端”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欧洲资本主义将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内外矛盾的加深，北约——这个沾满了世界人民鲜血、恶贯满盈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正在走向土崩瓦解、呜呼哀哉。

在世界历史经历着翻天覆地转折的时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处于一个尴尬的旁观者的位置。就其本心和阶级本性来说，中国资产阶级是不愿意看到俄罗斯和其他反帝力量的胜利的。但是，怯于世界反帝力量的强大，中国资产阶级又不敢按照美帝国主义的旨意与俄罗斯为敌，也承担不起断绝与俄罗斯经济贸易往来的代价。

中国资本主义以往的“繁荣”，对内是靠残酷剥削中国的劳动人民，对外则是靠美帝国主义维持国际资本主义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安全”和“秩序”。现在，美帝国主义的大厦正在轰然倒塌，中国资本主义的海外市场也面临着萎缩。

接下来，俄罗斯与亚非拉地区的大多数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势必要逐步团结起来，要求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改变自然资源出口国长期以来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被剥削的局面。随着几百年来少数核心国家剥削外围和半外围的不平等交换秩序的瓦解，不仅西方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统治将不可避免地终结，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主要制造业出口基地、严重依赖来自海外的廉价能源和原材料的中国资本主义也将面临灭顶之灾。

在亚非拉俄广大地区人民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剥削斗争的有力配合下，在经过长期“躺平”斗争的积蓄和准备以后，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必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光辉的历史时刻，登上创造历史的伟大舞台。

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导致生育率降低的一些思考

作者：“红色人口研究员”

最近几天不是中国的人口数据出来了吗，我也就顺便回顾了一下我之前对人口学的研究。然后又有了一些新的思考。我就把想法发到下面，论坛网友们都可以提提意见。

<https://www.zhihu.com/answer/13661632>

这个回答说明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同一个社会内部，生育率和收入根本没有关系。但是宏观统计来说，越是富裕的国家，生育率往往越低。

说明生育率下降一定是其他的，和社会整体发展有关的因素导致的。

然后再重新思考农业社会的所谓的高生育率：

农业社会死亡率也是很高的。所以说即使不考虑避孕而形成高出生率，也会被高死亡率抵消。换言之人类根本不会意识到控制人口。人口增长其实是粮食增加、剥削减少等等的降低死亡率的产物。但也正因如此，当时的人们根本不会考虑到规划生育，因为根本没这个需求。

当然，农业社会不是说没有人口控制的机制。但是，这种机制主要依靠是结婚率。例如说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论里面，就提到当时的欧洲的年轻人往往需要“置业”，成为自耕农或者独立的手工业者，然后才会结婚。不过以农业社会的情况，仅仅是结婚率，就足以控制生育率了。古代因为贫穷而无法娶妻，可能是一个经常的现象。而富人多生育其实抵消了穷人结婚率低。在此之上，最多加上一定的人口贩卖以及弃婴。

原本的假说——在农业社会，必须要生更多孩子，男丁多，才能确保自己财产的安全——也许成立，但是也可能不成立。例如说对于黑非洲，其实就有安全考虑以外的因素：非洲其实是非常空旷而肥沃的大陆，可耕地根本没咋开垦，生育大量孩子然后直接开垦新土地，对父母来说负担其实很小，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没有控制人口的需要。

作为映证，有大量土地、以自耕农为主的 19 世纪美国的生育率能类比黑非洲。

<https://www.infoplease.com/us/family-statistics/us-households-size-1790-2006>

美国早期的家庭大小，考虑到死亡率，生育率就和今天的非洲差不多了：到了 1890 年，中位数都还是 5 个（父母加三个孩子），

到了近现代，才因为死亡率降低遇上了需要节育的问题。在成本侧，我们首先考虑教育的因素。一些人说什么教育是阶级上升的渠道，

其实不能理解为教育是无产阶级上升到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上升到小资产阶级。由于小资产阶级占比达到百分之 15，这个阶级上升的难度实际上是不大的。结果就是大批量的人口不得不思索怎么阶级上升，因此反而绝育，因为这种为了阶级上升的教育，本质上是人和人的竞争，因此成本是无止境的。之所以教育成本变得更高，是“阶级上升”的目标是不劳动的阶级。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用来辅助自己统治的，因此在数量上始终维持一个比例，例如百分之 15 到百分之 25。要成为小资产阶级，表面看是由于“接受了教育”，实际上是“接受了比别人更多的教育”，因此教育的成本和耗费的时间会恶性膨胀，往下小升初也要择校，往上考研的人越来越多。除了教育军备竞赛以外，还要考虑，教育的“生产”非常依赖教师，很难像工业那样自动化，是典型的“鲍莫尔成本病”的行业。总结来说就是，家长对教育的需求量，会不断增加，而且每单位教育的生产成本，还会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生产率的上升而不断上升；家长不仅要购买越来越多单位的教育，而且每单位还越来越贵。因此教育成本就成了生育成本提高的最大因素。作为典例，就是 19 世纪法国人口增长非常缓慢。今天东亚的儒家文化圈的内卷国家，也是例子：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生育率都是世界最低。（而朝鲜和日本，一个是“低福利养懒汉”，一个是“高福利养懒汉”，这个到后面再说）

除了教育成本以外，成本侧还有另外两个因素，也就是：1，重要生活质量的成本，例如住房，以及：2，抚育需要耗费的父母精力。城市化降低生育率可能主要在于，多一个儿童所需要的房间面积很昂

贵。巧的是，资本主义的房价也是一个“鲍莫尔成本病”的产品，房租支出永远相当于工资的约百分之20到三分之一。而农村可不会遇到空间不足的问题（因此即使是工业社会，农民的生育率一般也更高；尽管这也有农民是半无产阶级，不会考虑阶级上升的因素）。另外，工业的劳动是非常紧张的（这也是为什么资本家想要把生育成本外部化）。农业，至少是传统的农业社会，总是有农忙农闲，总有时间陪孩子。因此，抚养需要的精力，在工业化之后，同样变得稀缺而昂贵了。

然后，我们再从回报侧来考虑问题。早期工业时代和农业时代，其实儿童都能（由于童工和下地干活）很快开始形成回报。但是因为教育周期变长了，回报周期就变得很长。教育成本在上文已经有说明，这一段我更想强调教育的周期、耗费的时间。这些时间让生育的回报周期变长。如果我们把养育儿童视作一种投资，这意味着这个投资越来越变成长周期、容易被套牢、沉没成本极高的非常“垃圾”的投资，自然让“投资人”望而却步。

但是反过来，劳动力的再生产，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必须要不断的补充新的劳动力，否则社会就会在老龄化下不断萎缩，直到消亡。除此之外，即使我们从人均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更多的劳动力也在几个方面更加有利：公共品的生产，例如说国防；有利于创新。换言之，生育的正外部性实在是太大了。而经济学理论就会说明，正外部性的“产品”的产量，总是会低于整个社会需要的产量。

在这里，我们已经有个小的模型：

1，农业社会人口问题其实不大，控制手段很简单（主要依靠结婚率）但也足够了

2，工业社会有这些特点：劳动时间紧张因而精力短缺，住房空间短缺。阶级上升空间大。造成抚养所需的劳动力成本高，住房成本高，教育成本也高。收益属于社会，对于父母来说回报周期很低。总之，由于成本侧的精力、教育、和关键生活资料的价格的因素，加上收益测的回报周期太长、回报主要是全社会而不是抚养的父母，生育率直线下滑。

3，宏观的，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同步，因此发达国家生育率就低下。但是反过来，在一个社会内部，收入更高的生育率越高。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模型套到一些量化研究所发现的现象，我们就会发现很容易得出解释：

首先，我们需要解释宗教和女权，为什么有所谓的“女性解放降低生育率”的说法。没有女权，其实某种程度上说，等于强制让一部分人退出劳动力市场来专门育儿。宗教本质则是反女权。因此就解决了三个成本问题的一个：精力成本。再加上女权不行的地方往往相对落后，不能参与阶级上升游戏的地区，所以说连教育成本也低了，最后这些地方往往是农村因此也没有房价问题。俄罗斯和一些穆斯林国

家，有可能就是靠这样让生育率回升的。这在政策上的推论是比较可怕的：因为宗教和女权的本质是强制一部分人退出劳动力市场提供育儿的精力，划出一块低价的土地，再禁止一部分人阶级上升。当局理论上，可能比如说改革教育体制，让职高生回农村生娃，生完了，孩子养到三岁可以勉强自理了，再去打工。这就赢麻了属于是。

再来思考埃及这个例子。埃及也可以用上述的模型解释：首先，宗教+失业，两个 buff 一起来满足生育对父母精力的需求。埃及也没有阶级上升（新自由主义改革形成大量的半无产阶级），然后也有低福利养懒汉（指大饼），结果教育成本也没了。最后就差住房了，但是住房的效果可能是很有弹性的。考虑到在原始工业化（封建时代末期，商品经济大幅度扩展，农民开始利用农闲来生产并出售手工业品，而且逐渐农民的所有剩余时间都被占用，也被称作“勤劳革命”；人口学上，这时候往往人口迅速增长，土地逐渐短缺）的时候“人们可能为了补偿不吃肉，决定买一大箱内裤”，用生很多孩子补偿住房短缺，说不定也是可能的。最后，埃及的生育率其实不高，只有 3，其实就是人们的意愿生育率：一儿一女然后再多一个。只是相比于其他国家还不到 2 的生育率就很高了，所以看起来就“人口爆炸”。和埃及类似的，可以解释为什么朝鲜在东亚的生育率相对更高。朝鲜没有宗教和失业的因素，也没有女性不工作的因素，但住房成本和教育成本都很低，朝鲜本质上也可以算是“低福利养懒汉”。

当今的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接近 2 但是低一点，最主要的特点是他们都是殖民主义的，而本国内部也有阶级斗争形成的再分配。这可以称作“高福利养懒汉”模式，和上一段对应，典型就是欧美。东亚的日本也因此生育率相对陆韩台新更高。这些国家的特点是，中产阶级地位比较稳固（阶级上升的压力不大），劳工阶级生活水平也比较高（因此有精力）。所以他们是没教育成本和抚养成本这个因素的。因此就有了接近自然的生育率，即略小于 2（大部分家庭想生两个一儿一女。但即使是发达国家也必然有少数不如愿的）。有的伪发达国家，由于内部阶级斗争的发展，没有形成再分配的格局，因此生育率仍然不足，典型即新加坡和韩国。这两个国家的阶级上升的军备竞赛都很严重。

除了上述的各个机制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即结婚率。最开始我提到，在农业社会其实就有一个控制人口的机制了，就是结婚率。毕竟一般来说是必须要先结婚再生育的。但是人类社会自有阶级以来，女性实际上都依附于有产阶级。换言之很多穷人根本不可能结婚，而女性可以靠姿色阶级上升。这可能才是房价影响生育率的实质，房地产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金融资产（房产本质上是地产，而土地由于是任何生产生活所必须，地租就由此变成了变相的税收，这也是为什么前面提到，房租总是工资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因为税收就是和收入成比例的。拥有一个房子，某种意义上就是拥有一块土地，因此可以避税甚至收别人的税，好比中世纪的自耕农），而男性必须

要有这种资产，证明自己是中产阶级，才能结婚，就好像马尔萨斯的时代必须是独立的手工业者和自耕农才能结婚一样。

结婚率的一个因素可能是女权。换句话说，原本的由于男性女性的劳动能力的差距，女性“往上结婚”是正常现象。但是由于工业化，女性的经济地位提升，但是女性还是可以靠结婚来阶级上升。这样，结婚门槛相对于农业社会就提高了不少。然后，再考虑一下“女拳”的组织。女拳和女权的不同在于，女拳的核心是借助垄断和话语权，抬高女性在婚恋市场的价格，而不是解放女性，所以说她们总是“子宫警告”啥的。中国虽然生育率已经在不断降低了，但是最近几年，结婚率又有了突然的，更加明显的下降，女拳和房价上涨（两者都抬高了结婚的门槛）应该是直接因素。

总结一下，逻辑环大概有以下几点：

1，工业化（造成从封建等级到资本主义的阶级）——阶级上升——教育军备竞赛——只以劳动力价格为限制的教育成本——生育成本高

2，工业化——阶级上升——教育时间过长——下一代回报速度，相比于童工和农业劳动力，太长——生育回报少回报慢——生育率低

3，工业化（减少了男女劳动能力的差别）——女权——女性工作——育儿需要的精力变得更加稀缺——生育成本高

4, 工业化——女权——女性能工作但是还能靠性价值阶级上升——（以房价等金融产品、资产证券的高价格和稀缺性为中介）——结婚率低——传统农业社会的限制人口增加的机制被进一步加强。

5, 工业化（需要理性）——反对宗教——女性不再相夫教子——精力成本变高——生育率低

6, 工业化（相比于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的差别）——工作时间延长、工作需要的精力增大——（以职场排斥孕妇、以劳动时间长为中介）——精力成本增加——生育率低

所有逻辑环的第一步都是工业化、经济增长，从而形成了越发展越绝育的历史现象。

所以说对于社会主义来说，要维持劳动力再生产，不能仅仅靠所谓的“补贴”，必须考虑这些要素：

1, 怎么样提高结婚率？（这是考虑到，单亲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出心理问题）

2, 怎么样限制教育军备竞赛？

3, 怎么样确保劳动者有足够的精力？

然后才考虑所谓的生育补贴。不解决上述三个问题，生育补贴就是泥牛入海，无穷无尽，不见尽头。

我对上面的问题有一些并不成熟的思考，当然也希望大家都能提点建议

对于问题 1，之前论坛也讨论过以此结婚和专偶制的问题。

<http://www.redchinac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477&extra=&page=14>

里面提到了：

“在第二阶段，革命民主政权的主要策略应当是“封闭性市场”。即关闭跨国和跨地区性市场，引导人口向小城市和农村流动，限制小资产阶级女性的“向上”婚姻选择。同时使用专政手段打垮国内外资产阶级有意扶植的“女拳/女德”组织，阻止它们向（仍然存在）的性市场释放扭曲信号。”

换句话说，通过逐渐削弱婚姻和财产的联系（甚至到这一步都不算婚姻了），将实际上的结婚率/独身率降低

对于问题 2，它的实质是限制小资产阶级的收入，同时又普及高等教育，从而消灭“阶级上升”。对于一个半外围国家来说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实际上又和脑体劳动分工纠结在一起。没有消灭阶级上升，这也是为什么苏联的生育率仍然很低。

最后，第三个问题反而最好解决，因为降低劳动时间、增加休闲就是社会主义带来的直接的好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社会化抚养（就目前的具体情况来说，其实主要是增加幼儿园和托儿所），也可以降低父母在儿童身上花费的精力。此外还可以在基础教育阶段让学校提供一日三餐和服装（校服），甚至国家给儿童发零用钱，进一步降低家长需要耗费的货币支出。

从资产阶级御用“经济学家”的不学无术看新一轮新自由主义“改革”阴谋

作者：“红色人口研究员”

刚刚从微博上看到了两篇文章¹⁴，作者是殷剑峰，他背后的资本集团似乎在鼓吹新自由主义改革。两篇文章都有严重的逻辑硬伤，下面进行一一分析

首先，殷剑峰在第二篇文章里面，鼓吹“中国消费不足，不是因为劳动力报酬不足，而是因为政府占据了大量的开支”。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

殷剑峰逼真认为，中国的劳动报酬占 GDP 的比重，竟然高达百分之 57.4，然而，根据红色中国网的计算，中国的劳动报酬的实际占比只有百分之 45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50462>)。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工人阶级的报酬也就在百分之 40 到百分之 60 之间移动；一个国家的所有居民在房租上面的支出，可能也就百分之 15。殷剑峰这样的错误的估算，差不多可以等价于这两个命题：1，中国不是工人阶级剥削最深重的国家，反而是被剥削最轻的；2，中国工人不需要付高昂的房租，事实上房租是免费的。

¹⁴ [殷剑峰 | 财政的“钱”去哪了? - 议报](#)

另一方面，殷剑峰还错误估计了基尼系数。在他的表格里面，中国的基尼系数居然只有 0.38。这同样是一个非常离谱的数字。中国的不平等程度是略高于美国的，大概是 0.45。结果，中国又从一个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变成一个不平等程度正常、不高也不低的国家了。

另一个严重的错误是，美国的政府收入，居然在殷剑峰的表格里面，只有 GDP 的百分之 9！！这又是完全不讲数据。按照红色中国网的统计，美国的各项税收和非税收入的占比是 GDP 的百分之 29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50826>)

由于殷剑峰对劳动力占比报酬的估计完全错误，对基尼系数的估计也完全错误，所以说他的论点，也就是“内需不足不是由于劳动报酬低，资本收入高”，也就被证伪了。

然而他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严重的事实错误，还继续写了第一篇文章《财政的钱都去哪里了》，而且犯了更多的错误。

在文章最开始，殷剑峰把土地财政的收入也算作政府收入，就算是这样，政府的收入也只有 GDP 的百分之 25。然而土地财政和税收不一样，和社保也同样不一样。不管是社保还是税收，都是长期，而且往往是必须要缴纳的。可是政府能不能把土地卖出去，开发商能不能把房子卖出去，是不确定的。因此政府为了卖房，就必须要修建基础设施，就必须要招商引资，这样未来的房价才会涨，这样才会有人来买房子。因此，实际上土地财政是不能简单的视作政府财政收入的——这笔钱实际上是不能用在社会保障服务或者教育这类开支上的（当然，短期是可行的，代价就是政府的债务爆炸）。也因为如此，

“中国政府在政府投资上开支过大”，也就被证伪了。

另一方面，殷剑峰又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数据，发现中国的公共部门雇员的开支占财政开支比重超过百分之 34，而发达国家都只有百分之 10。我简直不知道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据说这是世界银行的数据，但是这个数据是不符合逻辑的。假设发达国家真的只有百分之 10 的开支，这就意味着发达国家的公务员、教师、医生等等的开支占 GDP 的比重是百分之 3，但是根据这篇引用量 100+ 的文章，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 ... onal/multi-page.pdf](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onal/multi-page.pdf)

“The heaviest fiscal weigh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age bill i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9.8% of GDP),”

“Worldwide, civilian government employment accounts on average for about 11% of total employment, with MENA countries highest at 17.5 %, OECD at 17.2%, ECA and LAC at 16.0% and 8.9%”

可以看出，OECD 国家的公务员占就业人口的超过百分之 10，而仅仅是中央政府的工资开支，就超过 GDP 的百分之 5。算上地方政府更多，远远高于殷剑峰或者世界银行数据的百分之 3。而中国的公务员、教师、医生的工资开支占比是百分之 10GDP，反而是比较正常的。

总结来说，殷剑峰的数据错误，逻辑上无法互相映证。但是，这篇文章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学术垃圾，而是资产阶级当局试图进行反攻倒算，试图对工人阶级发起新自由主义式的进攻的证据

殷剑峰的两篇文章，从政策来说，实际上是在这样暗示：

1, 分配问题不是经济问题的主要因素，政府收入太多了才是问题，政府必须给资本减税

2, 问题的主要因素，在于给公务员发的总工资太多，因此要紧缩编制；但是，实际上地区的县城本质上是“公务员经济”，不是公务员服务于当地居民，而是公务员的开支给了当地居民收入。如果公务员经济解体，下一步就是当地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口，并且向沿海和省会大城市集中，形成更多的产业后备军。

3, 财政的另一个要素是政府的投资太多，因此还要减少政府投资，要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而这样的后果就是就业率降低。

尽管他并没有挑明这一点，而是间接的说“需要改革财政体制框架”，但是只要搞什么“改革财政体制框架”，结果就必然是上面这三点。

我个人认为，这很有可能是资产阶级当局准备对工人进行进攻的一个信号。

当然，危机是危中有机。如果政府真的采用了如此的政策，拿自己的财政资源给资本家续命，那么也许“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就有了存在的可能

<https://yibaochina.com/?p=249136>

什么样的制度最有利于科技进步？

作者：“红色人口研究员”

这篇文章¹⁵关于技术发展的逻辑是完全错误的。

什么是技术？如果我们不说玄之又玄的基础科学，而仅仅谈对经济影响很重大的科研项目，那么技术就是一种新的生产配方。有一些技术范围比较大，比如说用电动车代替油车来满足出行需求，或者说用高铁来代替飞机；有的是中间的，比如说消费品每年都进行更新，加了些新功能，但是没有被彻底替代；最后是小范围的改良，比如说增加了某个设备的效率，减少了用电量。总而言之，技术的特点就是一个新生产配方，可以直接写成一个投入产出函数或者一个向量。假设 L 代表劳动时间，K 代表某种设备，C 代表某种消费品，那么技术进步就可以表达为：“从 $2K+L \Rightarrow 2C$ ” 到 “ $4K+L \Rightarrow 6C$ ”。这里的特点是：生产配方的投入是可测量的，产出是可测量的。但是你在投入一项新科研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能不能得到新的配方。这就是科研和生产相比最大的区别：生产是一个已经知晓的配方，投入产出很明显，算价格算利润就行了。而科研是寻找一个新的配方，你能很简单的知道新配方是不是成功的，但是你不能确定要有多少次失败、付出多少次成本才能获得新配方。这一段其实就是要表明这样的事实：对经济有价值的科研活动，是成本不确定、方向不确定（尽管不是完全不确定），但是产出很容易测量的。

¹⁵ <https://zhuanlan.zhihu.com/p/603860157>

所以说，对于任何科研活动来说，怎么样才是有效的科研活动呢？其实就是穷举。各个方向都试一下，每一个方向都拿到数据。科研活动就好比盲人在打靶，只要盲人往每个方向都开一枪，总有一个子弹会打到靶子。当然，科学的理论能指导技术的研究，就好像盲人能靠听觉帮助感知一样，但是耳朵毕竟不是眼睛。科研也有很大的规模经济：因为信息是可以流动的，所以说大的团队，每个人只负责干一小块，就可以很快的得出技术。但是如果是很多个小团队，那就得不断地重复发明轮子。

对应到制度上，什么样的制度是最适合科研的呢？答案当然不是这个人毫无逻辑的，把“自由度”和“创新”联合起来。最适合科研的制度是一个公共机关掌握科研，然后各个方向都穷举，最后找到答案之后开始投入商业化生产。资本主义国家尽管是私有制的，但是自从进入 20 世纪以来，所有国家都至少模拟了这种办法，也就是说国家投入科研，但是技术对本国企业公开。例如说，旧日本帝国的理工学界就和财阀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最直接的例子自然是互联网，互联网本身就是一个美国国防部的项目，然后美国的资本家直接无偿使用了研究结果；中国目前的太阳能产业竞争力极强，但是它之所以能够盈利，也在于大约 05 年的时候，政府组织学界攻克了几个技术难关，打破了欧洲对光伏关键技术的垄断。

（顺带一提，根据 red ant 网站的看法，技术如此的依赖于国家的支

援，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始终无法离开本国彻底全球化的原因

[https://red-ant.org/2018/08/01/1 ... n-the-21st-century/](https://red-ant.org/2018/08/01/1...n-the-21st-century/) :

“洛里默指出：“过去 50 年的所有重大技术创新最初都是由帝国主义国家军事部门的研究人员为发动战争或准备发动战争而创造和发展的……这是政府在技术上的巨额赤字支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战争物资、军备的改进几乎创造了 20 世纪下半叶的所有技术创新。” [8] 营销这些技术（如微波、互联网、雷达）由跨国公司瓜分，而其发展的责任和成本则由国家承担。

国家对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的补贴是通过大学等国家机构推广的。这种密切的国家与私人资本关系解释了为什么跨国公司并不像人们曾经相信的那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自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高科技生产越来越集中在富裕国家——尽管有误导性的炒作。”

当然，穷举是很耗钱的。如今的”自由阵营“，能靠专利和技术垄断拿到全世界一半的 GDP，再加上历史上就有技术积累，自然看起来技术先进。但是这和”自由“一点关系没有。作者认为必须要自由制度才能发展技术，很明显是把相关性认为是因果性了。顺便一提，分不清相关性和因果性，是目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最大特点。其中最严重的部分，例如说经济学和政治学，甚至故意不去区分。

上面提到的是一个国家怎么提出技术。然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不是主流，这些技术怎么被应用到现实中，也是很重要的。这里最重要的条件，在于应用技术要比不应用技术获得更多的利润

（这里假设这种技术不是错误的、无效的技术，而是对社会整体来说

也是一个改进的技术)。在现实中这个条件并不是经常满足的。假如火灾部门(FIRE, 指金融, 保险, 房地产)能获得巨大的利润, 那资本自然不会去在实际生产应用新技术, 甚至连实际生产都不要了; 要是靠算法和流量就能赚钱, 芯片就没有人去研究了; 要是建筑业像今天的中国那样, 要点在于尽快的大规模的去借钱加速资本流转、外包来逃避劳动力和资金成本, 那着重于改进建筑质量、改善采光等技术的建筑商就会破产了; 要是能靠不能留种的种子来迫使农民依附, 孟山都自然就不需要开发效能更高的转基因种子了。更不用说例如说医药业这种高度信息不对称的行业。因此要应用新技术, 就必须要靠有效的国家监管, 确保那些不应用新技术而是靠信息不对称、靠流量与地段收租也能赚大钱的资本破产, 就必须要强化政府干涉, 就必须强迫民营企业接受政府的”随意管理“。

总而言之, 这篇文章作者的想法, 实际上和发展技术背道而驰。

评“关于当前国内形势的几点研判”——兼论消费不足学说的误导

作者：“红色人口研究员”

文章的全称是：批判所谓的”关于当前国内形势的几点研判“，以及论消费不足理论的严重误导。

刚刚看了看”关于当前国内形势的几点研判¹⁶“，我感觉这篇文章实在是缺乏逻辑，充斥混乱，与其说是分析不如说是发泄焦虑情绪，因此写这篇文章来进行说明

这篇文章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它完全是建立在所谓的消费不足理论之上的。这篇文章一会儿在说”出口导向“，一会儿在说”大基建“，不外乎逻辑是说，由于资本主义总是会生产过剩，所以说必须要有一个外部需求，不管是政府印的钱还是出口。然而我在这个帖子下面已经说明了，不存在消费不足，也不存在生产过剩，只有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并且在凯恩斯之后，周期性经济危机就退化为危害小得多的经济周期。

<http://redchinac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114&extra=&page=1>

这里就再次大致提一下消费不足理论的问题：工人的消费是需求，但是资本家的投资也是需求。正常情况下，也就是资本主义处于周期的”复苏“阶段的时候，投资和消费加起来等于总的生产。但是由于

¹⁶ [关于当前国内形势的几点研判-红色中国网](#)

各种因素，资本家的投资会变动。在正常情况下，资本家会为了抢夺市场拼命投资，总需求就超过总供给，造成资金短缺或者劳动力短缺，形成经济过热。这种短缺增加了资本家的成本，影响资本家的利润，然后资本家又怕自己跑得慢，一下子撤资，经济就进入了危机/崩溃阶段。凯恩斯主义的实质在于过热的时候减少政府支出，崩溃的时候增加政府支出，从而让总需求的波动稳定，这样经济周期就仅仅是周期而不是危机了。

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工资受到失业率的调节，失业率过高工资会停滞，但是会增加剩余价值率，加速资本积累，反之亦然。因此工资始终等于生产率的一个比例。因此资本家大量投资，让生产力加倍的同时，工人的总工资（尽管可能不是人均工资）同样也会加倍。消费和生产是同时增长的，不会出现所谓的“仅仅为生产而生产，用机器制造机器”的情况。

事实上，生产过剩仅仅存在于经济周期的崩溃阶段。而且这种生产过剩，恰好是前一个阶段也就是经济高潮/泡沫时期需求过剩、生产不足的结果。从长期来说，总需求会匹配总供给。

回到要分析的文章。这篇文章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完全是站在需求侧的。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大约 30 年的平均百分之 10 的增长。因此不分析供给侧，不分析怎么生产，不分析生产的进步是怎么发生的，反而分析需求侧，完全是找错了重点。此外，除了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作者堆砌了太多的官方套话，很多地方缺乏逻辑。

文章一开始提到“出口导向经济”，并“推动工业化进程”。但是究竟是怎么推动的呢？按本文作者的想法，是外贸提供了大量的需求。但是，如上文所述，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能从需求侧着手。供给侧呢？好吧，作者确实提了一下，“为什么中国有能力给世界市场提供供给”，结果是劳动力非常廉价。但是，我们分析的不是经济的增长吗？劳动力廉价，所以说出口企业会获得更多利润，然后呢？增长在哪里呢？生产的进步又在哪里呢？

如果我来分析出口的部分，我会从供给侧、生产的方面来分析。首先，中国刚刚改开的国情，就是大量的小农和少数在现代部门的工人。小农我们完全可以视为仅仅是活着，没有任何实际产出。而之所以只有少数人在现代工业，就是因为生产资料太少，工厂太少，机器太少，总之就是资本太少。因此，要增长经济，要增加生产率，就必须解决这个瓶颈，也就是资本不够。换言之必须要大力投资。当然，除了资本不够以外，使用更先进的机器、更先进的劳动方式，也能直接的增加生产率。总而言之，中国的经济增长从供给的角度来分析，就取决于两个要素：1，是不是能增加投资，来雇佣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2，有没有引进/研发/采用更先进的技术，从而直接增加生产率。

外贸的作用，就在于1，出口行业实现了规模经济，直接增加了生产率；2，外贸引进了外国技术，直接增加了生产率；3，外资涌入能让外国的生产资料进入中国。但是，外贸同样也有很多的害处：1，外国相对于中国处于垄断地位，因此例如芯片、机床等的进口让中国

让渡了大量的劳动给外国；2，外资如果控股了中国的企业，这些企业往往就不会进一步开发技术，典型的就是合资车；3，由于顺差，中国积累了大量的绿纸，这些绿纸并没有变成生产性投资，却浪费了一部分国家的产出。总的来说，外贸对供给侧的影响有好有坏。我之前曾对此做了一个线性回归，判断贸易额和 GDP 增长率是否存在线性关系，结果是没有。大概可以认为，供给侧的角度，外贸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抵消了。由此我们就应该得出两个可能的结论：可能1，外贸对中国的意义有限，因此应该无视掉；可能2，外贸里面平等交换的部分就是对中国有利的一面，而不平等交换、新殖民主义剥削就是不利的一面；目前两面抵消了，但是我们仍然应该改变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抵抗新殖民主义剥削，让贸易的正面的一面发挥出来。

第二部分，提到土地财政。作者前面大致说了下模式，“地方政府通过住房....形成制度垄断租金...居民的储蓄被最大限度地转化为政府所获得的土地出让金...以极低的价格出让工业用地.....刺激投资率...刺激了企业的创新活动和生产性投资”，并指出地方政府之所以会致力于经济增长，是因为政绩锦标赛。但是，我在前两段已经提到，中国的增长从供给侧看，取决于技术进步和投资。这样看来，土地财政难道不是一个好东西吗？不是能尽可能的增加生产性资本积累，尽可能的调动储蓄，从而加速经济增长吗？但是，作者反对我的观点，而是认为，这会造成”脱实向虚“，也就是买房的投资超过了对机器的投资；第二个是地方债问题，但是注意原因是”随着城市化放缓，地区房价没有预期上涨“；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是影响人

口出生率。简而言之，作者认为土地财政是这三个问题的原因。

事实上，这三个问题都不是土地财政所导致的。这三个问题的原因不是土地财政，而是房价过高，但是土地财政并不导致房价过高，经济周期的高涨/泡沫阶段才是原因。土地财政的本质是一种绝对地租，因此作为实际土地所有者的政府、开发商、房叔房姐就可以拿到地租，地租的总额则大概相当于当地 GDP 百分之 10。因此，房子并不是一种生活资料，正相反，是一个资产，房价就是” xx 市基础设施建设平台有限公司 “的股票价格。这能和居住情况的数据相互映照：中国的农民工有百分之 61 不是是租房住的（所以说，表面看，中国的”自住率 “很高，实际上不过是在自己从不回去的农村修小别墅、在城里打工的时候租房）。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4/t20190429_1662268.](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4/t20190429_1662268.html)

html。股票在高涨时期的特点，就是其价格会有泡沫，股价和盈利相比过高。中国目前的相对于经济水平的过高的房价，同样也是高涨的产物（还可以补充说，作者提到的所谓的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是一切行业在高涨时候的现象，只是主体可能是私企资本家而不是地方政府）。要应对高涨， 就必须首先采用紧缩性政策把经济提前打入崩溃阶段，不然泡沫尾大不掉，然后再立刻改成扩张性政策减轻崩溃带来的痛苦。而这正是中国从 2021 年末到如今的经济政策：首先 2021 年用金融管制逼迫一系列房企陷入破产，到了 2023 年却反过来完全放开。在这之后，经济进入复苏周期，房价逐渐回归正常值，自然这三个问题都不存在了。

这并不是说我支持土地财政，下面我将从供给侧来分析，土地财政为什么曾经是一个有效的制度，但是现在不合适了。在上面我说过，中国的经济增长本质上取决于技术进步，以及靠大规模投资来调动农村的劳动力。但是现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基本耗尽了，投资的意义已经不大了，所以说必须重视技术。但是，地方政府的政绩是短期的，而且是货币化的，所以说地方政府就必然首先支持各种短期的，能迅速形成盈利的行业。而至关重要的技术进步，芯片也好，汽车也好，都需要长期的，持久的投入，而且长期不见利润——这要么是因为技术迭代周期太长（例如说大飞机），要么是虽然迭代周期很短，但是外国领先太多代（芯片）。因此，就必须要有个不那么注重短期利润的部门来负责技术进步。就是说，至少要搞国家资本主义，如果不是社会主义的话。例子之一是，中国的电力行业是国有的且垄断的，因此开发、引进了先进的轮机技术和高压输电技术，目前中国在这两个技术上面是绝对的领先地位。当然，国家资本主义的上限很高，下限也很低，中国石油部门的出油率（原油和产出的汽油、石脑油、重油等）大概是百分之 60 多一点，远低于发达国家。这说明需要清除腐败、以及强迫它们搞技术进步而不是垄断。

说完土地财政，作者下一个论点是，由于所谓的”非合作性劳资关系“（但是，问题来了，阶级斗争还能是”合作性“的？），造成一系列问题。首先是因为 08 年之后外需下降，继续压低工资会造成

内需下降（但是，非合作性劳资关系为什么就等同于工资下降？为什么不是工人索要更多工资，让工资增加？）；然后是所谓的”低工资-消费不足-出口依赖-低工资“困境（但是我上面已经提到了，消费不足是伪命题。资本家的投资也是需求）。

这些需求侧分析的荒谬性，我上面论述了不少字，就不再复述了。但是下一段的供给侧分析，就让人绷不住了，”依靠引进和模仿国外技术和压低工资份额来吸引外资和打开国外市场，这种路径依赖导致了低质量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也造成核心技术和产业创新能力的缺乏“。为什么就会导致创新能力匮乏？所谓创新能力，不外乎有钱，有人，然后做实验。中国”缺乏创新能力“，不外乎就是1，中国绝对的没钱；2，中国的企业界不愿意花钱。上两段我提到了，中国的地方政府不愿意投入技术进步，是因为回报周期太长。这里的企业也是一样的。但是这和工资份额有什么关系？工资份额增加，企业就更愿意投资长回报的技术？

另外，引进技术是创新的前提。所有的技术都得建立在巨人的肩膀上，自己重新发明一遍轮子可不是创新。真要说引进技术的问题，可能在于1，合资企业有外国股份，靠外国技术躺平，并且往外企送钱；2，一些国有企业一直在引进、引进、再引进，而没有真正自研，这就是管理的问题。总之，是管理问题和所有制的问题，而不是引进技术本身。

三个论点，即出口导向，土地财政，还有工资挤压都说完了之后，作者回顾了中国几次经济周期，然后指出”内需很重要“，要”改善

分配“。这里的每一个论点都是错误的。1980年代后期的经济危机，是通货膨胀、供给不足为特点的，根本不是需求不足。这实际上符合我在最上面的帖子（[http://redchina.cn/forum.php? ... p;extra=&page=1](http://redchina.cn/forum.php?...p;extra=&page=1)）里面提到的第二种经济危机（第一种是劳动力短缺型经济危机，第二种是资金短缺型经济危机）。但是按照消费不足的理论，很明显是没法解释为什么需求不足居然还能通货膨胀。

1993-2011年作者分成了两个周期，然后认为这是”内需不足因此要出口导向“，我上面在”如果我来分析出口的部分“也早就批判了。最后一个，2012年到现在的”长期萧条“期，我对土地财政的分析，已经指出这个所谓的长期萧条，实际上是”土地股市“进入高涨和泡沫阶段，因此需要连续的、紧挨的一个紧缩性政策+一个扩张性政策。

总结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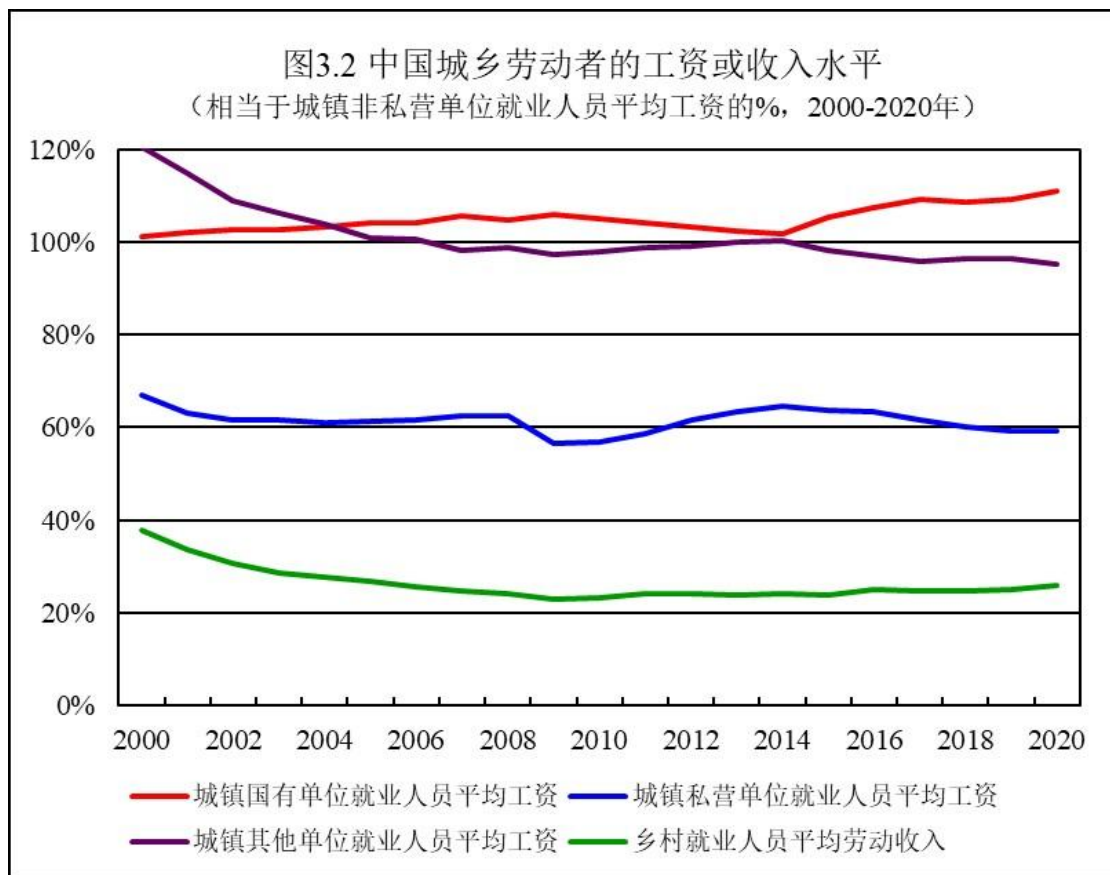
目前的整个社会，但是也包括左翼，是笼罩在一股奇怪的消费不足的谬论之下的。但是这个理论实际上是错误的。消费不足并不是一个有效的理论，实际上真正的机制，是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形成的经济周期。这种经济周期在没有政府宏观调控的时候，就会转变为经济危机。因此，需求侧的分析，仅仅在分析政府需要实行何种刺激政策，来稳定经济周期的时候，才有意义。而对于长期的经济增长，就必须分析生产的过程，分析供给；在二元劳动力的情况下，只管增加投资，而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耗尽之后要建立有利于技术发展的制度（此外，也许还有鼓励人口增长的制度）。目前，大量的资金、资源

掌握在资本家的手里，但是有利于技术发展的制度要求集中资金、为了长远目的来投资技术；而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大概需要 GDP 百分之 14 的资金来提供儿童的食宿、延长教育时间等。这就意味着，目前的经济问题，并不是”消费太少“的需求侧问题（我在文章前半部分也已经证明，如果仅仅是需求侧，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组合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而是资本家已经成为阻碍生产力的纯粹蛀虫的问题，而是私有制不能有效的利用剩余资金的问题。要改善经济，需要的不是作者的所谓”劳资协作“的方案，而是要实行公有制，把资本家的利润投入到合理的方向去。

为什么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离不开小农经济？

作者：西红柿收割机

辛卯论网友问：不管是短期来看还是长期来看，当下的小农经济都不利于资本进一步发展吧？



西红柿收割机：

先说结论：由于经济发展对于农村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压倒性的城乡差距、缺乏保障的小农经济使得农村劳动者更倾向于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就业，而不是留在农村搞合作社。但小农经济的不可持续性会破坏经济发

展，所以在未来，农村的社会主义大农业必将蓬勃发展。

1. 经济发展需要小农经济

在我前几天关于要不要引进外劳的回答里，我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担任着产业后备军的角色：

就目前来看，充当中国劳动力队伍中的产业后备军角色的主要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农民工”，题目中说的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最直接原因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正以每年 1000 万左右的速度下降，如果今后的二十年内不采取任何坚决有力的手段把资本家给图了，那么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最晚将于 2050 年前全部耗尽、彻底枯竭。

在上世纪农村人民公社解体后，原有的农村公社保障体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农业部门无法为农村劳动者提供更多的保障，无法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劳动收入。当城乡间劳动力流动的门槛逐渐被破除后，劳动供求规律的开始发挥它的作用。

在过去一段历史时期，城市的市场经济部门在依靠着亿万廉价劳动力的“红利”而高速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也同样的提高了城镇劳动者的名义工资，城乡差距的急剧扩大使得农村日渐凋零，农村劳动者不再热衷于从事单干式的农业生产，而是开始大规模的进城打工。

这一张图可以很好的说明，进入 21 世纪以来，农村劳动者的可支

配收入长期处于低位，仅相当于城镇劳动者平均工资的16%左右。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小农与其在农村种地，风吹日晒也赚不到多少钱，还不如进城打工。

农村劳动者在进城后可以接受相对低下的工资，因为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实在是太低了，再加上他们是接受了相当部分义务教育的，这就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批数量庞大、工资相当低下的熟练劳动力队伍。

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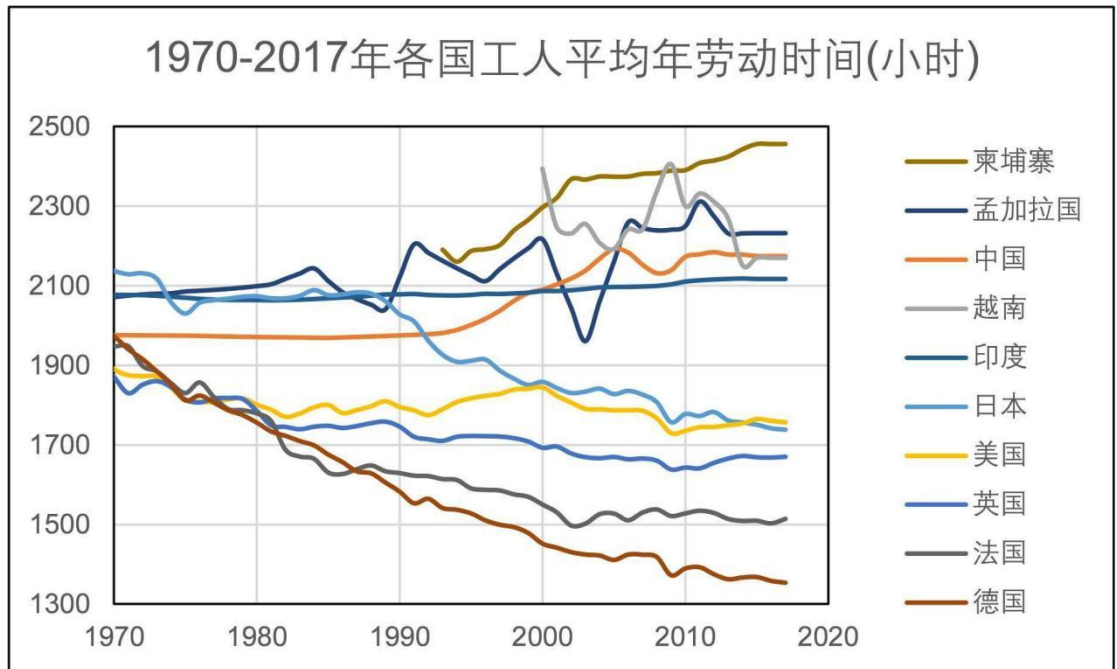
使工人过剩的现象，甚至比资本的增加更要快得多。这种不断地增加的工人人数将招致什么结果呢？他们形成产业后备军，这种产业后备军，在营业状况衰落或平常的时候，是在劳动价值以下付予报酬的，而且就业不经常，或者要靠公共慈善机关的救济为生。但在营业特别活跃的时期，它对于资本家阶级是必不可少的，……这种产业后备军却会破坏经常在业的工人抵抗力量，使他们的工资保持在低下的水平上。[1]

同时，由于我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决定了我们无法通过资本输出与不平等交换获得超额利润与超额剩余价值；由于我们不是核心国家，决定了我们无法在绝大多数行业依靠带有垄断性的高科技作为竞争手段；由于我们的人均资源不足，又决定了我们无法在世界市场上靠出卖高价值自然资源获取丰厚的“资源租金”。

在世界体系中处于半外围地位的中国，经济发展就只能依靠廉价劳

动力的“人口红利”才能在世界市场上维持竞争力。

所以，我们的劳动者们所承受的劳动强度与劳动时间是极其惊人的：



只有长期存在一支剩余劳动力队伍，才能够将工人的工资压制在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低位内，而为经济发展提供这样一批剩余劳动力队伍，正是从农村大量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若要维持一批廉价的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打破农民的自组织，让单干的农村劳动者在农业市场竞争中被击败，让种地的，变成进厂拧螺丝的。

也正因如此，有很多自由派公知很喜欢鼓吹让农民单干，因为小农无力进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一旦天灾来了，就只有进城给他们打

工一条路了。

一旦工人发现，他们本身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完全取决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压力，一旦工人因此试图通过工联等等在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组织有计划的合作，来消除或削弱.....那种自然规律对他们这个阶级所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这时，资本和它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就大吵大叫起来，说这是违反了“永恒的”和所谓“神圣的”供求规律。.....只要有不利的情况妨碍建立产业后备军，.....资本就会同它的庸俗的桑科·判札一道起来反叛“神圣的”供求规律，并企图用强制手段来阻碍它发挥作用。[2]

小农经济可以为城市的市场经济部门提供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小农经济本身是不可持续的，长期来看小农经济会阻碍经济发展，因为作为经济发展必要条件的小农经济必然破产。

倘若小农经济破产后，怎么办？

小农经济是富不起来的，小农业也是没有多大前途的。我们要抓的是大农业。[3]

唯一的道路就是走社会主义的大农业道路。

其实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就已经认识到了分田单干的弊端，农村扶贫必须坚决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一、加强集体经济实力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共同致富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要求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而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其他非公

有制经济成分只是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必要补充，它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主体。集体经济是农民共同致富的根基，是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物质保障。集体经济健康发展了，不但可以为农户提供各种服务，还可以发挥调节作用，防止两极分化。例如，当某一产业、某一方面个人收入过高时，可通过适当增加集体提留防止收入差距的拉大；当部分农民靠诚实劳动仍无力脱贫时，可以凭借集体经济实力对其实行物质上的扶持。二、发展集体经济实力是振兴贫困地区农业的必由之路。乡村集体经济实力的发展与农业的振兴是相互依存、荣衰与共的。乡村集体经济实力的发展，势必促进农副产品的增值，从而推进山海开发，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同时，也会加速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促使农村不断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 [4]

进入新时代，则提出了要因地制宜发展合作社的重要指示：

合作社的路子怎么走，我们一直在探索。你们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合作社发展道路，提高了农业机械化水平，发挥了得天独厚的土地优势，农业科技水平、农民科技素质和农业生产效益都有了很大提高，很有意义。希望乡亲们再接再厉，总结经验，不断推广，同时要鼓励全国各地因地制宜发展合作社，探索更多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路子来。 [5]

这有力的说明了，在我们国家，走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才是实现农村劳动群众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

为什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以小农为主的农业是死胡同？

作者：蒸馏水

为什么资本主义条件下，以小农为主的农业是死胡同？

面对资本主义对农村的侵害，一些人不免产生对田园牧歌美好生活的怀想。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小农生产绝不会为农业发展带来光明的前途。而这主要是因为从长期来看，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小农所生产的农产品在和工业品进行交换的时候，存在着不平等交换，即同等市场价格的农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大于工业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所以即使工农业品以表面上相等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换，也会不可避免地落入“剪刀差”的死胡同。

这样有什么后果呢？主要表现为工业攫取农业剩余，进而将农业剩余用于资本家的资本积累。“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资本家阶级就不仅能剥削自己直接雇佣的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而且还能剥削表面上占有生产资料的农民。”（李民骐，《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不平等交换呢？假设劳动力可以自由移动，农民选择打工或者种地都是可行的，那么他衡量这两个选择的出发点就是哪个挣的钱更多。下面分两种情况来说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为什么即使在“自由”市场竞争以及农民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工

农业产品中的不平等交换仍然是不能避免的。

情况一：小农劳动力价格 = 小农劳动力价值时的工农业品交换

假设有朝一日，小农生产领域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或者农村剩余劳动力因人口减少而不复存在。这时在劳动力市场上，小农劳动力价值会等于工人的劳动力价值。

我们知道，商品的价值 = 生产资料价值 + 劳动者劳动创造的新价值，所以

农产品价值 = 农业生产资料价值 + 小农劳动创造的新价值

同样，生产工业品的部门中，

工业品价值 = 工业生产资料价值 + 工人劳动创造的新价值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由工人和资本家共同占有。资本家攫取了工人劳动创造的新价值的一部分，即剩余价值。剩下的部分，则为支付给工人的劳动力价值。所以：

工业品价值 = 工业生产资料价值 + 工人劳动力价值 + 剩余价值

如果工业品按价值出售，则：

工业品长期均衡价格 = 工业生产资料价值 + 工资 + 剩余价值

然而，与资本主义条件下所生产的工业品不同，小农所生产的农业品的长期均衡价格不等于价值，而是由如下公式决定：

农业品长期均衡价格 = 农业生产资料价值 + 小农劳动力价值

假设农业品和工业品的生产资料都从市场上购买，那么长期均衡情况下，农业、工业生产资料价值对应的劳动量也是一样的。所以当

工农业品进行交换的时候，其生产资料所包含的劳动量一样，这部分不存在不平等交换。

如果农产品的市场价格 $>$ 长期均衡价格，这时小农的纯收入会高于工人的工资，那么工人就会回乡务农，农产品产量增加，进而导致小农纯收入下降，直至小农纯收入 = 工人工资，即与劳动力价值相等。

如果农产品的市场价格 $<$ 长期均衡价格，这时小农的纯收入会低于工人的工资，那么小农就会进城打工，农产品产量减少，进而导致小农纯收入增加，直至小农纯收入 = 工人工资，即与劳动力价值相等。

由以上可知，长期均衡情况下，小农纯收入 = 工人工资 = 劳动力价值。

当表面上价格相等的工农业品交换时，因为工业品是按照价值出售的，而农业品是按照低于价值的长期均衡价格出售的，所以农业品中较多的劳动只能交换工业品中包含的较少的劳动。或者说，一单位农业品中包含的劳动只能交换不到一单位工业品中包含的劳动。

因此，市场价格相等的工农业品进行交换的过程，也就是农业中的劳动量向工业流动的过程，也就是农业中劳动创造的价值流向工业的过程。进而这部分价值变成工业资本积累的一部分，从而使得资本家间接地剥削了小农。

所以，如果不考虑短期市场价格波动导致小农生产价格高于市场价格的情况，从长期来看，小农生产的农业品和资本主义工业品之间

存在不平等交换。

情况二：小农劳动力价格 < 小农劳动力价值时的工农业品交换

这一情况更符合我国国情。因为我国的人地矛盾，一块土地所需要的劳动力有限。并且当一块土地上的劳动力不断增加时，边际劳动力收益下降。所以不可避免的，以小农生产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领域中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那么这反映在小农劳动力市场上，即为供大于求，这就使得小农劳动力价格被压低，并且低于小农劳动力价值。

此种情况下，因为小农劳动力价格 < 小农劳动力价值，
所以农产品价格 < 农业品长期均衡价格 = 农业生产资料价值 + 小农劳动力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和小农类似的其他小生产者，在长期都将面临着更加严重的不平等交换问题，或者说，更大幅度的“剪刀差”。

更不要说，外国廉价农产品倾销对小农所造成的伤害——这种情况下，因为等价农业品中，外国农业品包含的劳动量不仅低于小农所生产农产品包含的劳动量或价值，甚至还低于小农所生产农产品包含的劳动力价值。所以，小农的生产是更没有前途的。因此，更多的小农被迫变为农民工。大量农民工的出现继而压低了工人的工资。所以外国农业品进入中国市场，也间接地增加了中国资本家攫取的剩余价值。

中国和资本主义全球经济，2000-2022 年

作者：红色经济观察

自即日起，红色中国网开始发布 2023 年度红色经济观察。红色经济观察系列由红色经济观察组撰写，以往于每年夏季发布，今年应网友要求提前发布。红色经济观察系列通过整理和分析中国和世界经济的统计数据，追踪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借以认识和分析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相对地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中国资本主义积累内外条件的变化，力求在科学的基础上推断资本主义危机来临的可能性以及未来革命迫近的程度。

红色经济观察组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个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国家。一方面，作为一个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城市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城市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必然提出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要求，这些要求必将在不久的将来超出中国资本主义可以容纳的最大限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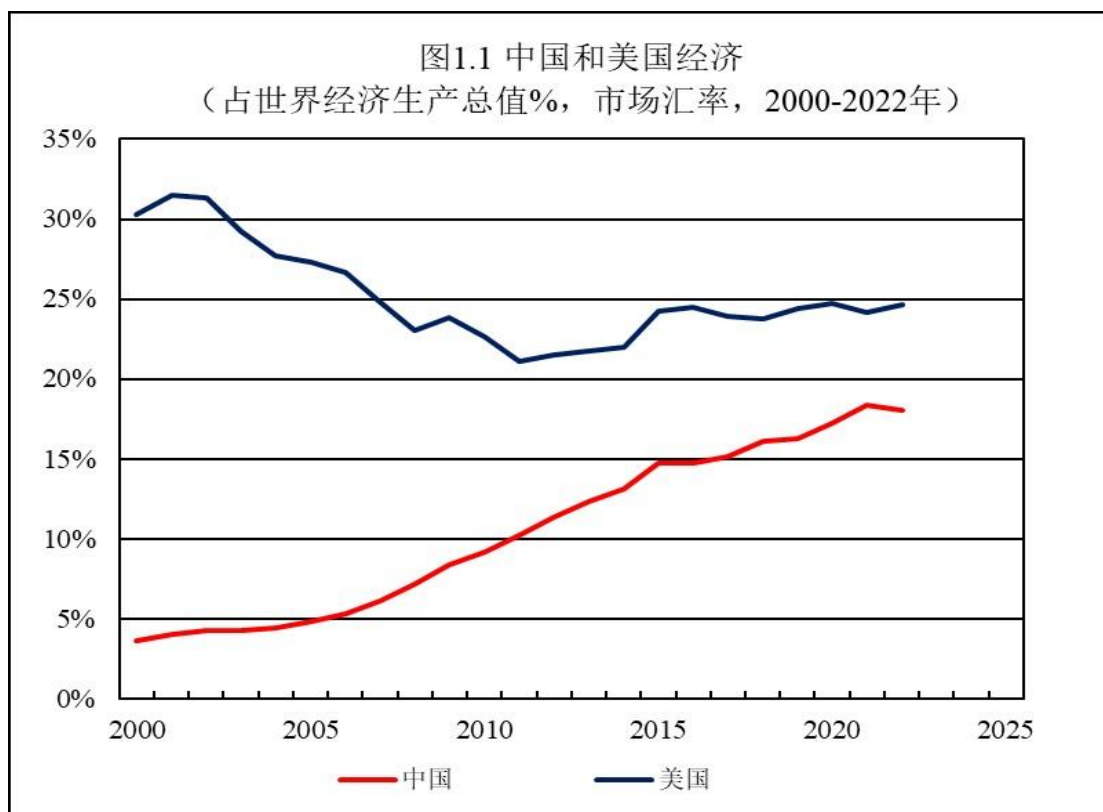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中国资产阶级将无法从世界市场上获取足够的超额剩余价值，以便在国内工人阶级中收买一支足够庞大的工人贵族队伍。中国资本主义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未来的矛盾将无法以阶级妥协或社会改良的方式

求得解决。中国资本主义的上述基本矛盾，决定了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如马克思在 1859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在考察社会的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 ... 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红色经济观察系列要做的工作，就是力求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把握在“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变革，努力正确地反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实冲突”，从“物质生活的矛盾”来解释包括人们的思想意识变化在内的世界上的种种变化，进而为改造世界服务；而不是从一厢情愿的主观愿望出发，在想象中实现“变革”，更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自我麻醉，以抚慰小资产阶级的脆弱心灵。

图 1.1 比较了自 2000 年以来中国和美国分别占世界经济生产总值的比例及其变化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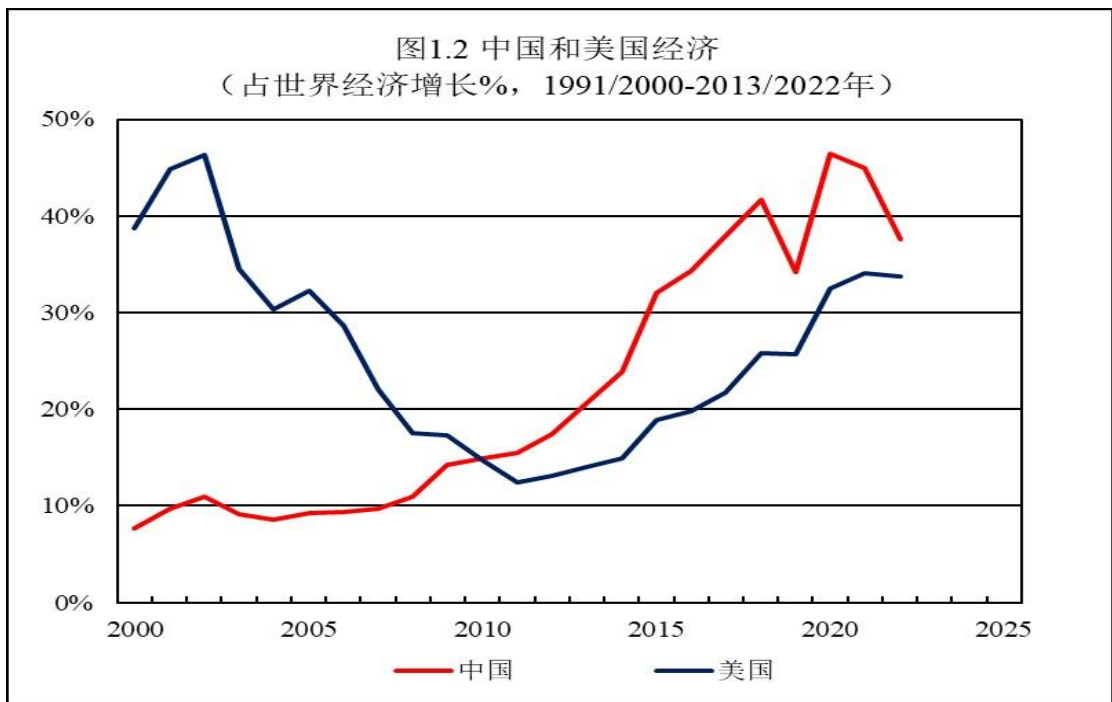


2022年,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世界经济生产总值达到约102万亿美元,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3万亿美元,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约25万亿美元。

在本世纪初,美国经济约占世界经济生产总值的31%,中国经济约占世界经济生产总值的4%。到了2011年(即2008-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到了21%,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生产总值的比例上升到了10%。此后,美国经济占世界的比例有所回升。2014年以来,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保持在24%左右;2022年,美国经济占世界的比例为24.7%。2021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生产总值的比例进一步

上升到 18.4%；2022 年，由于人民币贬值等因素，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例略降至 18%。

图 1.2 比较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和美国在各个十年期间对世界经济累计增长的贡献（即在每一个十年期间中国或美国按照当期美元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额与世界经济生产总值的增长额之比）。通过观察这个比例变化的情况，可以了解未来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例在长期可以趋近的上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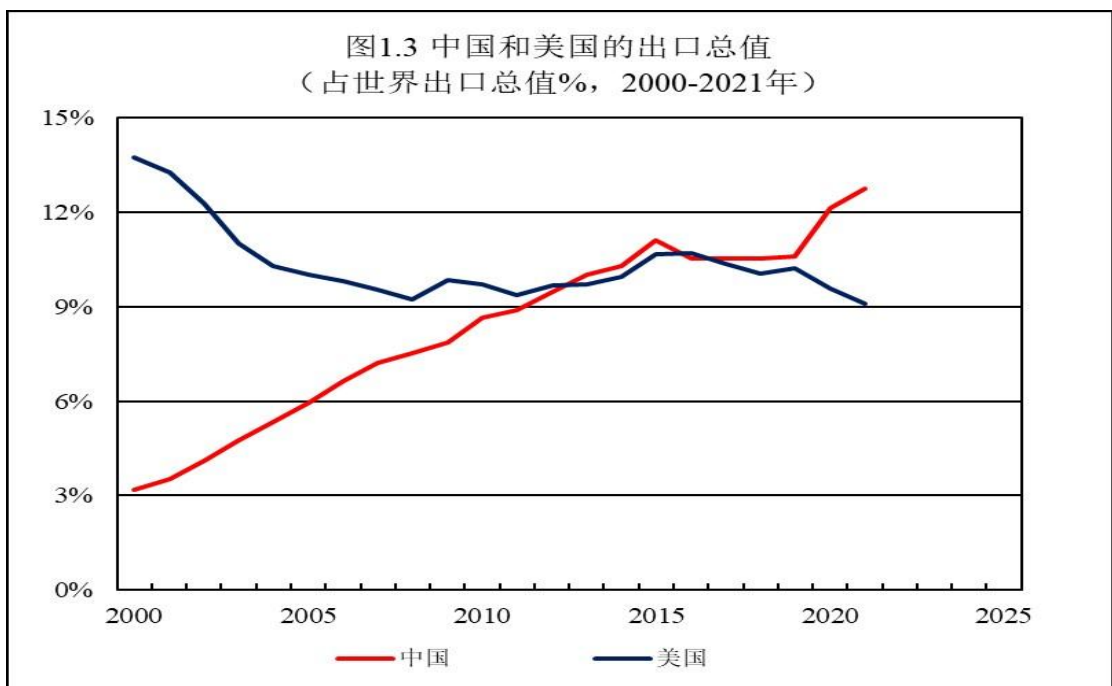


在 1993-2002 年期间，美国经济增长曾经一度占到了世界经济增长的 46%。在受到 2008-2009 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以后，美国经济陷入停滞。在 2001-2010 年期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一次超过了美国。在 2011-2020 年的十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占到了世

界经济增长的 46%。不过，到了 2013-2022 年的十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到了 38%。

值得注意的是，自 2011 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占世界经济增长的比例也在趋于上升。2013-2022 年，美国经济增长占世界经济增长的比例为 34%。中、美两国合计，占有了过去十年世界经济增长的 70% 以上；而占世界人口总数近五分之四的世界其他国家仅获得世界经济增长的不到 30%。这说明，美国和中国资本主义是当前世界资本主义矛盾的中心，也是国际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两个主要堡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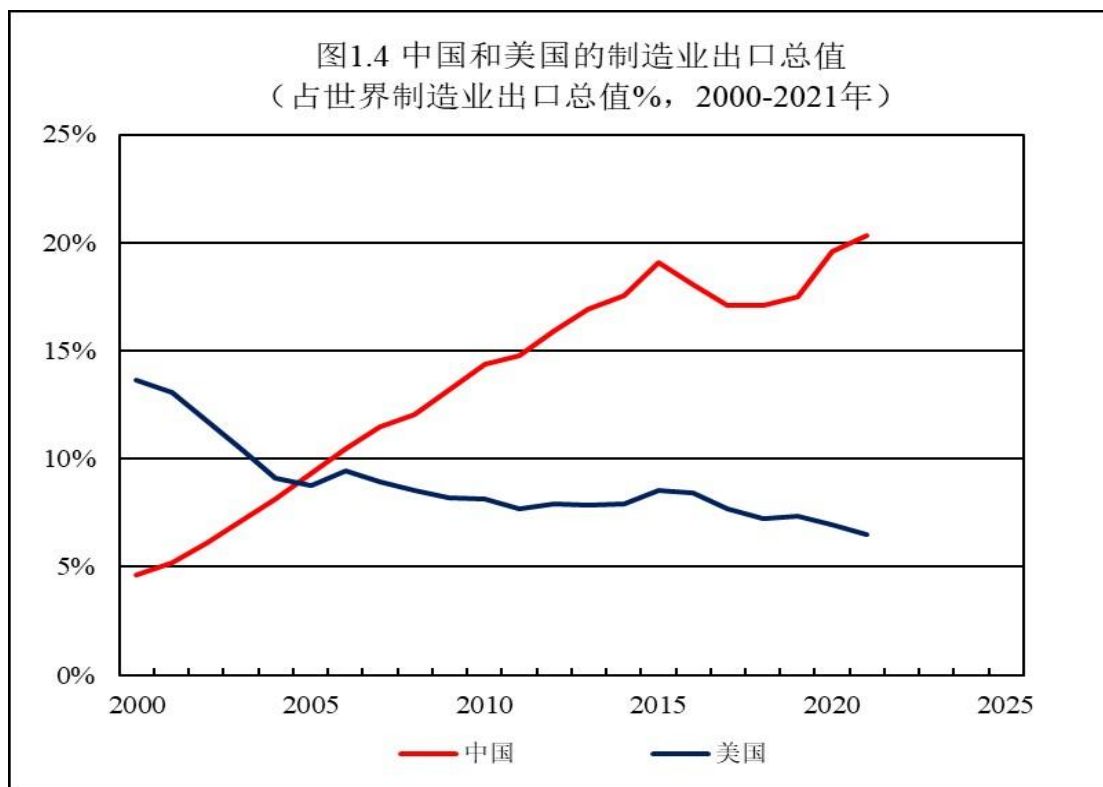
图 1.3 比较了 2000 年至 2021 年中国和美国分别占世界出口总值的比例及其变化情况。这个比例可以反映中国和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分别占有的份额。



2000年，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额仍占世界出口总值的14%。到了2008年，美国在世界出口总值中的份额下降到了9%。此后，美国在世界出口总值中的份额一度有所回升。但是，到了新冠危机爆发后，美国在世界出口总值中的份额趋于下降；2021年，美国在世界出口总值中的份额回落到9%。

从2000年至2015年，中国商品和服务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值的比例从3%大幅度上升到11%。2013年，中国出口额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不过，2016年至2019年期间，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扩张受阻，占世界市场的份额徘徊在略低于11%的水平。新冠危机爆发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恢复得更早、更快。利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能力一度受到严重限制的时机，中国在世界出口总值中的份额迅速上升，于2021年达到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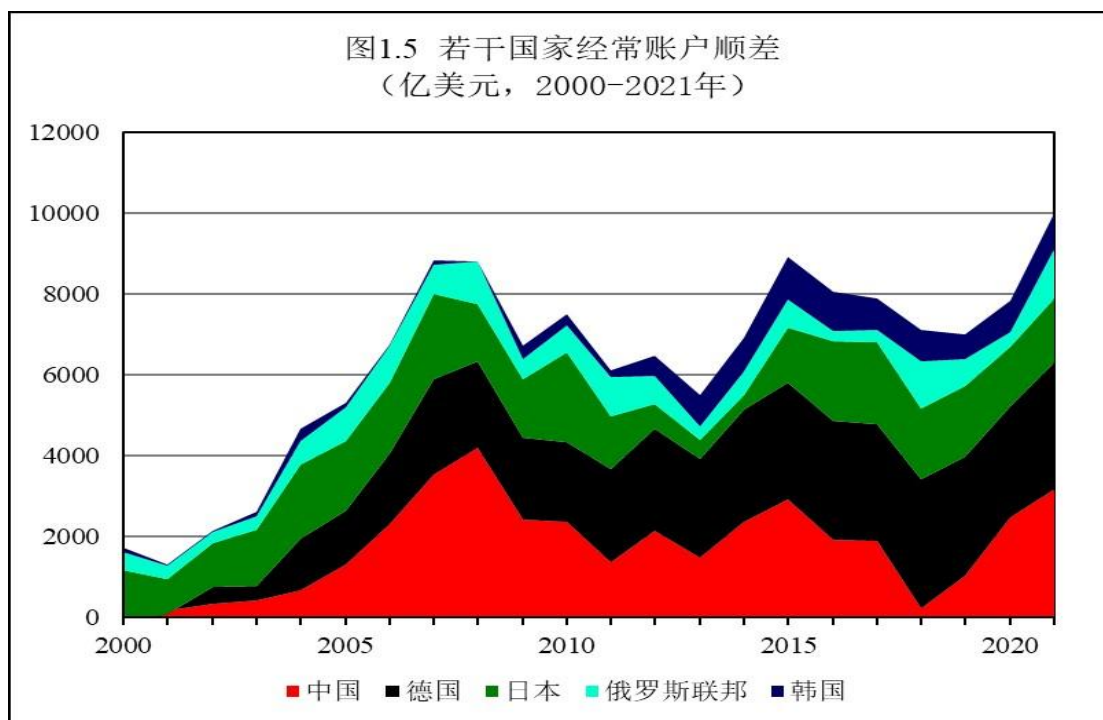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主义全球分工中主要从事出口制造业。图1.4比较了2000年至2021年中国和美国分别占世界制造业出口总值的比例及其变化情况。



2005年，中国制造业出口额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出口国。2015年，中国制造业出口额达到世界制造业出口总值的19%。此后，中国占世界制造业出口市场的份额有所下降。2021年，由于新冠疫情导致世界大多数国家制造业出口能力下降，中国制造业出口额占世界制造业出口总值的比例超过了20%。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世界上许多国家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不得不依赖出口来维持增长。但是，如果许多国家都要保持贸易顺差，就必须有另外一些国家保持贸易逆差。但是，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保持贸易逆差的国家往往面临资本外逃和金融危机的风险。只有美国，作为拥有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霸权国家，才有条件长期保持大幅度的贸易逆差。

图 1.5 说明了 2000 年至 2021 年世界上几个主要贸易顺差国经常账户顺差变化的情况。所谓经常账户，指的是广义的贸易账户，包括国际间的进出口及收入往来。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平衡等于出口减进口，加上一个国家从海外获得的收入（如利润、利息、工资、汇款等），再减去海外居民从该国获得的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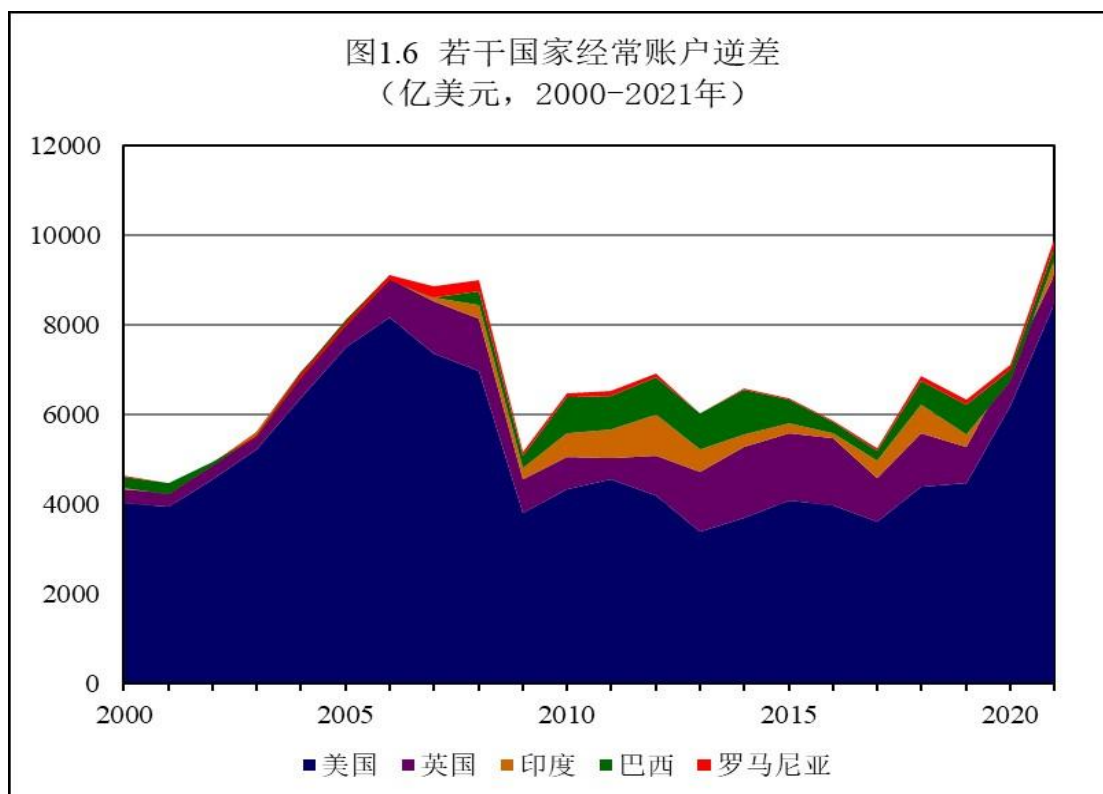


2021 年，世界前五大经常账户顺差国及其顺差额分别为：中国（约 3200 亿美元）、德国（约 3100 亿美元）、日本（约 1600 亿美元）、俄罗斯联邦（约 1200 亿美元）、韩国（约 880 亿美元）。五大经常账户顺差国的顺差之和约为一万亿美元。

这里再强调一下，经常账户顺差指的是广义贸易账户上的顺差，并不等于人们通常所说的贸易顺差。比如，据国家统计局的《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1年，中国货物进出口顺差4.37万亿元（约合6800亿美元）。但由于中国在服务贸易和收入项目上都有比较大的逆差，整个经常项目的顺差只有3200亿美元。

中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常账户顺差国，但实际上中国现在的经常账户顺差还小于2008年的最高纪录（当时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达到了约4200亿美元）。此外，2018年，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曾一度缩小到了只有240亿美元。

图1.6说明了2000年至2021年世界上几个主要贸易逆差国经常账户逆差变化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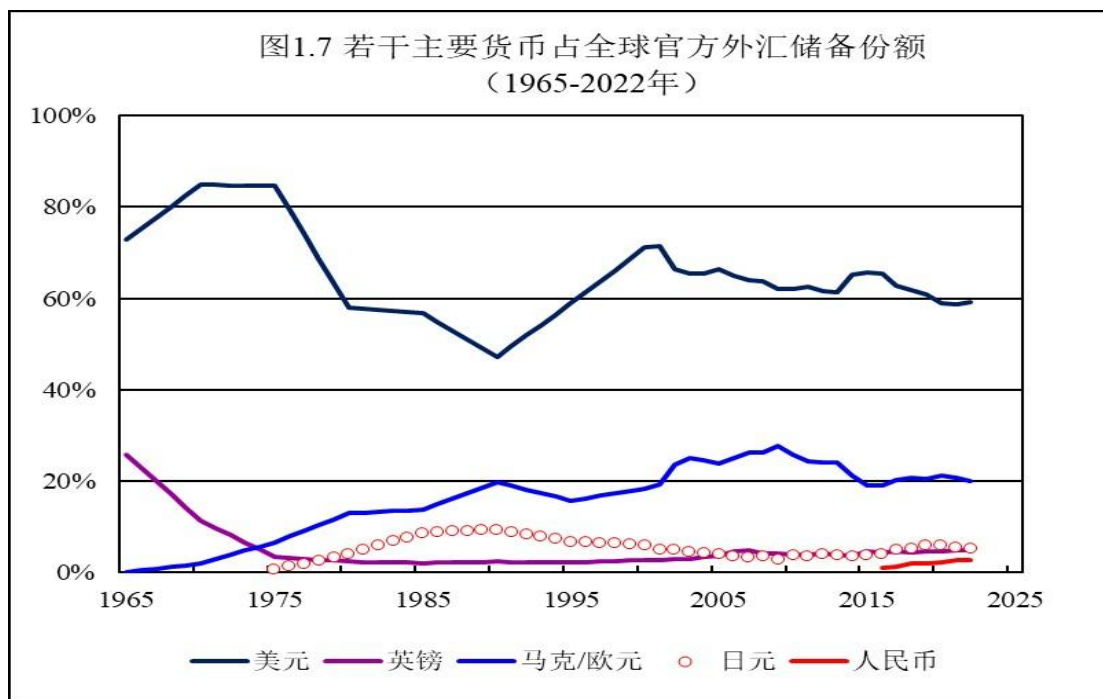


2021年，世界前五大经常账户逆差国及其逆差额分别为：美国（约8500亿美元）、英国（约630亿美元）、印度（约330亿美元）、巴西（约280亿美元）、罗马尼亚（约210亿美元）。五大经常账户逆差国的逆差之和约为9900亿美元。

五大经常账户逆差国的逆差之和与五大经常账户顺差国的顺差之和大致相当。2021年，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占前五大经常账户逆差国逆差之和的85%，占有数据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逆差之和（约1.3万亿美元）的65%。可见，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全球经济主要是靠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即美国国民总支出超过国民总收入的部分）来吸收依靠出口维持增长的中国、德国、日本以及俄罗斯等石油出口国的贸易顺差，从而维持世界经济总需求的稳定和扩张。如果没有美国保持大规模的经常账户逆差，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就有陷入紧缩性恶性循环的危险。

美国能够长期维持大规模的贸易逆差，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元仍然充当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主要储备货币。世界各国的资本家和政府主要用美元来从事国际贸易和资产交易，并将贸易顺差用于购买美元资产，从而保证美国可以获得比较充足和稳定的海外资本净流入。

图1.7说明了自1965年以来世界上几种主要货币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所占份额变化的情况。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美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所占份额曾经高达 80% 以上。到了 1990 年，美元份额一度下降到了不足 50%。九十年代，美国和全球经济经历了短暂繁荣；至 2000 年，美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所占份额又增加到 70% 以上。近年来，美元份额下降到了 60% 左右。

在 2010 年前后，欧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所占份额一度达到四分之一左右；近年来，欧元份额维持在约 20%，英镑、日元各占约 5% 的份额。人民币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所占份额尚不到 3%。

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以海盗式的行径冻结了俄罗斯在海外的资产。西方帝国主义长期赖以自欺欺人的所谓国际金融“信誉”荡然无存。在俄罗斯反霸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鼓舞下，许多外围、半外围国家纷纷开始去美元化进程，越来越多地使用本国货

币从事国际贸易。这一趋势发展下去，必然能够减少美国可以获得的海外资本净流入并最终导致美元崩溃。

在这一形势下，中国资产阶级也企图浑水摸鱼，趁机推动所谓“人民币国际化”。一些被民族主义狂热冲昏了头脑的小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分子，也纷纷鼓噪，仿佛“人民币”代替美元已经指日可待，中国资产阶级也有望登堂而“入关”、取美帝代之。

从图 1.7 可以看出，“人民币”目前仅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很小一部分。即使世界资本主义在未来几十年仍然能够保持“正常”发展并且中国资本主义也能够继续顺利“崛起”（而这两者都是不可能的），“人民币”要代替美元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也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都不懂得的是，美帝霸权的衰落并非意味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崛起”可以从此走上平坦的道路。恰恰相反，随着美元的崩溃，美国将无法继续通过大规模的贸易逆差来维持全球经济总需求的稳定，而中国资本主义又不具备代替美国的能力。这样，美元的崩溃将不仅导致美帝霸权的崩溃，而且还将开启全球资本主义的长期萧条。

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和阶级斗争，2000-2022 年

作者：红色经济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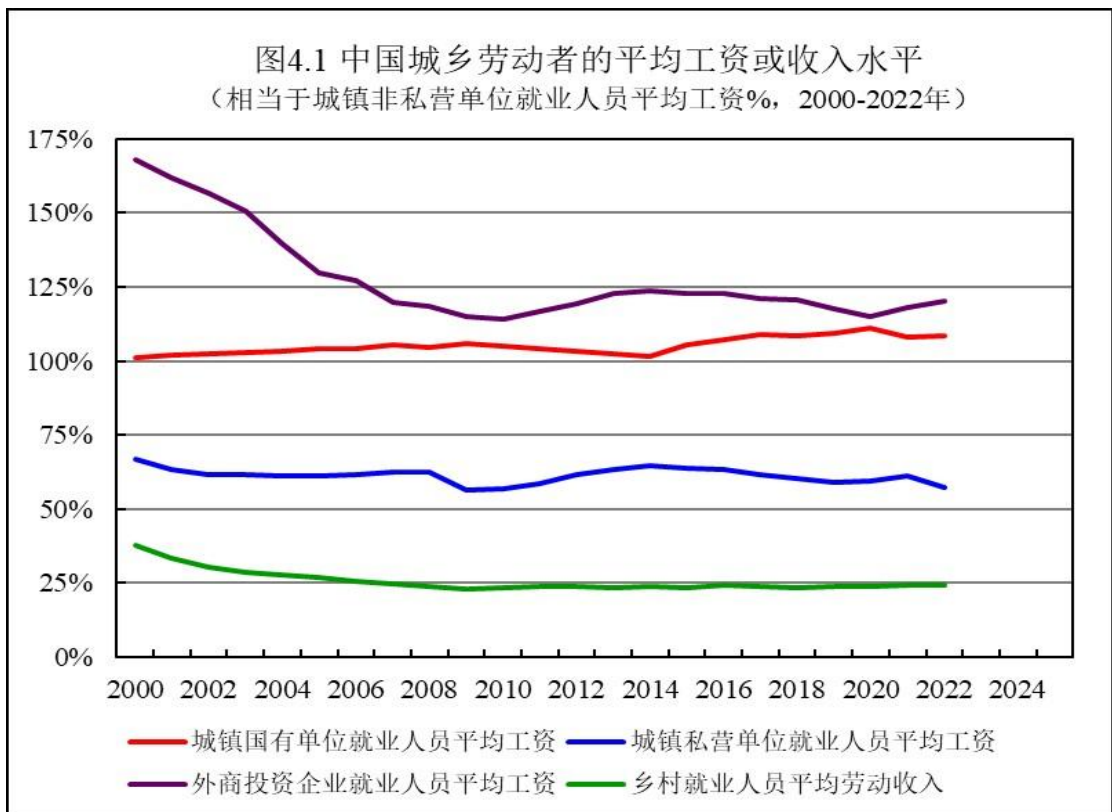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城镇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队伍在近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据红色经济观察组的研究，目前，城镇无产阶级（城镇就业者中完全或主要依靠雇佣劳动为生的劳动者，不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和中下层官僚）约有 2.3 亿，城镇半无产阶级（包括官方统计中的城镇“个体”就业人员和城镇失业人员）约有 1.6 亿，乡村半无产阶级（包括乡村就业人员和乡村失业人员）约有 3 亿，城镇小资产阶级（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和中下层官僚）约有 7000 万，资本家阶级（包括资本家和上层官僚）约有 2300 万。

2000 年，中国有 4.9 亿人在乡村就业； 2010 年，乡村就业人员下降到 4.1 亿； 2022 年，乡村就业人员下降到 2.7 亿。

2000 年，中国有 2.3 亿人在城镇就业；2010 年，城镇就业人员增加到 3.5 亿；2021 年，城镇就业人员增加到 4.7 亿。2022 年，城镇就业人员意外地减少到 4.6 亿。这是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经济中首次发生城镇就业人数绝对减少的情况。与 2021 年相比，2022 年的城镇就业人员减少了 800 多万人。这说明，资产阶级当局所推行的反动清零政策在去年导致了大批城市工人失业。

目前，在城镇就业人员中，有大约 1.7 亿人在城镇“非私营”单位工作，另外有大约 2.9 亿人属于城镇私营单位和个体就业人员。在官方统计中，所谓城镇“非私营”单位包括国有单位（主要是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股份制企业（包括国有控股的和非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说，城镇“非私营”单位属于中国经济中的“正式部门”，对资产阶级法律执行得较为严格，在其中就业的人员工资较高、待遇较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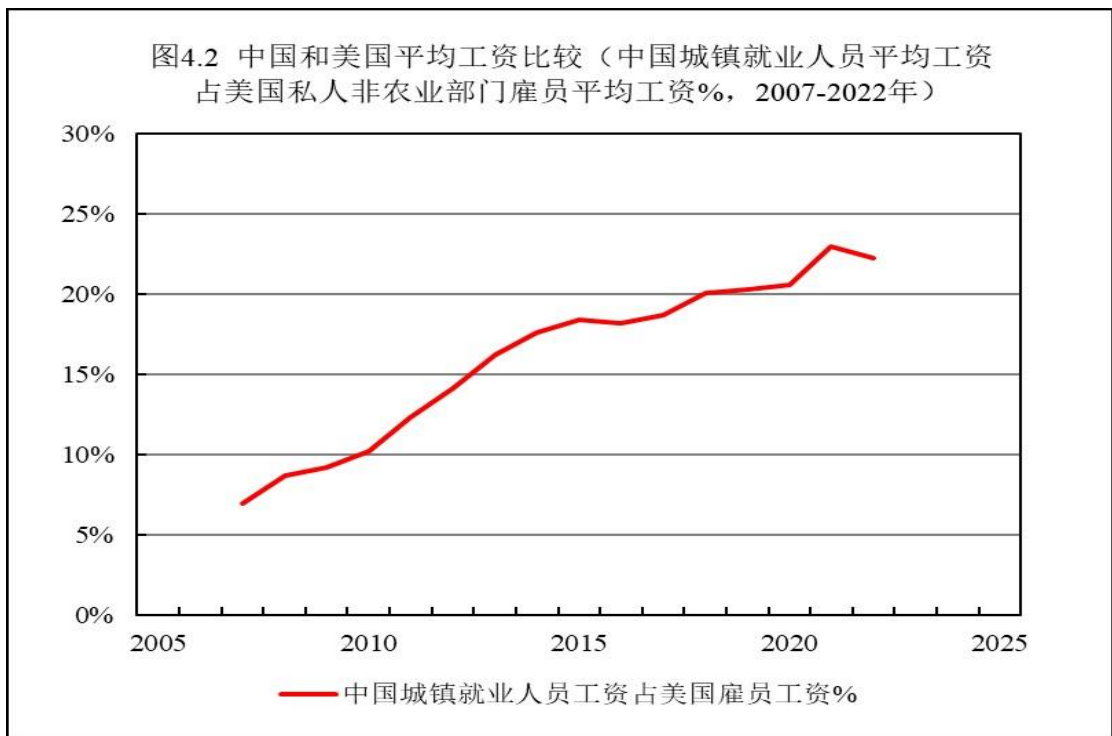
图 4.1 比较了自 2000 年以来各类城乡劳动者的平均工资或劳动收入：



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不包括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大约相当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1.2

倍，国有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大约相当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1.1 倍，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大约相当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五分之三。在本世纪初，乡村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收入（包括务农劳动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大约相当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五分之二。此后，乡村就业人员与城镇就业人员劳动收入的差距有所扩大。自 2010 年以来，乡村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收入一直保持在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四分之一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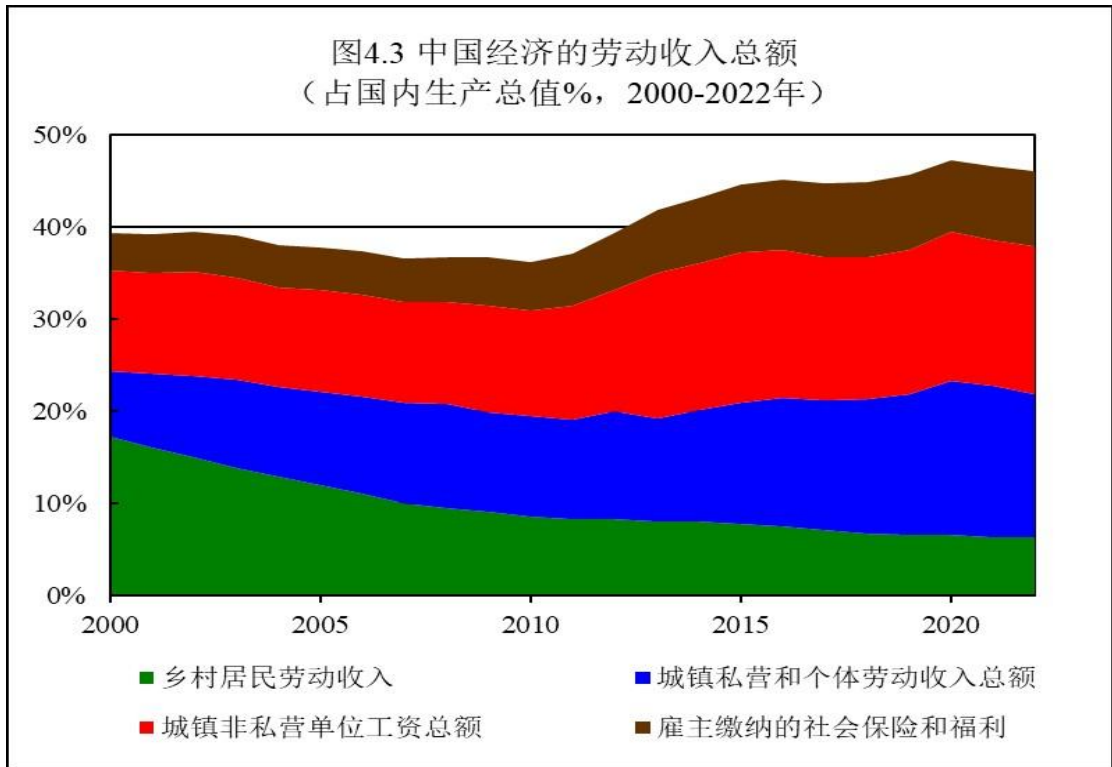
图 4.2 比较了自 2007 年以来中国城镇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与美国私营非农业部门雇员的平均工资：



美国私营非农业部门雇员的年平均工资按照私营非农业部门雇员周平均工资再乘以 50 估算。2007 年，美国私营非农业部门雇员的年平均工资约 36000 美元；2022 年，美国私营非农业部门雇员的年平均工资约 56000 美元。

2007 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按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并以两者各自的就业人数作为权重加权平均计算）约 19000 元（折合 2500 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雇员平均工资的 7%；2021 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约 79000 元（折合 12200 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雇员平均工资的 23%。值得注意的是，2022 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约 83000 元（折合 12400 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雇员平均工资的 22%；中国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与美国雇员平均工资之比与 2021 年相比有所下降。

图 4.3 说明了自 2000 年以来中国经济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



劳动收入份额是一个国家各种形式劳动收入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中国的劳动收入总额包括乡村居民劳动收入（包括乡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劳动收入总额（假设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收入等于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和福利（按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的50%和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的25%之和粗估）。

劳动收入份额是观察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阶级斗争动态和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晴雨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遭到历史性失败，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导致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斗争力量严重削弱，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从1990年的53%下降到2010年的36%。

2011年至2016年，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第一次工人斗争高潮。据“中国劳工通讯”统计，2011年，全国各地发生工人斗争203次（其中100人以上的较大斗争113次）；2015年，全国各地工人斗争增加到2775次（其中100人以上的较大斗争527次）；2016年，全国各地工人斗争2670次（其中100人以上的较大斗争439次）。这些斗争，当时主要集中在南方沿海省份的制造业企业。到2016年，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增加到了45%；与2010年相比，足足增加了9个百分点。

面对中国工人阶级斗争力量的增强，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理人忧心忡忡。他们大谈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吓唬小资产阶级说，如果工人工资高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就要失去竞争力，民族主义小资一心向往的“强国梦”也就成了水中月、镜中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当局提出要对残存的国有企业实行所谓“混合所有制”；后来又打着“供给侧改革”的旗号，对公有制的事业单位实行所谓企业化、“民营化”。资产阶级当局的这些倒行逆施，导致工资较高、待遇较好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总数自2015年起逐年下降。此外，2015年以来，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业结构有所调整，部分制造业企业转移海外，导致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另一方面，与互联网技术相联系的所谓“平台经济”快速扩张；大量新增城镇就业人员在官方统计中以“独立承包”的方式与“平台经济”发生关系，缺少社会保险和劳动保障。

尽管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一些对中国工人阶级不利的变化，但是在新冠疫情之前的几年，劳动收入份额始终徘徊在 45%左右。这说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进入了暂时的僵持局面。2020 年，中国经济劳动收入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一度上升到 47%；2022 年，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回落到 46%，但仍高于新冠疫情之前若干年的水平。在 2022 年的劳动收入总额中，乡村居民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6%，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劳动收入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6%，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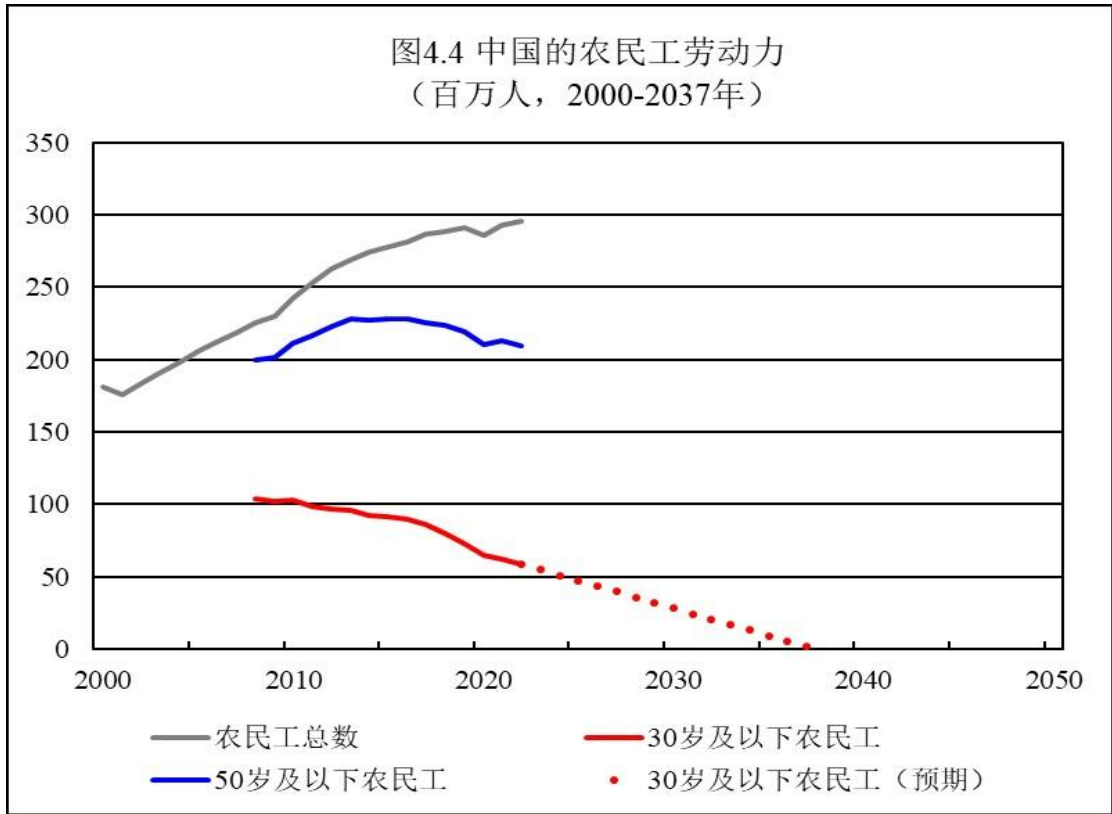
中国工人阶级所蒙受的剥削在全世界是最深重的之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建立在中国特有的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的剥削体制上。在罪恶的“996”体制下，中国工人在一年中的平均劳动时间长达 3600 小时。相比之下，墨西哥工人平均一年劳动约 2300 小时，越南工人平均一年劳动约 2200 小时，印度工人平均一年劳动约 2100 小时，美国工人平均一年劳动约 1800 小时，日本工人平均一年劳动约 1700 小时，法国工人平均一年劳动约 1500 小时。过度劳动每年导致几十万中国劳动者猝死。

中国工人阶级为什么会长期忍受如此超乎寻常、非人的剥削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在中国农村存在着一支庞大的剩余劳动力队伍，充当着资本主义积累的产业后备军。如图 4.1 所显示的，在乡村劳动者和城镇劳动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乡村劳动者只要能

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其预期货币收入可以立即翻一番以上。对于很多来自农村的劳动者来说，为了换取收入和消费的巨大改善，并为下一代创造更好的生活，哪怕几年、十几年如一日地忍受“996”乃至更残酷的剥削，也是值得的。来自农村的源源不断的剩余劳动力，不断地给城镇劳动者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迫使他们接受恶劣的劳动条件、害怕与资本家斗争。

然而，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现在终于开始萎缩了！新一代城镇劳动者不堪忍受资本家的残酷压迫，正在以“躺平”等方式积极开展灵活多样的斗争，给中外资本家以沉重打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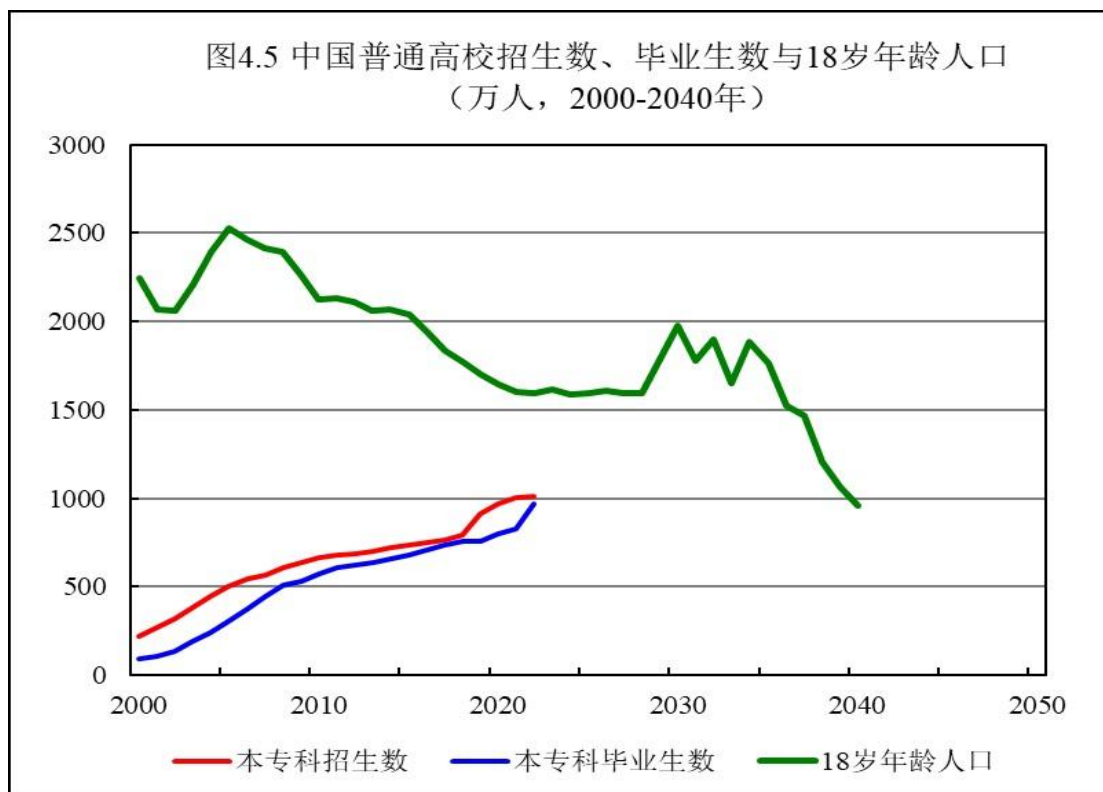
图 4.4 说明了中国的农民工总数及其按年龄划分的组成部分自 2000 年以来变化的情况：



中国的农民工总数从2000年的约1.8亿增加到2010年的约2.4亿；2022年，中国的农民工总数达到近3亿。虽然农民工的总数还在增加，但是近年来农民工总数的增加完全来自50岁以上农民工数量的增加。50岁及以下农民工的总数已经从2013年的2.3亿减少到2022年的2.1亿。

尤其令人可喜的是，对于维持中国资本主义特有的超高剥削强度所必需的30岁及以下的青年农民工总数从2008年的一亿以上减少到2012年的约9700万，再减少到2022年的约5900万。从2012年至2022年，中国的青年农民工总数平均每年减少约380万；按照这个速度，到了2037年，中国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上的青年农民工就将濒临完全耗尽、彻底枯竭！

图 4.5 说明了自 2000 年以来中国普通高校（包括本专科）招生的情况并与过去以及未来的 18 岁年龄人口相比较：



2000 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总数 221 万，占当年 18 岁年龄人口的 10%；当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总数仅 95 万人。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在本世纪初，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还是很有竞争力的。2022 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总数 1015 万，占当年 18 岁年龄人口的 64%；当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总数 967 万人，超过 2000 年毕业生总数的 10 倍。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从为资本主义积累提供相对“高端”的专业人才到为资本主义企业供应一般的廉价劳动力的转变。

未来几年，中国的 18 岁年龄人口会稳定在 1600 万左右。但是，由于在 2011 年至 2017 年期间有一个出生人口小高峰，2029 年至 2035 年，中国的 18 岁年龄人口将达到 1800 万至 2000 万。考虑到资产阶级当局正在推行所谓的“中考分流”，以维持低端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假设到本世纪三十年代，高校招生数量维持在 18 岁年龄人口的一半左右，那么，在 2029 年至 2035 年期间，高校招生总数仍然可以维持在每年 900 万至 1000 万。由于高校毕业生总数与高校招生总数相比大约滞后两、三年，在 2038 年以前，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仍然可能面临很大的压力。然而，这将是 中国资本家可以享受的“最后的辉煌”。

2036 年，中国的 18 岁年龄人口将回落到约 1600 万；2040 年，中国的 18 岁年龄人口将下降到约 960 万。所以，从 2036 年起，中国的高校招生总数以及未来的大学毕业生人数都将断崖式下降！

进入本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将完全枯竭。到那时，“10 后”、“20 后”、“30 后”等新兴青年将完全无法忍受非人的“996”、过劳死，也不会再面对源源不断的落后农民工的竞争。他们将既有强烈的愿望、又有充足的底气来向恶贯满盈的中国资本家开展普遍的“躺平”斗争。他们的斗争必将导致中国资本主义“劳动纪律”的全面崩溃。到那时，离开了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剥削强度就不会赚钱的中国资本家必然纷纷垮台，整个的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秩序也将土崩瓦解！

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2000-2022-2100 年

作者：红色经济观察

在今年的第一期红色经济观察中，我们曾经指出：“中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个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国家。一方面，作为一个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城市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城市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必然提出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要求，这些要求必将在不远的将来超出中国资本主义可以容纳的最大限度。另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中国资产阶级将无法从世界市场上获取足够的超额剩余价值，以便在国内工人阶级中收买一支足够庞大的工人贵族队伍。中国资本主义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未来的矛盾将无法以阶级妥协或社会改良的方式求得解决。中国资本主义的上述基本矛盾，决定了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在第二期红色经济观察中，我们论证了目前的中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半外围国家。在第四期红色经济观察中，我们论证了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增长，在 2011-2016 年期间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此后，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进入了僵持局面。未来，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枯竭，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还将发生新的对工人阶级有利的变化，为新的工人阶级斗争高潮创造条件，并最终在本世纪中期以前导致资本主义劳动纪律全面崩溃。

在这一期红色经济观察中，我们将进一步论证，资本主义中国将无法代替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新的霸权国家。中国的资产阶级将无法掌握足够的剩余价值，来一方面满足国内阶级妥协的要求，另一方面又满足资本主义积累的需要。这些矛盾，一方面反映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产出资本率的下降和利润率的下降上，另一方面也反映在资产阶级国家财政危机的发展上。

平均利润率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主要指标。图 5.1 说明了 2000 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以及几种相关指标的变化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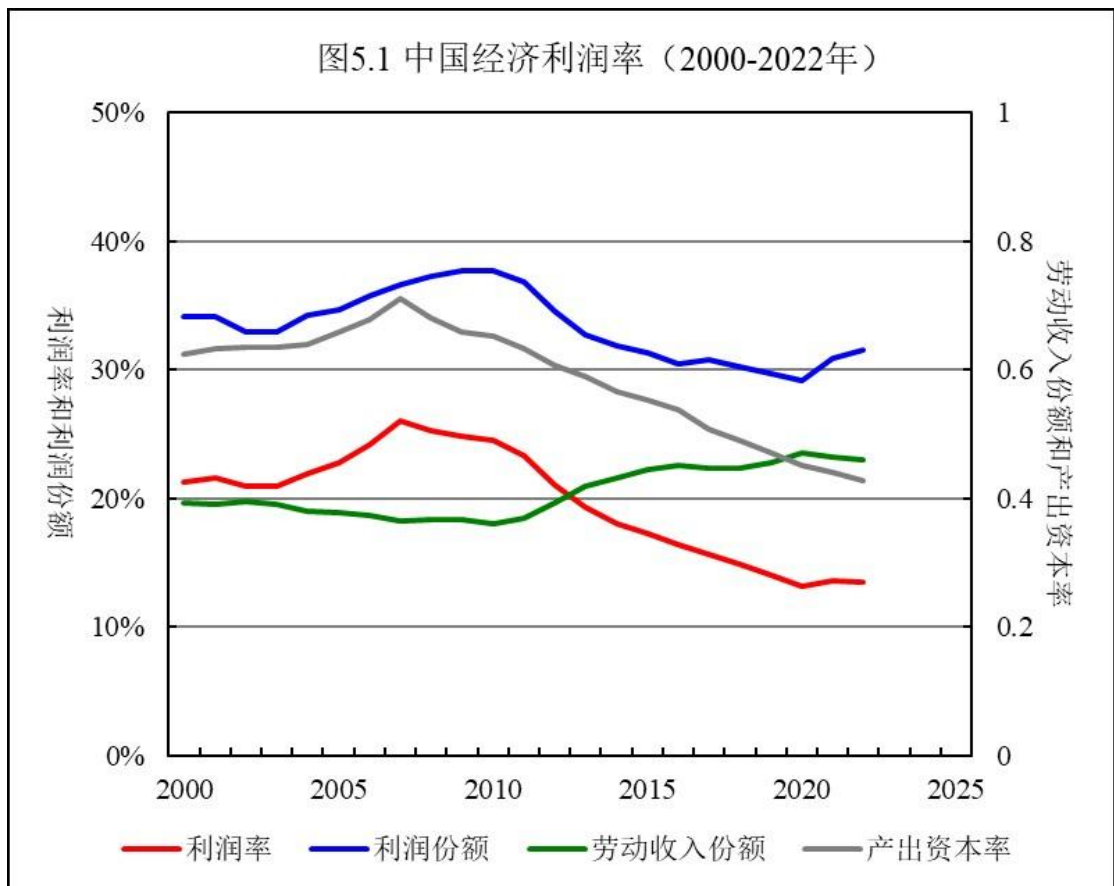


图 5.1 中，利润率指的是资本家阶级从国内生产获得的利润总额（包括企业利润、利息、租金等）除以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得到的比率；利润份额指的是资本家阶级从国内生产获得的利润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劳动收入份额指的是劳动收入总额（包括乡村居民劳动收入、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劳动收入，以及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产出资本率指的是国内生产总值与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之间的比率。其中，利润率和利润份额用左坐标显示，劳动收入份额和产出资本率用右坐标显示。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资本家阶级利润总额，没有扣除资本家阶级所缴纳的企业及个人收入所得税。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资产阶级在向工人阶级的进攻中取得了胜利，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在本世纪的前十年，资产阶级统治巩固，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可以从农村获得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工人阶级斗争力量薄弱。这一时期，劳动收入份额趋于下降、利润份额趋于上升。2010 年，中国经济的利润份额高达 38%；这一利润份额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高的，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2010 年以后，由于工人阶级斗争力量增强，中国经济的利润份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2020 年，中国经济的利润份额下降到 29%。

本世纪初，中国经济的产出资本率趋于上升。2007 年，中国经济的产出资本率达到 0.71。但是，自 2007 年起，中国经济的产出资本率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2020 年，中国经济的产出资本率下降到 0.45；相比之下，美国经济同年的产出资本率为 0.79。

中国经济产出资本率的持续下降，反映了中国作为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克服的矛盾。在本世纪初，中国刚刚成为世界制造业出口中心，通过引进核心国家技术，可以用相对较少的投资就带来一定规模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但是，在 2008-2009 年世界经济危机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平均技术水平与核心国家的差距缩小、核心国家加强对中国技术出口的限制，从核心国家引进的技术无法再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靠残酷剥削廉价劳动力发家的中国资本家阶级贪婪吝啬且急功近利，不可能投入足够的资源在需要长期投资和高风险的领域进行真正有突破性的创新；大量所谓的“创新”都是模仿性、应用性的。至于资产阶级国家推行的所谓“自主创新”产业政策，往往是各个资本家集团相互争夺、骗取财政补贴的产物，在执行中往往造成大量浪费，没有多少真正的成果。这样，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只有靠不断增加投资，来维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由于每一单位投资所能够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越来越少，这就导致平均投资效率不断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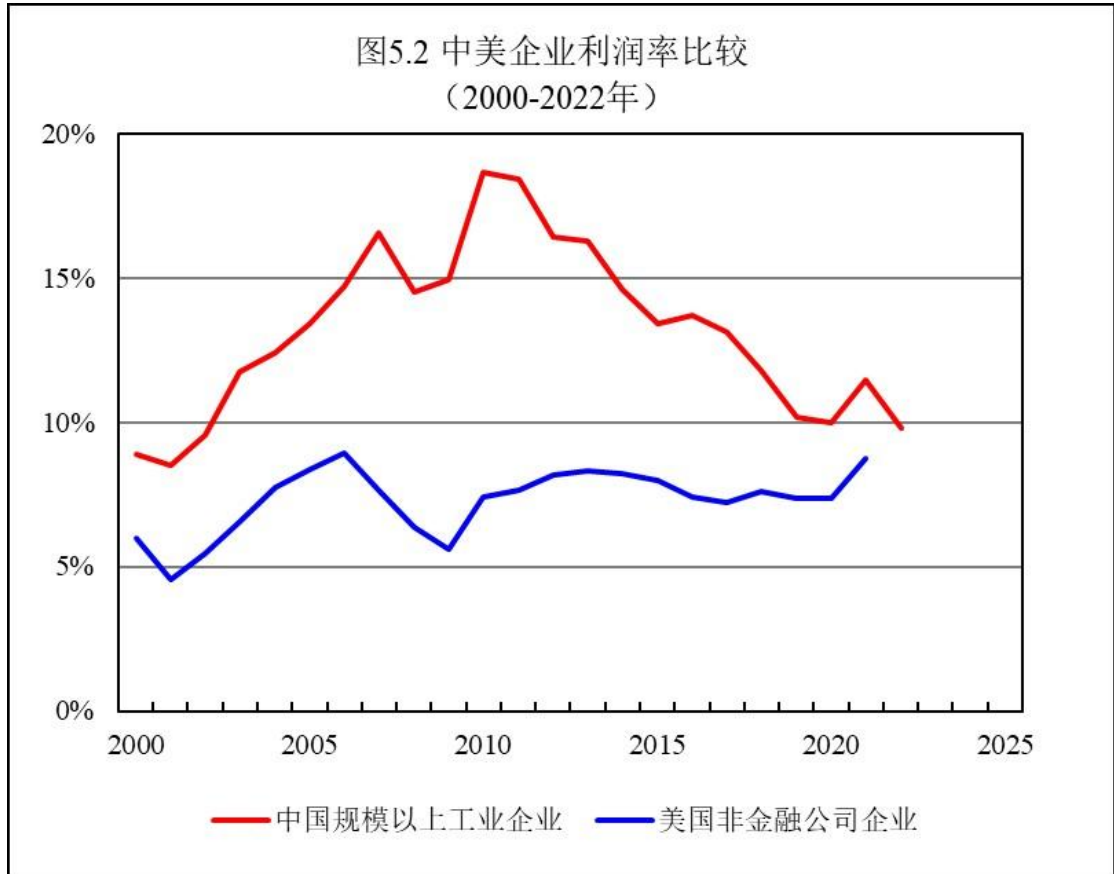
一个国家的平均利润率是利润份额与产出资本率的乘积。既然中国经济的利润份额和产出资本率在过去一个时期都趋于下降，那么，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也必然趋于下降。2007 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是 26%，比美国经济同年的平均利润率高 9 个百分点。到了 2020 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到了 13%，与 2007 年相比下降了一半，与美国经济 2020 年的平均利润率相比也要低两个百分点。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最大可能的利润。如果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持续下降，或迟或早，越来越多的资本家将丧失投资的动机，直至导致投资下降乃至崩溃，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危机和停滞。

为了挽救利润率下降造成的危险局面，资产阶级当局利用新冠疫情造成的一些特殊条件，一方面在反动清零政策的掩护下加紧对工人阶级的镇压，另一方面慷人民之慨，盗用国家财政资源推行给资产阶级“减税降费”的反动政策。在这些反动政策的共同作用下，过去两三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利润份额有所恢复，于2022年达到32%；由于产出资本率在过去几年继续下降，抵消了利润份额的上升，利润率暂时稳定在13%左右。

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已经下跌到美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以下。不过，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总利润中，相当一部分是金融资本的利润；企业部门净利息支付与金融公司利润之和大约占美国经济总利润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如果只看工业或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率，中国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目前仍然高于美国非金融公司企业的平均利润率。

图 5.2 比较了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与美国非金融公司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率用税前企业利润与按重置成本计算的企业净资产之比来计算；美国非金融公司企业的利润率用税前公司利润与固定资本存量之比来计算。



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于 2010 年达到资本主义经济正常发展时期的最高点（19%），此后即趋于下降。2020 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到了 10%；2021 年，工业企业平均利润率一度恢复到 11%；2022 年，工业企业平均利润率又下降到 10%。

相比之下，在上一个经济周期的扩张期，美国非金融公司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保持在 7%-8%。2021 年，美国非金融公司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上升到了 9%。未来，如果中国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继续趋于下降，并下降到美国以及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企业的利润率以下，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就会显著下降，同时大规模资本外逃的风险也会显著增加。

2022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21 万亿元；按市场汇率计算，约合 18 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生产总值的 18%。表 5.1 说明了 2001-2022 年期间中国经济的简单增长核算：

表 5.1 中国经济增长核算，2001-2022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0 年	2013-2022 年
年平均增长率：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官方）	10.6%	6.8%	6.2%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佩恩世界表）	9.8%	3.9%	3.3%
就业人数增长率	0.5%	-0.1%	-0.4%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9.2%	4.1%	3.7%
资本劳动比增长率	11.3%	11.5%	10.7%

设资本产出			
弹性为 0.5:			
资本劳动比	5.6%	5.8%	5.3%
提高的贡献			
自发的劳动	3.6%	-1.7%	-1.7%
生产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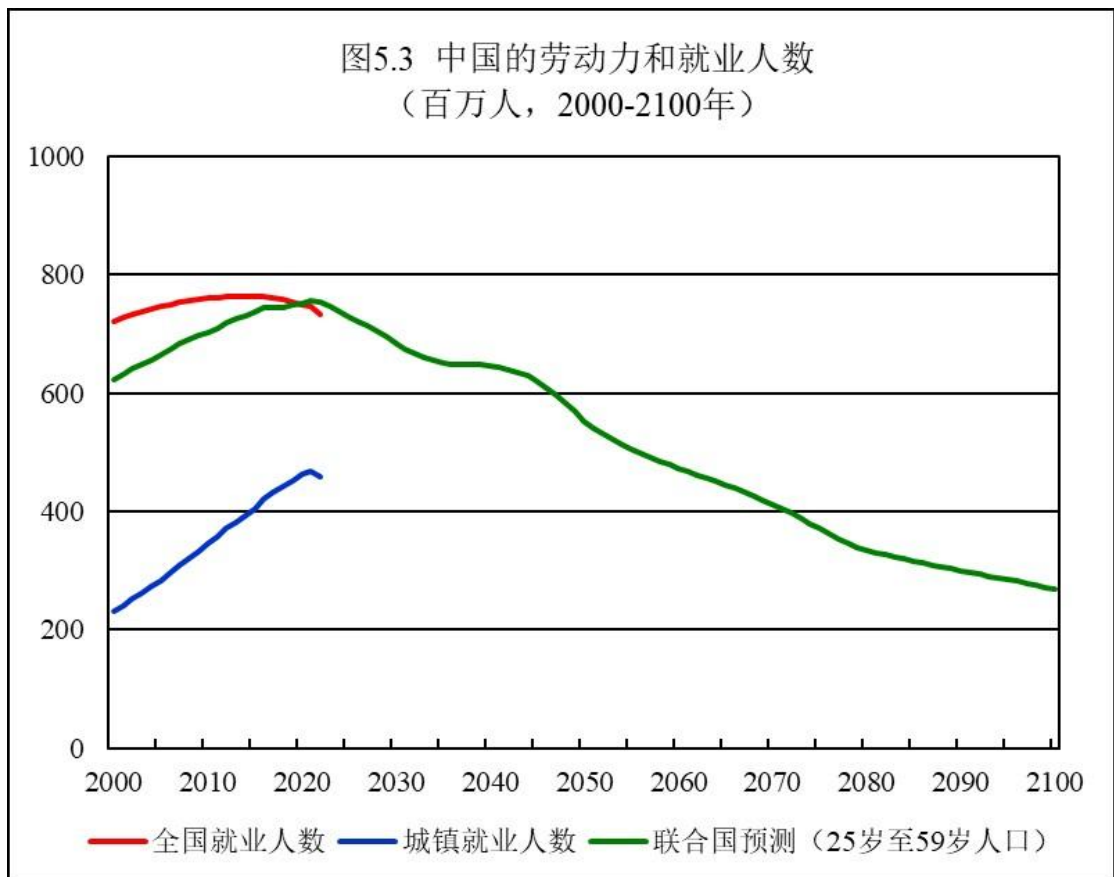
经济增长核算的原理是：经济增长率可以分解为劳动力（就业人数）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又可以按照一定的假设进一步分解为由资本劳动比（即每名就业人员装备的固定资本存量，反映机械化、自动化水平）提高带来的增长和“自发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从 2001-2010 年期间的 10.6% 下降到 2013-2022 年期间的 6.2%。不过，在第二期红色经济观察中曾经说明，中国的官方经济增长率很可能存在着严重的高估。按照佩恩世界表以及红色经济观察组调整过的数据，2001-2010 年期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 9.8%；2013-2022 年期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 3.3%。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的资本劳动比的增长速度保持在 10%-11%。尽管资本劳动比保持了快速增长，但是如果以佩恩世界表的数据为基础，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却从 2001-2010

年的 9.2% 下降到了 2013-2022 年的 3.7%。这说明，尽管中国的资本家拼命增加资本积累，但是每一元新投资所能够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却在不断下降。

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取决于中国未来劳动力数量的变化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图 5.3 说明了自 2000 年以来中国经济就业人数与 25 岁至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变化的情况以及按照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下属人口司的“中生育率”情景所预测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从现在至 2100 年变化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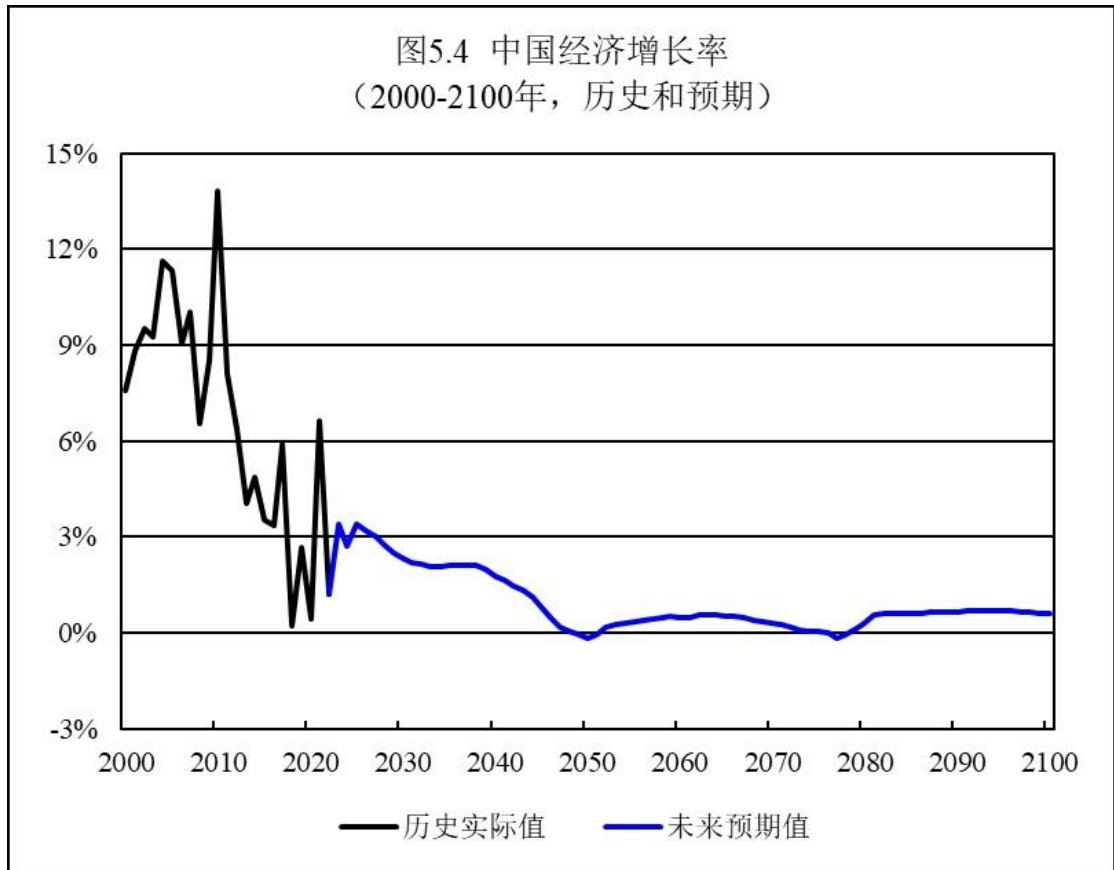


近年来，中国的就业人数与 25 岁至 59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大致相当。中国的 25 岁至 59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于 2021 年达到峰值（7.6 亿）。预计中国的 25 岁至 59 岁人口将于 2050 年下降到 5.5 亿，于

2100 年下降到 2.7 亿。就是说，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劳动力队伍将比现在减少约三分之二。我们假设，未来中国经济的就业人数将与 25 岁至 59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同步变化。

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在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相当于美国 1950 年的水平。1951-2019 年，美国经济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 1.7%。日本于 1975 年达到了美国 1950 年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76-2019 年，日本经济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 1.9%；韩国于 1991 年达到了美国 1950 年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0-2019 年，韩国经济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 2.1%。以上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这些国家在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或超过中国现在的水平以后，其长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都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保持在 2% 左右。根据这些国家的历史经验，我们假设，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将从现在的大约每年 4% 逐步下降到本世纪后半期的大约每年 2%。其他假设还有：中国企业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从现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逐步下降到 2050 年以后的 13%、固定资本折旧率为 4%。按照这些假设，可以预测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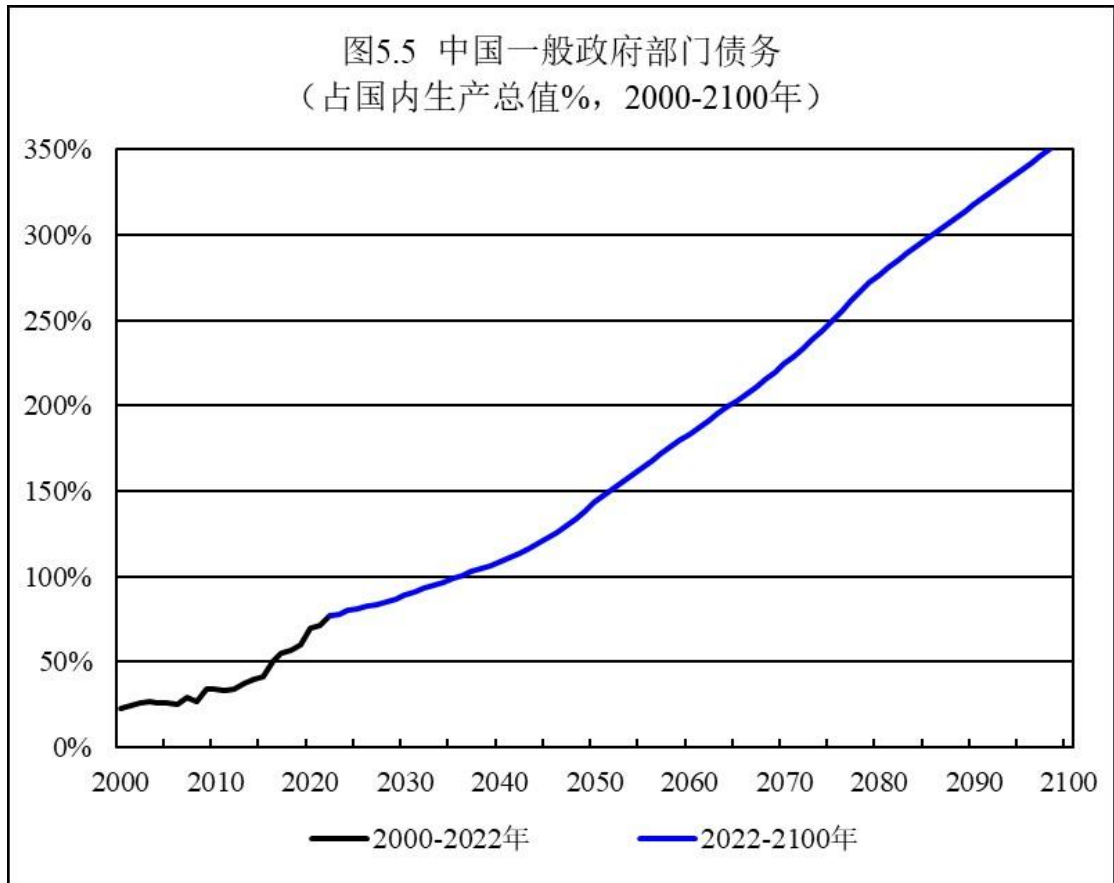
图 5.4 说明了中国自 2000 年以来的实际增长率及红色经济观察组预期的从现在起至 2100 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



预期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将每年增长大约 3%；到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经济的趋势增长率将下降到大约 2%。2050 年以后，如果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存在并“正常”发展，中国经济的趋势增长率将下降到接近零。

按照第三期红色经济观察所预期的美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率以及本期红色经济观察所预期的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率，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于 2040 年前后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 1.2 倍（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此后，随着中国劳动力队伍的加速减少，中国经济趋于零增长，中国经济规模相对于美国经济规模的比例将不断萎缩。到 2070 年前后，中国经济在总量上将被美国经济反超；到本世纪末，中国经济的相对规模将下降到美国经济的大约 80%。

图 5.5 说明了自 2000 年以来中国政府部门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变化的情况以及红色经济观察组预期的从现在起至 2100 年中国政府部门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趋于上升的情景：



近年来，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经济矛盾不断加深，迫使资产阶级国家不得不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社会保险支付以及镇压劳动人民反抗的“维稳”等支出，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机器也日益膨胀。另一方面，为了制止利润率的下降、讨好中外资本家，资产阶级国家又大力推行反动的“减税降费”政策。由于收不抵支，资产阶级国家的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导致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逐年上

升。中国政府部门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 2000 年的 23% 增加到了 2022 年的 77%。

按照图 5.4 所预期的中国经济未来的经济增长率，再假设未来中国政府部门初级财政赤字（即扣除了政府部门利息支付以后的财政赤字）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 3%、实际利率为 1%，那么，中国政府部门债务将于 2050 年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4 倍、于 2100 年增加到 3.6 倍。如果名义利率是 3%（假设到那时通货膨胀率为 2%），那么，到了 2050 年，中国政府每年支付的利息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 以上；如果名义利率是 5%（假设到那时通货膨胀率达到 4%），那么，到了 2050 年，中国政府仅每年支付的利息就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7%。

产能利用率和企业利润率 —— 兼评唯“生产过剩” 危机论的错误

作者：远航一号

近年来，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讨论中，很多青年同志都关心有关产能过剩与利润率之间关系的问题。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利润率是衡量一个资本主义经济是否运转正常、是否具有“活力”还是正在走向危机的最重要的经济指标。过去若干年来，红色中国网在大量分析中一直指出，由于中国作为半外围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工人阶级斗争力量上升，从而引起利润份额下降；另一方面中国的资本家阶级无法获得由核心国家垄断的先进技术，不得不用大量投资来勉强维持劳动生产率增长，从而导致产出资本率不断下降；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导致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趋于下降。利润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爆发难以克服的危机，进而陷入长期停滞。

由于许多青年同志对红色中国网的理论分析、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还不了解、不熟悉，在涉及到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现实的阶级斗争等问题时，往往陷入迷茫。有的人凭着主观臆测，期待危机与“革命”随时爆发，马上爆发。还有许多左派队伍中曾经“积极”的分子，看到自己从青少年时代就期待的“革命”几年过去了、十几年过去了，还不发生，于

是便灰心失望，“淡出政治”，与理想告别，淹没在资本主义世俗世界的汪洋大海中。

在关于经济危机的讨论中，有一种教条主义观点仍然流行。这种教条主义观点拘泥于传统教科书中某些特定的结论。持这种教条主义观点的人，看不到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上升，也看不到半外围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发展必定导致工人阶级的相对甚至绝对贫困化，必定导致工人阶级的购买力相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相对不足甚至绝对下降，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过剩越来越严重。在他们看来，由此引起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唯一可能的原因。他们既不承认也不愿意思考任何其他的可以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

比如，几个星期前在知乎上的一次讨论中，佐伊 23 公众号就认为：“危机的实质还是在于生产相对过剩。大量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或者大量设备闲置不能投入生产 … 就会形成危机。因此看经济是复苏还是恶化，从产能利用率（看）会更准确。”佐伊 23 又给出了评价工业产能是否过剩的数量标准：“产能利用率的同行指标大致如下：（1）低于 80%属于产能过剩。（2）低于 75%属于产能严重过剩。（3）高于 90%属于产能不足，需要投资扩产。”

所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爆发时都会伴随着消费和投资的减少，所以当危机已经爆发以后，当然会发生生产过剩以及产能过剩。但是，危机爆发时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并不等于就是危机的“实质”，也不能直接揭示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

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五章第 I 节中，马克思曾经指出：

总资本的增殖率，即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因为资本的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就这一点来说，利润率的下降会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从而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利润率的下降在促进人口过剩的同时，还促进生产过剩、投机、危机和资本过剩。

可见，在马克思看来，是利润率的下降导致了“生产过剩”、“危机和资本过剩”，而不是“生产过剩”导致了利润率下降，也不是“生产过剩”导致了危机；因为危机本身就表现为“生产过剩”、“资本过剩”。某种意义上，严重的“生产过剩”不过是危机的同义语。说一个人因为上呼吸道感染引起发烧，是有道理的。说一个人因为发烧而引起发烧，或者说发烧的“实质”就是发烧，那是属于毫无意义的废话。

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五章第 III 节中，马克思进一步强调了利润率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意义：

利润率即资本的相对增长率，对一切新的独立形成的资本嫩芽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只要资本的形成仅仅发生在某些可以用利润量来弥补利润率的极少数现成的大资本手中，使生产活跃的火焰就会熄灭。生产就会进入睡眠状态。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那种而且只有那种生产出来能够提供利润的东西才会被生产出来。英国经济学家对利润率下降的担忧就是由此产生的。单是这种可能性就使李嘉图感到不安，这正好表明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深刻理解。... 使

李嘉图感到不安的是：利润率，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积累的条件和动力，会受到生产本身发展的威胁。而且在这里，数量关系就是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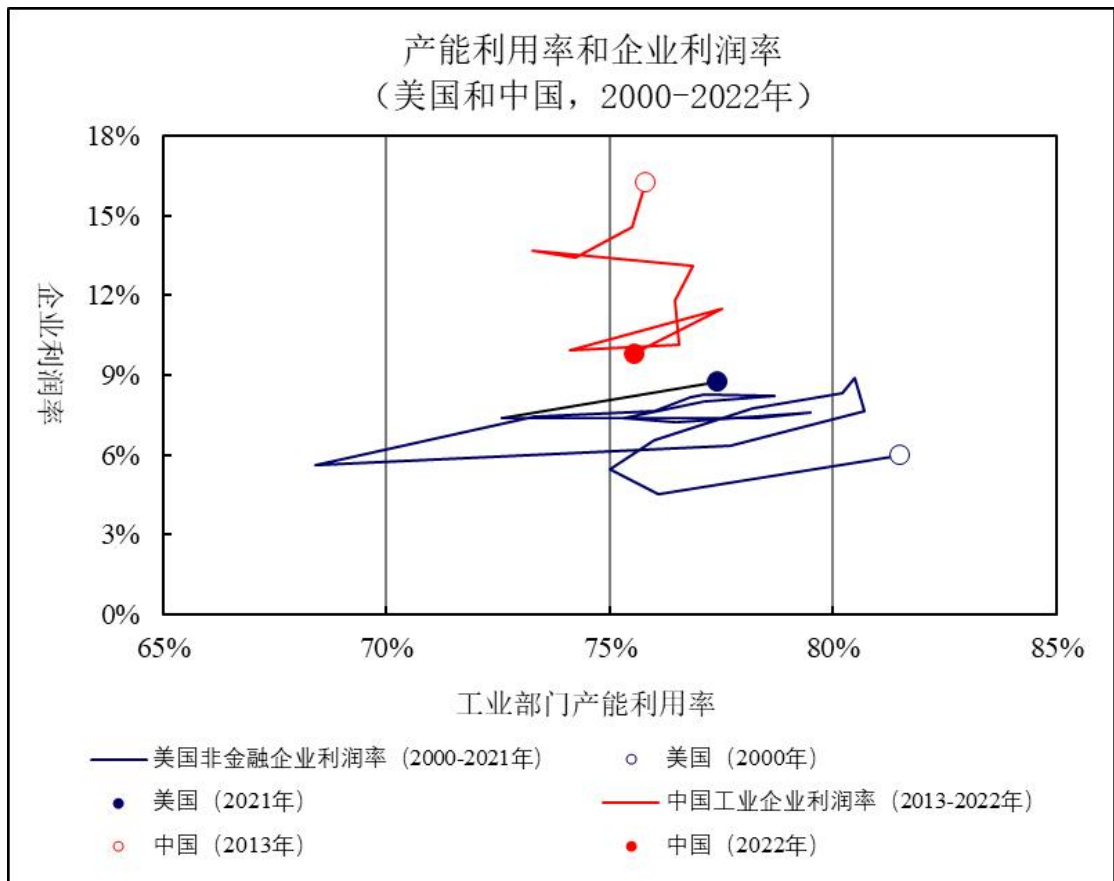
马克思在这里进一步强调了“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利润率对“资本嫩芽”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如果利润率的下降得不到制止，“使生产活跃的火焰就会熄灭”，“生产就会进入睡眠状态”。马克思还特别表扬了李嘉图，认为他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不安”表明了“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深刻理解”。

任何确实读过《资本论》第三卷的人都不会怀疑利润率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与关键的地位。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要评价资本主义经济“是复苏还是恶化”，当然要看“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是强劲有力还是萎靡不振，要看大多数资本家的积累有没有实现他们的目的（是否获得了足够高的利润率）。所以，我们对于佐伊 23 以及其他一些团队排斥利润率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指标，是不能理解的。其他经济指标，比如产能利用率，当然也可以参考。但除了利润率以外，其他的指标都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最根本的“推动力”，因而也就不能帮助我们把握资本主义积累以及危机的“实质”。

在本文的其余部分，笔者采用美国和中国的一些统计资料，简单比较一下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的产能利用率及企业利润率，并力图说明这两种指标与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之间的联系。

下面的图比较了美国和中国工业部门产能利用率与企业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图中，横轴显示的是工业部门的产能利用率，纵轴显示

的是企业利润率；其中，美国的企业利润率用非金融公司企业的税前利润率（税前利润与固定资本存量之比）来代表，中国的企业利润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税前利润率（利润总额与按重置成本计算的净资产之比）来代表。美国的产能利用率和企业利润率数据是从 2000 年到 2021 年；中国的产能利用率和企业利润率数据是从 2013 年到 2022 年。中国各年的产能利用率按照当年四个季度产能利用率的平均值来计算：



下面的表列举了 2000-2022 年期间美国和中国各年产能利用率和企业利润率的数据：

产能利用率和企业利润率（美国和中国，2000-2022 年）

《红色中国网文集 2023》

	美国 产能利用 率	美国 非金融企 业利润率	中国 产能利用 率	中国 工业企业 利润率
2000 年	81.5%	6.0%		8.9%
2001 年	76.1%	4.5%		8.5%
2002 年	75.0%	5.4%		9.5%
2003 年	76.0%	6.5%		11.8%
2004 年	78.2%	7.7%		12.4%
2005 年	80.2%	8.3%		13.4%
2006 年	80.5%	8.9%		14.7%
2007 年	80.7%	7.6%		16.5%
2008 年	77.7%	6.4%		14.5%
2009 年	68.4%	5.6%		14.9%
2010 年	73.3%	7.4%		18.7%
2011 年	76.0%	7.6%		18.4%
2012 年	76.8%	8.2%		16.4%
2013 年	77.1%	8.3%	75.8%	16.3%
2014 年	78.7%	8.2%	75.5%	14.6%
2015 年	77.1%	8.0%	74.2%	13.4%
2016 年	75.3%	7.4%	73.3%	13.7%
2017	76.5%	7.2%	76.9%	13.1%

年	2018	79.5%	7.6%	76.5%	11.8%
年	2019	78.3%	7.4%	76.6%	10.2%
年	2020	72.6%	7.4%	74.1%	10.0%
年	2021	77.4%	8.8%	77.5%	11.5%
年	2022	79.6%		75.6%	9.8%

从上图和上表中可以得出的第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产能利用率与企业利润率之间仅存在着不确定的联系。比如，2000年，美国非金融公司企业利润率为6%，当年工业部门产能利用率高达81.5%。2009年，美国非金融公司企业利润率为5.6%，与2000年相比仅少0.4个百分点；而当年工业部门产能利用率却大幅度下降至68.4%，与2000年相比减少了13个百分点。

从2013年至2022年，中国工业部门的产能利用率始终在73%至78%之间波动；2022年与2013年相比，产能利用率几乎没有变化。但是，恰恰在这一时期，中国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从2013年的16.3%减少到2022年的9.8%，减少了大约40%或近7个百分点。如果我们仅仅看有人认为“更准确”的产能利用率，那么就会忽略、无视这一时期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的利润率的大幅度下降。

那么，通过观察产能利用率，我们能否判断一个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在复苏、扩张还是即将陷入危机？到目前为止，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还没有爆发过真正的经济危机。所以，下面主要参考美国经济的经验来探讨产能利用率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

自进入本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共爆发过三次经济危机（2001年、2008-2009年、2020年）。在每一次经济危机中，危机年的产能利用率与危机爆发前的年份相比都有比较大幅度的下降。2000年至2001年，产能利用率下降了约5个百分点；2007年至2008年，产能利用率下降了3个百分点，2009年，又下降了约11个百分点；2019年至2020年，产能利用率下降了近7个百分点。

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确实表现为严重的生产过剩及生产能力的过剩。但是，这仅仅是“表现”。恰恰是在每一次危机爆发之前，产能利用率往往处在周期性扩张的最高点或接近最高点。在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的2007年，产能利用率高达近81%；而在同一经济周期中，利润率于2006年已经达到高峰并开始下降。在2020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的2018年，产能利用率接近80%；而在同一经济周期中，利润率于2012-2014年已经达到高峰并开始趋于下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周期中，利润率也是于1997年即达到高峰并开始下降。

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是利润率的下降导致了“生产过剩、投机、危机和资本过剩”，而不是“生产过剩”本身导致了生产过剩。

我们现在看到，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从2010年以来就趋于下降。但是，总体来说，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率仍然高于美国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率；即使是中国近年来最低的利润率也仍然高于美国在过去几个经济周期中最高的利润率。这说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相比，仍然有更大的“刺激”、更大的“推动力”，

只是这种“刺激”和“推动力”正在变得越来越虚弱。假以时日，当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下降到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相当甚至下降到后者以下的时候，频繁的危机和长期的停滞就必然要光顾到中国资本主义了。

我们认为，利润率是马克思主义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最主要、最关键的指标。如果不了解利润率对于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的作用，就不能做到如马克思所说的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深刻理解”。但是，我们并不排斥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参考产能利用率等其他指标。

即使作为参考指标，也存在着一个怎样正确使用的问题。佐伊 23 说：“产能利用率的同行指标大致如下：（1）低于 80%属于产能过剩。（2）低于 75%属于产能严重过剩。（3）高于 90%属于产能不足，需要投资扩产。”

笔者愚钝，不知道佐伊 23 所采用的关于产能过剩和产能严重过剩的标准有什么来源根据，是根据哪些国家哪个时期的经验总结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将佐伊 23 的上述标准套用到中国经济上，在有数据的 10 个年份中，中国经济年年“产能过剩”，其中三年（2015 年、2016 年、2020 年）还属于“严重过剩”。

如果我们将佐伊 23 的上述标准套用到美国经济上，在有数据的 23 个年份中，美国经济只有四年（2000 年和 2005-2007 年）不处在“产能过剩”的状态。按照佐伊版的“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年年产能过剩，在其中的绝大多数年份，经济不但不危机，反而不断

扩张。这就使得像“生产过剩”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概念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也就失去了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从过去二十多年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经验来看，在绝大多数年份（有数据的 23 个年份中的 16 个年份），美国工业部门的产能利用率都在 75%至 80%之间。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将这个区间视为产能利用率的正常状态。在美国工业部门产能利用率处于 75%至 80%之间的 16 个年份中，在其中的 14 个年份，美国经济都处于周期性扩张时期。不过，也有例外。2001 年，美国经济衰退，但产能利用率为 76%；不过，这一次美国经济的衰退属于温和衰退，当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上年相比还增长了 1%。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而产能利用率仍然接近 78%；当时美国经济刚刚开始陷入危机，2008 年全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前一年相比还微增了 0.1%。

2009 年，美国经济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2.6%，当年美国工业部门的产能利用率下降到 68%。2010 年，美国经济复苏，但失业率仍然高达 9.6%；这一年，美国工业部门的产能利用率恢复到 73%。2020 年，美国经济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2.8%，不过由新冠疫情造成的这次经济危机十分短暂，到了当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已经强劲复苏；这一年，美国工业部门的产能利用率不到 73%。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将产能利用率在 70%至 75%之间的区间视为一般的“产能过剩”状态，而将产能利用率不到 70%的情况作为产能“严重过剩”的状态。一般的“产能过剩”对应的是短暂危机或在危机边缘的年份，而产能“严重过剩”则对应比较严重、比较长时期的经济危机。

我们可以尝试用这些标准来评价中国工业部门各行业的产能利用状况。将 2022 年工业部门各行业各季度的产能利用率做简单平均计算后，得到如下结果：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74.9%；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92.0%；食品制造业，71.7%；纺织业，77.2%；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76.7%；医药制造业，75.5%；化学纤维制造业，82.3%；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包括水泥、砖瓦、玻璃、陶瓷制品业等），67.0%；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钢铁工业），76.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79.3%；通用设备制造业，79.2%；专用设备制造业，77.6%；汽车制造业，72.5%；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77.3%；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77.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72.4%。

在有数据的 16 个行业中，有 9 个行业产能利用处于正常范围，两个行业产能得到充分利用或高度充分利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四个行业存在着产能过剩现象（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食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电热气水生产和供应业），一个行业存在着严重产能过剩（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这些观察与我们认为当前中国仍然处于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而不是危机与革命前夜的判断是相一致的。

全球气候变化，1880-2022-2100 年

作者：红色能源观察

自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大量使用化石燃料，排放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氮等温室气体，使得地球表面的能量平衡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全球表面温度明显上升。2022 年，全球表面平均温度比 1880-1920 年的平均温度高 1.17 摄氏度。这里，以 1880-1920 年的平均温度来代表工业化以前年代的平均温度。在 2013-2022 年的十年期间，全球表面平均温度比 1880-1920 年的平均温度高 1.16 摄氏度。2023 年 7 月初，全球表面的日平均温度达到了有近代气温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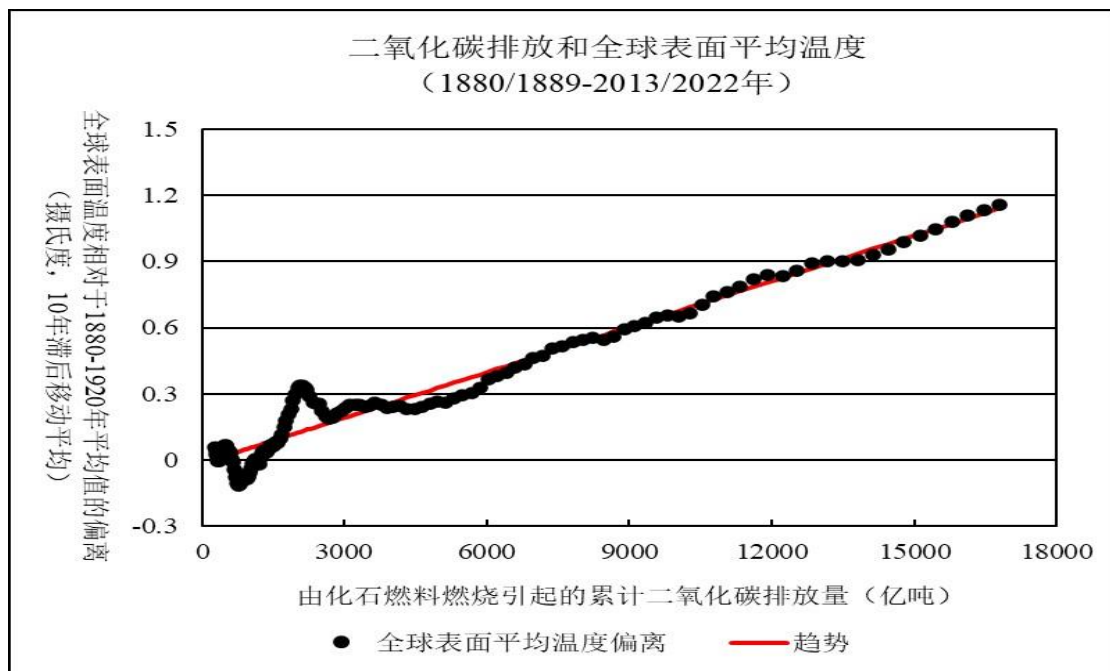


图 10.1 二氧化碳排放和全球表面平均温度（1880-2022 年）

图 10.1 说明了 1880-2022 年期间全球表面平均温度的变化与世界累计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全球表面平均温度用相对于 1880-1920 年平均温度的偏离来代表，并取 10 年滞后移动平均值。世界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指的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截止到某一年的全世界由于化石燃料燃烧而引起的全部二氧化碳排放。至 2022 年，世界累计排放二氧化碳 1.68 万亿吨。如图，全球表面平均温度偏离与世界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高度线性相关。用全球表面平均温度偏离对世界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做线性回归得到的结果是：全球表面平均温度偏离 = $-0.017 + 0.689 * \text{世界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 （单位：万亿吨）；回归 R 平方值：0.95。就是说，世界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增加一万亿吨，全球表面平均温度倾向于增加 0.69 摄氏度。

图 10.2 说明了 1960-2100 年期间全世界因化石燃料燃烧而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及其各个组成部分在历史上以及在未来预期变化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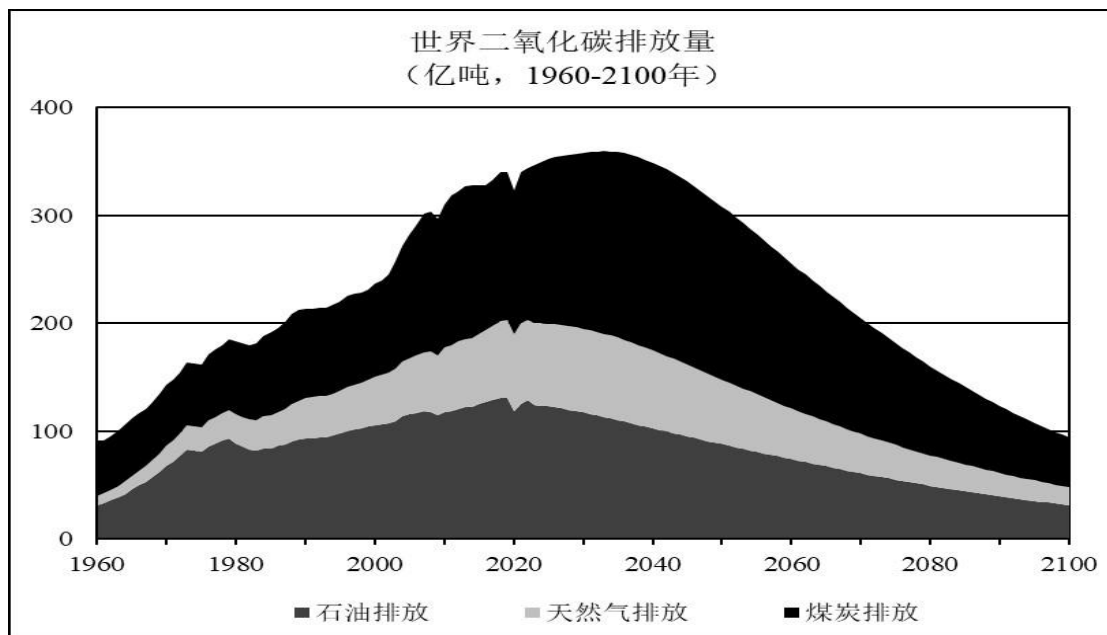


图 10.2 世界二氧化碳排放（1960-2100 年）

图 10.2 中的深灰色部分、浅灰色部分和黑色部分分别代表因为石油消费、天然气消费和煤炭消费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如果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未来“正常”发展，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生产得以大致正常进行，除了资源逐步枯竭和开采成本上升以外不受其他因素（比如环境政策）的限制，那么，预期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于本世纪三十年代达到约 360 亿吨，此后趋于下降；至 2050 年，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下降至约 310 亿吨；至本世纪末，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下降至 90-100 亿吨。按照这样的变化轨迹，在 2023-2100 年期间，世界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再增加 1.9 万亿吨。这样，到本世纪末，全球表面平均温度将比工业化以前时代上升 2.45 摄氏度。

图 10.3 说明了自 1880 年以来全球表面平均温度（用相对于 1880-1920 年平均温度的偏离来代表）在历史上变化的情况以及未来

预期变化的情况。图中，全球表面平均温度偏离取 10 年滞后移动平均值，以消除太阳黑子周期以及厄尔尼诺等现象所造成的短期气候波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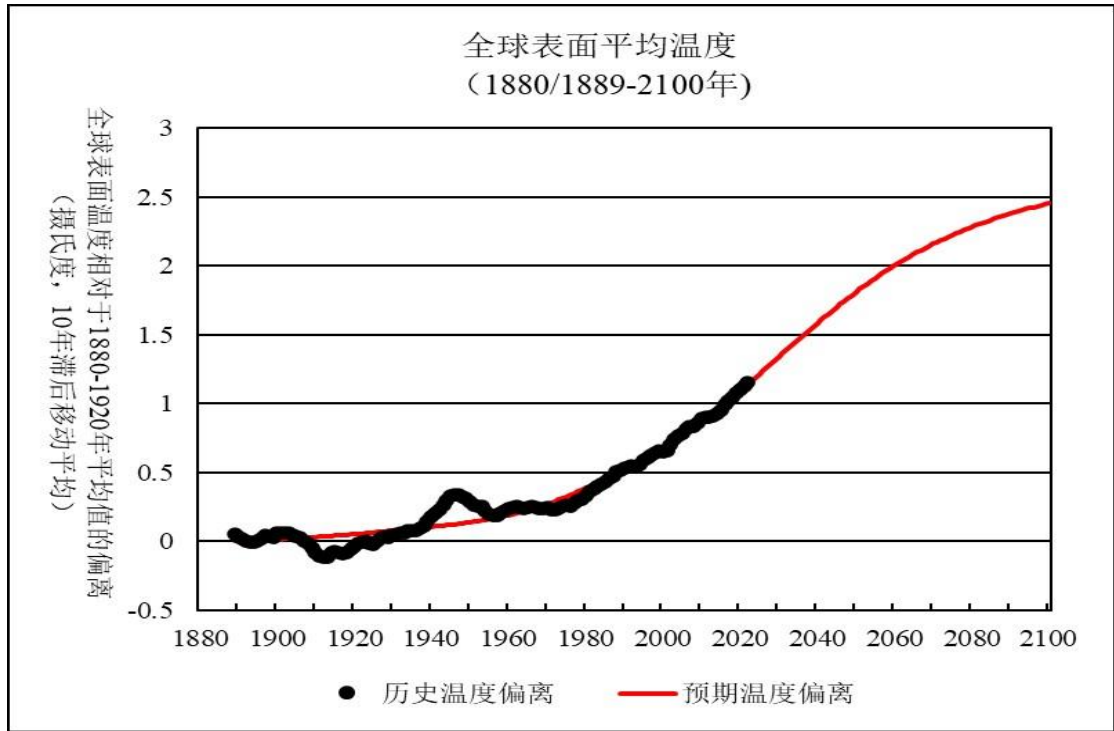


图 10.3 全球表面平均温度（1880-2100 年）

按照现有趋势，全球表面平均温度相对于 1880-1920 年的偏离将于 2060 年超过两摄氏度。此后，全球变暖速度可能会有所放缓。但是，至本世纪末，全球表面平均温度仍将按照每 10 年增加 0.07 摄氏度、每个世纪增加 0.7 摄氏度的速度上升。

如果全球变暖超过两摄氏度，将引起西南极洲冰盖融化，进而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 5-10 米，淹没世界上数量众多的沿海城市。全球变暖超过两摄氏度以后，还会通过南北两极附近的冰盖或海冰的融化

以及世界各地的植被变化，引起陆地和海洋生态或地质系统的一系列气候反馈。比如，北冰洋海冰融化后，将不再反射太阳光而是吸收太阳光带来的热能；北极地区的冻土带融化后，会释放大量的甲烷等温室气体；大洋中的浮游生物可能大量死亡，导致海洋食物链崩溃。

如果全球变暖超过三摄氏度，亚马逊热带雨林将崩溃，整个亚热带地区将沙漠化，几十亿人口可能成为环境难民。到那时，人类将完全失去对全球变暖过程的控制，即使不再有新的温室气体排放，全球变暖也将最终超过六摄氏度。

人在生理上可以承受的自然湿球温度（湿度 100%条件下的温度）极限大约是 35 摄氏度。超过这个极限，人体将无法有效向周边散热，新陈代谢过程将很快崩溃。现在，科学家们一般用湿球黑球温度（用湿球温度和实际感受温度的加权平均值来计算）来评估高温条件下人体所能承受的热强度。根据目前通行的国际标准，对于身体健康、适应当地气候的个人来说，为了维持正常的身体内部温度而可以忍受的湿球黑球温度的上限是 33 摄氏度；对于室外劳动的工人、老人、不适合当地气候的个人来说，可以忍受的湿球黑球温度上限要显著低于 33 摄氏度。

据研究，如果全球变暖超过两摄氏度，目前生活着大约 8 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的地区，将每年经历至少一次湿球黑球温度超过 33 摄氏度的极端热浪天气；如果全球变暖超过 4.5 摄氏度，目前生活着大约 26 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的地区，将每

年经历至少一次湿球黑球温度超过 33 摄氏度的极端热浪天气；如果全球变暖超过六摄氏度，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地区将不再适合人类生存。

可见，气候变化是目前人类在生态环境领域所面临的最大危机。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全球资本主义积累以后，全世界的生态系统正面临崩溃，人类文明在过去几千年赖以存续的物质基础可能在未来的一两百年蒙受灭顶之灾。仅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要避免全球生态系统崩溃并维持人类的繁衍、文明的传承，必须在本世纪末以前将全球变暖的幅度限制在两摄氏度以下。

按照过去十年平均的全球表面温度计算，目前的全球表面温度比工业化以前时代已经高出了 1.16 摄氏度。所以，要在本世纪末以前将全球变暖的幅度限制在两摄氏度以内，从现在起到 2100 年之间的全球变暖不能超过 0.84 摄氏度。按照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的历史趋势，世界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增加一万亿吨，全球表面平均温度倾向于增加 0.69 摄氏度。所以要将未来 78 年的全球变暖限制在 0.84 摄氏度以内，在 2023 年至 2100 年之间的世界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不能超过 12200 亿吨。

这 12200 亿吨的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就是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全世界的总碳排放预算。如果现在有一个世界社会主义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那么就可以按照这个总的碳排放预算，从现在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减少全球范围的二氧化碳排放，并完成至本世纪末将全球变暖限制在两摄氏度以内的目标。

但是，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既没有公有制计划经济，也没有世界政府。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由彼此相互竞争的大大小小的民族国家组成的。所以，全世界的总碳排放预算必须分配给各个大大小小的民族国家。理论上，可以设想两种可能的分配方案。一是“惯性方案”，即各国在未来的碳排放预算占全世界总预算的比例等于这些国家现有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世界总排放量的比例。二是“公平方案”，即各国在未来的碳排放预算占全世界总预算的比例等于这些国家现有的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大致来说，惯性方案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较大的半外围国家比较有利，而公平方案则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国家相对有利。其它各种可以设想的、在政治上有可能被大多数国家接受的碳排放预算分配方案无非是上述两种方案的某种结合或折衷。

2022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106亿吨，占全世界总排放量的31%；中国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的18%。所以，按照公平方案，中国在未来可以累计排放二氧化碳约2200亿吨。如果要满足公平方案的约束，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当从2023年立即开始下降，并且从现在起至2100年每年下降4.7%（至2050年比现在下降74%，至2100年比现在下降98%）。

在过去十年中（2013-2022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3.3%（已经扣除了官方统计中的浮夸部分），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平均增长1.6%，这意味着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碳排放强度年平均下降1.6%。如

果中国在未来保持过去十年的碳排放强度下降速度，那么，要满足公平方案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轨迹，中国经济在未来应当每年下降 3.2%。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包括了北美、西欧、日本、澳大利亚等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高收入资本主义国家，简称“经合组织国家”或“OECD 国家”，俗称“发达国家俱乐部”。经合组织国家可以大致上代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和一些高收入半外围国家。

2022 年，经合组织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116 亿吨，占全世界总排放量的 34%；经合组织国家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的 17%。所以，按照公平方案，经合组织国家在未来可以累计排放二氧化碳约 2100 亿吨。如果要满足公平方案的约束，经合组织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当从 2023 年立即开始下降，并且从现在起至 2100 年每年下降 5.5%（至 2050 年比现在下降 79%，至 2100 年比现在下降 99%）。

在过去十年中（2013-2022 年），经合组织国家经济年平均增长 1.9%，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平均下降 0.9%，这意味着经合组织国家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碳排放强度年平均下降 2.7%。如果经合组织国家在未来保持过去十年的碳排放强度下降速度，那么，要满足公平方案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轨迹，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在未来应当每年下降 2.9%。

“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了除中国和经合组织国家以外的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2022年，世界其他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122亿吨，占全世界总排放量的36%；世界其他国家的总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的65%。所以，按照惯性方案，世界其他国家在未来可以累计排放二氧化碳约4200亿吨。如果要满足惯性方案的约束，世界其他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当在2023年立即开始下降，并且从现在起至2100年每年下降2.4%（至2050年比现在下降49%，至2100年比现在下降85%）。

在过去十年中（2013-2022年），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年平均增长3.0%，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平均增长1.5%，这意味着世界其他国家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碳排放强度年平均下降1.5%。如果世界其他国家在未来保持过去十年的碳排放强度下降速度，那么，要满足惯性方案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轨迹，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在未来应当每年下降0.9%。

另一方面，按照公平方案，世界其他国家在未来可以累计排放二氧化碳约7900亿吨。世界其他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在2034年以前继续增长，以后再逐步下降；至2100年，世界其他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比现在下降61%。

图10.4说明了中国、经合组织国家、世界其他国家自2000年以来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历史上变化的情况以及未来按照公平方案的要求分别应当实现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下降的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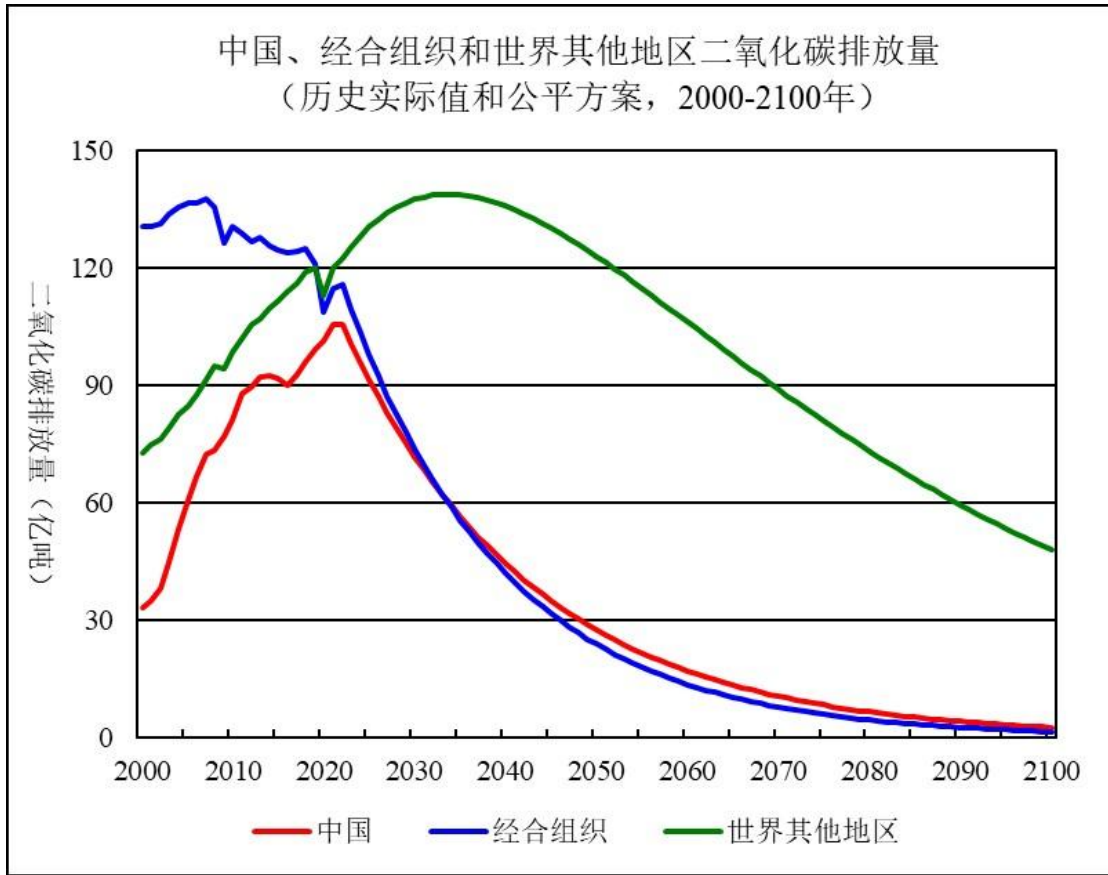


图 10.4 二氧化碳排放量（历史实际值和公平方案，2000-2100 年）

综上所述，在惯性方案下，世界其他国家（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的经济必须负增长。一般来说，资本主义国家无法长期在经济负增长的条件 下维持经济和政治稳定。不仅如此，南亚、中东、非洲、拉丁美洲等许多国家的人口目前仍然在快速增长。在这样的条件下，长期经济负增长将引起这些地区社会秩序的全面崩溃，进而颠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在公平方案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在未来一个时期继续增长；然而，经合组织国家和中国都必须接受长期经济负增长。这就会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地区陷入经济和政治动荡，同样会颠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国资产阶级也无法实现其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领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迷梦。

以上分析表明，如果要采取必要措施以避免到本世纪末以前全球变暖超过两摄氏度，那么，无论是中国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都无法保持基本的经济和政治稳定。另一方面，如果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继续存在下去，则将威胁到整个人类文明赖以存续的物质基础。

上述分析还说明，未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尽快地在公有制计划经济条件下向经济零增长或负增长过渡，并力争在满足全体劳动群众基本需要的同时来实现中国以及世界的生态可持续性。

中国资产阶级国家几种财政收支账户的区别和联系

作者：远航一号

这几天，在红色中国网上围绕中国资产阶级国家财政收入的规模展开了讨论（“关于中国财政收入规模以及国企对财政的贡献”）。中国资产阶级国家的财政收支统计庞杂而混乱，以所谓的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社会保险基金四大账户为基础。资产阶级的御用经济学者、小资产阶级右派评论家往往利用其中的混乱，编造中国资产阶级国家“强大”、对经济“干预过多”的神话；典型的做法，是将上述四大账户的收入和支出简单相加以得出政府部门占整个经济很大比例的结论。还有一些“左派”网络评论家，也跟在右派后面鹦鹉学舌，有意无意地充当右派的帮手。

如上一次讨论所说，对中国资产阶级国家财政收入和支出的计算要以资金流量表为基础。资金流量表的数据与资产阶级国民收入核算中的各项数据（也就是用生产法、收入法、支出法所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等数据）相一致，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收支统计口径一致或接近，是相对比较可靠的。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从资金流量表中得出的财政收支各项数据与所谓四大账户中的收支各项数据相比较，尽可能厘清两方面数据之间的关系和差别，并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不能简单地以四大账户为基础来计算中国资产阶级国家的财政收支。

下面的表一，以 2020 年的数据为例，概括了资金流量表与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社会保险基金四大账户中收入各项的区别和联系。表中数据以万亿元为单位。202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101.4 万亿元；所以，每一万亿元大致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

表一 中国政府部门财政收入，2020 年
(单位：万亿元)

资金流量表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本经营	社会保险基金
生产税净额	间接税总额			
8.85	专项收入			
	11.34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3.64	3.64			
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1.16	1.16			
利息收入				
0.76				
红利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0.62	0.19		0.48	
地租收入	国有资产有偿使用	24 项基金收入		
0.99	0.99	1.13		
转移支付收入	行政事业收费			
0.93	罚没收入			
	其他收入			
	0.96			
社会保险缴款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5.48				7.55
非金融资产转让		国有土地出让		
3.40		8.22		
合计：25.83	18.29	9.35	0.48	7.55

在资产阶级国家的财政统计中，广义政府部门的收入包括各项税收、财产收入、转移支付收入、社会保险缴款、非生产类非金融资产（即土地）转让净收入等几大类。

首先看各项税收。通过比较资金流量表与一般公共预算账户中的税收项目可以发现，两者所列出的企业所得税收入和个人所得税收入完全一致，分别为 3.64 万亿元和 1.16 万亿元。

资金流量表与一般公共预算账户所列出的间接税各项不尽一致。在资金流量表中，生产税净额为 8.85 万亿元。所谓生产税，包括各

种间接税以及政府向企业征收的附加费，举例来说，包括“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烟酒专卖专项收入、进口税、固定资产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排污费、教育费附加、水电费附加等。”生产税净额则等于生产税减去政府给企业的补贴（如价格补贴、政策性亏损补贴）。

在一般公共预算账户中，间接税总额（这里说的间接税总额包括除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以外的所有其他各项税收）为 10.63 万亿元，另有专项收入 7100 元。据了解，财政专项收入“是指根据特定需要由国务院批准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由财政部批准，设置、征集和纳入预算管理、有专门用途的收入。包括排污费收入、水资源费收入、教育费附加收入、矿产资源补偿费收入等。”这里，专项收入可以理解为政府向企业征收的各种附加费。间接税与附加费之和为 11.34 万亿元，比资金流量表中的生产税净额多了 2.49 万亿元。

从统计概念来说，资金流量表中的生产税净额指的是间接税加附加费减补贴，所以资金流量表中的生产税净额与一般公共预算账户中的间接税和附加费总额之间的差额，（如果不考虑其他统计遗漏和误差的话）应当就是政府向企业部门提供的补贴。考虑到 2020 年是新冠疫情年，政府向企业部门所提供补贴的数额比较庞大，是有可能的。

在财产收入各项中，资金流量表中列有利息收入一项；而在一般公共预算账户和其他账户中没有与之相同或接近的项目。这可能是由

于，广义政府部门中的利息收入主要是资产阶级国家所属中央银行的收入，按照资产阶级国家中央银行“独立”运营的原则，不纳入中央政府财政收支的范围。

在资金流量表中，广义政府部门获得的红利收入为 6200 亿元。在其他账户中，与之相接近的是国有资本经营账户中的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4800 亿元。此外，在一般公共预算账户下，也有一项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数额为 1900 亿元，这是从国有资本经营账户划拨的；如与国有资本经营账户下的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相加，就会发生重复计算。

在资金流量表中，广义政府部门获得的地租收入为 9900 亿元。在其他账户中，与之相接近的是一般公共预算账户中的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 9900 亿元。据了解，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包括“土地出让金收入、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海域使用金、探矿权和采矿权使用费及价款收入、场地和矿区使用费收入；出租汽车经营权、公共交通线路经营权、汽车号牌使用权等有偿出让取得的收入；政府举办的广播电视机构占用国家无线电频率资源取得的广告收入；以及利用其他国有资源取得的收入。”其中一部分或者全部可能来自于政府性基金账户中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以及其他一些基金收入；如与政府性基金账户下的收入简单相加，就会发生重复计算。

在资金流量表中，广义政府部门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为 9300 亿元。在其他账户中，与之相接近的是一般公共预算账户下非税收入中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其他收入三项，共 9600 亿元。

在资金流量表中，广义政府部门获得的社会保险缴款为 5.48 万亿元。与之相比，2020 年，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的总收入为 7.55 万亿元；后者比前者多了 2.07 万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中多出来的 2.07 万亿元来自于政府部门的财政拨款。所以，如果将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与政府部门的其他财政收入简单相加，就会发生巨大数额的重复计算。

在政府性基金账户下，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高达 8.22 万亿元。资产阶级御用经济学者、低级庸俗的右派网络评论家以及一些“左派”网上“乐子人”常常喜欢引用这项数字，以夸大所谓“土地财政”的作用，并且利用人民群众对买不起房的不满，将责任推到所谓“政府对土地垄断”上，撇清资本家的责任。然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所得收入中，相当一部分是用于对城市居民的拆迁补偿和对农村居民的征地补偿。只有从国有土地使用出让金名义上的总收入中扣除拆迁补偿、征地补偿等费用后，才能得到政府部门实际获得的、可用于公共服务的净收入。

在资金流量表中，土地转让净支出或收入列在运用条目中的“其他非金融资产获得减处置”一项下。其中，企业部门这一项的数值为正值，即企业部门购买土地的支出大于出售土地的收入；广义政府部

门、住户部门这一项的数值为负值，即广义政府部门、住户部门购买土地的支出小于出售土地的收入，由此发生的负值用来冲减支出。

在表一中，我们还是将广义政府部门出售土地的净收入列为政府部门收入的一项。2020年，企业部门购买土地净支出为6.89万亿元，广义政府部门出售土地净收入为3.4万亿元，住户部门出售土地净收入（实际上应当是城市和农村居民通过拆迁、征地补偿得到的收入）为3.49万亿元。广义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出售土地的净收入等于企业部门购买土地的净支出。

综上所述，资金流量表中广义政府部门各项收入之和为25.8万亿元。相比之下，如果将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社会保险基金四大账户的收入简单相加，总额将高达35.8万亿元，其中有多项重复计算，且未扣除对住户部门的拆迁、征地补偿，严重夸大政府部门的收入规模。

将资金流量表中收入各项与其他四大账户相比较，可以发现，除社会保险缴款、非金融资产转让（土地出售净收入）两项外，资金流量表中广义政府部门收入的大部分项目与一般公共预算账户中财政收入的各项接近或重合。在各种误差相互抵消后，资金流量表中的广义政府部门总收入大致相当于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之和。

表二概括了 2020 年资金流量表与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社会保险基金四大账户中支出各项的区别和联系。

表二 中国政府部门财政支出，2020 年

(单位: 万亿元)

资金流量表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本经营	社会保险基金
政府消费 17.36	一般公共服务 外交国防公安 教育科技文化 卫生健康 城乡社区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 粮油物资储备 灾害防治应急 14.47			
政府净投资 4.39	各项经济建设 住房保障支出 5.85			
投资性补助 1.46			国企资本金注入 0.23	
社会补助 1.66	社会保障和就业 3.26		国企改革成本 0.03	
社会保险福利 5.74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7.86
利息支付 1.29	债务利息支付 0.99			
合计: 31.90	24.57	11.81	0.26	7.86
赤字: 6.06	6.28	2.46	-0.22	0.31

在表二中，广义政府部门各项支出中最大的一项是政府消费，共 17.36 万亿元；这一项也就是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政府消费”。在中国现在的资金流量表中，政府消费分别列为政府向住户部门提供的“实物社会转移”以及政府部门的“实际最终消费”两项。前者，实际上就是政府向教育、卫生、科研、文化等事业单位提供的财政拨款；后者，则包括政府部门雇员的工资和福利、政府日常办公费用以及政府部门固定资产的折旧。

在一般公共预算账户下的各项支出中，与政府消费相关的支出项目有：一般公共服务、外交支出、国防支出、公共安全支出、教育支出、科技支出、文化体育传媒支出、卫生健康支出、城乡社区支出、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支出、粮油物资储备支出、灾害防治和应急支出等。以上各项相加，共 14.47 万亿元，与资金流量表中的政府消费相比，尚少 2.89 万亿元。

在资金流量表中，广义政府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 5.6 万亿元。这主要是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建造办公大楼、购置办公设备、新建非营利性基础设施而发生的支出；此外，军队警察购买武器装备、建设军事基地的费用也包括在这一项里。然而，政府部门固定资产的折旧已经包括在前述的政府消费中，所以，为避免重复计算，要将其从政府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扣除。在资金流量表中，政府部门固定资产折旧可以用政府部门增加值减去政府部门劳动者报酬得出。减去固定资产折旧后，政府部门净投资为 4.39 万亿元。

投资性补助，指的是政府向企业部门提供的财政拨款，“用于基本建设、更新改造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政府部门净投资与投资性补助相加，为 5.85 万亿元；正好等于一般公共预算账户中各项经济建设支出（包括农林水支出、交通运输支出、资源勘探支出、工业和信息产业支出、商业服务业支出和金融支出）与住房保障支出之和。所谓“住房保障支出”相当于政府在房地产业上的支出。

在资金流量表中，广义政府部门社会补助支出 1.66 万亿元。在一一般公共预算账户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为 3.26 万亿元。后者比前者多了 1.6 万亿元，这多出来的 1.6 万亿元由财政拨款给社会保障基金账户作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的一部分（此外，在一一般公共预算账

户中的卫生健康支出中，也划拨出几千亿元作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的一部分）。

在资金流量表中，广义政府部门支付社会保险福利 5.74 万亿元。在社会保险基金账户中，2020 年，社会保险基金总支出为 7.86 万亿元；后者比前者多了 2.12 万亿元。

在资金流量表中，广义政府部门支付利息 1.07 万亿元，这与一般公共账户中政府部门支付债务利息以及债务发行费用 9900 亿元十分接近。此外，广义政府部门支付其他财产收入 2200 亿元。

综上所述，资金流量表中的广义政府部门合计支出 31.9 万亿元。用表二中的广义政府部门支出合计减去表一中的广义政府部门收入合计，去除四舍五入误差后，得出广义政府部门赤字 6.06 万亿元，与资金流量表中广义政府部门净金融投资负 6.06 万亿元相一致。

与一般公共预算账户下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总支出相比，广义政府部门的总支出多了 7.33 万亿元。这 7.33 万亿元是从哪里来的呢？广义政府部门的支出包括了社会保险福利支出，而一般公共预算账户不包括这项开支。扣除社会保险福利支出后，余额是 1.59 万亿元。但是，如前所述，政府部门给社会保险基金划拨了 2.07 万亿元；这样，广义政府部门支出中有待解释的缺口就是 3.66 万亿元。

如上所述，社会保险基金账户下的总支出比资金流量表中广义政府部门的社会保障福利支出要多了 2.12 万亿元。如果查阅 2020 年全

国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决算表，可以发现，职工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之和为 2.14 万亿元，与社会保险基金总支出与社会保险福利支出之间的差额很接近。如果这多出来的 2.12 万亿元支付给了医院和卫生部门的其他单位，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这属于政府购买的医疗服务，可以视为政府消费的一部分。这样，广义政府部门支出中有待解释的缺口就是 3.66 万亿元减 2.12 万亿元，等于 1.54 万亿元。

此外，国有资本经营账户稍有盈余（表二中，国有资本经营账户赤字为负值，代表盈余），且盈余的大部分已经划拨给了一般公共预算账户。

接下来看政府性基金账户。2020 年，各种政府性基金账户的总支出为 11.81 万亿元。在讨论表一时曾经提到过，住户部门出售土地净收入 3.49 万亿元；这 3.49 万亿元应当就是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基金中支付给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拆迁、征地补偿。扣除这 3.49 万亿元后，政府性基金账户其余项目的总支出为 8.32 万亿元。

此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基金不仅卖地，而且买地。如前所述，2020 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总收入是 8.22 万亿元，而当年企业部门买地净支出为 6.89 万亿元。假设两者之间的差距即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基金向企业部门买地的支出，则政府性基金账户有待解释的支出可以再减少 1.33 万亿元，余额为 6.99 万亿元。

在讨论表一时还提到过，一般公共预算账户下的几种收入实际上来自于从政府性基金账户划拨。如果假设一般公共预算账户中的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都来自政府性基金账户的划拨，那么，政府性基金支出有待解释的余额可以再减少 9900 亿元，尚有 6 万亿元需要解释。

按照前面的计算，广义政府部门支出中有待解释的缺口是 1.54 万亿元。假设这一缺口是由政府性基金账户支出的一部分来解释的，那么，政府性基金账户支出中有待解释的余额可以进一步减少为 4.46 万亿元。

这 4.46 万亿元又花到哪里去了呢？在讨论表一时曾经提及，广义政府部门的生产税净额为 8.85 万亿元，而一般公共预算账户下的间接税和附加费总额为 11.34 万亿元，两者之差应当是政府给企业部门的各项补贴；这些补贴属于对企业日常经营的补贴，区别于前面说过的投资性补助。这些补贴没有出现在资金流量表广义政府部门的各项支出中，但应当确实发生了。假设政府性基金账户支出中的一部分直接或间接用于支付政府给企业部门的补贴（2.49 万亿元），这样，政府性基金账户支出中尚有 1.97 万亿元需要进一步解释。

通过查对财政部印发的《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这 1.97 万亿元可能与地方政府因发行专项债券而发生的还本付息支出有关。

表一 中国政府部门财政收入，2020 年

（单位：万亿元）

《红色中国网文集 2023》

表	现金流量	一般公共 预算	政府性基 金	国有资本 经营	社会保险 基金
额	生产税净	间接税总			
	8.85	专项收入			
		11.34			
税	企业所得	企业所得			
	3.64	3.64			
税	个人所得	个人所得			
	1.16	1.16			
	利息收入				
	0.76				
	红利收入	国有资本 经营收入		国有资本 经营收入	
	0.62	0.19		0.48	
	地租收入	国有资源 有偿使用	24项基 金收入		
	0.99	0.99	1.13		
收入	转移支付	行政事业 收费			
	0.93	罚没收入			

《红色中国网文集 2023》

	其他收入			
	0.96			
社会保险 缴款				社会保险 基金收入
5.48				7.55
非金融资 产转让		国有土地 出让		
3.40		8.22		
合计： 25.83	18.29	9.35	0.48	7.55

表二 中国政府部门财政支出，2020年

(单位：万亿元)

资金流量 表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 金	国有资本 经营	社会保险 基金
政府消费	一般公共 服务			
17.36	外交国防 公安			
	教育科技			

《红色中国网文集 2023》

文化

卫生健康

城乡社区

自然资源
海洋气象

粮油物资
储备

灾害防治
应急

14.47

资

政府净投

各项经济
建设

4.39

住房保障
支出

5.85

助

投资性补

国企资本
金注入

1.46

0.23

社会补助

社会保障
和就业

国企改革
成本

1.66

3.26

0.03

社会保险
福利

社会保险
基金支出

5.74

7.86

《红色中国网文集 2023》

利息支付	债务利息			
1.29	支付			
	0.99			
合计:	24.57	11.81	0.26	7.86
31.90				
赤字:	6.28	2.46	-0.22	0.31
6.06				

中国资产阶级的“短策”、“长策”与“无策”

作者：远航一号

前两天，在一个帖子下面与爱琳娜和其他网友讨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等问题。这里，继续就相关问题做一些提纲挈领的、非正式的讨论，分别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角度来考察中国资本主义所面临的眼前矛盾与长远的、根本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

中国资本主义的近期矛盾与资产阶级可以采取的“短策”

在经过了 2021 年相对强劲的经济复苏以后，资产阶级当局在 2022 年坚持反动的“清零”政策，尽管后来被迫放弃，仍然给劳动人民的正常生活造成严重干扰并打击了资本家阶级的“信心”；再加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利润率长期趋于下降、世界资本主义风雨飘摇，到了今年上半年，终于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的现象。

目前，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些主要表现有：

(1) 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偏低：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59.3 万亿元，去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56.26 万亿元；今年上半年与去年上半年相比，名义 GDP 增长 5.4%。相比之下，新冠疫情之前的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名义 GDP 的增长率分别为 11.5%、10.5%、7.3%；新冠疫情肆虐的 2020 年，名义 GDP 增长 2.7%；经济复苏的 2021 年，名义 GDP 增长 13.4%；实行严厉“清零”政策

的 2022 年，名义 GDP 增长 5.3%。今年上半年名义 GDP 的增速与实行严厉“清零”政策的 2022 年差不多。

(2) 物价水平下降：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微增 0.7%，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下降 3.1%；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降 0.3%，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下降 4.4%。

(3) 企业利润下降：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3.39 万亿元，按官方“可比口径”计算，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约 17%；如与去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4.27 万亿元直接比较，则下降 21%。

(4) 按美元计价的进出口总值下降：今年前七个月，按美元计价的货物出口总值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5%，进口总值下降 7.6%；其中，7 月份，按美元计价的货物出口总值下降 14.5%，进口总值下降 12.4%。

此外，还有两个方面的指标，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一是关于就业和失业的指标。今年上半年，16-24 岁青年失业率约 21%。但是，官方数据也显示，至今年二季度末，外出农民工总数达到 1.87 亿，比去年同期增加 3.2%；外出农民工月收入达到约 4600 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6.5%。目前，虽然大学毕业生面临严重就业压力，但就整个劳动力市场来说，到底是普遍失业严重还是不同种类劳动力供需不平衡、过剩与紧缺并存，还需要看到更多的数据才能加以澄清。

再就是关于工业部门产能利用方面的指标。今年二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4.5%。我们以前研究过，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工业

产能利用率如果在 75%至 80%之间，大致属于正常范围。目前的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还只是略低于正常范围的下限，产能过剩的程度还不能算严重。

综合以上分析，目前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明显的有效需求不足的迹象，但尚未发展到就业形势全面恶化、产能严重过剩的程度。不过，如果不采取措施，资本家的投资与劳动群众的消费继续萎靡，不排除有效需求下降发展为恶性循环并触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那么，资产阶级当局是否有办法避免这种危机的可能性发展为现实性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代表私营资本家阶级立场的反动自由派评论家是怎样给当局出谋划策的。在反动自由派的经济评论家看来，中国经济的一切问题都是由于还不够资本主义、还不够私有化带来的，所以他们努力推销的方案，就是实行最彻底、最反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比如，下面是推特上的“老蛮频道”提出的所谓“有益于经济”的五点措施：

- 1、民营经济主体的所得税下调到 10%以下。国企有着权力和垄断地位护航，短期内改不了，那就降低民企的税负，以增加它们的抵抗力。

- 2、个人所得税降到 10%以下。这才是鼓励中产阶层消费的有效措施。

3、以地市为单位核定当地主要民营产业年产值。一旦出现产值下行，五套班子领导就地免职。培育出新民营产业的，五套班子就地提拔。

4、新生儿分地区每个月补贴三千至五千元，至其年满三岁。

5、三线以上城市均应建立完善且免费的技能培训服务体系，向失业人群提供从厨艺、电焊到编程的高质量培训。原来失业的教培人员可以加入这个体系。

以上五点内容中，第一条和第二条都是直接慷人民之慨，给资本家大发红包。按照全国私营企业缴纳所得税总额约 3 万亿元、现行企业所得税率 25%来估算，仅将“民营企业”所得税率降到 10%一条，就意味着要在中国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巨额巧取豪夺之外，还要给他们白白再馈赠 1.8 万亿元。

上述五点中的第三条，则更是使得私人资本家可以凌驾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地方官员之上，有恃无恐，胡作非为。第五条，则是打着“培训”技能的旗号，由资产阶级国家提供补贴，为资本家提供更大量、更熟练、更适合资本家剥削的廉价劳动力。

至于上述五点中的第四条，属于欺骗劳动群众的空头支票。一方面给资本家大减税，另一方面又假惺惺地表示要给部分劳动群众一点嗟来之食。按每年维持出生人口 1000 万，每个新生儿从零岁至三岁每月补贴 3000 元来算；政府须对每个零至三岁儿童每年补贴 3.6 万元，每年同时补贴 4000 万个儿童，每年开支 1.44 万亿元。这 1.44 万亿元由谁来出呢？“老蛮频道”不说。由资本家来出吗？那是上帝

绝不允许的！资本家不出血，又要减税，又要增支，财政缺口如何弥补呢？

那么，这是不是说资产阶级国家面对当前的经济困境就束手无策呢？那倒也不是。我们在以前的经济分析中，曾经反复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单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经济危机是不难克服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当局面对当前的经济问题看似无所作为，不是因为当前的经济问题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完全无解，而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决策机关一方面被新自由主义教条束缚了头脑、另一方面又被各个资本家集团的局部私利所纠缠，而现实形势的发展又还没有严峻到迫使他们抛开一切踌躇和愚昧来挽救现存社会秩序的程度。

到目前为止，资产阶级当局所谓“拼经济”的办法，无非就是两招，一是“减税降费”，也就是直接给资本家发钱；二就是所谓“给政策”，也就是允许资本家更加放肆地侵犯劳动人民的利益甚至可以违反资产阶级国家所制定的一些法律和政策（即在某种程度上破坏整个资产阶级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但是，在总需求不足、利润率下降的大背景下，无论资产阶级当局如何“给政策”，资本家都缺乏投资的“信心”与动力。至于广大劳动群众，饱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又面临教育、医疗、养老的沉重压力，也很难提高自己的“消费倾向”。

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资产阶级宏观经济政策史已经反复证明，如果真的要“刺激经济”，最有效的政策既不是货币政策，也不是减税，而是政府直接增加赤字开支。这是因为，前两者最终都有赖于私人部门增加投资或消费；如果私人部门因为所谓“信心”不

足，不增加投资或消费，则政府毫无办法。反之，如果政府直接增加赤字开支，可以直接增加国民经济总需求，并且通过“乘数效应”间接带来更多的总需求。

就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来说，凡是有助于克服短期经济矛盾的政策都属于“短策”。在“短策”中，依照其效果与可持续性，又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策。

上策：由政府直接增加给国有企业的投资，可以向现有的国有企业注入新的资本金，可以用收购、赎买的方式将一些私营企业国有化，可以新建生产性的（而不是基础设施类的）国有企业，可以在农村收购抛荒的土地并新建国营农场。由此形成的投资，可以直接形成对建筑业、设备制造业的需求，可以直接扩大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就业，由此增加的收入可以带动劳动者进一步增加消费。不仅如此，由于国有企业的投资在未来可以形成利润和税收，所上缴的利润和税收可以弥补财政赤字，甚至带来财政盈余。所以，用向国有企业投资的办法来增加总需求，在长期不会带来政府债务负担的增加，因而是上策。

中策：大幅度增加给低收入人群的补贴或者由政府直接实行一项覆盖全体公民的临时的或永久的基本收入计划，比如无条件地向每个公民每年提供 1000 元，每年增加赤字开支约 1.4 万亿元（略大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1%）。如果采用这个办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劳动群众的消费并提高总需求。但是，政府发给居民的钱的一部分（30% 甚至更多）可能被留作储蓄而不是用于消费；这样，其刺激总需求的效果会打折扣。此外，政府发给居民的钱，仅仅是被消费掉了，并不

是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政府赤字增加了，但未来的税收并不因此增加，在长远会增加政府的债务负担。

下策：如果上策、中策都不用，但资产阶级中央愿意立即拿出相当一笔资金（比如一万亿元），给所有经济困难省份的地方政府提供补助，帮助他们渡过财政危机，并给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正常发工资，也可以起到安定人心，进而稳定消费和总需求的效果。

总之，从纯粹经济的角度来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目前面临的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并非不治之症。然而，即使是可治之症，如果一再拖延，甚至滥用自由派郎中开出的假药、毒药，也有被治死的危险。

中国资本主义的长期矛盾与资产阶级可以采取的“长策”

红色中国网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个以出口制造业为主的半外围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中国资本主义既不能像核心国家那样靠垄断“高技术”攫取巨额超额利润，也不能像以出口能源为主的半外围国家那样获取资源租金。中国资本家在世界市场上的“取胜之道”，主要是靠残酷剥削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此基础上，通过获得从核心国家转移的技术或者模仿核心国家已有的技术，来取得竞争优势。所以，数量庞大而且成本（相对于核心国家）足够低廉的劳动力，是中国资本主义赖以“发达”的根本条件。

但是，恰恰是中国资本主义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再加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一般趋势，正在迫使中国的劳动人民以缩小代际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开展普遍的“躺平”斗争，进而给资本主义中国带来了空前的人口危机。

据育娲人口研究发布的 2023 年版《中国人口预测报告》，在没有实质有效的生育减负政策的前提下，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将从现在的大约 1.1 进一步下降到 0.8（而维持人口稳定代际更替的生育率水平是 2.1）。至 2100 年，中国的总人口将下降到 4.8 亿，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将减少到 4.8%；2100 年，中国的新出生人口将不到 100 万，占世界出生人口的比例将不到 1%。

目前，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例约为 18%。如果到 2100 年时，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不到 5%；**即使**届时中国人均 GDP 达到世界人均 GDP 的两倍，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例也将不到 10%，也就是倒退到 2010 年以前的水平，并且还将随着人口的减少而进一步萎缩。到那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肯定小于美国，并且还很可能被印度甚至更多的国家反超。中国资产阶级所谓“民族复兴”的迷梦将彻底沦为黄粱一梦。

中国现在的人均 GDP 与世界平均水平大致相当，如果要使中国的人均 GDP 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中国人均 GDP 的增长速度必须长期保持比世界人均 GDP 更快的增长速度。这有可能实现吗？在新冠疫情以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已经高速增长大约四十年了，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还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都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长期快速增长下去。

中国现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大约相当于美国 1950 年的水平。在从 1950 年至 2019 年近七十年的时间中，美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 1.7%。日本的人均 GDP 于 1975 年达到美国 1950

年的水平；在从 1975 年至 2019 年四十多年的时间中，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 1.9%。韩国的人均 GDP 于 1991 年达到美国 1950 年的水平，此后，韩国于 1997 年遭遇了金融危机；在 1999-2019 年的二十年时间中，韩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 2.1%。从这些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在达到了中国现有的人均 GDP 水平以后，二十年以上的长期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一般在 2%左右；并且经过的时间越长，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越低。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中国经济从现在起至本世纪末、在长达近八十年的时间中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不会超过 2%，有可能更低。

据育娲人口研究报告，中国现在的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70%，至 2100 年将下降到 37%，总人口抚养比（老年和未成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将从现在的约 40%增加到 2100 年的 1.7 倍。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与总人口之比从现在至 2100 年年平均下降 0.8%；这就意味着，即使未来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得以年平均增长 2%，人均 GDP 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也仅仅是略高于 1%。这样，只要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均 GDP 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 1%，到本世纪末，中国的人均 GDP 与世界平均的人均 GDP 之比就不会高于现在的水平。也就是说，到本世纪末，中国的人均 GDP 很可能仍然与世界人均 GDP 大致相当；如果是这样，到那时，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例就不是大约 10%，而可能仅有大约 5%，相当于退回到 1949 年的水平（也就是中国近代长期民族衰落的最低点）！

如果未来因为资本主义技术进步越来越迟缓等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长期增长速度大大低于 2%，那么人均 GDP 的增长速度也将大大低于 1%。由于从现在起至本世纪末，中国总人口将以年平均 1.4% 的速度下降，那么，不仅中国经济占世界的比例将趋于萎缩，中国经济总量的绝对规模也将趋于萎缩。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来说，这将是末日来临的灭顶之灾！

资产阶级不愿意坐以待毙，他们想要挽救自己的灭亡。育娲人口研究也为中国资产阶级贡献了自己的“长策”——挽救资产阶级长远命运的策略。育娲人口研究认为，如果要制止生育率灾难性的下降，将其恢复到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当的水平，需要中国资产阶级当局下决心，采取一系列“世界上最大力度的生育减负”措施。下面列举他们建议中的几条：

本报告具体提出了生育减负的十大建议，其中包括：

一是现金补贴，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未成年孩子，给与每月 1000 元的现金补贴，给与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每月 2000 元的现金补贴。

二是税务补贴，对于二孩家庭的父母实施所得税和社保减半，对于三孩以上家庭实施所得税和社保全免。

三是购房补贴，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举例，返还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 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可以设置封顶上限）。

四是增建托儿所，把 0-3 岁的入托率从 4% 提高到 50% 左右。

五是同时增加父母双方的产假天数。

六是提倡灵活办公。

七是引进外劳保姆。

八是扶植辅助生育技术。

九是保障单亲家庭权益。

十是教育改革，普及大学本科教育，减轻升学压力，缩短基础教育的学制。

“十大建议”中，除了“引进外劳保姆”、“扶植辅助生育技术”略显荒唐外，其他几条，都很诱人，也很“亲民”。但是，所有这些都是要花钱的。据育娲人口研究自己的估计，这些措施的财政成本约为**每年**花费 GDP 的 5%。这样一笔巨款由谁（哪个阶级）来负担呢？

我们可以粗算一笔账，不考虑中国政府已有的财政赤字。假设未来中国经济长期年平均增长 2%（如上所述，很可能做不到），政府债券的实际利率 1%，那么，每年增加财政赤字相当于 GDP 的 5%意味着，在长期，政府债务将额外增加相当于 GDP 的 5 倍（就是 500%！）。如果未来中国经济陷入零增长、负增长，那么在理论上，任何政府财政赤字最终都将导致政府债务相对于 GDP 之比趋于无穷大。所以，“世界上最大力度的生育减负”，仅仅靠政府透支财政，是绝无可能做到的。

这便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们可爱的地方。只要说到“发展经济”，那么一定是依靠“民营企业”，给资本家“减税降负”，打破“国企垄断”，好让私人资本家在本来国企经营、没有垄断利润的行业攫取垄断利润。只要说到解决各种社会矛

盾、减轻生育负担，他们就会想到政府的“责任”，政府应当干预，应当出钱，就是不说，政府出的钱从哪里来？如果不向资本家征税，难道从天上掉下来？给中国的资本家当“政府”，就如同给明末东林党当皇上一样，都是费力不讨好——倒了八辈子霉！

中国资产阶级的“无策”与中国无产阶级的“长策”

可以预料，尽管面临着长期生死存亡的危机，要钱不要命的中国资产阶级一定会死死守住他们的钱袋子。正如明末东林党那样，哪怕朝廷被后金与农民起义两面夹攻，也决不能触动江南富商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今日的中国资产阶级绝不愿意为了生养可以供未来资本家剥削的廉价劳动力而牺牲自己眼前的利润和财富。这样，中国资产阶级就没有切实可行的“长策”，于是就成了“无策”。

那么，中国无产阶级能不能将资产阶级的“无策”转变为自己的“长策”——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长远策略呢？

我们知道，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在政治上是采取专制独裁的形式，现在又辅以各种高科技的监控技术，无情镇压“左”、右各路反对派。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堡垒”。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要取得胜利，不应该去正面强攻资产阶级统治的“堡垒”，如一些自由派以及幼稚“左派”曾经做的那样，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就妄图“建党”、建立“独立工会”，或进行各种表演式的示威抗议，徒受牢狱之灾，而无损于资产阶级统治，更不妨碍资本家赚钱。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正确策略，是绕开资产阶级当局坚固设防的“专政防线”，而对其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什么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底”呢？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告诉我们了：“**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一切资产阶级统治的根本条件，都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即资本主义积累的正常进行和扩张。只要中国无产阶级，采用符合自身历史条件的正确斗争策略，逐步地削弱、拖垮中国资本主义的积累，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然土崩瓦解、分崩离析。

怎样才能拖垮中国资本主义的积累呢？前面说了，中国资本家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法宝就是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只要中国无产阶级通过长期斗争，使得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不再“庞大”而且日益萎缩，使得中国的劳动力不再“廉价”而且因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而变得更加“昂贵”，中国资本主义垮台的日子就不远了。

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正在以各种自觉和不自觉的方式开展普遍的、群众性的“躺平”斗争。这样的“躺平”斗争已经造成了令资产阶级胆战心惊的生育率全面下降的大好形势。这样的大好形势继续下去，就必然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由增长而减速，由减速而停滞，由停滞而萎缩，直至破产。到那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府由中央到地方将陷入普遍的财政危机，从而陷入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困境。

不仅如此，“躺平”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当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濒临彻底枯竭，尤其是当大学毕业生的劳动力市场也由长期过剩而突变为严重短缺的时候（如果中国资本主义保持正常发展，这可能会发生在2040年前后），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必然发生对无产阶级有利而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决定性变化。那时，人民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的历史性时刻就到来了！群众性的“躺平”斗争就可以进一步发展为广泛的怠工、罢工斗争。然后，在资本主义积累与资产阶级国家坍塌的废墟上，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辉就将降临人间、普照大地！

当前的世界形势正在发生激烈的、迅猛的转折。现在的世界历史阶段，既不是中国资产阶级当局时时挂在嘴边、不懂装懂的所谓“百年未有之变局”，也不是某人曾经津津乐道、最近又不敢说的“东升西降”，而是毛主席所说的“东风压倒西风”！（此“东”非彼“东”）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第一次发生了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不利、对世界革命人民有利的重大变化。当前，俄罗斯与广大亚非拉的人民正在团结起来，将世界范围的反帝斗争推向了一个新高潮！西方帝国主义几百年来靠残酷剥削和掠夺亚非拉人民和资源而建立起来的罪恶财富正在灰飞烟灭。广大亚非拉人民争取资源自主利用与平等交换的斗争正在从外部将西方帝国主义以及作为西方帝国主义最后一根支柱的中国资本主义包围起来，中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则从内部将残酷而腐朽的中国资本主义拖瘦、拖垮、拖死。中国人民与俄罗斯人民、亚非拉人民联合起来，内外夹击，就

一定能够打垮腐朽而接近死亡的中国资本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开辟世界历史的新篇章！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国家干预（一）

作者：远航一号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多个省份爆发了比较严重的债务危机。这种现象，在马列毛左派青年中引起了热烈讨论。很多同志关心，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近期会不会爆发危机？这样的危机是周期性的，还是长期的、结构性的？资产阶级政府有没有应对危机的有效手段？这些问题，涉及到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若干基本特点；只有正确了解这些基本特点，我们才能够正确地认识现代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其表现形式并且将这些表现形式与阶级斗争的不同发展阶段联系起来，特别是正确区分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时期与资本主义矛盾全面激化、革命形势即将来临的时期。

为了说明这些问题，笔者准备用几篇文章来探讨一下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特点以及资产阶级国家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稳定资本主义经济的若干手段及其局限性。

为此，首先要介绍一些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在现代资产阶级国民经济核算中，用来衡量经济总量的基本概念是国内生产总值，其具体的定义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之和。这里所说的“最终产品”指的是用于“最终”消费或投资的商品和服务，但不包括那些投入到其他商品和

服务的生产中并且在生产中被一次性消耗掉的产品（如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原材料、水、电、气、燃料等），后者是所谓的“中间投入”。

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来说，资产阶级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国内生产总值包括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所生产的全部生活资料、全部“服务”以及一部分生产资料的市场价值。包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生产资料主要是在资本主义积累中作为固定资本起作用的那部分生产资料（如各种建筑物、机器设备以及计算机软件），而不包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生产资料（即被资产阶级经济学称之为“中间投入”的那部分产品）指的是在资本主义积累中作为流动的不变资本起作用的那部分生产资料。

在资产阶级国民经济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分别用支出法、生产法和收入法来计算。如果不考虑统计误差，这三种方法在理论上得出的计算结果应该是一样的。这里要说明的是，美国的国民经济核算是以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为基础的，而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是以生产法国内生产总值为基础的。

美国和中国在计算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时所划分的组成部分也不尽一致。美国的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所包括的四个组成部分是：个人消费、私人国内投资、政府消费和投资（简称“政府购买”）、净出口（即出口减进口）；中国的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所包括的四个组成部分是：居民消费、政府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即总投资）、净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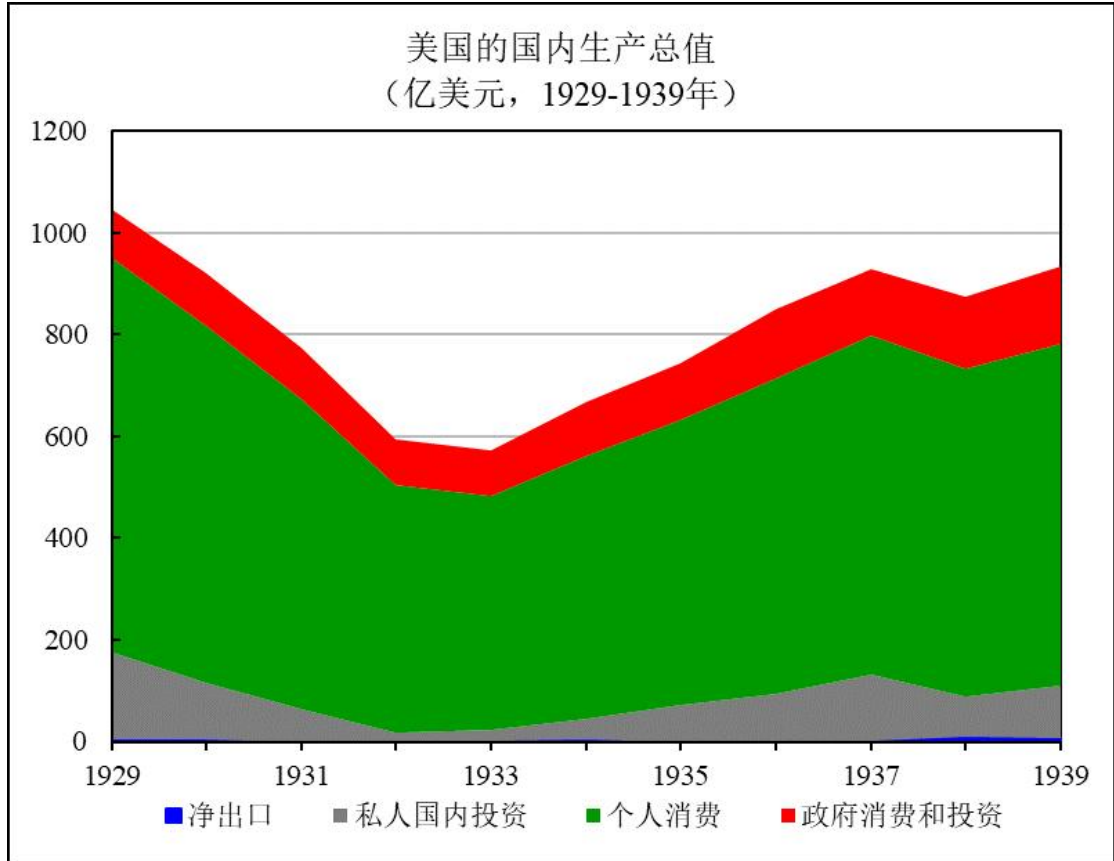
口。所以，在中国的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将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居民投资合并在一起作为资本形成总额。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资产阶级国家还没有学会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自觉的、有意识的干预，政府部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份额也比较小。那时，影响宏观经济活动的主要是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此外，对于一些中小国家来说，净出口有时也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现在资产阶级教育体系下中学的“思想政治”教科书中所谓消费、投资、出口是驱动经济的“三驾马车”这一庸俗说法所描述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那种“小政府、大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

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一旦某些经济部门发生严重的生产过剩，这些部门的资本家就会一面减少投资、一面缩小生产规模并解雇工人，这又会进一步减少对其他商品的需求，从而引起更大规模的投资和生产萎缩以及失业。这样的连锁反应，如果不是因为资本家的“信心”恢复等偶然原因被制止，就会形成难以遏制的恶性循环，引起投资、消费、产出、就业的交替下降，导致经济大萧条的爆发。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就是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时代一次最严重、最典型的经济危机。

下面的图一说明了在大萧条期间美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变化的情况：



图一 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1929-1939年）

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贸易账户大致平衡；除了在1938年和1939年贸易顺差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左右以外，在其他年份，净出口与整个经济相比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1929年时，美国经济中最大的组成部分是个人消费，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4%；其次是私人投资，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6%；再次是政府消费和投资，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这时的美国，是典型的“小政府”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经济。

投资是资本主义经济中最不稳定的一个组成部分。1929年至1933年，美国经济中的私人投资从172亿美元减少到23亿美元，减少了87%！可以说，在此期间，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投资几乎完全崩溃。

1929年至1933年，美国经济中的个人消费从774亿美元减少到459亿美元，减少了41%。

这一时期，美国的资产阶级政府还没有学会自觉地干预资本主义经济、缓解经济危机。1929年至1933年，美国的政府消费和投资支出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从96亿美元减少到89亿美元，坐视私人投资和消费崩溃而无所作为。

美国整个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即按当期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没有扣除物价水平变化的影响）则从1929年的1046亿美元减少到1933年的572亿美元，几乎下降了一半。

从那时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大大加强了国家干预，从而避免了大萧条式经济危机的再次爆发。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长生不老，也不是说，社会主义革命遥遥无期，而是说，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的表现形式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然而，在中国的马列毛左派中，却仍然存在着那样一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他们反对将马列主义真理应用于当代中国和世界资本

主义的现实，顽固地拒绝学习自经典作家以后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进步理论的新发展、新变化，不善于或者不愿意从当代资本主义现实存在的而不是想象中的矛盾出发来具体地分析具体的问题。

在他们的想象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只能有一种形式，那就是由生产过剩或者说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所引起的危机，这样的危机必然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大萧条式的经济危机，并为未来的革命创造条件。

比如，宗派主义分子和亲帝“左派”的宣传工具“风雷”就声称：“中国的内需实在是疲弱至极 … 这又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因为生产过剩。”“现在，中国经济严重寒冬，房子卖不动了。”

亲帝“左派”代表人物阳和平先生煞有介事地问：“经济危机已经到来，难道你看不见？”阳和平说：“我们现在越来越面临着 … 一个百年一遇的大萧条”；“即便是他们想避免那种大萧条，他也不可能，因为最根本的矛盾，就是生产过剩啊。”说完这些，阳和平先生还不忘指桑骂槐：“我真奇怪，有些人自称马克思主义学者，否定生产过剩危机是最根本的危机 … 然后呢，大讲什么资源的危机 … 资本主义从来不怕短缺不怕匮乏，他怕的是过剩，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啊”。

宗派主义分子的另一个宣传工具“佐伊 23”看到出身台独世家的反动经济学家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学说便如获至宝：“当

前我国的情况和辜朝明描述的情况确有类似之处，比如企业投资意愿大幅下滑，个人储蓄意愿提升而不愿意消费，等等，这都会造成需求的缺口”；“危机的实质还是在于生产相对过剩。大量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或者大量设备闲置不能投入生产（因为没有订单），就会形成危机。”

从上述的“唯生产过剩”危机论出发，许多受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影响的青年认为，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仍然会由于生产过剩、需求不足而爆发严重的、无法克服的危机。比如，许多人非常关心房地产投资的波动。在他们看来，只要房地产泡沫破裂，房地产投资就会崩溃，然后其他领域的投资以及居民消费都会相继崩溃，中国就会发生大萧条式的经济危机。

熟悉红色中国网的读者知道，我们红色中国网编辑部的看法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单纯由总需求不足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已经不可能给资本主义经济带来致命的打击；一般情况下，资产阶级政府通过宏观经济调控可以稳定资本主义经济、避免大萧条式的崩溃再次发生。要了解现代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道理、形成符合当代实际条件的正确的无产阶级斗争策略，必须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从当代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实际出发，摆脱条条框框的束缚，打碎精神的枷锁，然后才能打开通往真理和胜利的大门。

评反动民族主义分子的所谓“时间在我”

作者：远航一号

中国资产阶级的总头目习近平目前正在美国旧金山访问。为了给这次访问做准备，中国资产阶级当局的宣传机器开足了马力，新华社连发五篇评论，呼唤中美关系“校准航向再出发”、“重归正轨”。当此欧洲与中东战火纷飞、生灵涂炭，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风雨飘摇之际，中国资产阶级仍然在“不知今夕为何夕”地高谈所谓“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

几年前，中国资产阶级对于中美关系的官方表述仍然是“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现在，正当全球反帝反殖运动在沉寂了半个世纪之后再度高涨、美帝霸权面临总崩溃之际，习当局竟然将中美关系进一步升格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所谓“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那就是说，不仅中美关系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来说是“最重要”的，其重要性也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其它的双边关系，包括美俄关系、美欧关系、俄欧关系，等等。中国资产阶级如此飘飘然，于它自己是缺少自知之明、不知天高地厚，高估了中、美资产阶级的力量，低估了世界人民的力量。对于俄罗斯等“金砖国家”以及全世界的反帝反殖力量来说，中国资产阶级此举无疑进一步暴露了其真实的内心及其一如既往的见利忘义、鼠目寸光。在中国资产阶级看来，美欧资产阶级才是可以与之共谋全球资本主义千秋大业的自己人，而广大的亚非拉俄诸国则不过是其出于现实利益不得不与他们虚与委蛇而随时又可以坑蒙拐骗的生意对象。

中国资产阶级向美国资产阶级递上了橄榄枝，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心要回归中国供应廉价劳动力、美国收获超额剩余价值、美国资本家发大财、中国资本家发“小财”、美国当世界警察扑灭一切反帝烈火、未来中国海军参加当“辅警”那样一种美中“共治”、“互利共赢”的美妙时光。

那么，美国资产阶级准备不准备接受中国资产阶级提出的“要约”呢？《纽约时报》11月15日有一篇文章，列举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初步要价。对此，本网的井冈山卫士编辑做了概括：

纽约时报评论员认为，拜登将要求：

1) 中国停止向墨西哥出口一些化学原料。美国宣称这些原料在墨西哥被加工成毒品，并被卖到美国毒害美国人民。（井冈山卫士评：拜登政权一直对南方边界置之不理，任由毒枭集团和人口贩卖滋长，这与中国卖不卖化学原料无关。此举纯属没事找事，干涉别国贸易关系，属于毫无实际意义的羞辱性条款。）

2) 拜登将建议恢复两军正常交流，并且建议双方不在核武器的指挥和控制中使用人工智能。

3) 拜登将要求中国向俄罗斯和伊朗施加压力，让中国不要妨碍美国在中东和东欧的代理人战争。（井冈山卫士评：中国资产阶级对此的意见是复杂的。一方面，中国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影响力远不及外界猜测的大，拜登的此类“要求”反而让中国看起来比事实上更为强大；另一方面，中国被“命令”做这种事情显然也包含着羞辱性含义。

更重要的是，中国如果在外交上全面背叛俄罗斯和伊朗，全面背叛第三世界，政治后果难以逆料。)

4) 拜登似乎不准备取消或者减少对中国的制裁。

5) 拜登以及帝国主义主流媒体一致在宣传中国“内外交困”，仿佛是习近平自己扛不住了找上门磕头来了。

中、美两家资产阶级准备勾结到什么程度？或者由于两家资产阶级各自的内外矛盾，导致他们无法达成实质性的交易？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每当中国资产阶级迫不及待地要讨好美帝国主义，同时将“祖国统一”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神圣”目标推到遥遥无期的时候，总有一帮反动民族主义分子（这里说的反动民族主义分子，指的是那些打着“民族利益”至高无上的旗号为中国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做无耻辩护的小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跳出来，说什么“时间在我”，等到中国资本主义“强大了”，便一切水到渠成，云云。

果不其然，这两天，就有那么一位叫做“坏土豆”的民族主义坏分子，自我陶醉地欢呼什么“中美力量对比已经出现决定性变化！”这个坏分子，几个月前，还写过一篇奇文，祝福饱受中外资本家剥削与压迫的中国人民：“2023 将成为中国人幸福元年！”

在“中美力量对比已经出现决定性变化”一文中，除了吹捧中国资产阶级“强大”以及“在国际问题上没有私利，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公平正义一边”以外，“坏土豆”不出所料地大谈反动民族

主义的滥调——“时间在我们这边”，“从这 20 年来看，这是一句真理。任何胜利都需要付出代价，但是伴随时间的流逝，我们的实力在与日俱增，而美国却一天天衰落。既然如此，我们何必要速胜呢？为什么不许美国自乱阵脚呢？”

说美帝国主义“一天天衰落”，这是正确的。说“时间”在中国资本主义一边，还说“从这 20 年来看，这是一句真理”，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讲，这是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某一个时期取得了一定的快速发展，这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但是，如果认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一直快速发展下去而不产生一系列不可克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不爆发危机与革命，那就是罔顾事实、一厢情愿。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速度确实是比较快的。如果按市场汇率（即名义美元）计算，2000 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 4%；2010 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份额增加到 9%；2020 年，中国经济的份额增加到 17%；2022 年，中国经济的份额增加到 18%。与美国经济相比，2000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2%；2010 年，中国经济相对于美国经济的比例增加到了 40%；2020 年，中国经济相对于美国经济的比例增加到了 70%；2022 年，中国经济相对于美国经济的比例进一步上升到了 71%。

如果我们将以上的趋势线性外推下去，尤其是将 2020 年以前的趋势线性外推下去，那么，确实，要不了多久，资本主义中国就可以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假以时日，资本主义中国还可以取得对美国

的绝对优势。到那时，中国资产阶级不需要流血流汗，也不要费一枪一弹，世界霸主的桂冠就会在“和平崛起”中像天上掉馅饼一样砸在中国资产阶级的脑袋上，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可以跟着吃肉喝汤、爬上“世界第一”小资产阶级的交椅，永远骑在中国以及亚非拉俄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时间在我”，皆大欢喜！

只可惜，“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一切现存事物都是必然灭亡的，永远线性增长的事物是不存在的。第一个动摇中国资本主义基础的，就是现在连资产阶级也无法否认的已经发生的并且正在逐步加速的人口下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就其根本原因来说，无非是依靠对数以亿计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特别是依靠其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的剥削体制。面对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根据中国阶级斗争的具体特点，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自发或者自觉地开展了普遍、持久的“躺平”斗争，特别是通过不生、少生，极大地降低了生育率，缩小了中国资本主义在未来可以获得的廉价劳动力供给，以釜底抽薪的方式瓦解了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基础。

对此，育娲人口研究发布的《人口预测报告》分析说：“中国人口到 2050 年将减少到 11.7 亿，2100 年中国人口将降到 4.79 亿，占世界比例将从现在的 17%降至 4.8%，而新出生人口只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 0.89%。届时，中国就不再是一个人口大国了。按此趋势，华夏民族几千年积累的人口优势，将在 100 年内丧失殆尽。” 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分析家们现在也普遍承认，中国正

在逐步失去一个人口大国的地位。那么，随着资本主义中国逐步失去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的地位，其作为经济大国的地位又会怎样呢？

如果按照联合国的人口预测，在“中生育率”情景下（比较符合世界与大部分国家目前的生育率状况），世界人口将从2022年的79.4亿增加到2050年的96.9亿，再增加到2100年的104亿；美国人口将从2022年的3.37亿增加到2050年的3.75亿，再增加到2100年的3.94亿。在“低生育率”情景下（比较符合中国目前的生育率状况），中国人口将从2022年的14.3亿，减少到2050年的12.2亿，再减少到2100年的4.94亿。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将从现在的约18%，减少到2050年的13%，再减少到2100年的4.8%（与育娲人口研究的预测差不多）。中国人口相对于美国人口的倍数将从现在的4.22倍减少到2050年的3.26倍，再减少到1.25倍。显然，简单的计算就可以告诉我们，到本世纪末，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必须超过美国的80%，才能始终在经济总量方面超过美国并保持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

2022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市场汇率计算）相当于美国的17%，与世界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基本持平。如果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在本世纪末达到美国的80%，那么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美国的比例需要在未来的78年间平均每年提高0.8个百分点，或者在未来的62年间共提高约50个百分点。

从世界银行的数据库中，可以找到的有数据的最早年份是1960年。1960年时，在所有有数据的国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美

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5%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共有 28 个（不包括美国自身）；这些国家在 1960 年时的总人口为 3.75 亿，占 1960 年世界总人口的 12.4%。到了 2022 年，在这 28 个国家和地区中，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美国的比例与 1960 年相比有所上升的，共有 23 个国家和地区。而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美国的比例在 1960-2022 年期间上升了的国家中，上升幅度超过了 50 个百分点的，只有五个国家和地区；这五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卢森堡、百慕大、瑞士、挪威、爱尔兰。这五个国家和地区在 1960 年的人口加起来只有 1200 万，其中人口最多的瑞士在 1960 年的人口也仅有 500 多万；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仅占 1960 年世界人口的 0.4%。与中国目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比例比较接近的是当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美国的 15%至 20%之间的几个国家。其中，南非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1960 年时达到了美国的 18%，到 2022 年时反而下降到 9%；希腊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1960 年时达到了美国的 17%，到 2022 年时增加到了 27%；智利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1960 年时达到了美国的 17%，到 2022 年时增加到了 20%；乌拉圭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1960 年时达到了美国的 16%，到 2022 年时增加到了 27%；巴拿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1960 年时达到了美国的 16%，到 2022 年时增加到了 23%；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1960 年时达到了美国的 16%，到 2022 年时增加到了 44%。

即使我们参考这里最幸运的日本的例子，假设命运继续眷顾中国资产阶级，从而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在 2050 年达到美国的

一半，从而中国的经济总量可以在 2050 年达到美国的 1.6 倍（因为到那时中国人口仍将为美国的 3.26 倍）；然而，只要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无法突破美国的一半，那么，到本世纪末，中国的经济总量就会回落到大约为美国的 60%。

当然，二十一世纪是美国霸权衰落的世纪，我们不能简单照搬二十世纪的经验。然而，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一下二十一世纪到目前为止中美竞赛的经验，其结论也是不容中国资产阶级乐观的。

如上所述，在人口相对比例的竞赛方面，除非未来中国人口的出生率能够发生革命性的转折（除非中国社会本身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否则这种转折是不可能发生的），中国在人口总量方面相对于美国的巨大优势逐步减少直至完全消失，将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在这方面，时间绝对不是“在我”而是在彼。

这样，资本主义中国要想在经济总量方面超过美国并且长期保持下去，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方面始终超过美国，并且超过的幅度还要足够大。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中国确实也一直做到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超过美国。然而，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资本主义中国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追赶”美国的速度正在逐年放慢。

2000 年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 2.6%；到了 2005 年、2010 年、2015 年、2020 年、2022 年，这个比例分别为 4.0%、9.4%、14.1%、16.4%、16.6%。从 2000 年到 2005 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美国的比例增加了 1.4 个百分点；从 2005 年到 2010

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美国的比例增加了 5.4 个百分点，与 2000 年至 2005 年相比有较大增加。然而，到了 2010 年至 2015 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美国的比例增加了 4.7 个百分点，增加幅度开始下降；从 2015 年至 2020 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美国的比例增加了 2.3 个百分点，增加幅度显著下降；到了 2020 年至 2022 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美国的比例仅增加了 0.2 个百分点。如果按照这个趋势简单推算下去的话，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美国的比例很快就会停止增加，甚至开始下降。

如果按照几何平均增长率（也叫“复合增长率”）来计算，在 2006-2010 年期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美国的比例年平均增长 18.7%；到了 2011-2015 年期间，这个比例的年平均增长率下降到了 8.6%，与前一个五年相比下降了一半多；到了 2016-2020 年期间，这个比例的年平均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到 3.0%，与前一个五年相比下降了三分之二。到了 2021 年和 2022 年两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美国比例的年平均增长率进一步减少到了只有 0.8%！

如果我们乐观估计，假设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美国的“追赶速度”在接下来几年有所回升，从而在 2021-2030 年的整个十年中仍然维持在 3%；此后，假设这一“追赶速度”每隔十年下降一半，也就是到 2031-2040 年时下降到 1.5%，到 2041-2050 年时下降到 0.75%，依此类推，直至本世纪末；据此就可以推算从现在起至本世纪末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经济总量相对于美国的比例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下面的表说明了按照上述假设进行推算的结果：

中国人口、人均 GDP、经济总量相对于美国的比例，2020-2100

年

	人口	人均 GDP	经济总量
2020	4.26	0.16	0.70
年			
2030	3.97	0.22	0.88
年			
2040	3.61	0.26	0.92
年			
2050	3.26	0.28	0.90
年			
2060	2.84	0.29	0.81
年			
2070	2.38	0.29	0.69
年			
2080	1.97	0.29	0.58
年			
2090	1.59	0.30	0.47
年			
2100	1.25	0.30	0.37

年

如上表所示，按照前面的假设，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追赶”美国的进程到 2050 年以后就将基本结束，以后会长期稳定在不到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三分之一的水平。中国的经济总量相对于美国经济总量的比例将在 2040 年前后达到最高峰；到本世纪末，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下降到不到美国的一半。

现在中国资产阶级至少在表面上还处在“上升”势头，但仍然要赌咒发誓，“不寻求改变现有国际秩序 … 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在国际上活脱脱一个人畜无害的“大熊猫”（连“纸老虎”都不如），到处寻求“共赢”、建立“命运共同体”，将大国间的纵横捭阖糟蹋成义乌商人的生意经，哪里还有心思去改变“台湾现状”。等到未来连这种表面“上升”的势头都没有了，就更不要指望什么“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了。到那个时候，“时间”便会露出其复仇的面目，加倍地惩罚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寄托了反动民族主义分子一切欲望及幻想的所谓“时间在我”，到头来不过是一场没落资本主义的黄粱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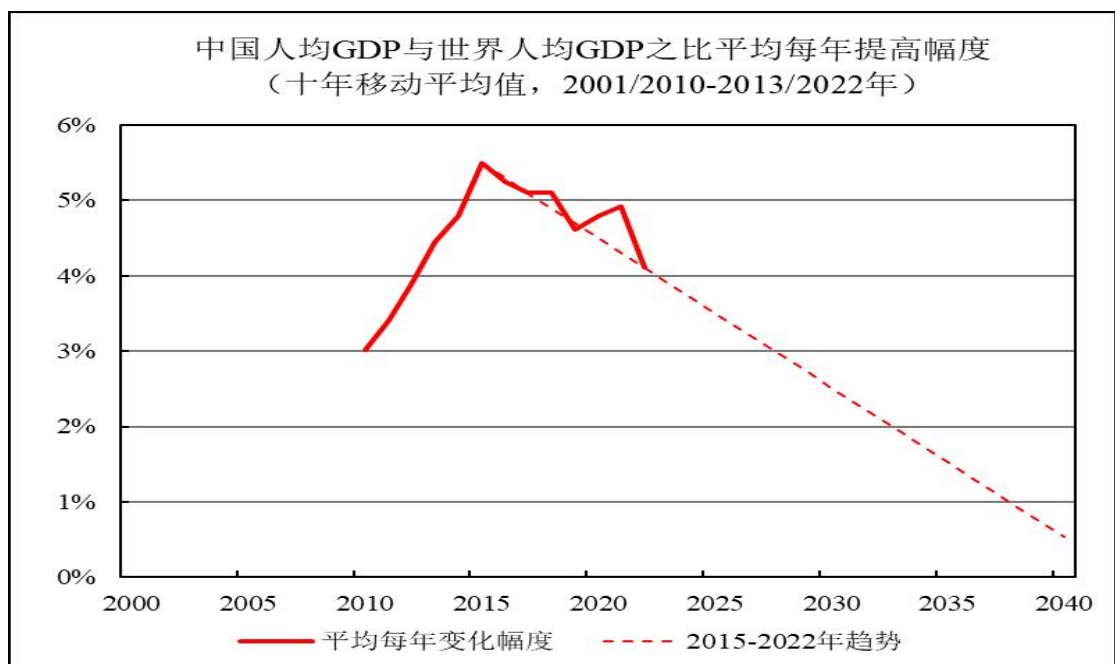
当然，时间也不在美帝国主义一边。无论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资产阶级都属于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腐朽的、反动的势力，正在被“时间”（即历史）无情地推向死亡。只有中国以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才是永恒的，才有权利拥有未来从而拥有永恒的“时间”！

再聊聊中国资本主义与“时间”

作者：远航一号

在前一篇文章中，笔者引用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数据，指出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将从现在的约 18%，减少到 2050 年的 13%，再减少到 2100 年的 4.8%。另一方面，中国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方面相对于美国以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优势近年来似乎在快速缩小。如果这些趋势没有改变，到了本世纪后半期（假设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到那时尚能正常发展），资本主义中国不但无望取代美国成为新霸权，而且与美国的差距还有越拉越大的危险。

在继续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做了两张图，又有一些新发现。



第一张图说明的是从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到 2022 年为止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世界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平均每年增加的幅度。对于不熟悉经济学术语的读者来说，这个概念可能显得稍微复杂一些。所以这里详细地解释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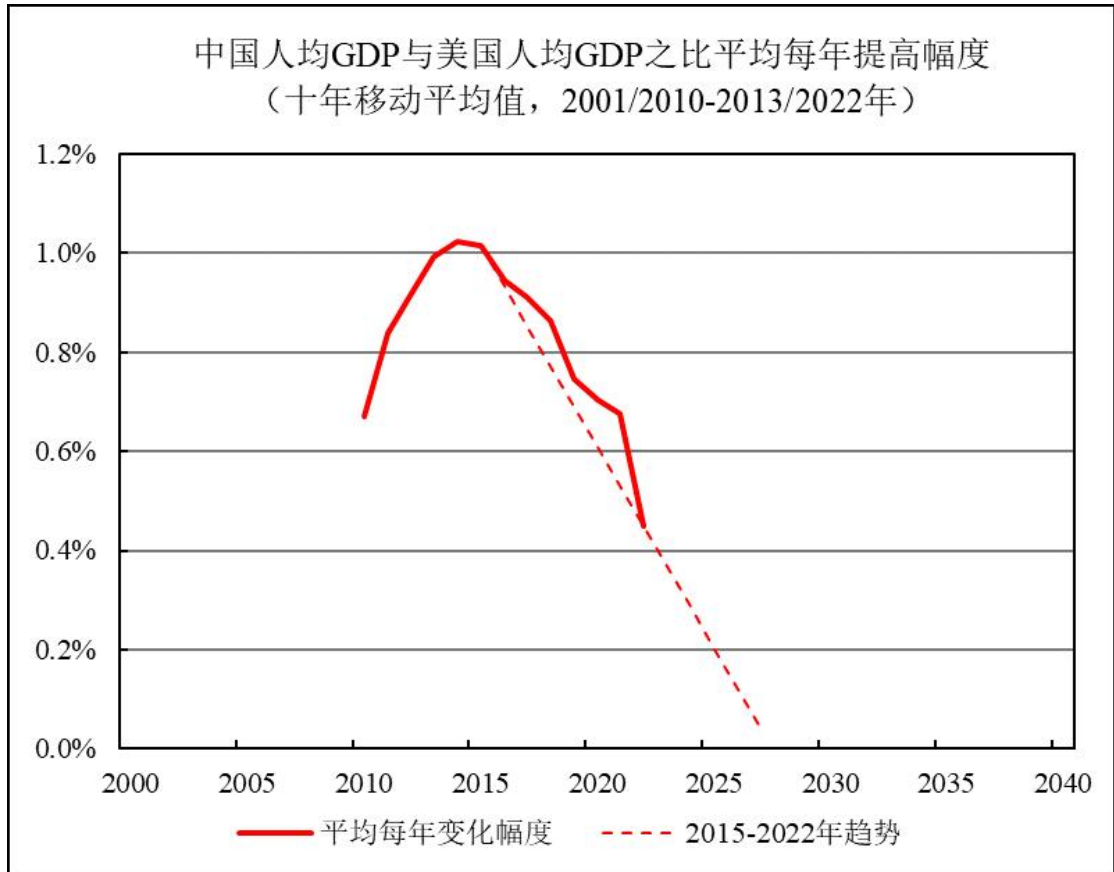
比如说，2000 年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市场汇率或名义美元计算）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17.4%，到了 2010 年时，这个比例增加到了 47.6%。这样，在 2001 年至 2010 年共十年的时间中，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世界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一共增加了 30.2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 3.02 个百分点。所以，在第一个图中，红实线的第一个点就出现在 2010 年（代表头一个十年的最后一年），数值为 3.02%。

而在 2006-2015 年这十年中，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世界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一共增加了 54.9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 5.49 个百分点。所以，在第一个图中，在 2015 年（代表 2006-2015 年的最后一年）的时间点上，数值为 5.49%。这说明，从本世纪初开始直至 2015 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快速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还不断加快。

但是，2015 年是个转折点。在 2015 年以后，虽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仍然在提高，但是提高的速度却在不断放慢。在 2013-2022 年的十年中，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

世界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一共增加了 41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 4.1 个百分点；与 2006-2015 年相比，减少了 1.39 个百分点。

第一个图中的红虚线表明，如果 2015 年至 2022 年的趋势持续下去，那么，到本世纪四十年代初，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世界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提高的过程就会完全停止。到那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会达到世界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 1.4 倍。即使假设在此之后，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世界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发生下降，由于中国的人口总量不断减少，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也会从 2040 年时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20% 减少到 2050 年时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18%，再减少到 2100 年时仅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7%。



第二张图说明的是从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到 2022 年为止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平均每年增加的幅度。看懂这张图的方法与第一张图相同。

在 2001-2010 年期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一共增加了 6.71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 0.671 个百分点;在 2006-2015 年期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一共增加了 10.1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 0.101 个百分点。这说明,从本世纪初开始直至 2015 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与

美国资本主义的竞赛中不断缩小了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与美国的差距，并且追赶的速度不断加快。

但是，到了 2013-2022 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虽然继续提高，并且在这十年中一共增加了 4.48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 0.448 个百分点；但是增加的幅度与 2006-2015 年相比，大幅度减少了 5.62 个百分点。就是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追赶美国的脚步大大放慢了。

第二个图中的红虚线表明，如果 2015 年至 2022 年的趋势持续下去，那么，甚至在 2030 年以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追赶美国的进程就可能完全停止。即使假设在此之后，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发生下降，由于中国的人口总量不断减少，中国经济总量相对于美国经济总量的比例也会从 2030 年的 70% 减少到 2050 年的 58%，再减少到 2100 年的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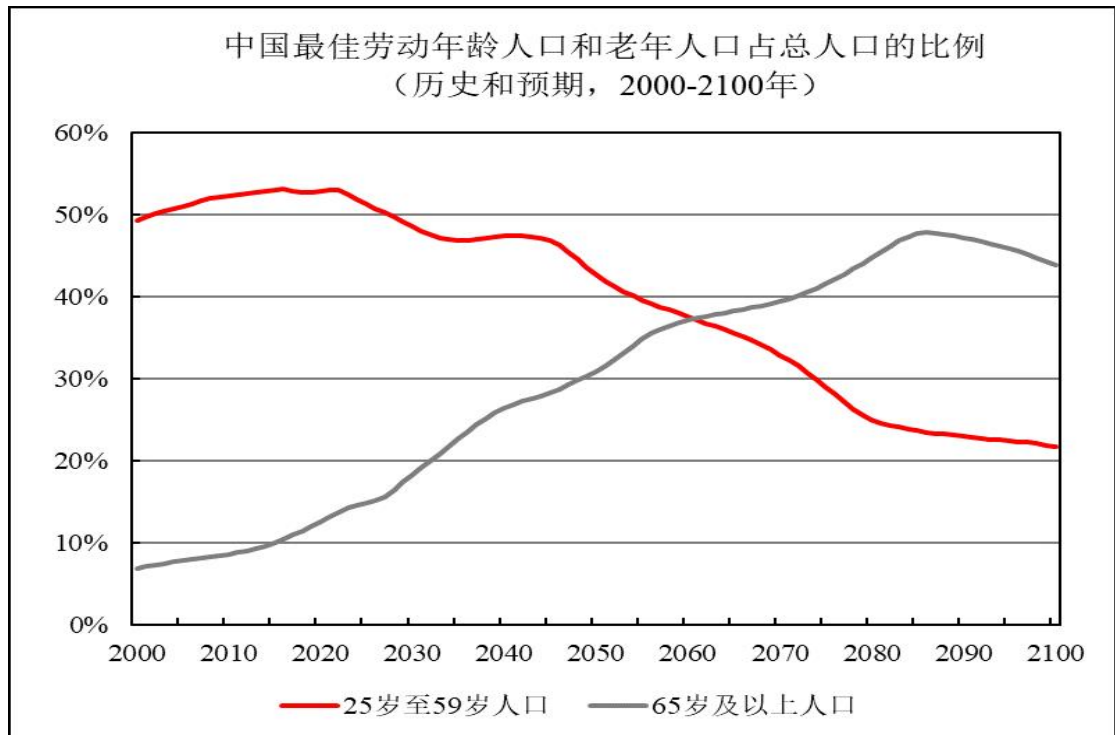
当然，这些都只是简单的线性推算，只能作为初步的参考，还需要根据未来新的数据不断进行调整。未来中国、美国、全球的资本主义还会发生很多矛盾和危机，还会有很多现在还无法预料的变化。然而，现有的证据越来越有力地表明，时间不在资产阶级那一边，而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边。

人口老龄化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财政危机

作者：远航一号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影响。在人口老龄化与其它资本主义矛盾的共同作用下，到本世纪中期，美国资本主义很可能面临着无法克服的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在这一篇文章中，我们进一步探讨人口老龄化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影响。

下面的图说明了2000年至2022年中国人口中25岁至59岁人口（最佳劳动年龄人口）与65岁及以上人口（老年人口）占中国人口的比例以及按照联合国的“低生育率”情景所预测的从现在至本世纪末这两种比例变化的情况。



中国最佳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2000-2100年

一个国家的25岁至59岁人口大致决定了这个国家总的就业人口的规模。如上图所示，2000年时，中国的25岁至59岁人口占总人口的49%；到2016年时，这个比例达到了历史上最高的53%；2022年，这个比例仍然保持在53%，但此后就无可挽回地趋于下降。预计到2050年，中国的25岁至59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下降到43%，到2100年时，再下降到仅有22%。

2000年时，中国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仅占总人口的7%；到2022年时，这个比例增加到了14%。预计到2050年时，中国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上升到31%；到2086年时，将达到历史上最高的48%，到2100年时，将回落到40%。

与美国相比，中国老龄化的进程要迅猛得多，长远的后果也更加严重。2000年，美国每一个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平均可以得到大约4个劳动力（按25岁至59岁最佳劳动年龄人口计算）的供养，中国每一个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平均可以得到大约7个劳动力的供养。这显示了本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所享受的巨大“人口红利”（即可供资本家剥削的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供应）。

到了2022年，美国每一个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平均可以得到2.7个劳动力的供养，中国每一个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平均可以

得到大约 4 个劳动力的供养。中国人口的老龄化程度赶上了美国在 2000 年时的水平。中国的老龄化程度仍然显著落后于美国。

到 2050 年，预计美国每一个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平均可以得到 1.9 个劳动力的供养，中国每一个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平均只能得到 1.4 个劳动力的供养。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将显著超过美国。

到本世纪末，预计美国每一个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平均可以得到 1.3 个劳动力的供养，中国每一个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平均只能得到大约半个劳动力的供养。如果到那时中国资本主义仍然存在，老龄化将成为中国资本主义无法承受的重负。

如上一篇文章所说，要分析老龄化对资产阶级国家财政的影响，我们需要对未来的经济增长率做出一定的估计，假设一定的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分别计算未来的社会保险缴款和社会保险支付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再对政府部门其它方面的收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做出一定的假设。

先来看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率。这里，我们以红色经济观察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测为基础，稍做调整。按照调整后的预测，预计中国经济将于 2050 年增长到 2022 年的 1.96 倍，此后将陷入长期负增长；至 2100 年，中国经济将回落到 2022 年的 1.22 倍（一些主要的假设有：中国未来的劳动力规模与联合国所预测的 25 岁至 59 岁人口同步变化，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自发”增长率从现在的每年

1.3%逐步减少到本世纪末的0.6%，企业部门投资从现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逐步下降到2060年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并在此后稳定在这个比例，折旧率为4.1%，资本产出弹性为0.5）。

我们假设未来中国政府债券的平均实际利率为1%、平均名义利率为3%。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中国政府部门各项收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2021年是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新冠危机之后恢复正常扩张的一年。这一年，中国政府总的财政赤字是3.5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

在政府的各项收支中，政府部门支付利息1.14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政府部门获得社会保险缴款7.43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3%；政府部门支付的社会保险福利为6.25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政府部门其它各项收支赤字为3.53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

2021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82000元。这一年，中国25岁至59岁最佳劳动年龄人口共7.56亿人，平均每人缴纳社会保险金约9800元，相当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12%；如果取这一比例在2012-2021年期间的平均值，则为10%。下面，我们假设未来中国最佳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每年缴纳的社会保险金占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例从现在的 12%逐步提高，于 2028 年达到 15%，以后保持在 15%。

2021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共约 1.88 亿人，平均每人从政府部门获得社会保险福利约 33000 元，相当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 40%；如果取这一比例在 2012-2021 年期间的平均值，则为 50%。下面，我们假设未来中国老年人口平均每人每年从政府部门获得的社会保险福利仍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 50%。

此外，在 2012-2021 年期间，在扣除利息支付、政府部门的社会保险收支以后政府部门的其它各项收支所形成的赤字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1%。下面，为了简便，我们乐观假设未来中国政府部门在扣除利息支付、政府部门的社会保险收支以后的其它各项收支保持平衡。

下面的表介绍了在 2000 年至 2020 年期间中国政府债务、利息支付、社会保险收支赤字、总的财政赤字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以及按照上述假设以上各项比例在未来变化的情况（表中数字分别只保留一至两位有效数字）：

中国政府部门债务、利息支付、社会保险收支赤字、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政府债务	利息支付	社会保险 赤字	政府部门 赤字
------	------	------------	------------

《红色中国网文集 2023》

2000 年	23%	1%	0%	7%
2010 年	34%	1%	0%	-1%*
2020 年	70%	1%	0%	6%
2030 年	68%	2%	2%	4%
2040 年	100%	3%	6%	9%
2050 年	180%	5%	10%	15%
2060 年	330%	10%	14%	24%
2070 年	560%	17%	16%	33%
2080 年	950%	28%	21%	50%
2090 年	1400%	43%	24%	67%
2100 年	2000%	60%	24%	84%

* 负值表示盈余

在 2030 年以前，尽管中国的社会保险收支赤字会有所上升，但总的财政赤字仍然在可控制的水平，中国政府不会感受到特别大的财政压力。到了 2050 年，政府部门债务将上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8 倍，政府部门赤字将上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5%；即使到那时，中国的居民部门仍然可以保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10% 以上的庞大财务盈余，中国政府也将面临日益加剧的财政困局。2050 年以后，政府部门债务、赤字和利息支付都将暴涨到天文数字。如果到那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国家仍然存在，势必以比美国资产阶级国家更快的速度走向全面的财政崩溃。

综合各方面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的积累危机、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不可避免地总爆发的时间大约是在 2040 年以后、2050 年之前。这里所讲的“不可避免地总爆发”，指的是，假设从现在起到本世纪四十年代之间，中国与世界的资本主义尚能正常发展，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不犯大的错误（比如肆无忌惮地进行全面私有化、全面金融开放等新自由主义“改革”或者头脑发热发动“统一祖国”的战争），在中国资本主义作为半外围资本主义的内在的、特殊的矛盾长期持续作用下，各种危机将不可避免地爆发。如果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在此期间犯下严重的错误或者国际形势发生了对中国资本主义严重不利的变化（比如亚非拉俄人民团结起来迫使中、美、欧等国支付更高的资源产品价格），那么，中国资本主义各种危机的爆发当然可能提前。

为了迎接中国资本主义总危机在未来的爆发并且为在总危机爆发后创造革命形势、争取无产阶级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准备条件，在今后的二十年至三十年，中国无产阶级的基本斗争策略将是：一方面，坚持长期的、普遍的“躺平”斗争，猛烈地减少资产阶级可以获得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并且随着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将“躺平”斗争的成果转化为在一切工作场所开展普遍的怠工斗争，并且在时机特别有利时，开展更加积极的罢工斗争，直至发展为普遍的、群众性的、此起彼伏的总罢工，最终瘫痪资本主义的积累机器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镇压机器。

另一方面，要坚决支持一切退休劳动者要求维持并改善退休待遇、提高社会保险支付水平、提高医疗保险支付水平的斗争，努力增加资产阶级国家的财政负担。在这方面，要特别警惕资产阶级及其自由派政治打手利用一部分落后群众的小农平均主义心理，煽动所谓退休公务员、国企退休人员待遇过高，为削减这部分退休人员的待遇制造舆论，以此来达到其分裂劳动群众及其统一战线，压低资本家的积累成本、缓解资产阶级国家困难的罪恶目的！

当未来中国资本主义的积累危机和财政危机爆发时，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必须坚决挫败资产阶级通过私有化、财政紧缩、“政府要过苦日子”等倒行逆施将危机的代价转嫁给劳动群众的图谋。如果资产阶级胆敢发动这样的进攻，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必须首先争取在政治上将其挫败。如果暂时不能在政治上挫败资产阶级的进攻，那么就应该发起群众性的、普遍的怠工和罢工斗争，使得资产阶级的积累机器和镇压机器瘫痪，再适时地转入政治上的反攻。

如果跨国资本和私人资本家以大规模资本外逃和投资罢工来要挟资产阶级国家和劳动群众，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则应该要求资产阶级国家实行左翼的改良主义政策来应对眼前的经济危机，要求实行大规模的财政扩张政策，以维持就业水平、保护无产阶级的斗争力量，同时以大规模的公共投资来代替资本家的私人投资，极大地增加国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为未来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好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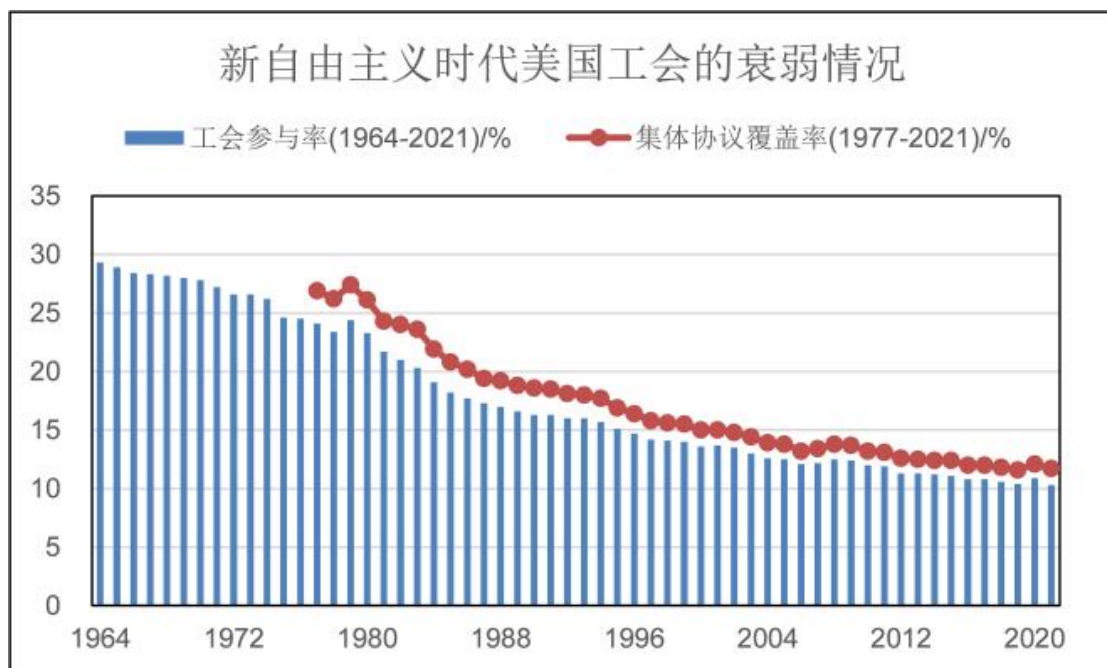
如果出现了有利的政治时机，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可以考虑赞成对一部分资本家用赎买的办法来实现国有化（比如以政府低价收购企业股票的方式）。还可以考虑，在一定的时期内，与一部分愿意与“改革开放”反动路线决裂的旧官僚暂时分享权力，以争取在尽可能和平的条件下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否则，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必然在资本主义的积累机器和镇压机器完全瘫痪以后，首先在那些资产阶级统治已经完全溃散的地方，夺取并建立一批地方工农民主政权，然后向广大地区迅猛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直至取得全国胜利。

美国工会 —— 美国帝国主义的打手和帮凶

作者：蒸馏水

在《“中帝论”者的新自由主义幻想与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一文中，1964年到2021年美国工会参与率及覆盖率持续走低（见下表）。所以本帖补充一下美国工会的情况供大家参考。



很多人对工会充满向往，抱有浪漫的期待。然而实际上，美国工会既不能在国内代表美国工人的利益，也不可能在国际上团结世界无产阶级。

美国主流工会的问题既是体制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在国内是“团结-斗争-团结”的劳资合作关系，在国际上则大行劳工帝国主义，与美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狼狈为奸。

罗伯特·费奇在《出卖团结：腐败如何毁灭了劳工运动，削弱了美国的前程》一书中，揭露了美国主流工会体制中工会结构、领导层腐败和黑帮勾结等深刻问题。他指出，美国工会只为狭隘的利益主体服务，美国的劳工因此被多个利益群体和各利益群体内部的（种族、性别、长幼、国籍等）不平等关系所分化。在对待移民工人和第三世界工人的问题上，美国的几大工会不仅没有倡导国际主义，反而以倡导人权之名，掩沙文主义、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之实。更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参与实施“颜色革命”，颠覆他国政治生态，充当美国帝国主义的打手和帮凶。

转《严海蓉：利益群体症——剖析美国劳工运动中的“美国病”》
全文见下。

兵棋体会战争 —— 诺曼底战役推演笔记（一）

作者：草庐棋士

应井冈山卫士同志的请求，我将在这里以推演随笔的方式给大家带来桌面兵棋《黑暗夏日》（诺曼底战役 <https://boardgamegeek.com/boardgame/249582/dark-summer-normandy-1944>）的推演战报，同时简单地聊一些关于兵棋推演和军事历史的知识。为大家紧张的生产、生活、斗争之余提供一些略有深度的军事历史研究经历。

棋与兵棋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学习和理解战争是为了在未来的阶级斗争中准确地把握斗争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为今后可能的类似斗争做准备。从阅读和思考中，我们可以获得关于战争的理性和感性认识。我们会认识到，堑壕中的战争是真实的，指挥部中的战争也是真实的。那么如何形成微观和宏观统一的战争观呢？这就需要将我们自己带入到指挥官的角色中，自己亲自“指挥”一场战役或者整场战争。我们现在又不是真正的军官，没法亲自去演习，在这种情况下，兵棋就是提供“指挥”机会的方便工具。在通常的语境中，“纸上谈兵”是书呆子不了解实际地胡乱指挥的代称，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则是用兵的最高境界。这看似对立的两者实际上存在着统一的关系。在没有战争的年代，“纸上谈兵”就是实战“运用”的替代

品。同理，那些经历过战争并擅长在战争中总结经验教训的阶级和民族，也会广泛地通过“纸上谈兵”的方式将经验和教训传递下去。

中国的围棋就是古代战争中“包围”这一经典作战形式的总结。一朝被围，四“气”不通，矢尽援绝，身死国灭。象棋类游戏则是对古代战争中“诸兵种合成作战”的抽象刻画。进退腾挪，火力交叉，象冲马跃，车驰卒奔。现代的军棋则注重交替掩护，隐真示假，利用地形，保障交通。但无论是哪种“棋”，都需要玩家充分理解“奇正相生”的道理。所谓“正”，就是正面进攻，以车换车，以马换马。所谓“奇”，就是出其不意，瘫痪对手，以弱胜强。“奇正相生”反映着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有正无奇，就会打成纯粹的消耗战。有奇无正，过分冒险，则四处漏风，失去章法。

弈棋最可贵的并不是取得胜利的喜悦，甚至也不是走一步、看两步、猜三步的深谋远虑，而是在逆境中迸发出来的主观能动性。红色中国网历来强调，天下大势归根结底决定于阶级矛盾发展的历史规律。但在这个已经被必然性决定的历史空间内，仍然保留了主观能动性发挥的巨大空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既不搞玄想空谈的宿命论，也不搞低头认命的宿命论。弈棋就是学习如何避免上述两种宿命论的上佳手段。与大家熟悉的电子游戏不同，弈棋基本不存在悔好几步棋的可能，不会给我们“读档重来”的机会。我们要为我们的每一个错误，每一次失着“负责”。如何在丧师失地，疆土沦亡的逆境下继续坚定胜利的信心，采取灵活大胆的策略反败为胜，是对弈中最重要的

体验。人生如棋，天下如棋，定式手筋不重要，重要的是逆境破局的韧性、智慧和勇气。

围棋、象棋、军棋都属于极高抽象程度的对称游戏。它们虽然可以让我们学习军事辩证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局部与全局的质量互变，奇正相生的对立统一，胜败转化的否定之否定等，但是它们严重缺乏具体环境的历史代入感。同时由于其对称性，双方缺乏明确的起始条件区别，无法反映历史上军事斗争的绝大多数情况。针对这些问题，十九世纪初的普鲁士军官团最先在宫廷军事教育游戏的基础上研发了世界上第一套严肃兵棋系统“战争游戏（Kriegsspiel）”。在“战争游戏”中，具体战斗的结算不再由导演部根据主观判断给出，而是由一系列严格的计算决定。他们还引入了掷骰子决定随机性和战争迷雾（不完全信息）的概念。随着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扩大，兵棋推演也逐渐走向世界各国，成为军事决策的重要工具。“战争游戏”的英文翻译“Wargame”也成了兵棋在英语世界的官方姓名。

当兵棋本身的机制设计和数据输入基本符合现实时，兵棋推演的结果通常代表当时历史条件下主观认识对客观现实较为正确的判断。如果在这个时候无视推演结果，空谈“存乎一心”，就会被客观规律无情地惩罚。旧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战役前的推演中曾经得出了日本联合舰队损失三艘航母的惨败结局。但由于日本海军不相信这种推演结果，强行让自己被击沉的航母“复活”，最后得出了可以赢得胜利的错误结论。结果不出推演结果所料，在历史上的中途岛海战中，日军

一共损失了四艘航母，比推演时还多一艘。当然，当兵棋本身的设计有问题时，“完美”的推演结果则会导致军事灾难的“完美风暴”。纳粹德国在入侵苏联之前，对即将到来的战争进行了推演。由于纳粹情报机构极大地低估了苏维埃政权的群众支持、组织能力和工业能力，导致他们极大地低估了苏联的战争潜力。兵棋推演的结果表明，德军可以凭借质量和数量的双重优势在第聂伯河-德维纳河以西消灭苏军主力。在此往东，苏军将失去有组织反抗的能力，德军将再无大仗可打。历史发展的结果表明，德军确实做到了推演结果的前半段：他们在波罗的海地区纵横驰突，摧枯拉朽，他们在莫斯科轴线上取得了比亚维斯托克-明斯克围歼战的胜利，他们在南方打破了苏军的重点防御之后，又在乌曼地区围歼了苏军重兵集团。苏联战前储备的技术装备遭受了严重损失，有经验的常备军也受到重创。但是推演结果的后半段显然并不如德军所想。苏维埃政权迅速组织起了庞大的后备力量，即使在斯摩棱斯克、基辅、维亚济马-布朗斯克战役中继续遭受重大损失以后，仍然能在莫斯科城下挡住德军并发起了全线反攻。通常随着资料的逐渐解密和研究的深入，兵棋设计者对以往历史的了解也会更加准确。

诺曼底战役与《黑暗夏日》

我们接下来将推演的诺曼底战役是美国主流军事文化中的重要符号，是美国世界帝国地位巩固的标志。对于美国的一般“军迷”，乃至一般的资产阶级“国际关系”和“历史”学者来讲，苏德战争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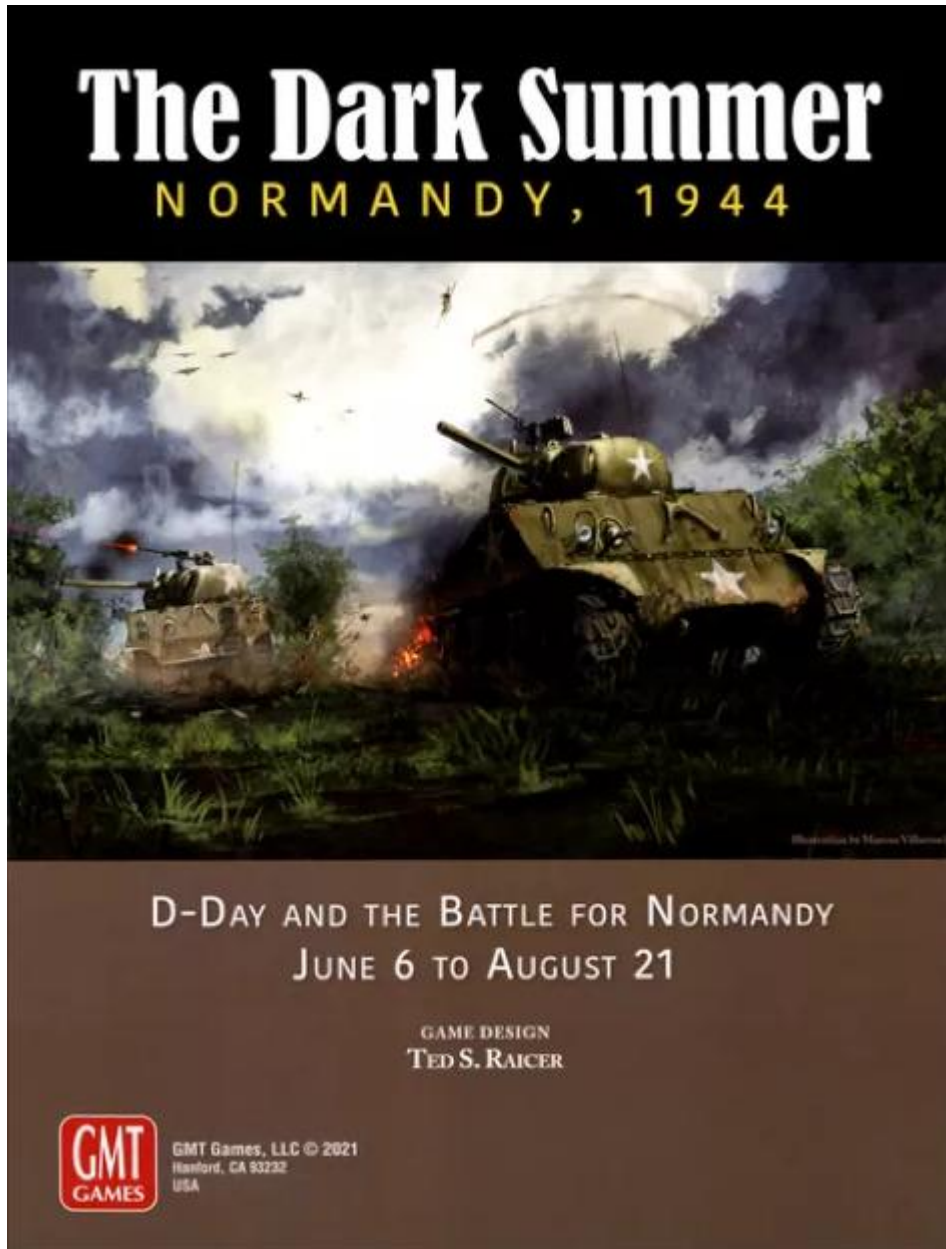
非是二战的一场小插曲，诺曼底则是绝对的转折点。这些西方文人的愚蠢以及战后西方军事历史过度依赖纳粹军官回忆录的状况让西方对二战真正的决定性战场研究一直处于过家家的水平。在这个问题上，里德·哈特自吹自擂的《德国将领谈话》是罪魁祸首，纳粹-北约军官梅林津和巴尔克的“回忆录”也是恶名昭彰。直到苏联解体，许多档案解禁之后，西方才真正拥有了严肃的二战史研究。当然，今天我们讲的诺曼底战役与西方对苏联人民抗战的偏见基本无关。总体上，西方军事历史学界还是能够以较为可观的态度分析本场战役的。

在西方民用兵棋推演爱好者中，诺曼底题材也是最受欢迎的题材之一，是著名的二战西线“老三篇”（诺曼底、“市场花园”、阿登）之首。在战役级别的诺曼底兵棋中，最著名是由马克·西蒙内奇设计的《诺曼底’44》

（<https://boardgamegeek.com/boardgame/38718/normandy-44>）和丹尼·霍特设计的《诺曼底战役》

（<https://boardgamegeek.com/boardgame/32838/battle-normandy>）。前者仅仅覆盖了1944年6月6日登陆到6月27日瑟堡战役结束的短暂区间，细节过多。后者则是营-连级的巨大规模，双方各有上千个棋子，非蒋光头一般的“微操”爱好者绝不会有过多耐心和时间推演此类作品。这次我们要讨论的是在拟真性、教育性和趣味性之间取得较好平衡的作品：泰德·瑞瑟尔设计的《黑暗夏日》

（<https://boardgamegeek.com/boardgame/249582/dark-summer-normandy-19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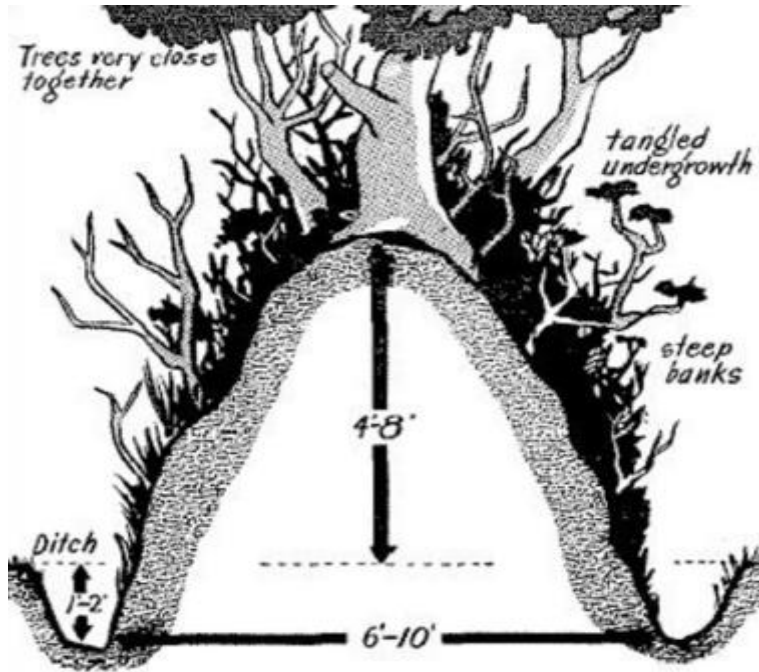
《黑暗夏日》模拟的是 1944 年 6 月 6 日登陆到 8 月 21 日法莱斯战役结束这段时间美军和英联邦军与纳粹德国军队在诺曼底地区展开的战役。参战单位通常是旅级（英联邦）、团级（美军、德军步兵）、团级战斗群（德军机动部队）。少量部队是营级规模。一个回合的时间跨度是一个星期。

这是本作的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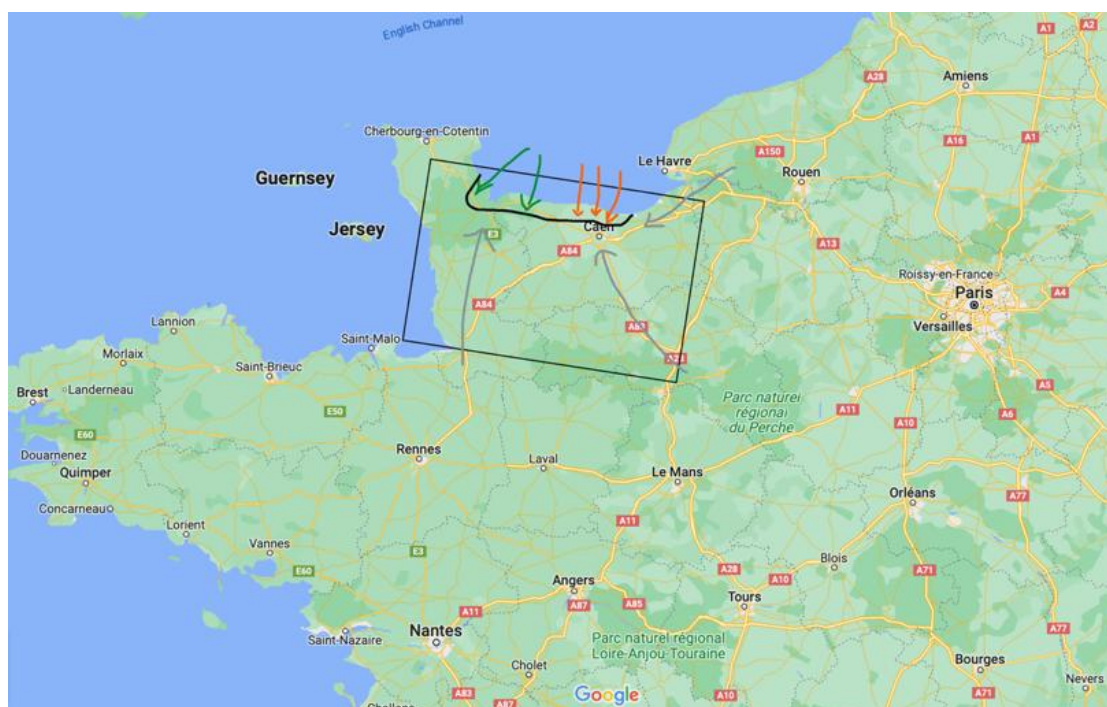


通常兵棋的地图由许多六角格组成。这是因为任意一个六角格中心点距离周围六个六角格的的中心点距离相等。本作每一个六角格的代表现实世界中 2.25 英里（3.6 公里）的距离。地图的正上方指向北略偏东。地图覆盖了北抵诺曼底海滩（上方蓝色部分）、南达阿朗松（右下）和阿弗朗什（左下）、西涉海峡群岛东面（左方蓝色部分），东括阿让唐（右偏下）和利雪（右偏上），东西横跨 180 公里，南北纵幅员 100 公里的地区。途中蓝色部分是海洋，土色部分是平底，深棕色部分是高地，深绿色是密林，浅绿色是疏林，蓝色粗线和细线是河流，河口青色地区是沼泽和湿地，灰色密点是城市，浅黄圆点是城镇，红色线条是主要道路，灰色线条是次要道路。这些都会对部队的运动、作战、补给和对地区的掌控造成影响。占地图面积最大的绿色网状部分是诺曼底特有的“树篱”地形。树篱由诺曼底地主划分地界时种下的各种植被组成。其底座通常是高一到两米的突破，上面有树

木和灌木，旁边可能还有排水沟。树篱将当地地形切碎为大小不一的碎块，十分有利于防御作战。树篱将对盟军，尤其是从地图上方偏左部分登陆的美军造成巨大的阻碍。树篱的示意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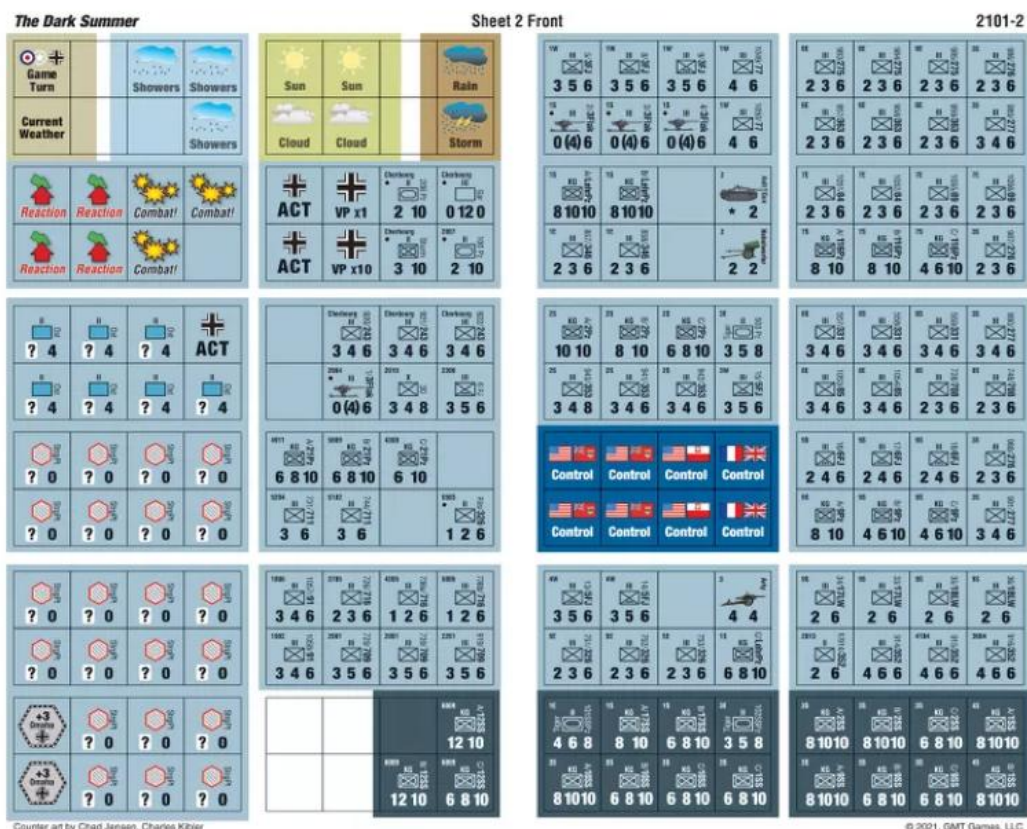
在谷歌地图上，该兵棋地图覆盖了下图黑框内的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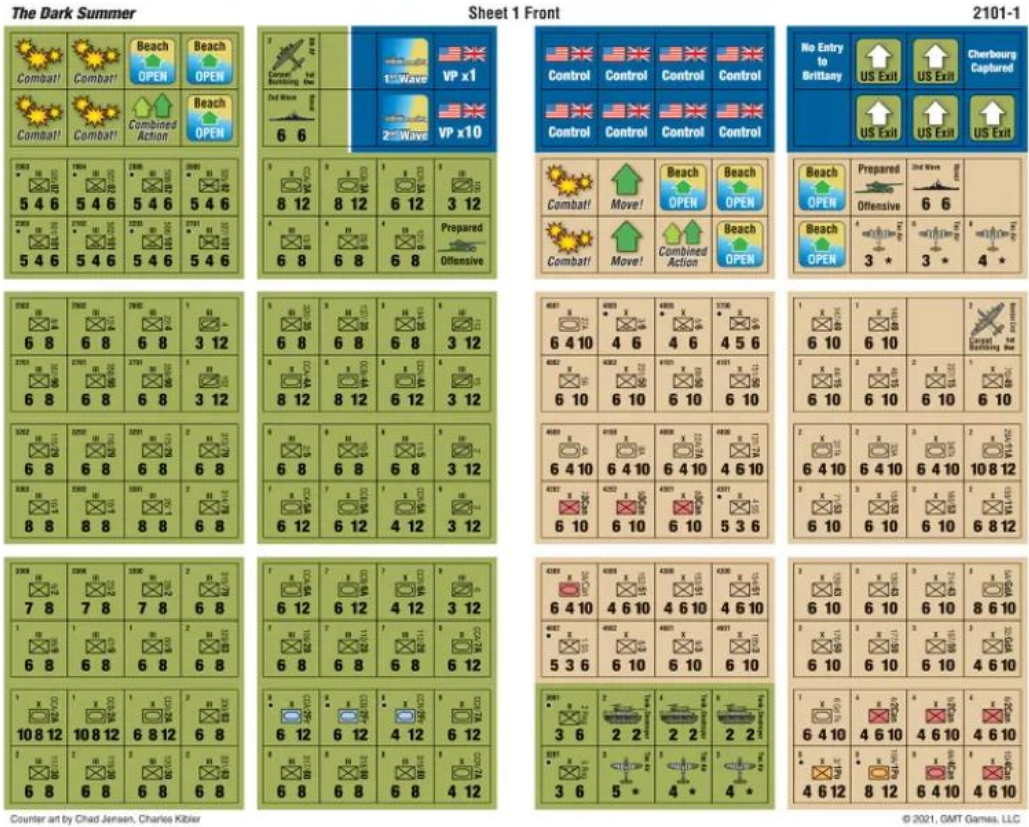


途中绿色箭头指示美军登陆方向，棕色箭头指示英联邦军登陆方向，黑色曲线指示最初的对峙线，灰色箭头指示德军的增援方向。其中南方的灰色箭头是德军第 1 集团军步兵的增援路径，东北方灰色箭头指示德军第 15 集团军步兵的增援，东南方的箭头指示德军西线装甲预备队的增援。最初与盟军对峙的部队是实力较弱的德军第 7 集团军。不难看出，诺曼底地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战区，如果登陆的盟军被压缩在登陆地点不远，不能取得有效的突破，则无法发挥其数量优势和火力优势。如果盟军能够取得突破，则可凭借空中优势和机动性优势将战线的长度拉伸到德军无法接受的长度。在这种情况下，德军要想维持战线就只有一个选择：从法国全部撤出，在法德边境重建防线。同时盟军也可以在撤退过程中大量杀伤德军，甚至引发连锁崩溃。相反，德军只需要维持一段不长的战线就可以将盟军“堵”在海岸线和向北突出的科唐坦半岛内。就算不能把盟军“推下海”（这显

然是奢望），也能以较小的兵力和损失牵制巨大的盟军兵力，从而继续将主力集中在苏德战场，稳住那里摇摇欲坠的战线。所以，诺曼底对于双方都是必争之地。

下面两张图就是兵棋的棋子板，棋子通常也称为“算子”（counter）。算子版上青灰色的是德国国防军和空军（防空炮）的单位，黑色的是纳粹党卫军的单位，橄榄绿色的是美军和自由法军的单位，土黄色的是英联邦军队的单位。这些颜色基本反映了参战各方军服的颜色。此外还有一些用作标记的算子，如天气，行动轮次，战场支援，胜利点数回合记录等，我们将在推演时根据情况具体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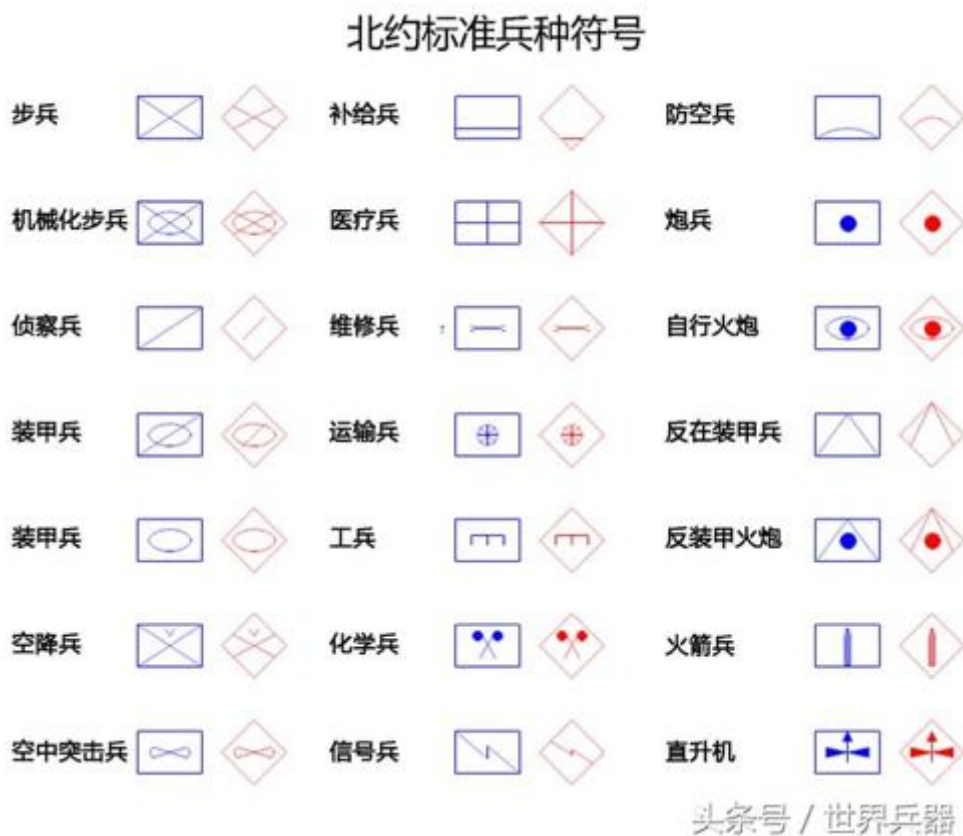


在算子中最重要的是表示军事单位的算子，以下图为例：



这是纳粹党卫军（Schutzstaffel，简称 SS）第 12 师，“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的全部三个团级战斗群（Kampfgruppen，KG）的算

子。通常算子中间的符号表示该单位的兵种信息。党卫军 12 师虽然是个装甲师，但是其麾下的装甲单位和步兵单位通常是以混编战斗群的形式作战，因此兵棋设计者将上述三个战斗群都定性为机械化步兵。机械化步兵的兵种符号由一个代表步兵的“X”（代表两支步枪相交）和一个代表装甲兵的“O”（代表坦克的形状）组合而成。下图是使用最广的北约军事符号系统对各兵种的描绘。



算子兵种符号的上部通常是该单位的兵力规模。本单位是战斗群（KG），规模大小随着具体编制的变化。下面是北约符号体系中对部队规模的表示。

●●	小队
●●●	排
	连、陆战连、炮兵连、或飞行小队
	营、骑兵中队、或空军中队
	团或集团
X	旅、装甲师战斗群、或空军连队
XX	师或空军司令部
XXX	军或航空队
XXXX	集团军
XXX'XX	集团军群

本兵棋的部队规模在营（两道竖杠）到师（两个 X）之间，德军的战斗群规模大约是团级（三道竖杠）。

以党卫军第 12 师“C”战斗群（历史上德军战斗群通常以指挥官名字命名，这里兵棋设计者做了简化）为例，其算子下方的三个数字代指单位的进攻能力（6），防御能力（8），和机动能力（10）。如果某一单位进攻和防御能力相等，则只有统一的战斗力和机动能力两个数字。如党卫军第 12 师的“A”战斗群和“B”战斗群的战斗力都

为 12，机动能力都为 10。算子左上方的信息是算子的部署和增援信息，在此不多做介绍。

如果我们略微查看一下两张算子版上的信息，就可以一窥参战双方军队的状态。

美军单位（橄榄绿）的主力是步兵师，装甲师，独立装甲骑兵（机械化侦查兵）团和两个空降师。美军的步兵师高度标准化，除了两个老兵单位（第一和第二步兵师），其余的战斗能力都为 6，移动力都为 8。这反映了美军在战争后期完全动员起来的工业能力可以像制造汽车一样地制造步兵师这样的大型单位，而且各种步兵师的组织编成完全一样。下图是一个典型的美军步兵师（第 4 步兵师）的三个团级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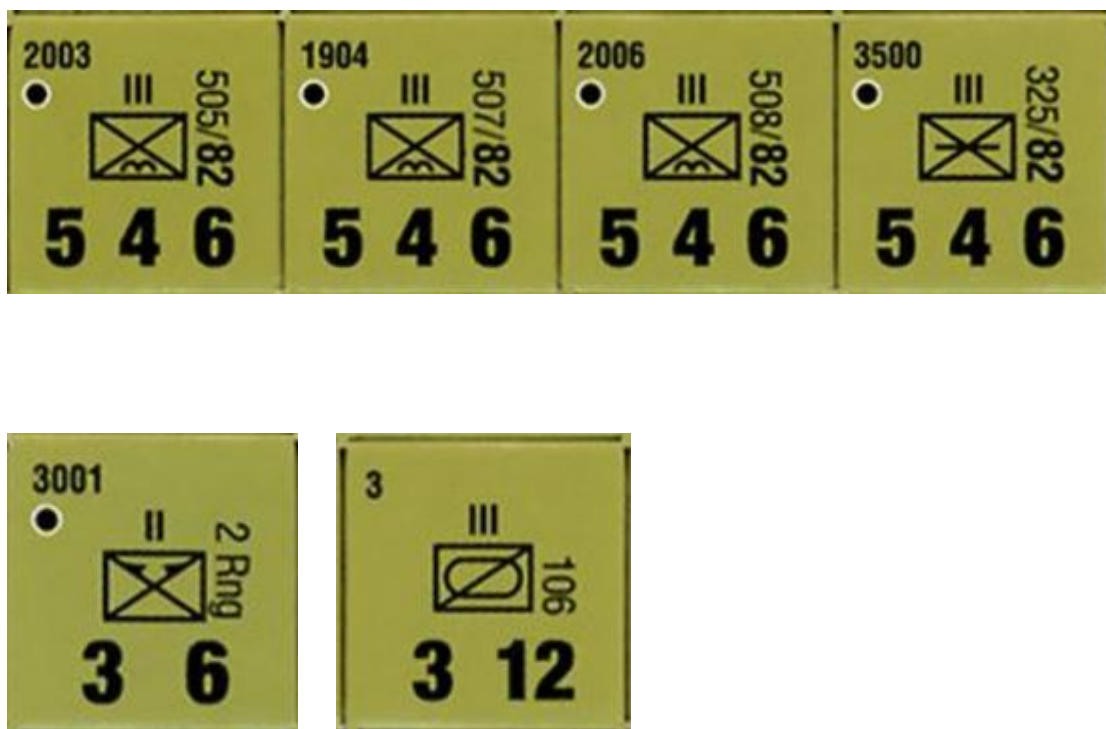


美军的装甲师拥有极高的机动能力（12），但是水平参差不齐。第 2 装甲师战斗群的战斗力为 10 或者 8，而新编的第六装甲师就只有 6 或者 4。这反映了装甲师作为高度合成的单位严重依赖长期训练和作战经验的积累，并非可以在一朝一夕之内建成，就连战争资源极其丰富的美国，也不可能“量产”有诸兵种合成作战经验的军官。当

然，今天的美军早已经不是当时意气风发解放西欧的美军了。下图是美军精锐第2装甲师三个旅级战斗群的算子。



此外，美军还拥有两个空降师，一些游骑兵（轻步兵）单位，和一些装甲骑兵（机械化侦察兵）团。以下本别是第82空降师的四个团、第2游骑兵营、第106装甲骑兵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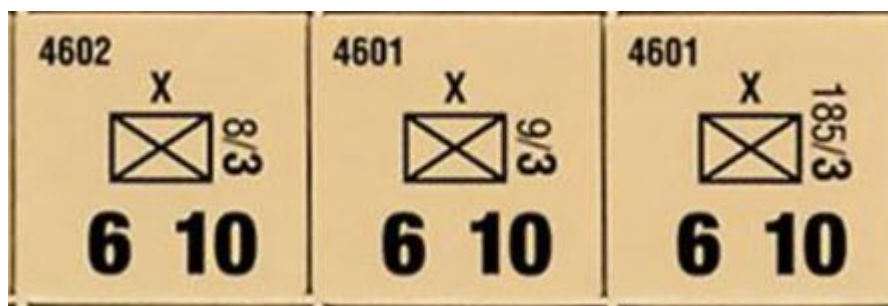


英联邦单位（土黄）的特点是按部就班、谨慎行事。在经历了1940年法国战役和后来的北非战役之后，英军中敢打敢冲的军官和

士兵损失严重。到了诺曼底登陆的时候，英军中普遍绵延着严重的厌战情绪，哪怕是老兵也不愿意冒险参与大胆的战术行动。英军的巨大损失也可以从其军队构成中体现出来。英联邦军队中兵种符号是猩红色的单位是加拿大军队，亮黄色的是波兰部队两者占了英联邦军队的近四分之一，在英军自己的部队中也有大量的印度人在服役，这种大规模使用殖民地和仆从军的现象也说明了这个“老大帝国”朽木难支的局面，与今天的美国是形神俱似。下图是归英国指挥的加拿大第2步兵师。



当然，英军有一个有点是美军暂时比不了的，就是英军由于规模较小已经全部实现了摩托化。依靠建制内卡车的英军步兵部队的机动能力可以达到10，而主要依靠上级调拨卡车的美军步兵只有8。考虑到英军登陆地区（地图右上角）基本没有树篱地形，一旦英军在平地上取得突破，有可能给德军造成灾难性后果。下图是英军（本土）第3步兵师。



英军还有一些装甲师。但是直到战争结束，英军一直没有真正领会现代装甲战的精髓。其装甲师的坦克旅和步兵旅仍然无法很好的配合。此外，英军还有一些独立的装甲旅。这些部队在没有步兵掩护时会非常脆弱。要知道，这还是二战后期巅峰状态下的英军装甲部队，这也难怪今天的英国教官在给乌军“传授”如何使用装甲部队突破俄军防线的时候，连乌克兰人都看不起他们。下图是英军扬名北非的第7装甲师和第8独立装甲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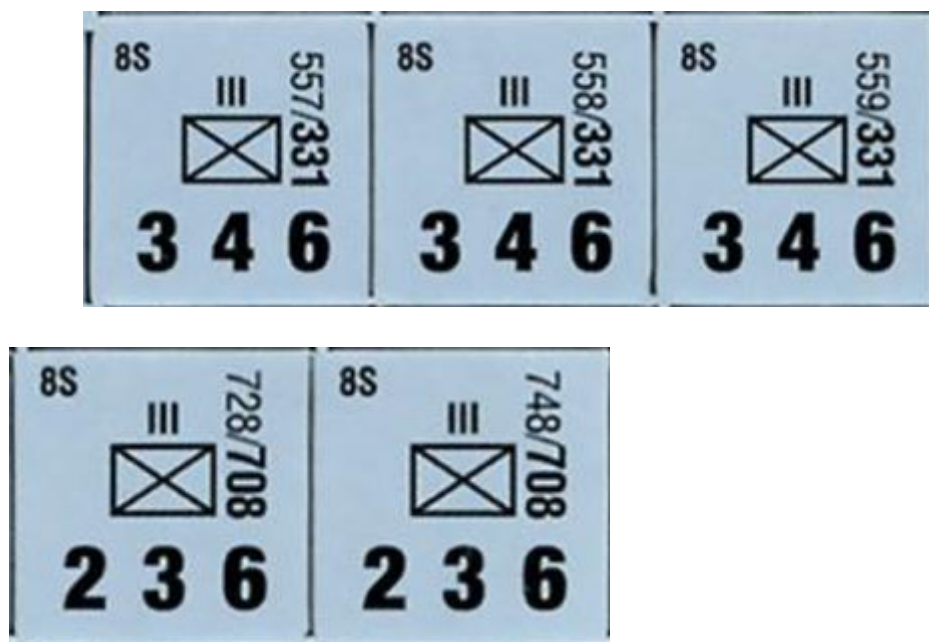


英军也有伞兵和类似于美军游骑兵的“皇家突击队”，在此按下不表。

德军单位（青灰色和黑色）的战斗力的分布则显露出纳粹德国晚期的尴尬状况。德军绝大多数普通步兵师和伞兵师下属团的战斗力都在2到4之间，而且机动能力通常只有6。造成这种窘境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首先，德军的人力资源在已经持续近 5 年的战争中损失严重，一般步兵部队的基层军官已经损失殆尽，后补充进去的军官和士兵的素质和士气都成问题。为了适应这种损失，德军在 1942 年以后把每个步兵团三个步兵营裁剪为了两个，有些步兵师甚至直接裁掉了一个团。第二，德国的军工生产完全无法跟上高强度的战争消耗，许多步兵师无法配齐建制内应有的火炮，被迫使用较小口径的替代品，甚至使用缴获的法国和苏联火炮。第三，德军为了加强装甲师和机械化步兵师，把普通步兵师的机动车辆基本都交给了前者，导致步兵师只能通过士兵的双脚或者骡马来机动，极大地减慢了重装备的机动速度。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德军真正的步兵主力一直在二战的主战场苏联，留给西线的步兵通常是些次等部队，这极大地限制了德军步兵的作战能力。当时德国步兵的窘况同样也适用于今日乌克兰军队。巨大的损失让基辅被迫将没有充分训练的新兵投入战场，新兵上阵后会造成更快的损失，为了填补战线，就要进一步缩短训练，造成恶性循环。时至今日，哪怕是“北约亲训”旅团，也充斥着刚刚完成连级训练的新兵。此时此刻，一如彼时彼刻。此番境况，不知北约军头们会作何感想。

下图是两个典型的德军步兵师，分别是战斗力尚可的第 331 步兵师（二线师）和只有两个团的第 708 步兵师（静态守备师）。这些步兵师只有将其下属各个团猬集成团才能勉强抵御盟军的进攻。



构成诺曼底战场德军主力的是5个国防军机动师和6个党卫军机动师。这些机动师的战斗能力通常可以媲美盟军的精锐装甲师，有时一个德军装甲师的团级战斗群的战斗力顶得上一个普通步兵师。德军机动部队的机动性也达到了10，理论上可以在数个战役重点之间灵活机动。能否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集合相当数量的机动部队对盟军进行坚决的打击，是德军能否暂时取得战场主动权的关键。下图是德国国防军第2装甲师。



德军还拥有数个装备“虎式”重型坦克的重装甲营。如果它们与机动部队配合得当，有可能取得较好的作战效果。下图是纳粹党卫军第 101 重装甲营。



不过，无论历史和兵棋推演中，想要做到这一点都是不容易的。正是由于德国的战争资源过度偏袒这些机动部队，导致他们不得经常疲于奔命，填补由于步兵战斗力低下造成的漏洞，并没有太多出击的机会。此外，德军还拥有一些由俘虏组成的“东方营”和海岸火力点，这些单位基本会在初期被消灭，在此不过多介绍。

历史上影响诺曼底战役进程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天气。对，你没看错，龙王爷也在战争中有投票权，有时这个投票权还很重要。一切登陆作战的难点都在于补给。能把部队送上滩头是一回事，巩固滩头阵地是另一回事，为探头和后续部队提供补给是比前两者更加复杂且困难的事。历史上，盟军登陆地点没有现成的港口，唯一一个较近的港口科唐坦半岛北端的瑟堡港也被德军彻底破坏。盟军只能在登陆的几个滩头建立人工港。这些人工港的吞吐能力有限，而且一旦遇到恶劣天气就无法有效装卸物资。更令盟军头疼的是，在没有全天候战斗能力的时代，空军的出勤也受到天气条件的巨大限制。对没有制空权

的德军而言情况刚好相反。没有了盟军的空中遮断打击，德军就不必担心在道路行军的时候被轰炸的问题了。在本次兵棋推演中，天气状况会影响到盟军的德军的增援、补员、空军和炮兵支援、道路机动能力和行动机会等，这些细节在以后会择机讲述。

本兵棋的设计者为推演设置了双方的胜利条件和胜利点数。



盟军尽早占领瑟堡（A）、尽早占领卡昂（D）、向布列塔尼半岛突进（B），向东面的巴黎方向突进（C）都会获得胜利点数。德军阻止盟军过早占领瑟堡和向布列塔尼推进，歼灭盟军空降兵，并最后向东方撤离（C）都会获得胜利点数。胜利点数的设置反映了盟军的补给瓶颈以及最终突破德军防线的战役目标，也反映了德军最初想要挡住盟军前进，后来要努力逃脱盟军追击的目标。

推演双方与最初计划

本次推演由我（草庐棋士）扮演德军，由井冈山卫士同志扮演盟军。由于兵棋在我这里，井冈山卫士无法参与具体操作，只是给出大体指导意见，并由我代为操作（感谢井冈山卫士的信任）。据井冈山讲，他曾经在“战争艺术 IV”和“决定性战斗：诺曼底”两个电子兵棋中推演过诺曼底战役，同时也有和远航一号推演桌面兵棋的经验。尽管井冈山卫士是第一次推演这个兵棋，但是他应当对本场战役的全局拥有相当程度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同时也对桌面兵棋的一般规则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次又由其执相对简单的盟军一方，这对我会造成不小的压力。

下图是推演前的初始状态。



途中绿色文字标注的是美军登陆的海滩代号，土黄色文字标注的是英军登陆的海滩代号，黑色文字标注的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突破方向。1944年6月6日，美军的第82空降师和第101空降师大部已经在科唐坦半岛东南侧，犹他海滩背后成功空降。英军第6空降师大部也在奥恩河以东，宝剑海滩背后成功空降。盟军的其他登陆部队随时准备突击上陆。德军的兵力较为薄弱。除了奥马哈海滩的第352步兵师和卡昂南部的第21装甲师以外，剩余的都是一些用作静态防御任务的次等步兵师。东方营（兵种符号是蓝色矩形）和滩头阵地（兵种符号是六边形阴影）并不能有效起到阻碍盟军推进的作用。

在推演完成后，井冈山卫士向我介绍了他的进攻计划。在我们推演的时候，我们互相不知道对方的计划。由于他画的图实在是碍观瞻，我在这里帮忙重新画了一下。



图中绿色箭头是美军的进攻计划，土黄色箭头是英军的进攻计划。粗箭头是主攻方向，细箭头是辅助进攻方向。红色线条是双方最初对峙线。黑色直线的两军分界线（结合部），由于两军后勤补给体系不通，兵棋规定在美军突入布列塔尼（地图左下方）之前，英美两军相互不得跨过分界线。

井冈山的总体战术判断是这样的：由于盟军拥有总的兵力优势和良好天气下的机动性和战场支援优势，可以通过反复拉扯德军防线的虚弱部分迫使德军延长防线，为盟军突破创造有利条件。盟军一旦完成突破，则可以充分孤立那些被甩在后面的德军单位，让德军机动部队不得不疲于奔命。在时机有利的时候，可以将小规模击溃战发展为大规模的围歼战。

美军计划 A1:集中犹他海滩的登陆的多数兵力迅速向瑟堡挺进。造成迅速夺取瑟堡，获得大量胜利分数的声势，造成对德军指挥官（草庐棋士）的巨大心理压力，甚至迫使其调动部队进入瑟堡。这些部队将不可避免地被切断补给并最终被消灭。

美军计划 A2:集中一个空降师（82 师或者 101 师）的兵力，试图切断科唐坦半岛，吸引德军抽调从南方进入的空降兵援军，拉长德军战线，使其出现漏洞和弱点。

美军计划 A3:历史上向卡灵顿的进攻是盟军在登陆第一天就计划完成的事，结果拖了一个星期。井冈山似乎并不急于夺取卡灵顿，只是计划调集一个步兵师的兵力去试探性进攻。

美军计划 A4:根据井冈山的总方针，他会用少量兵力从奥马哈海滩出发向卡灵顿前进。其目标也不是夺取卡灵顿，连接两个海滩，而是给德军一个仿佛能守住卡灵顿的幻觉，从而将德军守军和增援部队最终包围在卡灵顿和附近的沼泽。

美军计划 A5:这是井冈山的主攻方向。第一阶段（A5.1）意图趁德军在战役初期立足未稳之时迅速通过树篱地区的北段，夺取圣洛。圣洛是德军在战役初期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一旦丢失，德军从南向北的增援和机动部队从东向西的调动都会受到极大的干扰。如果德军不想冒整个诺曼底西部战役集群被切断后路的风险，就必须将防线大踏步后撤到库唐斯一线乃至更靠南的位置。这将大大压缩德军的防御纵深。第二阶段（A5.2）美军的目标是攻取格兰维尔，切断任何未来及撤退的德军的后路。在第三阶段（A5.3），美军将会沿着海岸公路和平地地形一路攻占阿弗朗什，突入布列塔尼半岛。当第三阶段开始时，瑟堡应当已经被美军夺取，犹他海滩登陆的部队可以加入到这一行动中。这一阶段没有什么战术技巧可言，就是利用盟军的兵力、火力和空中优势把沿路的德军统统炸上天。历史上，井冈山的这一行动对应着美军在7月底发动的“眼镜蛇行动”，只不过突进纵深更小，兵力更加集中。

井冈山为美军做的计划看起来很完美，但是该计划的实施严重依赖于计划的各个组成部分严丝合缝地完成，一旦某个中间环节出现差错，总体计划的完成就会被极大地推后，导致计划本身迅速“贬值”。比如，一旦美军在向瑟堡前进时受阻或者在圣洛以北推进缓慢，德军就有可能将增援调集到美军面前，从而极大地推迟 A5.2 和 A5.3 的执行。井冈山时候也承认，自己高估了美军的物质优势，过度分散了兵力。

井冈山为英军做的计划久保守的多，这可能是因为他一向对英军没什么信心。

英军计划 B1: 派出少量兵力保障与美军的结合部，吸引德军机动部队来此维持防线，稀释德军在其他战线上的机动兵力。

英军计划 B2: 这是英军的主攻方向。第一阶段（B2.1）集中力量尽早夺取卡昂和其东南方向的高地。该目标一旦完成，则英军向东（巴黎方向）进军的道路畅通无阻。第二阶段（B2.2），在打开突破口之后，英军视情况决定向东突破（走出地图）还是向南卷击德军侧背。

英军计划 B3: 向东北方向进攻奥恩河下游沼泽地带，将德军的援军引入机动不便的沼泽地区，辅助 B2 方向的突破。如有机会，向地图东北独立取得突破。

后来的事实证明，英军这种“结硬寨，打呆仗”的做法比美军的大踏步穿插更让德军头疼。

井冈山估计，不迟于第7回合（7月第4周），美军完成A5.3，英军完成B2.2。此时德军在诺曼底的防线就会成一个东西向南凹陷，中间（英美军结合部处）向北突出的巨大突出部。在时机有利时，美军转向东北，英军转向西南，有可能形成对德军主力的大包围（计划AB）。如果成功，则盟军有可能在诺曼底直接摧毁德军西线主力，战争进程会大大缩短。这个内容并不包含在该兵棋剧本设定里，也不会影响任何的胜利分数。按照现在的话说，叫演习导演部并不知情。井冈山告诉我，这是他给自己定下的一个锦上添花的目标，如果推演时并无机会实现，则遵循兵棋规定的胜利条件：英军向东（巴黎）突破，美军向南（布列塔尼）突破。

我（草庐棋士）指挥的德军战役计划如下图所示：



由于盟军握有主动权，德军的行动，无论攻击或者防御，多多少少都是对盟军行动的反应。这也是我第一次和井冈山对弈，并不知道井冈山的战术风格，无法针对他设计对应的打法，只能采取一些一般性质的防御和进攻准备。

德军防御战的重点是利用有利地形和机动单位内线作战的优势维持防线的完整性。一旦防线被突破，盟军可以凭借极高的机械化水平和空中优势向突破地段迅速集中兵力，很有可能发展成不可收拾的局面。针对井冈山的进攻，我计划了几条防线。要说明的是，预先计划防线这种事情是完全不符合德军战役法传统的。但是当仗打到了第五年（1944年），在苏军和盟军的巨大优势面前，任何“传统”都必须为现实让路。维持防线完整是有代价的。由于盟军拥有全面优势，德军要维持战线就很有可能需要从有利于防御的地区撤出来缩短战线。如果不这么做，就要冒者前线部队在盟军重火力下遭受巨大损失

的风险。因此，阻挡盟军，防线完整，控制损失这三项任务不可能同时完成。本作中德军战役指挥的艺术就体现在如何用微观上的兵力调动和布局，在宏观上控制三项任务失败的进度不至于过早失衡。

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我为德军设计了四条目标防线。

红线（GT2）是德军在第2回合（6月第3周）结束时的目标防线大致位置。在防线西段，德军将把瑟堡守备队大部调出，将盟军阻挡在科唐坦半岛的树篱地区。在盟军舰炮无法有效覆盖的地区，集中一个步兵师在树篱地形可以顶住三倍于己的盟军进攻，有三个这样的师（91师，243师，709师）各自相隔两格（该兵棋规定无法跨越敌方单位周围六格的控制区）排布，就能形成类似“铁索连环”的效果。再加上东方营和瑟堡的两个机动营，就有可能将在吞吐能力有限的犹他海滩登陆的美军限制在距离登陆点不远的地方，阻止其向瑟堡前进，同时减缓其切段科唐坦半岛补给路线的速度。在防线的中段德军视情况退到树篱地区的边缘，不必追求顶住盟军的进攻，但在撤退中需要维持防线完整，等待前来增援的机动部队。在防线西段，保证卡昂不能有失，可以在卡昂城外用低价值步兵部队建立一道缓冲区，减缓英军的前进。红色虚线是德军可以在撤退之前与盟军“拉扯”的地区。在卡灵顿附近，德军可以依靠沼泽与河流用小部队迟滞盟军的进攻，并视情况或牺牲这些部队来争取时间，或将其撤出。在防线东段，如果天气允许而且英军不增援奥恩河东岸的伞兵第6师，德军可以在第1或者第2回合（6月第2、3周）调集21装甲师（现在卡昂南部）

或者党卫军第 12 “希特勒青年团”师将其击退或者消灭（德军攻击行动 GA2），并沿着奥恩河重建防线。如果天气允许而且英军右翼缺乏掩护，德军也可以调集两个或三个机动师，以赌博的姿态从两军结合部的巴约镇直接冲向英军登陆的三个海滩（德军攻击行动 GA1）。如果赌博成功，英军登陆点被基本破坏，按照兵棋规则德军可以直接获得推演胜利。

紫线（GT4）是德军在第 4 回合（7 月第 1 周）结束时的目标防线大致位置。我预计井冈山会集中兵力切断科唐坦半岛的补给线（井冈山自己的计划仅仅是将此作为次要方向）。当补给线被切断以后，瑟堡守军势必成为一盘死棋。此时防线西段的河流和树篱会成为天然的屏障。在防线中间部分，圣洛正北和东北方向的树篱有可能已经被美军逐渐蚕食，德军需要稳步后撤至河流和密林之间。防线东边的卡昂可能已经失守，就算没有失守，也不应在此地和准备充分的英军继续纠缠。德军应当退到奥恩河以东，以河流本身或者河东面的高地为依托展开防御。

蓝线（GT7）是德军在第 7 回合（7 月第 4 周）结束时的目标防线大致位置。我预计井冈山会在第 5 或者第 6 回合解决瑟堡守军，并将犹他海滩登陆的部队从科唐坦半岛调往南方。兵棋设计者也根据历史上盟军工兵装备的发展调整了树篱地区对盟军移动和作战的阻碍，树篱地区的防御优势会被削弱。从这个时候起，德军的防御方针将从以迟滞敌人为主的弹性防御转向以保存兵力为主的机动防御。由于德

军最终需要从地图东部撤出来获取胜利点数（反映历史上德军保存兵力防御德国本土），我决定加快让出西部防线的树篱地区，准备将机动部队向东调动准备撤离，将步兵向南调动掩护布列塔尼的入口。此时的防线将逆时针从与海岸平行的方向旋转到呈 30 度角的方向。由于此时德军后备兵力逐渐赶到，防线即使拉长一些也不是大碍。防线东段应当继续把守卡昂东南侧的高地和沼泽，为机动部队东撤提供屏障。

黄线（GT9）是德军在第 9 回合（8 月第 2 周）结束时的目标防线大致位置。此时美军大概已经突破了阿弗朗什以北所有的树篱地区。德军西部防线的剩余部队应当在河流防线后尽可能坚持到推演结束。防线东段的英军也应当已经突破了沼泽和高地防线，在此地的德军应当有序后撤。此时，德军的作战样式应当从机动防御转变为机动后撤，保证尽可能多的部队，尤其是机动部队从地图东方撤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无论这四条防线如何设置，都不能在现实中取得战役的胜利，因而也无法将战役的胜利转变为战略上的力挽狂澜。唯一一种在现实中能够给予盟军重创的方式是扫清登陆场，把盟军赶下海（GA1）。所以，本兵棋推演规定的“胜利”，多数情况下仅仅指的是德军输的不是那么难看而已。尽管如此，德军指挥官（草庐棋士）也不会坐以待毙，进行专守防御，而是需要在合适的时机进行反击，争取局部的战场主动权。

德军要想反击，靠步兵师是不行的。德军最有战斗力的两个步兵师是第 352 和第 77 步兵师。这两个师下属团级单位的进攻能力只有 4，而且它们出场较早，很有可能在推演早期就被拿去“堵口子”，无法抽身，或是直接被消耗掉了。德军反击的主力是机动师（装甲师和机械化步兵师）。德军在整场推演中一共有 11 个机动师。这个数量看起来是不少了（相当于德军在苏联前线机动兵力的一半，德军全军总机动兵力的三成），但是这些单位是在各个回合逐渐进入战场的。而且由于德军不得不拿出一部分机动师去维持防线，能够用来进行反击的机动师就更加捉襟见肘。在防线不至于迅速崩溃的情况下，德军能拿出来进行反击的机动师通常不超 3 个，而且也不能保证反击发起时这些机动师基本满员。我的判断是从推演开始到结束，德军可用于反击的力量将呈现一个倒“U”型曲线。在推演初期，由于增援的机动师尚未赶到，德军缺乏反击能力。随着这些部队的赶到，德军可能会在第 3 回合到第 5 回合（6 月第 4 周到 7 月第 1 周）之间遇到一个“黄金反击时间点”。如果德军此时没有遭遇重大不利状况，可能最多能够调集 4 个机动师进行反击。随着推演的继续进行，盟军的援军和火力都在加强，德军机动部队的消耗也会陡然加速。在推演接近结束的时候，德军能用于反击的机动部队数量会迅速减少。如果德军无法抓住这个机会进行反击，或者当时的形势并不利于反击，德军将彻底失去反击的机会。

GA3 是德军第一个可能的反击机会。在第 3 回合到第 4 回合之间，美军通常会从卡灵顿周围的沼泽中沿着道路向南推进。此时美军的犹

他海滩的大部分兵力有可能被牵制在瑟堡战斗中无法抽身，奥马哈海滩的部队有可能在圣洛以北的树篱地区陷入拉锯战。这一支部队有可能是孤立的。如果德军集中 2 个机动师和一些步兵部队在此发动反击，在有利的条件下有可能歼灭美军 2 到 4 个团的兵力，造成德军冲击犹他海滩的态势，迟滞美军向瑟堡的进攻，并削弱美军后续的进攻能力。

GA4 是德军第二个可能的反击机会。在第 3 回合到第 5 回合之间，英军突破卡昂之后会越过奥恩河进攻德军在卡昂东南高地的德军。如果德军能够集中 2 个机动师加上 2 个重装甲营的兵力，就可能在高地前的平地上分割包围并歼灭英军一个整师。

GA5 是德军第三个可能的反攻机会。在第 4 回合到第 6 回合之间，美军有可能会沿着海岸的高速公路试图直插德军防线侧后，迫使德军失去平衡。如果德军能够集中 3 个机动师的兵力向海岸突击，则有可能短暂地切断这一部分冒进美军的退路，为歼灭他们创造条件。这一反攻类似于历史上希特勒强令发起的，旨在切断已经突入布列塔尼半岛美军后路的“莫尔坦反攻”。不过 GA5 的野心没有那么大，发起时间也较早，如果失败也不太会影响德军部队最终撤出战场。当然，GA5 可能取得的战果也会小于“莫尔坦反攻”。

上述三个反攻机会的时间窗口很有限，德军很可能只能完成一个。尤其是 GA3 和 GA4 发生在战线的两端，几乎不可能同时发起。不过，随着战斗的进行，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战机出现。能否抓住战机，能否见好就收，就要看指挥员的智慧了。

对比井冈山卫士和草庐棋士的作战计划，我们可以发现双方不约而同地把美军视为盟军有战斗力的部分，但都低估了英军的战斗力。由于高看美军，井冈山卫士将美军过度分兵并且安排了过多的任务，致使兵力分散。由于小看英军，井冈山卫士反而将英军的兵力集中到了主要突击方向。由于高看美军，草庐棋士过高地估计了美军的推进速度，并且准备将多数增援的机动部队投入到美军的方向。由于小看英军，草庐棋士居然认为少数机动部队和一大批战斗力极差的步兵可以沿着高地和沼泽（甚至没有树篱）构成的简陋防线面对英军主力坚守七八个回合（四条计划中的目标防线在卡昂附近基本没有变化）。在接下来的推演中，双方的判断、误判和针对前两者的调整会造成许多戏剧性的局面。这些戏剧性的局面就是兵棋推演的魅力之一。

本系列后续计划用两篇随笔记录总共十个回合的推演情况。敬请期待。

用兵棋体会战争 —— 诺曼底战役推演笔记（二）

作者：草庐棋士

在这一篇推演笔记中，我将给大家介绍一些兵棋的基本概念，随后向大家展示最初 4 个回合的推演战报。

兵棋中的抽象

正如在上一篇中所讲，兵棋是“纸上谈兵”。“谈”的虽然是“兵”，但毕竟是在“纸上”。兵棋不可能包含真实战争中的全部要素，故而需要对这些要素进行取舍，这就是兵棋的“抽象”过程。所谓“抽象”，就是“抽”取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抽”取矛盾的主要方面，用较低复杂度的理论模型去尽可能准确地还原某些复杂现象的主要运动规律，帮助我们了解这些现象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基本规律。在过去的“学点经济学”系列

(<http://www.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7524>)

中，我们就“抽”取了资本主义经济中阶级斗争、资本积累、世界体系这三个主要因素，构建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宏观理论模型。我们构建这个模型的目的是为了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中寻找资本主义在未来以何种方式灭亡的答案。无论是阐述资本主义如何正常发展还是推测其如何灭亡，都是建立在抽象之上的“模拟”过程。一

般的讲，正确的抽象过程和建立在其之上的模拟过程，就是正确认识世界的方法和正确预测改造世界进程的方法。

我们不妨把兵棋也当作是类似于政治经济学理论模型一样的抽象和模拟工具。不同层级的兵棋模拟的“主要矛盾”不同。战略级兵棋通常模拟的是折冲尊俎、运筹帷幄、资源调配、战区取舍，对具体军事细节则不做太多考虑。战役级兵棋通常模拟的是谋定后动、出其不意、有效集中、保障有力，对政治的模拟则通常体现在兵力兵器本身的对比和某些胜利条件的设置。战术级兵棋通常模拟的是阵地构建、火力配置、兵种合成、攻守得宜，对战役全局的规划则鲜有着墨。兵棋与政治经济学理论模型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两点：第一，尽管经济模型中存在着阶级斗争，但由于阶级利益和阶级力量对比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大体上是确定的，阶级斗争的手段以及效果多数是可以预知的。如果经济模型基本符合现实，我们手里有什么“牌”，资产阶级大体清楚，资产阶级打着什么算盘，我们能猜得八九不离十。政治经济学模型反映的是历史大趋势，是阳谋，是阶级斗争总的力量对比，只有到了历史激变的时期，这种“线性”的总体格局才有可能部分被打破。但在兵棋中，我们往往并不十分清楚对手的意图，也不是很清楚对手实现意图的手段，因此指挥员的指挥艺术就成了决定推演结果的关键力量。第二，在政治经济学模型中，“不确定性”的影响范围通常限于资本家私人投资行为和与之相关的金融市场波动。这种不确定性当然重要，但其影响却可以通过有效的国家干预来有效遏制。反映到模型中，“不确定性”通常会表现为私人投资在“外在”因素影

响下的波动，这种波动可以被政府投资的增减抵消。在兵棋中，不仅对手的行为难以捉摸，战斗、后勤、天气等一系列因素都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兵棋中的“指挥员”不仅需要在信息混沌的情况下克服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或者轻敌情绪，还要学会如何利用不确定性干扰对手的判断。所以，比起经济模型的“科学”，兵棋推演更像是一门“艺术”。

想要准确地抽象战争中对立意志在不确定环境中的较量，兵棋就需要有反映这种较量的机制，而兵棋的推演流程就是这种机制的体现。

从生活常识看，最“真实”的兵棋推演流程就是“即时制”推演流程。双方指挥员随时对战场出现的情况作出反应。即时制兵棋的代表是《指挥行动》系列

(https://store.steampowered.com/app/521800/Command_Ops_2_Core_Game/)。在即时制兵棋中，双方的思考和犹豫都会消耗兵棋推演中的虚拟时间，下达给下属指挥部的命令也会有因为模拟战场环境而有所延迟。但即时制兵棋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在战争中，并非每一分钟都是等价的。指挥员密集思考的时间是珍贵的，而参谋部办公和下属单位执行的时间则不那么重要。在战争环境中，前者可能只有几个小时，后者则有可能长达数天甚至更久。如果时间“流速”设定太慢，乃至与现实战争时间等同，那么没有几个人能够有时间推演。如果时间“流速”设定太快，兵棋就成了在电脑前“拼手速”的即时战略游戏，失去了思考的深度，折损了决策的质量。

由于即时制兵棋无法区分关键决策时间和一般执行时间，其应用领域受到了极大地限制，除了一些节奏较快的模拟海空战斗的兵棋以外，目前存在的兵棋基本都遵循回合制的推演流程。

回合制流程分为两大类，最接近即时制特点的是“同步回合制”兵棋。所谓“同步回合”制（We Go），就是推演双方在回合计划阶段为己方单位设定本回合跨度内不同时间点的行动。举例来说，假设一个回合的跨度是一周，这一周被分为七个不同的时间点。红方指挥官在回合计划阶段下达如下指令：红方第1摩步团周一从A地出发，在周三经过己方前沿B地，并计划于周五开始进攻蓝方占据的C地。在同一个计划阶段，蓝方指挥员下达如下指令，驻守C地的蓝方坦克2营周三出发，配合己方其他部队在周五对红方前沿B地展开进攻。双方下达命令之后进入回合执行阶段。根据双方下达的命令，有可能红摩步1团和蓝坦克2营于周四在B、C两地之间的某处遭遇。由于发生遭遇时仍处在回合执行阶段，遭遇战的结果由遭遇双方的兵力、火力、双方在回合计划阶段设定的战斗、撤退和支援条令（doctrine）以及战场不确定性决定，并由计算机解算得出。这种同步下达命令，同时实行，当场解算的同步回合推演流程既保留了即时制兵棋的拟真性，又突出了关键决策时间和一般执行时间的区别。在这一类兵棋中，最有名的是《闪点战役》系列

（https://store.steampowered.com/app/2366530/Flashpoint_Campaigns_Southern_Storm/）。但这一类兵棋仍然需要计算机完成大量的战斗解算，其中的算法相当复杂，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学习，兵棋手

册可能长达数百页，就算是读完了之后也是一头雾水。而且兵棋的算法越是复杂，指挥员就越是无法有效形成对战斗的感性认识，无法“一眼看穿”战斗的可能结果，无法迅速形成对全局的把握。相应的，指挥员需要在算法和规则细枝末节上花费大量时间。总之，一切算法复杂到无法通过指挥员的心算来实现，从而不得不借助计算机的兵棋，都有把指挥员逼成技术员的可能，从而偏离了兵棋推演的主旨。

因为以上原因，电子兵棋的发展从来没有真正取代最传统的桌面兵棋。无论是日常的玩家推演，还是美国军方给其政客展示的兵棋推演，抑或是美国军方自己给非技术岗位出身的指挥人员提供的推演，几乎全都用的是摆在桌面上的“异步回合制兵棋”。这也是我们通过兵棋学习战争的最好入门。下图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学员们使用异步回合制桌面兵棋推演台海战争的照片。



所谓“异步回合制”（I Go You Go）就是红方（或蓝方）先进行计划，然后执行计划，接着由另一方制定计划并执行，双方计划的执行和执行在不同的时间完成。一个最典型的“异步回合制”推演流程是这样的：1）回合开始阶段：双方增援部队入场、支援火力补充、工事修筑、处理随机事件等；2）红方阶段：红方移动，红方战斗；3）蓝方阶段：蓝方移动，蓝方战斗（步骤2和3可能重复多次）；4）回合结束阶段：检查补给状态，检查胜利条件等。这种推演流程简洁明了，有关移动、战斗、支援等核心环节规则在推演数个回合之后就能烂熟于心。在对方的阶段，我方只需要观察其行动，并不需要进行大量的计算，极大地减少了学习的时间成本。对于成系列的兵棋而言，只需要熟悉每一部作品少数几条特殊规则，就能很快进入状态。这种推演流程还特别适合桌面兵棋的推演。与电子兵棋不同，桌面兵棋的每一步操作都需要推演者学习推演机制之后才能做出，这就“迫使”推演者去学习规则、思考规则设置的现实含义等，这也是了解兵棋抽象和模拟所必须的思考过程。

当然，异步回合制也不是完美的。由于推演流程是“你一招，我一招”，双方都可以较为轻易地识破对手“出奇制胜”的图谋，并在一个回合之内“见招拆招”。简单的异步回合制兵棋对战役突然性模拟不足，导致其经常产生对防御方有利的战果。除非进攻方拥有不记伤亡的战役决心并坚决执行，否则很容易让推演双方形成低烈度对峙的局面。

在不改变异步回合制基本结构的情况下，兵棋设计者会根据参战部队的特点对推演流程加以改进。一种较为常见的改进方式是增加某一方或者某些部队的行动阶段数量。比如，假设红方拥有较高的机动作战水平，就可以在阶段3（蓝方阶段）之后额外增加一个红方连续作战阶段。在此阶段中，红方的某些部队可以进行再次机动和作战。模拟解放战争豫东战役兵棋《大河滔滔》就有一个解放军的连续机动和连续作战阶段，模拟解放军较强的战斗意志和较好的组织性带来的疲劳作战能力。或者，如果为了反映蓝机械化部队行进间突破的能力，可以在阶段3中的蓝方移动环节为蓝方的机械化部队赋予一个“行进间突破”的能力，让其可以在正式的战斗环节之前不展开部队，而是直接突破红方防御的薄弱地带。模拟二战苏德战争的《为祖国母亲奋战》中就有德军的行进间突破环节，反映德军较为成熟的机械化作战理论和实践。这些特殊关节的设置可以反映不同部队之间组织和机动水平差别，也允许推演者利用和创造战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异步回合制“见招拆招”的缺点。



这些特殊环节的设置并未打破固定的回合流程，尽管创造了某些模拟战役突然性的机制，但是突然性本身却是被多多少少“固定”在这些特殊环节之内。针对这个问题，本世纪初的兵棋设计者们逐渐发展出了“抽签流程”。所谓抽签流程，就是除了回合起止的结算以外，

剩下的增援、补员、移动、战斗、补给检查等环节由抽签决定。其基本的流程是将反映这些环节“行动签”放在一个签杯中，由玩家随机抽取并执行。

以我们推演的《黑暗夏日》为例，下图是第一回合推演结束后的情况：



图中红框内的部分是第一回合执行过的行动环节。

其中，共有 2 个登陆签（环节）：



登陆环节是固定的，反映了6月6日和6月7日盟军突击上陆的行动。

2个英军战斗签和1个英军移动签：



当（可以是任意）玩家抽出英军战斗签时，所有英军单位可以对相邻德军发起战斗。当抽出英军移动签时，所有英军单位可以以其全部以动力移动。为了反映英军指挥体系的僵化，英军战斗签的正反面都是战斗标志，英军移动签的正反面都是移动标志。这就意味着，当抽出战斗签时，英军只能执行战斗环节，无论英军单位邻格有没有德军。如果没有德军，这个战斗签就模拟了英军缓慢的后勤补给系统拖慢了英军的战斗节奏，当英军准备好进攻的时候德军已经溜走了。同理，当抽出移动签时，英军只能执行移动环节，无论英军是否已经抵达了德军的面前。如果英军在已经全面与德军接触时抽到了移动签，

就模拟了英军后勤体系前一阶段过度重视油料和零部件的供应，未能将攻击所用的弹药及时运送。

3 个美军移动/战斗签：



美军移动/战斗签的正反面分别是移动和战斗。这就意味着当抽出该签时，盟军玩家既可以选择让美军进行移动，也可以选择让美军执行战斗。这反映了美军的后勤体系比英军更为灵活的特点。因此美军更能够抓住战机，在一个回合之内执行更多的有效移动和战斗。这也是我和井冈山都高估美军战斗力并低估英军战斗力的原因。

3 个德军移动/战斗签：



德军的情况与美军相同，当抽出德军的移动/战斗签时，德军指挥官可以选择执行移动或者战斗环节。

4 个德军“反应行动”签：



反应行动指的是德军针对盟军行动的反制。德军指挥官将反应行动签放在手边，并可以在任意一个盟军行动阶段之后抢断打出。与上文介绍的全局行动签（移动、战斗、移动/战斗）不同，反应行动签不能调动一方的所有单位，而是只能调动一个师的下属单位（通常是 2 到 3 个）或者同处在一个六角格中的所有单位。被调动的单位可以执行一次移动环节，德军机动部队还可以在该移动环节结束之后发起一次进攻。反应行动体现了德军在内线防御作战中拥有的灵活调动预备队的优势。当盟军即将达成突破的时候，一次德军反应行动就可以把一个装甲师调集到将要被突破的地段。当盟军的某些单位过于前出或者结合部出现漏洞的时候，德军如能利用反应行动进行一次恰到好处的反击，就能严重干扰盟军的作战计划。

由于抽签顺序是随机的，双方指挥官只能在回合将近结束的时候才能大体猜测剩余行动签的情况。除了德军反应行动以外，任何“见招拆招”的行动只能依托自己对对方意图的大概预判。而且，随机抽出的行动签也迫使双方指挥官针对抽签情况进行临机决断。在双方兵力兵器相差不大时，每抽出一个行动签都需要双方对战场情况进行重

新评估并酌情修改作战计划。拥有抽签流程的兵棋的计算量未必很大，但是思考量是极大的。抽签流程模拟了战场瞬息万变的情况。就《黑暗夏日》来说，第一回合最先出现的两个德军反应移动签模拟了德军西线B集团军群参谋长斯派达尔在军事主官隆美尔回家给夫人过生日不在岗位（隆美尔经常在关键时刻不在指挥岗位）时针对盟军登陆的临机决断。但是由于隆美尔返回指挥部的行程被随机因素耽误（比如要给过生日的隆美尔夫人买一双新鞋），导致美军在没有德军系统性干预的情况下顺利进行了一次移动环节（美军第1移动环节）。在此环节之后，斯派达尔只能利用自己的职权调动一个装甲师填补战线漏洞（德军第3反应移动环节）。在隆美尔抵达指挥部之后，指挥系统重新恢复运转的德军终于可以进行一次全盘调动（德军第1移动环节）来重组摇摇欲坠的防线。

抽签流程不仅仅可以给双方的行动创造不确定性，而且可以定向地创造不确定性。在《黑暗夏日》中，天气状况（也是由抽签决定）决定了双方行动签的数量。比如在对盟军最有利的晴朗天气下，美军拥有4个移动/战斗签，英军拥有2个移动签和2个战斗签，德军虽然拥有3个移动/战斗签（毕竟是德军拥有防御战的优势），但只有一个反应行动签。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双方的行动仍然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这种不确定性显然对盟军极为有利。对于德军而言，唯一的反应行动环节尽管十分珍贵，但是面对良好天气下获得充足补给和火力支援的盟军也是无能为力的。相反，在风暴天气，美军只有2个移动/战斗签，英军只有1个移动签和1个战斗签，德军却拥有4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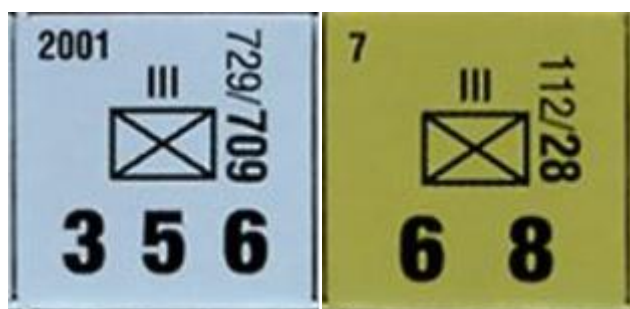
反应行动签。这就意味着在每一次盟军行动之后，德军都能够打出反应行动签来执行堵口或者反击的计划。再加上德军本来就有的 3 个移动/战斗签和恶劣天气对德军机动能力的正面效果（盟军空军失效），德军可以在盟军缺乏准备的地区发起凶狠的反击，并且可能还有足够的机动能力发展突破或者撤回安全位置。

有些同志可能会问：历史上的指挥官并不是抽签进行决策的，抽签系统是如何“抽象”一个与之性质完全不同的决策过程呢？这个问题既涉及到了唯物辩证法对于“抽象”问题的理解，也涉及到一些基本的统计思维。按照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战争最抽象的形态就是搏斗。在现代战争中，可以抽象为人使用火器试图摧毁对方的努力。一只步枪拥有一系列大体确定的并且可以量化的性能参数，一个士兵也拥有一系列大体确定的并且可以量化的技战术水平和战斗意志指标。当运气等因素被大量数据的累加平均化后，一个手持步枪的士兵就拥有一个范围大体确定的作战效能。要计算这个作战效能，只需要知道关于这只步枪和这个士兵的不超过 20 项数据就够了。这样得出的作战效能是直接从系统中各个部分抽象出来的，这种从局部到整体的抽象叫“微观抽象”。正像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从“理性经济人”推导到“市场最有效”一样，兵棋中微观抽象也是从战争中微观个体的特征推导战争的宏观结果的。同样地，正如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并不能真正地从“理性经济人”推导到“市场最有效”而不犯重大逻辑错误，兵棋“微观抽象”的个体并不能直接累加成为一个整体。一个手持步枪的士兵的作战效能好计算，但是一个步兵班组就需要考虑到班长的领导

能力、性格特征和班组战术条令的问题，这些情况至少是不容易量化的。当我们“累加”到步兵团这个层级的时候，就要考虑该团司、政、后、装的组织关系以及步兵轻重武器之间的协同。当我们进一步“累加”到步兵师层级，就会有步炮协同、步坦协同，与不同军兵种相互配合的问题。随着累加层级的上升，整个兵棋系统的复杂度将会以更快的速度上升。这就导致了两个问题：第一，大量的信息收集，数据量化，数据整理以及确定数据之间关系的工作将会成为巨大的负担。由于数据之间的相互联系，一个参数设置的错误就有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紊乱，牵一发而动全身。第二，随着累加层级的提高，每一层级的个体数量会急剧减少。比如二战苏军共有超过 2000 万人服役，但是只有不到 500 个师，62 个集团军和 10 余个方面军。方面军层面的不确定性，哪怕只有一个，比如最高统帅部战略方向的统筹，都不满足中心极限定理的基本条件。推演的层级越高，那些仅仅依靠“微观抽象”的兵棋系统就越是脆弱，越是需要大量的推演试玩来让无数玩家“试”出一组看起来合乎情理的参数。举个例子，假如有相当数量的玩家认为 1942 年的意大利步兵师应该加强一些的时候，兵棋设计者就只能通过修改某些参数来达到这个效果，比如增加意大利步兵师的士气和组织参数等。当兵棋系统的参数需要推演者“试玩”之后给出意见决定而不是经由统计分析决定时，“微观抽象”的所谓严谨性也就走到头了。

与微观抽象相对应的是宏观抽象。所谓宏观抽象，指的是兵棋设计者并不是从战争最简单的因素——即相互搏斗的人——出发，而是

从某个更高的层级出发，根据历史经验直接设定参数和机制的抽象。在《黑暗夏日》中，设计者根据大量的盟军和德军历史资料，将一个美军普通步兵团的战斗力设置为6，将一个德军普通步兵团的进攻能力设置为3。考虑到德军在诺曼底地区多年的经营，将德军的防御能力设置为5。如下图所示：



这种参数的设置并非来源于作者熟悉美军和德军每一个人、每一杆枪、每一门炮的性能并将其加总，而是根据历史上两军的实际表现（如双方在进攻和防御时实际的兵力对比）综合考虑作出的判断。如果我们理解这种宏观抽象的话，那么抽签流程也就不难想象了。在某种特定天气的一周中，双方各自能够进行的总的行动数量是大体确定的。好天气盟军多一些，坏天气德军多一些。在一个回合（一周）内，会发生组织协调不当、后勤补给不畅、指挥员犹豫不决、地下组织反抗、乃至隆美尔在盟军登陆时不在指挥部等诸多无法从微观方向量化的不确定性。当这些不确定性造成的战局变化会在大约一周之内显现在战场上时，使用抽签机制会很好地模仿这种“行动总量大体确定，行动方式难以预知”的情况。

让我们再用经济学理论做一个类比。在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中，社会的总消费量是由每个“理性经济人”的消费量加总而成的。每个个体的消费量又是由其根据效用（享受）最大化的目标将一定的收入分解为储蓄和消费决定的。当我们要推测一个社会的总消费水平时，如果仅从微观抽象出发，就需要研究每一个人的收入水平和储蓄行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要解决这个宏观上的问题，我们的抽象从一开始就应该是宏观的。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的抽象方法在解决这类问题上就有很大的优势：根据统计经验，在一个不长的历史时期，一个社会的总消费量与其总收入（GDP）大略呈某种相对固定的正比例关系。要预测消费水平，只需要知道目标年份的总收入水平即可。研究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不必关注个人的具体行为，只需要知道这些个人的具体行为的相互累加如何在特定社会中如何呈现出某种全局特征就可以了。

这种抽象方法并非一些人说的“过程魔幻，结果合理”的巧合，而是研究人员和兵棋设计者根据历史经验取舍得当的结果。

第 1 到第 5 回合战报

在上次的推演笔记中，我们讨论了井冈山卫士（盟军）和草庐棋士（德军）的作战计划。如下图所示：

盟军进攻计划：



德军防御和反击计划：



第 1 回合（6 月第 2 周）结束之后的情况如下：



盟军登陆作战十分顺利，哪怕是奥马哈海滩德军较为坚固的工事也没有给美军（第1、2、29步兵师和第2装甲师）造成显著的损失。由于上文提到的指挥系统反应迟缓，德军未能在第一时间对盟军的登陆做出全局的反应。圣洛以北的树篱地带遂被美军迅速占领，致使德军失去了一道纵深约为10公里的战役缓冲区（图中橙色虚线内的区域）。从犹他海滩登陆的美军显然就没有那么幸运。在试图向北突击并迅速夺取瑟堡未果后，其向南进攻卡灵顿的图谋也被挫败。面对困守卡灵顿的德军第6伞兵团，美军一整个步兵师损兵折将，只能隔河与德军对峙。美军的行为并没有明显超出预期。德军则执行战前计划，将瑟堡守备队大部调出，尽可能迟滞美军在科唐坦半岛的进展速度

（图左侧黑色箭头）。同时，除了卡灵顿留下第6伞兵团继续防御之外，其余部队撤出美军犹他和奥马哈两大集团的结合部，进入南部树篱地带继续防御。

英军方向则出现了一些很有趣的局面。一只英军偏师试图向西袭取英美两军结合部处的巴约，但被德军一个虚弱的步兵团顽强阻击。英军主力向着正南，而不是卡昂方向运动。井冈山卫士想干什么呢？他是想迅速跨过树篱之前的平坦地形，然后向东对卡昂地区展开大包围？还是继续向南推进，配合南进的美军将德军防线一勾切断？或者仅仅是虚晃一枪，让我把新增援的党卫机动师部署在树篱一线然后回师正面卡昂呢？上述三种可能性在图中用土黄色红框箭头表示。由于英军登陆之后的地形基本都是平地而且英军拥有极佳的机动力，就算英军指挥和后勤系统存在僵化的问题，在如此狭窄的作战低幅也是很容易根据现实情况转换作战目标的。英军也把一些装甲部队向东增援过了奥恩河，与先前在此空降的英第6伞兵师会和，并且重创了德军派往此地迟滞他们的一个机械化团。现在看来，卡昂迟早成为德军的一块不得不防守，但是防守起来代价极大的阵地。尽管英军的行动让德军被迫集中了前线四个机动师中的三个（第21装甲师和党卫军第12、17师）到英军正面，但卡昂地区地形暴露，纵深极小，让德军的防御战只能以静态消耗的方式进行。德军是消耗不过英军的。

为了主动制造一些战役纵深，为后续增援部队进入有利于防守的位置创造时间，我(草庐棋士)自作聪明地将 3 个步兵团和 1 个党卫军 12 师的机械化团调到了防线正前方作为暂时的屏障（图右侧三个黑色箭头）。未曾料想，英军在舰炮支援下的猛烈攻势不仅让其中 1 个步兵团直接“蒸发”，另一个步兵团遭受重创，破裂之后的防线还让这些过分前出的单位被英军孤立（见白圈内的两个单位）。在回合最后的补给检查阶段，这些被孤立的单位需要承受被切断补给的损失。

总结第 1 回合的作战，英军没能进入或者完全占领卡昂，美军也没能突入或者占领瑟堡。一些重要的据点，如卡灵顿和巴约还在德军手里。但德军的机动师也被完全牵制在防御战中，完全失去了冲上登陆点把盟军“赶下海”的可能性。尽管第一回合能够传达的信息不多，但是井冈山调动美军迅速冲进树篱地带和调动英军坚决向南推进的行为来看，此人的指挥风格有可能较为刚猛。但是他也并未虚晃一枪，放开登陆场诱使我将装甲部队投入并最后歼灭之。这有可能说明井冈山也并不想要进行一场豪赌。

第 2 回合（6 月第 3 周）结束之后的情况如下：



本回合的天气是多云，这算是一个较“好”的天气。盟军可以使用所有已经到场的火力支援，德军在的攻击能力也会被盟军的防御性近距离空中支援所削弱。德军也无法大摇大摆地在白天利用公路行军，只能躲躲闪闪地在夜里行动或是利用林间小道的掩护。这将极大地拖慢德军增援部队赶到前线的速度。在图上也可以看出，德军增援高炮部队和步兵都未能及时赶到前线。本回合盟军的地毯式轰炸和一些其他的支援也可以开始使用，这对德军是非常不利的。

在战线的最西北端，美军集中了第 101 空降师和第 30 步兵师，在地毯式轰炸的掩护下对扼守树篱地形的德军 709 步兵师发起强攻。德军指挥官并没有想到美军会这么早就使用极其珍贵的地毯式轰炸支援，低估了美军想要迅速夺取瑟堡，消除后顾之忧的决心。709 师虽然是个静态防御师，但是却在本场防御战中打出极其精彩的战损比

而且扼守树篱没有后退一步。旁边的美军第4步兵师也对德军第243步兵师发起强攻，同样也损兵折将无功而返。看来德军将一整个步兵师的三个团集中起来的“铁索连环”防御战术确实有效。卡灵顿方向，美军第2装甲师在付出了一定损失之后终于配合步兵将德军第6伞兵团逐出城镇。由于受到削弱，美军第2装甲师被调到科唐坦半岛上战况较为缓和的地段补充休整。卡灵顿以南两片沼泽之间的道路本是德军战前计划中预留的伏击圈。但是美军在此地集中了2个步兵师一共6个团的兵力（从左往右第3条绿色黑框箭头），已经超出了德军伏击做能有效歼灭的数量。由于圣洛北部的树篱地区已经被盟军占领，德军机动部队也被大量吸引到了英军方向，在此地伏击美军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综上所述，德军在道路两旁的树篱间部署了教导装甲师的一个较强的团，以求以较小的损失拖慢美军在这个方向的进攻。

在圣洛以北的树篱-密林交错地带出现了德军第一次危机。由于美军方向德军只有一个教导装甲师的机动力量，良好的天气也阻碍了德军增援部队的运动，导致圣洛以北的一处主要道路两侧15公里的防线只有德军352步兵师的一个被打残了的步兵团进行防御，而这处薄弱地带的两端也只有德军步兵。在此地，井冈山至少集中了美军第2、79、83步兵师和两个装甲骑兵团，侧翼的美军第29步兵师以及从奥马哈海滩上陆的增援部队也可以一路畅通无阻地通过这条道路进入德军的后方（绿色红框箭头）。如果下回合美军坚决从此地取得突破，德军面向美军的整个防线就有可能彻底失去平衡。就算美军不能继续发展突破，也很有可能在圣洛以北围歼机动性较差的德军第

77 步兵师和第 3 伞兵师，造成德军兵力进一步紧张，防线进一步稀疏的状况。

在英军方向，为了应对英军在宽大正面上展开的进攻，德军将新增援的第 2 装甲师也调动到了英军的面前。这样，面对英军和美军的德军机动师数量达到了 5 比 1，这已经极大地限制偏离了草庐棋士战前“重美轻英”的构想。但由于井冈山幸运地在回合较早的阶段连续抽到了两个英军的战斗签（这可能模拟了英军充分的火力准备），他利用英军在卡昂以北以西的兵力和火力优势，在地毯式轰炸的掩护下歼灭了党卫军 12 师的一个团，冲进了卡昂城区，并将另一个团孤立在了河西岸的城区内（白色圆圈处）。由于美军在西面的推进，在树篱防线面对英军的德军机动师不得不后撤来避免侧翼暴露。在战线最东端，英军又将一个师和两个独立装甲旅调过奥恩河，击退已经疲惫不堪的德军 21 装甲师的残部，从和东岸向卡昂挺进。历史上，这个德军 21 装甲师是英军在北非的老对手，现在又在卡昂相会，实属冤家路窄。目前在卡昂附近的英军已经摆出了要对德军进行“小包围”的架势，德军如有不慎，就会遭遇第 21 装甲师被歼灭而且卡昂以东高地防线洞开的可怕局面（土黄色红框箭头）。

在这第 2 回合中，井冈山卫士的指挥风格更加清晰地体现了出来。在占据兵力兵器优势的情况下，他可能未必愿意豪赌。但是一旦出现战机，哪怕是转瞬即逝，他往往毫不犹豫地发起非常凶狠的进攻。下

面就看他如何利用圣洛北部树篱-密林地带和卡昂附近的机会发展突破了。推演至此，渐入佳境。

第3回合（6月第4周）结束之后的情况如下：



第3回合是井冈山的幸运时间。本回合的天气状况为晴朗，除了多云天气下所有的对盟军有利对德军不利的状况外，晴朗天气下盟军的战略轰炸机可以深入德军腹地大举破坏铁路交通系统。在兵棋中，这反映在德军援军的数量被限制。历史上，6月下旬是德军统帅部终于从“加莱登陆”的误判中清醒过来，认识到诺曼底是唯一登陆方向的时刻，也是德军大量机动师蜂拥入场的时刻。在这个时候遭遇一个晴天，实在是德军指挥官最不想看到的事情。

防线东北端的美军继续集结两个师的兵力在地毯式轰炸的掩护下向德军 709 师驻守的树篱地带发起强攻。出乎意料的是，709 师再次创造了奇迹，不仅自身损失轻微，而且重创了美军一个空降团。至此，美军的地毯式轰炸资源被消耗干净。旁边的 243 师也成功地顶住了美军一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旅的进攻。历史上，瑟堡于 6 月 27 日被美军占领。但在推演中，美军连瑟堡的门槛都没有摸到。不过美军在科唐坦半岛中部取得不小的战果，在歼灭了数个德军“东方营”之后，美军在此打开了一个 15 公里的缺口，如果美军从此地向西的突破（地图最左端绿色红框箭头）不受阻，下回合就可能切断瑟堡与德军后方的联系，孤立瑟堡。在圣洛方向，德军上回合的缺口如今发展成了一个巨大的前线危机。美军集中了至少 5 个步兵师穿过缺口，占领了德军西线交通枢纽圣洛，并且包围了德军第 30 独立摩托化步兵旅和第 3 伞兵师的全部 3 个团（图左侧两个白圈），德军教导装甲师的一个机械化团也在战斗中被歼灭。整个德军防线西段只有第 200 装甲营（装备缴获的法国坦克）、大难不死的第 6 伞兵团和教导装甲师的 2 个机械化团形成一条十分稀疏的防线。为了应对这次前线危机，德军指挥官将本回合增援的三个机动师中的两个（党卫军第 2、10 师）投入到了面对美军的西方。由于良好的天气阻碍了德军的调动，这两个师尚未抵达有效的防御或反击位置。如果德军无法有效阻击美军向库唐斯方向前进的意图（地图中部绿色红框箭头），德军西部防线就有崩溃的危险。

英军方面，井冈山“结硬寨，打呆仗”的做法终于获得了回报。在英美两军结合部，英军一直对德军保持者不小的压力，让德军不得不把第2装甲师和党卫军17师部署在这附近。直到卡昂方向的局势变得实在不可收拾才把党卫军17师调动到防线后方的道路上，准备向卡昂增援。在卡昂方向，英军成功地歼灭了德军第21装甲师的2个团并且包围了最后的1个团（图右侧白圈），如果德军下回合不紧急撤退或者组织救援，该团也难逃覆灭的命运。党卫军12师仅剩的1个团也被逐出了卡昂以南的高地，剩下的步兵单位战斗力极差。从南方增援过来的党卫军第9师是这一地区唯一的生力军。总的来看，面对英军的德军总实力是不弱的。但是良好的天气限制了德军的机动，不利于防御的地形也让德军的机动部队无法轻易抽身增援薄弱地带，英军极高的机动性使其可以选择突破的位置，而德军就算疲于奔命也赶不上。

第3回合德军防线垮塌的速度要远超过德军指挥官的计划。卡昂和圣洛的丢失不仅让德军失去了两个有利于防御的重镇，也让德军丢失了两个重要的交通枢纽，限制了对德军机动作战至关重要的东西方向调动的能力。尽管井冈山抓住了战机将德军前线的漏洞扩大为了前线危机，但是其总体战略设计的问题也在这个时候显露了出来。由于美军过度分兵，井冈山既没能完成夺取瑟堡的目标，也没能及时切断布列塔尼半岛。这种重大战役计划的问题是不可能通过取得几个战术胜利来掩盖的。只要天气一旦变得对盟军不利，井冈山这种不留设计余量的战役计划就会四处漏风，无所不寡。

这不，第4回合（7月第1周），机会来了。



第4回合是风暴天气。盟军全部的空中支援一律不可使用，盟军的增援部队也会因为人工港无法承受大浪而被部分阻滞，同时不能获得任何补充。德军的机动能力不受限制，而且可以获得宝贵的装甲部队补充。这是德军主动采取行动的大好时机。由于先前德军防线遭遇了危机，部队被包围，防线被冲破，机动师遭受损失或者被钉死在防线上，德军已经没有本钱展开战役级别的反攻。但是，德军仍然可以利用风暴天气的有利条件解救被包围的部队，重新占领有利于防御的地形，并且巩固已有的防线。

在战线西北，不甘失败的美军对德军709师再次发动了强攻。在这次进攻中，709师全部三个团都已经损失过半（算子翻面）但是参与进攻的美军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更重要的是，709师仍然把守

着瑟堡的大门没有后退一步。在科唐坦半岛方向，德军抢先一步将243师的一个团和第206坦克营调动到了美军西面，阻止了美军切断瑟堡补给线的企图（图左侧两条细黑箭头）。在圣洛西北的树篱地区，德军集中了党卫军2师、党卫军第10师和教导装甲师的两个团在集团军群炮兵和火箭炮的掩护下撕开了包围圈的缺口，并成功救出了第3伞兵师（图中灯光附近两条黑色粗箭头处），并在圣洛西面的河流和树篱地区重新稳定了防线。德军第30独立摩步旅由于处在包围圈的深处，无法救援，被盟军歼灭。

在英军方向，德军调动党卫军第9师、党卫军第12师一个团、党卫军第17师一个团、党卫军第103重装甲营，成功抓住了贪功冒进的英军第43步兵师（图右侧白圈处）。在将该师重创之后，将其包围在了卡昂以南的高地上。被包围的英军43师距离最近的英军第3师和51师只有不到7公里的距离，在高地上仿佛还能看见友邻部队炮火的闪光。但在德军的重重包围下，这最后7公里就是咫尺天涯。

在第4回合，德军成功地解救了大部分被美军包围的部队，稳定了防线，而且反包围了英军一个整师并有望在下一回合消灭之。这些行动当然不会有改变战局的效果，比起战前计划中的几次反攻，规模也小了很多，最多只能起到拖慢盟军进攻脚步的作用。但是这些反击行动的成功也从侧面说明了井冈山卫士同志在兵棋推演中可能存在过度自信的问题。德军在前三个回合确实打得很谨慎，基本上没有发动什么像样的进攻，但是这并不代表德军已经失去了攻击能力。第4

回合正是战前估计的德军反击能力倒“U”型曲线的顶点，而且又是一个风暴天气回合。这就意味着如果盟军不注意自己防线的完整性，或者某些位置过度前出，就会有被德军集中兵力攻击的危险。在本回合德军发动的两场反攻中，德军总共动用了相当于4.5个装甲师的兵力。对于盟军指挥官来讲，忽视这只反击力量的存在无疑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当然，德军的战术思路也不是没有问题的。由于德军“意外”地守住了瑟堡和科唐坦半岛交通线，德军现在的防线长度战前计划的要长了四分之一。由于圣洛过早地失守，德军的防线在中部英美两军结合部有又形成了一个向南凹陷的形状。盟军虽然是进攻方，虽然看起来是在向四面八方进行战术上并不十分有利的“离心突击”，但是盟军后方的几条公路已经连通，盟军将会有内线作战一方调动灵活的优势。德军虽然暂时稳定住了战线，但是向南凹陷的防线以及交通枢纽的丢失将会极大地阻碍德军的调动。这将对德军在以后的机动防御造成极大的不利影响。在现在这条来之不易防线上呆多久，将是考验德军指挥员的重大课题。

在接下来的第3篇推演笔记中，我们将介绍第5回合（7月第2周）到推演结束的第10回合（8月第3周）的情况，并且对整场推演进行总结。

中国人所理解的“死” —— 不是无可奈何的谢幕凋零

作者：井冈山卫士

编注：下面是井冈山卫士编辑与其他网友在隐秘战线发起的一个帖子下面围绕历史上“人地矛盾”问题的讨论，内容丰富。井冈山卫士同志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动地解释了，为什么有些阶级社会“人命贱”，有些阶级社会提倡“武士道”，而另外一些统治阶级却能标榜并在某种程度上实践所谓“仁爱”。现生成文章，供各位网友进一步讨论。

原帖在这里：

<http://redchinac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977&extra=&page=5>

还是公平网友说：

中国这个地儿，人地矛盾（人与自然资源的矛盾）尤其紧张，“属于世界一流水平”，是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完全没有阶级妥协的空间，无论什么阶级当政都得搞专制。

现在是资产阶级专制，未来是工人专制（无产阶级独裁），以前是官绅-地主专制；相比而言，工人专制反过来就是最民主的了。因为谁都能当工人，但只有极少数人能当食利者。

井冈山卫士评：

提到人地矛盾，这里说点题外话，思考还不成熟，见谅。

我赞同“人地矛盾”越激烈的地方，通常人际关系也越紧张的总体看法。当然，这里的“人地矛盾”并不是抽象的人和自然的矛盾，而是阶级社会中的阶级矛盾通过资源分配方式的外在体现。下文所有的“人地矛盾”都指的是这种矛盾。

就我读过的历史和人类学的书来讲，中国的“人地矛盾”水平虽然较高，但是还没有到“世界一流”。

“人地矛盾”最尖锐的地区通常是那些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之前就已经达到或者越过“生态极限”的地区。最典型的例子是玛雅，其次是阿兹特克。这两个地区的人地矛盾十分尖锐，以至于战争中俘虏的敌人成为了重要的蛋白质和脂肪来源。印加帝国的情况就好些。一种解释是中美洲（不是南美洲）地区的大型哺乳动物很早就被人类杀完了。剩余的动物，如狗和火鸡，则要和人类抢粮食。因此，养狗养鸡不如种地。地种的越是劳动密集，人口增长也越是压缩每个人获取的营养。因此，玛雅和阿兹特克遭遇了典型的“马尔萨斯陷阱”。玛雅人没扛过去，社会崩溃。阿兹特克人则采取了增加死亡率的方式，组织大规模的人吃人，来压制人口数量和社会复杂度，维持脆弱的平衡，直到被西方殖民者摧毁。印加帝国则尚处在“王朝周期律”的上升阶段，其在殖民者来之前的扩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地矛盾的压力。这有点类似于罗马共和国晚期。

与人地矛盾相关的人际关系紧张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人命不值钱”。这在中美洲的大规模殉葬中也能够体现出来。

日本和朝鲜的人地矛盾虽然不如中美洲，但是由于其地理的封闭性，这两个地区也明显呈现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围城社会（besieged society）”的特征。所有能开垦的地区都被开垦了，地方的政权组织，无论是否被中央有效管辖，都有能力基本掌控自己的地区。除了朝鲜人能往女真跑以外（比如李成梁家族），朝鲜和日本的农民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社会上都没有脱离自身土地的可能。因此，中国的“侠客”和流民可以依赖非常松散的“江湖”或者会道门组织，大不了可以跑到深山老林里。但是日本和朝鲜的人地矛盾让他们的深山老林也被政权机关有效管辖，哪怕是黑社会，也多数直接依附于政权。

在这种逃无可逃的人地矛盾中，人的生命本身的价值被大大压低了。在土地数量和质量相对固定的地方，一单位额外劳动投入的粮食产出是递减的。也就是说，除去这一个劳动力自己必需的粮食以外，其“净产出”越来越小，有可能会最终为负。这种人命的经济价值的缩减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应则是人命本身变得越来越不值钱。在意识形态上，中国在“华夷杂处”的时代，还有“夷狄入华夏则华夏之”的兼容并包。但日本和朝鲜自达到了某个生态限制之后，都没有产生原创的，以“仁爱”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而以“仁爱”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或者简单地说“来我这，你就能活得好”，则是历史上大帝国（中国、罗马、波斯等）给境内和周边各民族的“社会契约”。

典型的日本“武士道”思想，哪怕是在被近代法西斯主义“改造”以前，也都是强调“切腹明志”。而这个“志”，哪怕在同时代的中

国人看来，很多也都是微不足道的东西。考虑到日本江户时期中下级武士获取的蛋白质和脂肪数量可能与中世纪早期欧洲农奴差不多，日本武士“轻死生”的态度显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勇敢”，而是由于他们一方面就处在“过剩人口”的边缘，主君不是离不开他们，另一方面，这种生活水平也未必能让他们有什么生活的乐趣。因此，人际关系的紧张，以及与此相关的人命卑贱，本质上是多数人口处在一个几乎生不如死，但又逃无可逃的阶级、经济、地理、生态囚笼之中。这种“围城社会”的意识形态也明显地体现在朝鲜和日本的各种文艺作品中。比如，南朝鲜的灾难片很有名，日本文学中的“物哀”思想也很能反应某种“无边无际”的绝望情绪。

中国虽然总体人地矛盾也很突出，但是突出的时候总是集中于王朝晚期。就算如此，中国广大的地理空间也给了群众一定的“逃亡”空间。魏晋有“桃花源”，明清有神农架；南下可以“填湖广”，北上还能“闯关东”。这些大规模的，最初以逃难为目的的人口迁移，在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后就有可能形成挑战中央政权的流民大军。当农民起义领袖说出“等死，死国可乎”这句话的时候，中国人所理解的“死”就不是无可奈何的谢幕凋零，而是改天换地的豪情壮志了。

